

戴高乐

● 李莉
范海洋

亲历记

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国防大学出版社★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



第二次世界大战
WORLDWAR II

戴高乐

亲历记

李莉 范海洋

(京)新登字 1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戴高乐亲历记 / 李莉编著.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5. 5

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将帅亲历记

ISBN7-5626-0619-6

. 第...

. 李.....

. 报告文学—作品—中国—当代 戴高乐, C. A. J. M. —生平事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战争史—法国—史料

. 125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4782 号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14.80 元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

国防大学出版社

戴高乐 亲历记

第一章摩托上校

在贝当摩下
坚持建立机械化部队主张
著书立说阐述装甲效能
大敌压境，法兰西军政首脑昏庸无谋
大难临头，戴高乐受命指挥第四装甲师
‘首相，我们被打败了！’法国总理求助于英国首相
临危受命，力主抗战

1946年1月20日，法国巴黎。位于塞纳河左岸圣多明尼克路古老的布里安大厦充满着神秘的气氛。

这一天恰好是星期日，本应是合家团聚的日子。可是今天，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各位要人却齐集在大厦的“盔甲大厅”，等待着临时政府总理的突然召见。

上午9时，临时政府总理夏尔·戴高乐神情严肃地走进入门，同早已等候于此的各位部长们握了握手，没等大家都坐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要卷土重来了。我是不赞成这个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一个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政治，我无法制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只得引退。……”

戴高乐的这一举动无不使在场的每一位部长感到震惊。但是，在沉默了片刻之后，人们似乎又理解了他的举动。

1945年5月德国投降以后，在法兰西人民欢庆胜利这段日子里，戴高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直在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一方面同意在法国进行普选，另一方面在宪法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他认为1940年法国之所以惨败，主要是由于多党议会制所造成的政府软弱无力，所以他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通过普选直接产生超脱于各政党的总统，再由总统选择一个不由议会授权。从而不受政党制约的政府，以便对内稳定政局，对外重振国威。可是，戴高乐的方案同法国的议会制传统格格不入、也与战后初期国际上趋向于加强议会民主的潮流背道而驰，因而遭到各政党的强烈反对。当时，政府的重大政策措施往往取决于议会中各主要党派间的协议，戴高乐虽身为政府总理，却受各方掣肘，无法主宰政府，于是很显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政党摆布，要么拂袖而去。戴高乐的倔强性格是早已为人们有目共睹的。因此，当戴高乐毅然选择了后者时，对他的这一举动，人们在震惊之余又感到可以理解。

人们默然无语地看着戴高乐悄然离开大厅，注视着这位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使一个曾被征服的民族从失败中振作起来的反法西斯将军退出了法国政坛。

戴高乐从凯旋巴黎出任临时政府首脑到挂冠下野，历时不过18个月，随后便在巴黎东郊科隆贝双教堂镇过上了隐居生活。

这是一个只有700个居民的小镇。距离教堂不远有一所在这个小镇上颇引人注目的城堡，它就是戴高乐的私人住宅拉布瓦瑟里。

拉布瓦瑟里原是一所十八世纪的建筑物，后来成为破旧的酒厂。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戴高乐同房东达成协议：他用自己的积蓄，每年付给房主一笔养老金直到房主去世为止，以购得这所房子的所有权。不料房主不到两年便死了，所以戴高乐实际花费不多。他把它修缮一新后供家人团聚和休假之用，大战期间，拉布瓦瑟里的部分建筑毁于炮火，战后重建时，戴高乐在房子的一角扩建出一座三面有窗的角楼，角楼底层便成为戴高乐的书斋。

这里地势很高，也很幽静。每当他倚窗远眺，数十里旷野无遮无拦，极目处是古老的山峦和森林，在这幽静的小屋周围还有着面积达一万二千多平方米的宽敞的花园，戴高乐每日在这里徘徊漫步，眺望落日的余辉。就这样，他依靠有限的准将退休金在这里过着宁静的隐居生活。

然而，戴高乐的心境却一刻也没有宁静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重返政坛重振法兰西的念头不停地在他的脑海中翻腾。

1946年6月16日，戴高乐终于打破了达半年之久的沉默，在贝叶城发表政治演说，猛烈抨击政府和正在拟订中的宪法，强调建立一个强有力政权的重要性，企图对制宪进程施加影响，进而为卷土重来铺平道路。然而，他所阐述的主张依然未能被习惯于七十多年来共和议会制传统的人们所接受，再次遭到各政党的强烈反对。

卷土重来不成，戴高乐对法国政坛已经心灰意冷，除了特殊的事件外，他不再对政治感兴趣，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或发表任何政治演说。在拉布瓦瑟里的书房里，戴高乐潜心读书，他既读政治、军事、历史书籍，也读世界文学名著。每当夜幕降临到这个幽静的小镇时，他便徘徊在花园里，仰望星空，回忆往事……

隆隆的炮声哪里去了？

撕心裂胆的装甲战车哪里去了？

血腥的搏杀哪里去了？

洛林十字军旗哪里去了？

……

将军追寻着逝去的足迹，沉浸在往日足以自豪的业绩之中。唯有这，才能排遣他的寂寞和苦闷。

从此，戴高乐把他全部的心血倾注到记述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历的《战争回忆录》上，谱写他一生中最辉煌与壮丽的篇章。

于是，戴高乐将军的思绪——如野马抖开的劲鬃，他的眼前闪现出烽火四起、硝烟弥漫、战车隆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

1932年新年伊始，法国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的办公室里，出现了一张新的面孔。

在靠窗户的一张办公桌前，一位身材颀长，腰板挺直，眼角已显出几道深深皱纹的军官正在伏案书写。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由他自己亲笔填写的履历书被送到了法军总监贝当元帅的桌上，呈现在贝当元帅眼前的是一个新上任秘书的简历：

姓名：夏尔·戴高乐

出生年月：1890年11月

入伍年月，1910年10月

军衔：中校

主要经历：1910年10月10日进入圣西尔军校学习，……

展示在人们面前的这份简历，简明扼要，寥寥数语，勾勒出的这位军人，

戎马生涯可谓是平淡无奇。可是，他却不同于一般的军人，而是一个有政治头脑和远大抱负的军人。当人们踏上戴高乐已走过的四十二年人生旅途时，或许能领略到这一点。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北方里尔市的外祖母家。这是一个世代殷实的法国北方市民和下层贵族之家。家庭成员虽然都笃信天主教，但思想比较开明。祖父是个历史学家，祖母是个颇有名气的文学家，父亲是耶稣会学校的教员。

从小夏尔睁开他那双清澈、碧蓝、晶莹明亮的一双大眼睛的那天起，他所看到的便是一个风云激荡的世界。

同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法国当时正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而且是典型的食利国。法国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十分突出，日益明显地暴露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腐败，贪污舞弊比比皆是，就在戴高乐诞生的翌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巴拿马丑闻”；不久又发生了历时十余年之久，使整个法国严重分裂的“德雷福斯冤案”。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也急剧激化。法国自1870年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后，复仇主义思潮有增无已，尤其是面对着普鲁士作为最强的大陆国家在欧洲崛起，不少人心目中更是滋长春一股强烈的复仇情绪。

他们全家常常在餐桌旁义愤填膺地谈论巴拿马丑闻、德雷福斯案件以及普法战争后法国丧失阿尔萨斯、洛林的国耻，讲到伤心处，甚至潸然泪下。

戴高乐自幼就是在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熏陶下长大的。童年时与弟兄们玩打仗游戏，他总是抢言当法国国王或法军总司令，要为法国干一番事业。有一次，他哥哥扮腻了德国皇帝。想换着当一回法国国王，戴高乐坚决不干，嚷嚷说，“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十四岁那年，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家，郑重其事地对父母说：“我打定主意了，我要考圣西尔军校，当个军人！”五年后，他果然如愿以偿，被圣西尔军校录取，从此开始了军人生涯。

初进圣西尔军事学校，对于年轻的戴高乐来说，再也不像他童年时代梦想的那样简单，那样容易了。按照国防部的规定，新生入校前必须先当一年兵。就这样，戴高乐被分配到了驻阿腊斯的第三十二步兵团九连当兵。

可以说，这一年对于戴高乐来说，是他一生中比较难熬的几段时间之一。几乎刚一到这个连队，他就不喜欢这里的生活，日复一日的军事操练，从天亮起床号开始一直持续到天黑后好久才结束。似乎是新兵天生就要挨老兵的训，老兵把他们这些新兵使唤得精疲力竭，没完没了地出操、训练，从来没有一点自己支配的时间，特别让人腻味的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杂务，一会儿是清扫厕所的脏活，一会儿是到厨房干像削土豆皮之类的劳动。唯一可以寻求慰藉的地方是坐落在古修道院里的阿腊斯市立图书馆，那里存有僧侣们精心收藏的图书，只是到这里读书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

半年时间过去了。同时入伍的新兵大都升为中士，而戴高乐依旧是个下士，同伴们不理解，便有人去问他的连长德蒂尼上尉，为什么不把戴高乐提升为中士，上尉耸了耸肩膀回答道：“我怎么能把这样的小伙子升为中士？他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称心如意哩！”这话一传开，戴高乐便首次获得了“大元帅”的绰号。

亨破仑曾经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因为他没有上进心”。此话说过一百多年后，法国真的出现了一个想当元帅的士兵，他

就是夏尔·戴高乐。

其实，戴高乐早在上中学时，就表现出了当将军、做元帅的强烈愿望。15岁的戴高乐发育得很快，个头儿比同班同学高出一大截，几乎和大人一样高，有一天，他把自己精心装扮了一番，然后去敲家里的大门，并自称是常胜将军“费德尔布将军”来访，逗得家人哄堂大笑。

枯燥无味的连队生活终于结束了。直到进了圣西尔军校，年轻的戴高乐才感到如鱼得水，十分自如。

戴高乐在圣西尔时颇为引人注目，这不单是因为他身材高大，而且还因为他的性格和记忆力，在这所学校和其他军事院校一样，开玩笑是家常便饭。因此，在学校，同学们很少称呼他的姓，叫他时用的是“大夏尔”，“公鸡”、“芦笋”、“两米”之类的绰号，戴高乐对这些打趣的话并不以为然，只是一笑了之。

在与同学们打趣，开玩笑的同时，戴高乐有时也表现出他的冷淡和孤高，这实际上是他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显然，他是严格地以此为座右铭的。为了启发同学们的爱国精神，夏尔·戴高乐多次向同学们发表即席讲演，他的雄辩的口才，惊人的记忆力，敏捷的文思，真正做到了“风格简洁，思想精确”。令同学们叹服。

1912年10月1日，夏尔·戴高乐从圣西尔毕业，军衔是少尉。他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十三。在两年的军校学习中，戴高乐勤奋好学，顽强自信，时常与教官争论，因此，不受某些教官的喜欢。一位教官在谈到戴高乐时曾说：“除身材颀长而外，余皆平平”。戴高乐对此并不以为然。

1912年10月，戴高乐重新踏上了阿腊斯城的土地，回到了自己当年作为见习士兵生活了一年的第三十三步兵团。

离开阿腊斯城仅仅三年，没想到这里的人却叫戴高乐感到陌生。当年嘲笑他只想当元帅的那位连长不在了，就是第三十三步兵团的团长也已易人，新任团长为菲利普·贝当上校。也就是后来成为法军总监的贝当元帅。

因此说，贝当元帅并不是从戴高乐调入法国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那天起才认识他的，也不是通过那张履历表才了解戴高乐的才干和性格的，他们的交往由来已久。

那时，夏尔·戴高乐作为贝当麾下的一个最低级的军官，仍然改不了他喜欢与人争论，敢于发表自己观点的“毛病”。一天，贝当上校在斯卡贝河岸上给他手下的军官们讲解火力的重要性。他的观点在当时的总参谋部里算是“先进的”，因为大部分人仍然认为刺刀比枪炮优越。贝当在讲到孔代王子的一次演习时，年轻的戴高乐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头，指出蒂雷纳元帅是用炮火压倒孔代而拯救了阿腊斯的。言辞铿锵，掷地有声。

真是语惊四坐，戴高乐的这番话刚一落地，便引起在场军官们的一片哗然，对戴高乐的观点大多数人心里表示赞同，但对他的举动却感到不解。一位年轻的少尉军官竟然中途打断上校团长的讲话，并且直言不讳地反对团长的观点，这个小子胆子未免也太大了。

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团长并没有表示出愠怒的样子，相反，这个下级军官的插话引起了上校的好感。课后，人们看见上校团长挽起戴高乐的胳膊，有说有笑地沿着斯卡贝河岸走向远方。在一处幽静的地方，贝当一个劲地和这个下级军官讨论起孔代和蒂雷纳两人各自的长处，言语像是身边的

斯卡贝河流，絮絮叨叨流不尽……

这是年轻的戴高乐首次受到上级军官的青睐，也就是从这一天，一个高级军官和一位有才华的年轻门徒建立了友谊。但是，由于两人性格不同，发生摩擦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1913年法国国庆日那天，贝当下令禁闭戴高乐。因为正当上校骑马检阅他的部队时，他竟让部队解散了。戴高乐认为自己是代人受过，但也无可奈何，只得眼看着第二天星期天不能象往常那样到巴黎去了。离火车开动的时间不多了，戴高乐感到懊丧。也就是在这最后的时刻，戴高乐接了解除他禁闭的指令，戴高乐欣喜若狂，拔开腿一口气跑到火车站，几乎在火车启动的铃声敲响之时，他跳上了刚刚开动的火车，走进一间包厢，戴高乐发现那里已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待气喘嘘嘘的戴高乐坐定之后，他才看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下令禁闭他的上校团长贝当。

“啊，小伙子，你差一点赶不上车吧？”上校带着微笑的面容问道。

“是啊，上校。不过，我想我准能赶得上。”年轻的戴高乐嘴上这么回答，心里却在想都是你上校这么捉弄我，瞧你那得意的样子。

“可是，你那时还关着哩！”上校微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

“那倒不假，但既然处罚不公，我相信你一定会撤销的。”戴高乐坦然地回答。

“好小子，到这时你还不服输！”上校说着起身坐到了戴高乐的身旁。

这一天，一个高级军官和一个年轻的下级军官在巴黎街头美美地玩了一天。

只可惜，这种和平、安宁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战争便象疾风扫落叶一般使戴高乐平生第一次经受了炮火的洗礼。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时，戴高乐还只是一名中尉。1915年，他晋升为上尉，受命指挥一个连。1916年3月。戴高乐所在的部队受命开赴凡尔登战场。

3月2日，德军重炮猛轰戴高乐连队驻守的高地，猛烈的炮火顿时把高地的地面掀去了一层皮，草丛都像连根铲去一样，到处飞扬着碎草和土块。戴着蓝色钢盔的法军士兵掩身在战壕里等待着奋起反击。一阵炮轰之后，戴着绿色钢盔的德军步兵黑鸦鸦的扑向法军阵地。

“给我狠狠地打！”戴着上尉臂章的戴高乐大吼一声，率先跃出战壕。于是，一阵机枪。冲锋枪猛扫着，就好像围猎一群乱冲的野兽一般。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戴高乐发现他的战士们所剩的弹药不多了，而法军的战斗伤亡人数却有增无减。

就在这情况危急之时，突然间有人高喊：“看，我们的援军来了！”戴高乐为之一振，急忙转过身去，看见一群戴着法军蓝色钢盔的士兵。待定睛一看，戴高乐惊讶得像挨了一下闷棍，这些钢盔刚才还戴在阵亡了的法军士兵头上，现在却戴在打死他们的德国人头上。戴高乐胸头不禁燃起了万丈愤恨之火。

“是德国人来了，准备战斗！”戴高乐说完，只听“咔嚓”一声，战士们一齐上好刺刀，准备与德军展开肉搏战。

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颗子弹穿透了戴高乐的大腿，戴高乐顿时昏倒在地。在距阵地不远的团指挥所里，团长布多尔上校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位勇敢的上尉连长中弹倒下，身上布满了鲜血，过了许久，他都没有站起来。布多

尔上校默默地摘下了自己的军帽。

战斗结束后，布多尔上校把战斗总结报告呈交给了贝当将军，这位昔日的团长，戴高乐的恩师此时已荣升为集团军司令，并担任凡尔登地区的司令。当贝当将军在阵亡的法军名单中看到夏尔·戴高乐的名字时，他难过地流下了热泪，立即“追授”这位年轻的上尉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

其实，戴高乐上尉并没有死，他负伤晕倒在地后，被德国人俘虏了。三次越狱均未成功，戴高乐因此被转押到因戈尔施塔特的惩罚营。

两年零八个月的战俘生活对于军人来讲，坐失了立功晋升的良机，这使他极为懊丧。然而他在战俘营里也并没有虚掷时光，因为他通过阅读德文报纸学会了德语，并写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构成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阵营的倾轧》的基础。

1919年波苏战争爆发，波兰招募法国志愿人员同红军作战，戴高乐自愿受募。1920年4月，戴高乐以波军少校的临时军衔指挥轻步兵营作战，以“军功”获得波兰最高勋章和法国军事当局特别“表彰令”的嘉奖。

1921年10月，戴高乐调至圣西尔军校任战争史讲师；1922年11月考入军事学院深造。1924年6月，军事学院的这届毕业生进行战术实地考核。戴高乐深信未来的战争将是坦克战、运动战。他在演习中受命指挥一个军，率领高度机动的地面部队发动闪电式进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彻底推翻了校长穆瓦朗上校的消极防御理论。更有甚者，上校向他提问。

“你右翼师左翼团的辎重队应该在什么地方？”

戴高乐看了看校长却不予回答，转身对他的“参谋长”夏托伊厄说，“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穆瓦朗对戴高乐的态度简直是怒不可遏，高声训斥说，“戴高乐，我问的是你！”

戴高乐从容不迫地答道：“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你还要我承担属于我下级的工作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自己的使命了。杀鸡焉用牛刀！”他据理陈述后，再次以命令的口吻对夏托伊厄说：“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穆瓦朗无可奈何地听完了夏托伊厄的报告后，生气地对戴高乐说：“我早就知道你把许多任务看得轻而易举！”

这次事件，使戴高乐名扬全校，也使戴高乐倒了霉。以穆瓦朗为首的多数考官竭力主张给他的结业考试评为“尚好”，也就是勉强及格。最后，由于贝当元帅的出面，他才被校方折衷，评了个“良好”。

由于没有评上“优秀”，戴高乐未能调往他自己向往已久的总参三局（计划局）实施他的战术和战略思想，也未能在军事学院谋得教席。最后他被派往第四周（运输供给局）去供职。戴高乐气得暴跳如雷，他深知这是对他不受欢迎的独立精神的一种侮辱性的惩罚，深感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他奔到野外，狂吼狂骂，对着天地日月来倾吐他的愤恨：

“军事学院那帮狗娘养的！不当上校长我就不回这个鬼地方来！等着瞧吧！”

赴任前，戴高乐向贝当元帅辞行，贝当允诺以后在自己的参谋部里给他安排适当的职位，还说总有一天要跟军事学院那帮人算帐。

1925年10月，法军总监贝当果然践诺，委任戴高乐为他的幕僚。1927年以后，他又先后被派往莱茵区。中东等地带兵。

1932年，贝当倡议设立最高国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直属内阁总理，负责法国的战备工作。贝当理所当然地又想到了他的得意门生戴高乐。于是，一纸调令召回了正在地中海东部地区部队供职的戴高乐。

扛上刚刚授予的中校军衔，戴高乐踌躇满志地走马上任，他为自己能够进入法国军队最高层军事机关工作而高兴，但同时他也深深地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因为战备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戴高乐更加感到自己的命运已经和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戴高乐担任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一职后不久，他的一部具有独特见解的著作《剑刃》问世了。

《剑刃》一书的出版，大大提高了戴高乐的声誉。他以其新颖的军事思想开始在军界崭露头角。

戴高乐在这本书中阐述了他的哲学观念，同时给他自己描绘了一个英雄形象，他通篇引经据典，文体十分文雅，有些典故使那些法国历史知识不如戴高乐渊博的读者难以理解。书中明确指出，领袖人物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履行职责，以及对个人野心应予以何种限制。在当时国际危机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他呼吁要强化军队的建设，并主张如果发生全国性危机，军队领导人应当挺身而出，挑起治理国家和领导人民战胜危机的重担。

三十年代，正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激化的年代。经济大危机席卷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也不例外。出路何在？从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各种政治思潮应运而生。1933年，希特勒德国崛起，蠢蠢欲动，欧洲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如何看待形势？如何对付未来的战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激烈交锋。

当时，法国军事当局墨守成规，信奉消极防御战略，把几十亿法郎花在马奇诺防线上就是这种理论的见证。戴高乐则认为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建立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配备坦克、飞机和机械牵引的新型大炮等先进武器的机械化部队。这种以机械化部队为主体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集中反映在1934年出版的《建立职业军》一书中。

但是，戴高乐的主张同法国总参谋部的阵地战、防御战的思想格格不入，大多数政客和军人都反对革新。1934年6月15日，即《建立职业军》发表后一个月，法国总理达拉第在议会发表演说，鼓吹消极防御，反对进攻性战略。更让戴高乐大夫所望的是贝当元帅也站出来反对。

20多年前，贝当和军界的同僚在上刺刀冲锋和火炮威力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那时的贝当有独立性格，能接受新思想，并敢于提出新建议，1934年，贝当已是78岁的人了，虽然他的身体还很健壮，但他的思想早已僵化，接受新思想的能力日益减弱。他把戴高乐的理论斥之为“开玩笑”，认为“无论坦克或是飞机都不能改变未来战争的内容，国家的安全只能依靠工事。”他还撰文重申对马奇诺防线的信心，声称有了它就无须担心装甲部队的进攻。

失去了权威人物贝当元帅的支持，戴高乐被完全孤立了。但他从没有停止呐喊，他不停地进行游说，决计要把人们从深夜和睡梦中唤醒。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怀有同样忧虑的人士，开始与他接触。这时，一个名叫让·奥比坦的年轻人与戴高乐结识。此人在权势人物中间交往甚广，

他把戴高乐介绍给两位政治家，一个叫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一个叫保罗·雷诺。

事实证明，雷诺是一位坚决而又雄辩地为戴高乐的主张辩护的国会议员。他身材矮小，但却长着一双机智的眼睛。在戴高乐看来，“他的智慧足以通晓事理，他的才能足以动员舆论，他的勇敢足以使他坚持到底。他虽然已是遐迩皆知的人物，仍然使人感到他还有更远大的前程。”当年的贝当在戴高乐心目中是位英雄，今天的雷诺在戴高乐心目中同样是位英雄。因为，他们都在戴高乐处于孤立的时候，伸出了增援之手。

1935年3月15日，国民议会就一项把服役期延长到两年的法案进行辩论时，雷诺抓住这一时机为戴高乐的观点进行辩护。雷诺宣称。他将投票赞成这一法案，条件是议会通过他起草的一项修正案，建议最迟在1940年4月15日之前建立起一个装甲军。如果这一建议得以实现，那么，德军在那年入侵时就会遭到强有力的阻击，而不致沿法国北部平原长驱直入，所向披靡。

雷诺不愧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他站在下院的讲坛上，对众多的议员们慷慨陈词：

“让我们假设，明天德国就宣战，比利时遭到侵略。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立即支援比利时，帮助它守住东部边界，那么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历史的悲剧也许会重演。比利时军队可能被迫朝海岸退却。那样，我们就不得不保卫法国北部无险可守的长达350公里的边界”。

讲到这儿，雷诺用他那双充满机智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接着说道：

“在坐的哪一位能同意不经一战就眼看着我们最富饶的省份再遭侵略，我们的祖国再受肢解呢？不建立这个装甲军，我们就会丧失一切！”

说到这儿，雷诺的一支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

然而，事与愿违。雷诺虽然振臂高呼，在一些人听来，他说得是那么慷慨激昂，不亢不卑，指陈利害是那么切当，但响应者却寥寥无几。雷诺先生的建议终于被下院的陆军委员会否定了。

不久，国防部长莫林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对赞成机动兵团的讲演中答辩道：

“我们已经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筑成了一个这样坚固的防线，如果我们竟疯狂到越过这个防线作莫名其妙的冒险，那难道是可以想象的事吗？”

莫林的话代表了当时法国政界和军界一些领导人的看法。他们目光短浅，害怕战争，他们错误地认为，退让就可以求和，妥协就可以避免战争。

而此时，萦绕在戴高乐脑际的观念却是：战争即将来临。为击败法国依仗马奇诺防线的梦想，他将继续孤军奋战！

1918年11月11日，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法国贡比涅森林，德军统帅埃茨贝格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停战消息所带来的震动，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比得上德国小镇巴斯瓦尔克的一家陆军医院。从被毒气窒息的死亡中抢救过来的一位下士伤兵从哭泣的牧师口中听到了这一消息，他踉跄着，用他那半失明的眼睛摸索着回到病房，一头倒在床上。“一切都付诸流水了，一切牺牲和代价都付诸东流了！”他痛苦地闭上眼睛。

突然，他听见许多声音在向他呼唤，要他拯救德国。顿时，奇迹出现了，

笼罩在他周围的黑影消失了，他重见光明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这位几乎被毒气夺去双眼的年轻下士，非但没有消沉下去，相反，15年后他却登上了德意志帝国元首的宝座。

这位年轻的下士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话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它并不甘心于眼睁睁地看着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签订的《凡尔赛条约》，重新分餐地球这个“甜包子”。它那血迹犹存的手，虽然也煞有介事地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但它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它的妄图鲸吞欧洲建立一个日耳曼民族的“千秋帝国”的梦想，促使它随时准备为了自己的利益，重新点燃熄灭的战火。1933年，希特勒登上帝国元首的宝座后，更加紧了扩军备战的步伐。

希特勒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中，对内以“砸烂凡尔赛条约的锁链，恢复德国人民的荣誉与自由”，“保卫德国的边界”和“维护和平”等口号来欺骗人民。他侈谈德国人民的“平等权利”，煽动群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情绪，为其侵略扩张服务。对外发表“和平”演说，宣称德国不要战争，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令人极端憎恶的，德国所希求的只是在大家都公正的基础上的和平谅解，借以麻痹法国、英国和美国，以便乘他们缺乏准备时，打它个措手不及。

希特勒的和平宣传果然发生了效应。英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伦敦《泰晤士报》欣喜若狂，为此发表评论说：“这篇演说结果证明是合理的、直爽的和全面的。凡是本着公正态度来看这篇演说的人，谁也不能怀疑，希特勒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完全可以构成彻底解决德国问题的基础——一个自由平等和强大的德国，来代替16年前强迫它接受和平的战败的德国。”

法国军政界的一些显要人物们，也在为希特勒大唱赞歌，他们认为这篇演说“是一篇诚挚而经过周密考虑的由衷之言”。并以此对戴高乐等人加强国防的建议大加谴责，说什么“何必庸人自扰！你看人家希特勒不是一再声明不要战争渴望和平吗？我们实在不应再搞劳民伤财的备战了！”他们继续沉溺于和平美梦之中，而沉睡不醒。

凡尔赛协议中最伤德国人感情的是有关莱茵兰的段落。莱茵河西部9450平方英里的莱茵兰和莱茵河东部30英里宽的地带全部为永久性、非军事化地带，以构成德法两国之间的缓冲区。30年代中期协约国军队撤离时，德国人自愿保证遵守1925年洛迦诺公约中维持莱茵兰非军事化的条款。直到1935年5月，希特勒还公然叫嚷：一个非武装的莱茵兰是德国对欧洲和平的“贡献”。

然而，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悍然撕毁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德军跨过莱茵河上的桥梁从东岸涌向西岸，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两个小时以后，希特勒在国会大厦宣布，德国人民为了维护他们边界的安全和保障他们的防务的根本权利，德国政府已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德国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这时，600名议员，像机器人一样倏地站起来，右臂向上伸出作纳粹式敬礼，口中高呼“万岁！”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戴高乐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非常清楚德军冒险进占莱茵兰的意义：希特勒正在重新武装这一地区，把迅速恢复的德国武装力量推进到过去和未来的仇敌——法国的大门口。就在德军进占莱茵兰的第二天，戴高乐在给友人奥比坦的信中指出：“应该迅猛而突然地采取行动”，“必须组织力量，以便能在同样条件下反击侵略者”，他认为，如果法国出面阻遏，将会对希

特勒德国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其实，根据洛迦诺公约的规定，法国是有权对德军进入这个非军事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而且，尽管希特勒训练有素的部队和德国新建空军似乎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他们装备不足，作为后盾的只有元首的雄心壮志，如果法国果断地采取行动，结果必定会如希特勒自己所说：“我们就得乖乖地夹着尾巴撤退。”

但是，法国的当局者们却按兵不动，甚至认为，希特勒只是要扫除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羞辱。法国政府的因循苟安深深刺痛了戴高乐少校的心。

1936年9月，戴高乐终于得到了一次向人民阵线政府的勃卢姆总理畅谈自己军事见解的机会。他表示，如果德国占领奥地利、捷克或波兰，法国就应占领鲁尔区。他还预言，如果德军突破法军防线，法国在军事上必将一败涂地。勃卢姆虽对这次谈话印象深刻，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

对法国来说，这是末日的开始，关于这一点，戴高乐早就预料到了。

1938年2月20日，在新建的帝国大厦前面，聚积了许多柏林居民。

有关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发表演说的消息，还没有正式公开，然而许多人已经知道了，消息不胫而走，顷刻传遍全城，形形色色的人群，顿时潮水般地向广场涌来。人们高高仰起头，把激动的目光一齐投向大厦前的凉台上。

突然，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帝国大厦那个著名的大凉台上出现了希特勒的身影，顿时人群中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叫声。

站在凉台上，希特勒开始了他的演说。开始声音很低，过后，把语调骤然提到近似歇斯底里的程度，他狂妄地宣布道：

“有1000多万日耳曼人住在我们边界接壤的两个国家里……一个世界大国不能忍受它的旁边的同族弟兄遭受残酷的折磨。保护这些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政治上和精神上自由的日耳曼人民，是德国的职责。”

德国元首用自己的狂热，有力地感染着人们，在场每一位人都明白了，希特勒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解决700万奥地利人和300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的前途，而这只能是第三帝国的事情，是他希特勒的事情。

但是，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希特勒的行动真是太迅速了。不出一个月，希特勒即出兵武装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

在希特勒武装侵占奥地利的紧急关头，法国，大不列颠和国际联盟又采取什么行动来制止德国对一个和平邻邦的侵略呢？他们依然是视若罔闻，装聋作哑，只在各国首都摆了摆“强烈抗议”的样子作罢。

于是希特勒在强行占领莱茵兰和武装吞并奥地利之后，胃口越来越大，立即转向他的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着手实施他的“绿色方案”。

面对着法西斯德国咄咄逼人的侵略，戴高乐和他的朋友们心急如焚，但百般呼吁无效，而且还不断地遭到反对派的谴责。在一次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之后，莫林将军曾当场严厉地对他说：“再见吧，戴高乐！有我在的地方，就没有你的地位！”虽然，莫林将军先他离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但戴高乐依然被这里的官员看作是“刺头”。

1937年，戴高乐被调往梅斯地区担任第507坦克团的上校团长。对于戴高乐来说，这次工作调动，名义上是提升，实际上是一次流放。陆军部的人曾经说：“你用纸上坦克把我们搅得够乱了。这一回倒要看看你用钢铁坦克

能搞出点什么名堂来。”

在一段时间内，戴高乐确实感到如鱼得水。他大搞坦克战和快速出击演习，并终于有机会在实际中去检验他的理论，他对此兴致勃勃，干劲十足。于是，他的头上又戴上了一顶新的绰号：“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在庆祝国庆日的演习中带着白色手套的“摩托上校”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大显神威。出席观看的梅耶军事长官，就坦克团训练有素向这位“摩托上校”表示祝贺，但接着就用尖刻的语言表明他没有功夫听戴高乐说教，他说，“亲爱的戴高乐，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在我的防区看到你的理论付诸实践。”

不久，戴高乐又从梅斯调动到阿尔萨斯，负责指挥第五集团军的坦克部队。这时戴高乐一面抓紧训练部队，一面静观局势。由于远离巴黎，根本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和各方接触，所以戴高乐无法和法国当权者们进行大辩论，他只有继续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观点。

1938年，正当国际形势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的时候，戴高乐所著《法兰西和他的军队》一书问世了。在这本书中，戴高乐以丰富的资料，精确的内容阐明了苦干世纪以来，国家的灵魂和命运何以一直都反映在军队这一面镜子里面。这便是戴高乐在那卑微的地位上，当大难临头的前夕，为法国提出的最后一次警告。

就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醉心于搞绥靖，他们不顾国内外人们的反对，决心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来赢得“时代和平”。

1938年9月30日晨之时，在慕尼黑元首官邸，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四巨头”，在协议书上签字，批准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向德投降，苏台德区捷克人从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10天内完成。最后的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这个文件交给奉命专程前来慕尼黑候发落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慕尼黑公约敲响了捷克的丧钟，对法国来说，慕尼黑会议也是一场大灾祸。原来法国拥有100多个正规师，而且还同东欧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较小的国家建立了同盟，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的军事力量是足以制服希特勒的。慕尼黑会议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了。原部署在坚固的山地工事中的35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捷克师，牵制着比这个数目还要大的德国军队，现在法国军队失去了这支力量，无异于失去一条臂膀。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在慕尼黑事件之后，法国在东欧剩下的盟国还有哪个能对它的旦旦誓言相信呢？同法国的结盟还有什么价值呢？同英国的友好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国家都争先恐后地想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同希特勒搭上桥，谋求保全自己，免遭大害。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地位毁了。然而，对于这一点，法国的统治集团却执迷不悟。当达拉第总理坐飞机从慕尼黑回到法国巴黎，高喊将光荣的和平带回来的时候，德国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当悲惨的慕尼黑事件发生时，在梅斯坦克团担任团长的戴高乐上校正老家参加侄女的葬礼，当消息传来时，戴高乐怒火填膺地对家人说：“我恨不能以我的坦克开过齐格菲防线，决不把盟国捷克的领土拱手让给希特勒。说什么后退是为了前进，见鬼去吧！愈是后退愈赢不了”。他预见到绥靖政策必然助长希特勒得寸进尺的野心，战争不可避免。

正如戴高乐所预言的那样，希特勒在完成了他的“绿色方案”后一年，开始了消灭波兰的“白色方案”。

1939年9月1日，天刚蒙蒙亮，数百架亮着翼灯的德机闪电般地闯入波兰上空。顷刻之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保持着沉默的国境地带变成了轰鸣、火焰纷飞的战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帷幕……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按照预先制订的“闪击”波兰的所谓“白色”方案，在航空兵实施大规模袭击后，一队队钢铁的巨流，碎人肝胆般地吼叫着，狂奔着，驶进波兰领土。

随后，150多万德国军队在以坦克为先导下，如锋利而坚韧的巨剑，迅速在波军防线上撕开一道道口子，杀出一条条血路，直逼波兰首都华沙。

被这突然袭击打的不知所措的波兰大地，顿时火光冲天，狂贼四起。

机场起火了，铁路枢纽炸断了，天摇地颤中指挥和动员大楼炸塌了。军营里，军官和士兵乱作一团，惶惶然不知所措。突然间，醒悟过来的士兵们，急匆匆跨上战马，操起钢枪和军力，呐喊着冲向那疯跑着的钢铁怪物。只见残忍的剧烈滚动着的履带，继续吼叫着，从士兵的肉体上碾压而过。浩浩荡荡的坦克集团军以其快速的机动力和前所未有的突破能力，向着波兰领土的纵深地带推进……

仅仅两周时间，波兰便征服在德军隆隆的坦克集团军和轰炸机的手中。

英法两国同波兰订有同盟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应当毫不迟疑地向波兰提供包括军援在内的一切援助。可是英法政府首脑，仍想继续推行“慕尼黑政策”，但在国内外人民强烈的压力和反对下，才被迫于9月3日对德宣战。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在希特勒的“闪电战”中，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部队初次显露头角，便震惊了世人。世界对“战场之王”——坦克所组成的上有飞机掩护、下有火炮支援的集团军群的快速机动力和猛烈突击力刮目相看。

在希特勒疯狂进攻波兰的时候，戴高乐上校率部驻守阿尔萨斯，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他看到了德国运用装甲部队对波兰进行闪电战，风驰电掣，所向披靡。而西方呢？比利时前线不堪一击，因为它连马奇诺防线那样的屏障都没有，而政治家们却盲目乐观，军队技术落后，缺乏斗志，战斗力日渐衰退。

1940年1月，戴高乐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以促使法国领导人吸取并正视德国在波兰所发动的闪电战的教训。虽说，1938年12月3日，最高军事会议终于决定建立两个装甲师，但这并不是戴高乐上校所设想的那种装甲部队。不仅时间上失之过迟，而且在装甲数量上也远远满足不了戴高乐所估计的需要量。戴高乐要求配备500辆坦克，而每个新装甲师却只有120辆，在少数懂得机械化战争特点的人看来，更糟糕的是，新装甲师将不是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发挥作用，而是把坦克分散到全军去配合各个步兵部队作战。

1939年11月，戴高乐曾写信给总参谋部，和以往一样毫不含糊地、十分有力地阐述了装甲部队的效能。并指出，一条漫长绵直的战线是极难防守的。岂知，此信发出后，竟如石沉大海。当时担任步兵和坦克部队总监的迪菲厄将军断言：“从此事的目前状况看，这些结论应予否定。”戴高乐的建议再次被打入冷宫。

戴高乐的倔强脾气，促使他只身飞往巴黎。

1940年1月，戴高乐来到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保罗·雷诺的寓所赴宴。几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与保罗·雷诺的友谊，同时在座的还有另一位客人，就是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他们心情沉重地交换了对战争形势的看法。

1月26日，戴高乐写了一份备忘录，题为《机械化部队的产生》。这份备忘录，是根据当时形势和法国军队的状况和需要，建议采取的紧急措施。

在备忘录中，戴高乐把德国令人恐惧的打击力量和法国相对的软弱无能进行了一番对比，并把德国军队的强大归于它的机械化力量，他认为，法国当时的防御战略根本无济于事。他写道：“任何守军如果只限于旧式的武装进行静止防御，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使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因此，用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部队进行反击……是现代防御战中不可缺少的手段。”

为了把问题讲得更清楚，他强调说：“在当前这场战争中，像在以往的战争中一样，消极被动必遭失败。”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一支新式的军队。他要求与英美合作，制定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他设想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在反击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要密切合作。备忘录的结语雄辩有力，预见到战争将蔓延到全世界，他呼吁法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坦克部队总监凯勒将军写了这样的评语：

“即使现在这道工事坚固的防线被突破或者被绕过，看来我们的敌人也不可能像在波兰那样得到进行闪电战的种种有利条件。因此，显而易见，在未来的战斗中，坦克的主要作用将一仍其旧，掩护步兵逼近一个接一个的目标”。

戴高乐的建议又被这些短视的将军和政治权贵们否定了。

虽说英国和法国已正式向德国宣战，声明要援助他们的盟国波兰，但当纳粹匪徒肆意践踏波兰国土、残酷屠杀波兰人民时，英法却无动于衷，“静坐观战”。

法国的统治者们继续躲在钢骨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坦然地宣称：西线无战事。

英法两国继续在他们政治领袖们编织的和平美梦中沉睡。希特勒也在继续弹唱美妙动听的“和平”迷魂曲。

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大厦里大唱和平高调。“我的努力主要是使我国同法国的关系摆脱一切恶意的痕迹……我一直向法国表示愿意永远埋葬彼此之间的旧仇宿怨，并使这两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国家相互接近……”至于英国，“我也作了同样多的努力来争取英德之间的谅解以至友谊……只有德国同英国达成谅解，欧洲和全世界才能有真正的和平”。

然而，事隔三天，即10月9日，这个妄图称霸世界的法西斯暴君签发了第6号作战指令，即所谓的“黄色方案”，准备对西欧各国发动进攻。

指令规定：

“……为了继续实施军事行动，我命令：

“1. 在西线的北翼，必须做好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的领土实施进攻作战的准备。此次进攻，规模要尽可能大，并要尽早实施”。

“2. 此次进攻作战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消灭法国陆军作战部队和站在法军一边作战的盟军；同时尽可能多地占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领土，以此作为对英国进行极有成功希望的空中战争和海上战争的基地，作为至关

重要的鲁尔地区的广阔的前方保障地带。”

然而，在波兰作战一个月之后，德军急需休整，坦克和装甲车有一半需要修理，弹药严重不足，所以陆军将领建议暂缓对英法进攻。希特勒只好让步，被迫先后 29 次改变进攻日期，最后推迟到 1940 年 5 月 10 日。

这时，希特勒为了确保从瑞典进口铁矿砂的供应线，（按照海军的建议，挥师北上，向丹麦和挪威开刀了。

1940 年 4 月 9 日清晨，丹麦人还在睡梦之中，德国陆军便越过边界，狼奔豕突，冲进丹麦。德国部队运输舰也开进了哥本哈根，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一营德国部队迅速登陆，攻占哥本哈根。天亮之前，德国驻丹麦公使就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丹麦毫不反抗地立即接受“德国的保护”。

在疏疏落落的枪声中，丹麦国王终于宣布，他的卫队停止抵抗，宣布投降。丹麦就这样被德军占领，成了德国的“保护国”。

4 月 9 日清晨，德国舰队的各个分遣编队也同时向挪威的各重要港口发动进攻。与丹麦所不同的是，德军遭到的是一群“我们决不自动屈服”的英勇将士。经过两个月的周旋苦战，希特勒终于征服了挪威，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

在英法静坐观望的八个月里，英法两国的国内政治局势也是动荡不安，政权更迭。达拉第政府于 1940 年 3 月 21 日倒台。不久，伦敦的张伯伦政府也寿终正寝。法国总统勒布伦召见雷诺，请他组阁。但是，雷诺刚一上台，便遇到了棘手的难题，激进社会党以把达拉第留在战时内阁作为合作的条件。雷诺深知，如果在议会中得不到激进社会党的支持，他将寸步难行。无奈之中，雷诺只好再一次任命达拉第为国防和陆军部长。

当雷诺上台的消息传出时，正在第 5 集团军坦克部队的戴高乐上校喜出望外。这位唯一热忱支持过他的机械化战争主张的政治家终于掌握了最高权力。戴高乐冰冷的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他要上巴黎，他要继续为他的主张呐喊。

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情的失望。戴高乐一到巴黎，便应邀出席了沉闷多疑的议会，这是一次糟透了会议。他亲眼目睹了政客们勾心斗角，相互诋毁。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前途，而是自己党派的私利。雷诺本想请戴高乐在新成立的军事会议任副国务秘书，结果却遭到激进社会党的强烈反对，达拉第并以要辞去内阁职务相挟。雷诺不愿冒新政府垮台的危险，惋惜地撤回了对戴高乐的邀请，由于令人痛心的党派政治的需要，雷诺不得不任用一些与他政见迥然不同的人。雷诺虽属主战派。却受到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包围，到处受到制约，很难开拓抗战的新局面。

戴高乐心灰意冷地告别了巴黎，忧伤使他的心变得更为沉重。坐在车窗旁边，他抬眼仰望巴黎的上空，虽然天空只有淡淡浮云。但是他觉得似有无边愁云笼罩着巴黎上空，日色也昏昏无光。

在从巴黎返回驻地的途中，戴高乐奉召来到设在万森城堡的法军总司令甘默林将军的总部。这位身材矮小的最高司令官，心不在焉地说，装甲师的数目将要翻一番，从两个师增加到四个师。戴高乐虽然还是上校，将受命指挥第四装甲师。该师将于 5 月 15 日成立。

听到新的任命，戴高乐孤寂的心稍稍得到平缓，但随之而来的，又是无尽的惆怅。当戴高乐禁不住表达他对时局的忧虑时，他得到的答复是：“我理解你的满意心情。至于你的忧虑嘛，我认为没有什么根据。”

在形势日益严峻，大敌即将压境之前，法兰西的军政首脑还是如此地昏庸无谋，戴高乐深感痛心。

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像灭火剂一样把戴高乐心头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浇灭了。但他并没有因此心灰意懒，失去继续奋斗的勇气。5月3日，戴高乐铺开纸张，奋笔疾书，给雷诺总理兼军事会议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波兰之战及其以后的挪咸之战均已证明，今日唯有根据现有的机械化部队的能力和规模方能订出作战计划。假定战火明天蔓延到瑞典领土，后天扩大到巴尔干，接着烧向乌克兰，比利时，最后又在西线烧起，不论是烧到齐格菲防线还是烧到马奇诺防线，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都将得到证明，”

“然而，法国的军事体制，从规划组织到装备指挥，都与现代战争中的这条规律背道而驰。彻底改革这一体制是当务之急，决非其他任务可比。‘法国的军事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首要问题。但是，如果继续迟疑不决，越趋不前，拖得愈久，改革就愈加困难，从而胜利也就愈加渺茫。”

“阁下……身居要职，品格高尚，且在过去六年中别具慧眼，深明改革之义，因此唯有你能够而且有责任成就此事业。我还要冒昧指出，倘若你以此事为内阁要务，必能使政府内外气象一新，并能使这套尚未用过的王牌在你手中发挥威力。从此时此刻起，每过一天，每经一事，时时事事都将有助于证明我们的理论。不过，应予指出的是，它也将有助于正在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敌人。”

就在戴高乐把这封信发出一个星期后，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终于打破西线的平静，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戴高乐预料发生的可怕事情终于发生了……

1940年5月10日，当轻纱般的薄雾从法兰西的江河上向着碧绿的草地和鲜花盛开的果园弥漫开来，预示着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即将来临的时候，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震撼了世界——纳粹德国猝然将西欧置于闪击战的狂飙之中。

德军集中了136个师，其中10个坦克师、7个摩托化师，2580辆坦克，3824架飞机，分A、B、C三个集团军群向荷、比、卢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A集团军作为左翼，从亚琛至摩泽尔河一线发起攻击，通过比利时和卢森堡，将在迪南和色当之间强渡马斯河，穿过法国边界防线，向松姆河口挺进。B集团军群作为右翼攻入法国，C集团军群对马奇诺发动佯攻，迷惑法军。

西欧诸国共有140个师（其中，法国100个，荷兰10个，比利时22个，英国派往法国的远征军10个），2300辆坦克，兵力总数不亚于德国。但由于战备下力，没有联合参谋部和统一指挥，加之比利时和荷兰又迷信希特勒的保证，恪守中立，所以仍处于劣势。

这种劣势还因战略计划失真而显得更为严重。英法认为，德国还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取道比利时发动进攻。怎么也不会想到德国庞大的坦克部队会从马奇诺防线北端法比边境的阿登山区突破，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道路难行，因此在阿登山区以南的色当一线防守极差。而这正是希特勒拟用重兵突破的地方。

德军主攻部队A集团军群的七个坦克师三天之内就夺取了迪南到色当之间的河岸峻峭。林木繁茂的缪斯河对岸的四个桥头堡，并且进占了色当。这是1870年拿破仑三世向毛奇投降的场所。也是结束法兰西第三帝国命运的地

方。

战略要地色当陷落，德军简直是唾手可得，犹如一声晴天霹雳，震惊法兰西内外。

在万森城堡，甘默林大无帅的司令部里，呈现出一片绝望的恐慌。法德两国刚一交火，法军的攻击行动即被德军彻底粉碎，总参谋部依仗“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的美梦，也化为了一枕黄粱。形势越发逼人！

5月14日，德军大规模的攻击开始了，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希特勒的爱将古德里安率领的装甲军在色当跨过马斯河，以势如破竹之势突破法国第九军团和第二军团的防线，迅速地向在比利时的盟军背后的英吉利海峡推进，这一队队的钢铁战车像洪水猛兽一般，遮天盖地地向法国北部滚滚而来。形势逼人，千钧一发。

面对着这个钢与火的队伍，50岁的戴高乐上校受命指挥第4装甲师。杜芒克将军把戴高乐召到总部，面授机宜。为了阻止德军进犯巴黎，将在埃纳河和埃勒特河上设立一道防线。新编坦克师将在拉昂地区单独作战。但是，谈何容易！当时部队士气十分低落，坦克又分散在各地。

东北前线总司令乔治将军与他分手之时，语气低沉地说了一句：“再见吧，戴高乐！敌人正在运用你长期以来所提倡的战术。现在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戴高乐上校一到拉昂，就在城东南方的布鲁那设立了他的指挥所，并驱车巡视周围的地区。看上去那里的一切都是匆匆忙忙拼凑而成的。一群又一群的难民拚命向南涌去，堵塞了所有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是被敌人解除了武装的士兵，当时德国装甲部队正飞速前进，突然出现在这些士兵面前，德国人叫喊着让他们放下武器，乘车或徒步南行，以免妨碍德国人向前推进。德国人高声喊着：“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哈哈……”。随后是一阵戏谑的大笑。

戴高乐看到许多慌乱的人民、溃败的士兵，又听到敌人这样蔑视狼狈不堪的法国保卫者，他的心中不禁燃起了无名怒火。“唉，真是笨蛋！头一仗真是再坏也没有了。但是必须继续打下去。说打仗，世界宽得很，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战斗；不论叫我打到哪里，不论叫我打多久，不打垮敌人，洗雪国耻，决不罢休！”往后戴高乐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从这一天决定的。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直到5月17日拂晓，才肖三个坦克营调集到戴高乐这里，天色微明，他就把这三个营投入战斗。他们一路上横扫敌人，迅速到达蒙科尔内。这是一次短时间的，振奋人心的胜利，但是好景不长。坦克到达塞尔河，但由于缺乏后援，无法抢渡。白天又拨来了第四轻步兵营，戴高乐立即派这支部队奋勇冲杀。当夜幕降临时，他们俘虏了130名德军，击毙敌人数百名，而法军方面损失不到200人。这一胜利稳定了军心，他们背后的难民也不再向南跑了。

戴高乐的部队虽然在局部地区取得了小的胜利，然而，整个局势已不可挽回。法国军队缺乏作战经验，战前又没有很好进行训练和动员。许多坦克兵的累计驾驶时数还不到四个小时。炮兵是由许多不同地点派来的分遣队组成，许多军官还是第一次在战场上和士兵见面。法国人连无线电之类最起码的设备都没有，命令只能由摩托传令兵送到各下属梯队。各单位非常缺乏一般应有的运输、补给和食物。尽管如此，戴高乐仍然看到了在这临时凑成的军队中，已经普遍地出现了士气昂扬的景象，这激励他继续指挥部队英勇作

战。

一星期后，他又奉命来到埃纳河一线率部阻击敌人。戴高乐接到了上级前后矛盾的命令，先是要他向北进击，接着又要他去攻打德军在亚眠的桥头堡，最后又命令他进攻阿布维尔的敌军，这时已是5月27日了，他的残缺不全的第四装甲师，一直在连续作战。尽管他不可避免地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受到限制，但他又一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

戴高乐在指挥新建的第四装甲师在拉昂和阿布维尔战斗中重创德军，俘敌600多人，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戴高乐因此被晋升为准将。多少梦想，多少奋斗，终于登上了将军的阶梯。但他实在来不及去细细品味这一切了，他需要继续指挥战斗。

到了3月30日，戴高乐将军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无能为力了。这时比利时国王举起了投降的旗帜，这犹如火上加抽，给盟军增加了巨大的困难。在绝望的时刻，比利时抛弃了英法，打开了大门，致使德军在已经受到很大压力的英法部队侧翼长驱直入。

就在这时，近40万英法联军退缩到敦刻尔克一块很小的三角地带，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后面是如狼似虎的追兵，由此陷入了重围之中。

5月中旬以来，英国首相丘吉尔可谓是经历了一段既激动又紧张的日日夜夜。

激动的是，5月10日，在英国朝野上下强烈要求张伯伦政府下台的口号声中，保守党人温斯顿·丘吉尔被推上了首相的宝座。连他自己也料想不到，在他66岁的时候，命运之神把他推上了政坛的顶点。多少梦想，多少奋斗，终于赢来了这一辉煌的时刻！丘吉尔怎么能不激动呢？这一晚，丘吉尔带着从来有过的心满意足进入了梦乡。

但他无法做什么美梦，因为就在当日，希特勒在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在这急难之时，5月13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

“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未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

丘吉尔深知，他是在英国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上台执政的，受命于危难之中，所面临的局势将是严峻的。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西欧战局竟是如此迅速地发展到恶劣的境地。就在他发表就职演说的第二天，盟军战略枢纽色当失守。

5月15日清晨7点30分，丘吉尔被一阵急促的铃声惊醒。丘吉尔睡意顿消，睁大了双眼。

“喂！我是保罗·雷诺总理。您听清我的话了吗？”电话是从巴黎打来的，声音听起来不很清晰。

“听清了！总理阁下，……听清楚了！……”

“听我说，阁下，我们被粉碎了！……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雷诺激动地在电话中喊叫着。

丘吉尔顿时惊呆了。他不相信，伟大的法兰西军队怎么会在一周之内就被打败了呢？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很快地，他脑子里又闪出了一个意念：“应该尽力安慰自己的盟友！得给他们打打气才行。”

5月16日下午3点，丘吉尔乘“红鹤”式飞机前往巴黎。随行的有帝国副总参谋长迪尔将军和伊斯梅将军。他们一下飞机就看到局势比他们所想象的还坏得多。

在法国外交部，丘吉尔会见了法国总理雷诺、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和甘默林将军。丘吉尔注意到了，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十分忧悒。

在甘默林面前，挂着一幅军用地图，约有两码见方。这位总司令简单地介绍了一个战场的情况。在色当以北和以南，大约五六十英里的一段战线被德军突破了。迎击的法军已被消灭或被击溃。法西斯的装甲部队和大约10个摩托化师正向阿布维尔和巴黎方向推进。这位将军说了大约有5分钟。说完以后，有一段时间的沉默。

丘吉尔不禁问道：“战略后备队在哪里？”没有人答话。他接着问道：“机动部队在哪里？”甘默林将军转过脸来，摇了摇头，耸了一下肩膀说：“一个也没有！”

接下来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丘吉尔踱步来到窗前，望着屋外的风景。几堆篝火上空，卷起一股股蓝色的青烟，官员们正把手中的档案向火堆中扔去。几片烧焦的纸片残骸，徐徐落在窗台上，他伸手一捻，全成了粉末。

突然，丘吉尔猛地一转身：“不错，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形势是很糟的，但绝不是不可挽救的，我们不能放弃战斗，英国将和法国一起并肩战斗下去！”

当天晚上，丘吉尔一行匆匆返回英国伦敦，征得内阁的同意。决定再派遣10个战斗机中队前来助战，希望法兰西战场能有个好的转机。

然而，法军战线一再被突破，法军的抵抗迅速瓦解。为了挽救危局，协调行动，5月22日，丘吉尔再飞巴黎。所不同的是，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战时内阁。

早在5月18日，雷诺就开始对法国内阁和最高统帅部进行了改组。贝当元帅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达拉第调去主管外交，雷诺接任国防兼陆军部长，任命刚从近东回来的73岁的老将魏刚接替甘默林将军。雷诺满怀希望地渴望新的领导班子能够振作起来，去领导法国人民继续进行抗战，直到取得胜利。然而，事与愿违，年迈的贝当元帅想的却不是胜利，实际上，他在很长时间里好象已完全没有能力来思考问题了。而魏刚将军在视察了前线之后，面对法军的困境也心灰意冷，认为继续打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他曾对一位内阁部长说：“我想得很多。政府只有留在巴黎束手就擒，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的“不再打下去的意见”得到了贝当元帅的支持。

丘吉尔此次来巴黎，面对就是这样一个法国战时内阁。在万森最高统帅部魏刚将军向丘吉尔讲述了他的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并表示要与法国忠实的盟友英国军队继续作战，尽快从敌人手里等回战场上的主动权。这使雷诺和丘吉尔都感到高兴，但是，待丘吉尔回到伦敦后，他才知道，这仅是纸上谈兵，由于最高统帅部没有下达任何作战命令，战事的演变已使敌人取得了支配权，致使40多万英法军队在敦刻尔克地区陷入德军的重围，令丘吉尔焦急不安。

在处境险恶，异常绝望的情况下，为了挽救这批英法部队，丘吉尔动员数以千计的各种船只，乘着大雾和天黑发动了“发电机计划”。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了。从5月26日到6月4日，丘吉尔亲自指挥了这场海上突围行动，

成功地将 338000 多名英法将士运上了本土，逃出了德军的虎口。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在援救敦刻尔克的日日夜夜，丘吉尔不思饮食，昼夜不眠，身体极度疲惫。可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极大地鼓舞了英国的士气。但是，丘吉尔仍然提醒议员们说：“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但是，在这次援救中却蕴藏着胜利。”接着，他向议员们发表了气势磅礴的演说：

“尽管欧洲的大片土地和许多古老的有名的国家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去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丘吉尔的著名演说，不仅有效地动员英国勇敢战斗，而且对全世界及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人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丘吉尔发表演说的第二天，6月5日，法国总理雷诺对战时内阁成员又作了新的调整，因为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内战中日益陷于孤立。于是，他力排众议，毅然任命刚刚被提升为准将的戴高乐为法国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这是戴高乐首次担任政府职务。

当晚，戴高乐获悉此任命后，匆匆告别了部队，前往首都巴黎。

坐在通往巴黎的汽车上，戴高乐的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他并没有为自己职位的升迁而陶醉，他的心里想的更多的是法兰西的前途，因为在他临启程之时，他获悉德军从色当到阿布维尔的弧形战线上又向法军发动了新的进攻。此刻，他眉头紧锁，思绪万千。

戴高乐将军坐在车窗后面，心情忧郁地注视着从眼前一一闪过的景象。当他路过城镇和乡村时，他看到的是惊慌失措的居民和一队队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法军。戴高乐将军的脸感到一阵阵的发烫。他感到无颜直视那些怀着默然无语的疑问，用期待和求助的目光看着这些溃退下来的保卫者的妇女和儿童。他看着那些茫然的目光，仿佛听到了他们心中那默然无语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军队与是撤退？为什么敌人的气焰那么的嚣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汽车越往巴黎方向开，戴高乐将军的心情就越发沉重。道路开始变得拥挤，车流流动缓慢。随着车流，戴高乐的汽车无可奈何地往前挪。好不容易开进巴黎市区，但道路也更加拥挤不堪。

戴高乐探出车窗，四下打量了一下：“乱糟糟的一片，好家伙，人们全像疯了似的。”戴高乐喃喃自语。

在过去的八个多月的“静坐战”中，巴黎没有经历任何考验，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颗炸弹落在市区的屋顶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弹坑破坏街心花园的美丽和平静。眼下可好，由于德军突然发起强大攻势，一再突破法军防线，把实施致命打击的尖刀。直直对准法国首都巴黎。这危急的局势所引起的恐惧打破了巴黎的平静，使巴黎陷入丧魂落魄的混乱之中。发了疯的市

民，包围了各个车站，更有甚者，则徒步越过各种关卡，尽快离开这座仿佛蔓延鼠疫的可怕城市，人们象一群群野蜂，闹哄哄地冲出不祥的首都巴黎。事到如今，逐渐清醒的人们不再存在什么幻想，不再盼望会出现什么历史奇迹。只想争先恐后地冲出巴黎，一走就万事大吉，可是，事与愿违，连绵不断的车流，越滚越大，越滚越长，最后几乎凝结不动了。

看着眼前的情景，戴高乐心里一阵阵发酸，百感交集。在近百年屈辱的历史风云中，法兰西首都的市民，曾先后五次，目睹过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可怜巴巴地在德国炮火轰击下燃起了冲天大火，化为一片炽热的废墟，巴黎市民也曾先后五次，亲耳听到愈来愈近的德军排炮的轰鸣声，声声叩击着他们的心房，历史的潮流，翻腾，咆哮、巨浪滔滔，整整几十年！难道这场可愤、可哀、可怕的悲剧，又要第六次重新上演吗？

此时，戴高乐将军更加深深地感到祖国和人民、亲人，朋友正面临着无法摆脱的可怕的危难。他顿时感到一个千斤重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肩上。

汽车好不容易冲出了拥挤的道路，驶进了宽阔的星形广场。戴高乐如释重负，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在爱丽舍宫前，汽车嘎然而止。戴高乐整理了一下军装，信步走进大厅。在总理办公室里，戴高乐见到了多日不见的雷诺总理。戴高乐一眼发现，在这段苦难重重的日子里，雷诺本人明显地消瘦了，脸上出现了相当多的皱纹。但他的目光却依然犀利，信心十足。

见到戴高乐，雷诺总理显得非常的兴奋，因为他在内阁中太孤立了。贝当元帅听说要任命坚持抗战的戴高乐担任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时，曾百般阻挠，并不厌其烦地宣传他的投降理论，雷诺为争取给戴高乐获得这一职位，同时也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当他见到前来上任的戴高乐时，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戴高乐首先对雷诺总理的大胆任命表示非常感激，但他马上直言不讳地向总理指出，让贝当元帅那样的失败主义者参加内阁。将来会后悔的。雷诺总理仍是用他那老一套的公式说：“把他放在里面比在外面好。”

“我只怕你会被迫改变你自己的意见。”戴高乐接着说道：“形势发展得很快，失败主义很容易淹没一切，这一点就更加有可能了。我们与德国人之间兵力相差太悬殊，除非是出现奇迹，否则在法国本土无法获胜，甚至无法守住，而且最高统帅部已经被意外事件吓倒，再也镇静不下来了。而你比旁人更清楚，政府的周围笼罩着怎样一种绝望的气氛。贝当元帅和他的幕后人将使今后的局势按他们的方式发展。如果 1940 年的战争失败了，我们还可以赢得另外一仗。”

戴高乐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思考了片刻之后，接着讲道：“我们要尽可能坚持在欧洲大陆作战，同时必须下定决心，准备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继续作战。这就需要有一个政策来安排以下各项事宜：必须把战争资源运往北非；必须挑选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指挥这个行动；而且不论对英国人有多大意见，都必须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谈到这里，戴高乐拍了自己的胸脯，“我愿意自告奋勇，来负责处理这些事宜。”

雷诺总理听到这儿，也显得很激动，“咱们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想请你尽快到伦敦去一趟。我在 5 月 26 日和 31 日跟英政府会谈时便设法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否定停战的可能。但现在所需要的正好相反，我们要使英国

人相信，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坚持下去，必要时甚至会到海外去坚持。这次你将要见到丘吉尔先生，请你告诉他要我改组内阁，并把你请到身边，就表现了我们的决心。”

两个人越谈越激动，两颗坚持抗战的心也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戴高乐在为他的访问进行安排时，拜访了魏刚将军。那天已是8日。戴高乐发现这位总司令依然镇定自若，但交谈几句之后，就发现他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

“你看，”魏刚将军说，“几天以前我告诉你，德国人将在6月6日进攻松姆河，一点也没错。他们实际上正在进攻，现在他们正在渡河，我无法抵挡他们。”说完，摊开两只手，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不错，他们是在渡过松姆河，往后怎样呢？”戴高乐问道。

“往后？那还不是塞纳河和马恩河啦。”

“是这样，再往后呢？”

“再往后？那就完啦！”

“你说什么？完啦？全世界都完啦？法兰西帝国也完啦？”

魏刚将军失望地笑了一笑。接着说道：“法兰西帝国，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至于全世界，当我在这里被打败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和德国谈判。”

从言谈话语中，戴高乐已感到面前这个统帅法国军队的总司令已经被失败主义的潮流卷走了，他不设法掌握局势，而只能在自己办得到的范围内找门路——投降，带着失望，戴高乐离开了这里。

回去之后，戴高乐马上就把这次谈话告诉了雷诺总理，开门见山地建议撤销魏刚将军的总司令职务，因为这个人已经不打算赢得战争了。

“现在还不可能，”雷诺答道，“但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继任人选。你看谁合适？”

“关于继任人选的问题，”戴高乐答道，“现在我所看到的只有洪齐格尔将军，他的双亲，一位是阿尔萨斯人，一位是布列塔尼人，他本人是个足智多谋的军人，据我看来，可以达到世寻战略的水平。”

“好，这个问题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雷诺的回答闪烁其词。

来巴黎上任后短短的几天，戴高乐看到了无论是军队。地方还是政府，到处都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这使他忧心忡忡。但他并不受这种情绪所影响，他坚持自己的主张，着手拟订一项在北非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详尽计划。这意味着要把大约50万军队撤往北非，包括正在西部和南部地区受训的新兵和从北部败退的法军残部。具有足够续航力的飞机可以飞越地中海；但人员和物资还需要由海军运输，而法国海军要完成这一任务，还缺少大约50万吨的船舶，这只有靠英国人来弥补了。

6月9日清晨，戴高乐乘上了开往伦敦的飞机。飞机在蓝空中飞行，一朵朵白絮似的云团从飞机舷窗外飘过，而在机身之下，却是一片汹涌翻腾的云海，戴高乐将军此时的心情也似这翻腾的云海，久久不能平静。从接任国防和陆军部次长的那天起，他虽然对他所将要从事的工作信心十足，但也意识到任重而道远。他要攀登一座座的险峰，要涉过一道道激流。

这是戴高乐一生的重大转折：从此，他由军界进入政界，开始了曲折奇特而又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涯。

第二章 自由法国

戴高乐面对的是一伙坐以待毙的主和派
“我理解你的处境！”丘吉尔不放弃斗争
德国兵不血刃进巴黎
来自海峡彼岸的召唤
戴高乐伦敦揭竿而起
为“自由法国”而战

飞机载着戴高乐一行向着伦敦飞行。两个小时之后，戴高乐踏上了伦敦的土地。6月9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

刚刚离开混乱不堪的巴黎，戴高乐感到伦敦是这般的于静。大街上和公园里充满了闲情逸致地散步的人群，电影院门前站了一长列人，各种各样的汽车在公路上穿流不息，商店门口更是热闹非凡，刚刚采购完物品的人们脸上流露着满意的笑容。这里属于战争圈外的另一个世界。

虽然英国的报纸上，也报道了正在激战的法兰两战场的情况，然而，一般人民由于事情发展得太快。对于法国局势的严重性仍然茫无所知，在英国人民看来，英吉利海峡还宽着哩。

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接见了戴高乐，他立即给戴高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戴高乐看来，丘吉尔的判断极其稳健，他的知识极其广博，他对有关的问题、有关的国家与人物大都很清楚，他对战争问题又极其热情，这一切都将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他的秉赋善于行动，善于冒险，他能坚决彻底地完成某种任务而毫无惧色。这一点，在丘吉尔亲自指挥震惊世界的敦刻尔克海上突围行动中，就已使人们领略了他的雄才胆略。戴高乐认为，作为一个领导人和领袖，丘吉尔是最理想的。这就是，丘吉尔给戴高乐留下的最初印象。

而戴高乐将军给丘吉尔的最初印象是，身材特高，身躯消瘦，目光犀利。

戴高乐代表法国总理雷诺告诉丘吉尔，法国政府决心坚持战斗，如有必要，将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内与敌周旋。这番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反映了戴高乐本人的想法。

丘吉尔听了既高兴，又怀疑。他明确表示，他不再相信法军有可能恢复元气，至少在法国本上是不可能了。

戴高乐则抓住时机，向元首阁下谈了下一步准备在北非继续进行抗战的详细计划，并提出英国人继续合作的要求。

“首相阁下，我一直崇拜查理和亚历山大·马其顿，他们在强敌面前斗志昂扬，宁死不屈，遇事果决，从不犹疑，”戴高乐将军在会谈将要结束时，坚定他讲道，“我们应该战斗！谁为之战斗，光荣的桂冠就属于谁！我们万众一心，就会取得必然胜利！”

“我万分荣幸地听到如此清醒、如此勇敢的声音，万分感谢您，将军阁下。”丘吉尔首相显然已被戴高乐将军激昂的话语所感动，他伸过手紧紧地攥住戴高乐的手。

丘吉尔最终答应把一个正陆续抵达英国的加拿大师调往诺曼底，并让第51高地师和装甲旅的余部继续留在法国。

那天，戴高乐还同当时任丘吉尔内阁陆军大臣艾登、海军大臣亚历山大、

空军大臣阿奇波德·辛克莱、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将军等人进行了协商。戴高乐从与他们的谈话中感到，英国人镇定自若，坚韧不拔，但他个人的决心并不足以使他们相信法国将坚持战斗。

当天晚上，戴高乐一行飞回法国，好不容易才在刚遭德军轰炸的布尔歇机场降落。

此时，事态发展越来越恶化。德国人已在巴黎西北方向渡过塞纳河，随时可能在香巴尼地区发起决定性进攻。因此，首都就直接受到东、西、北三方面的威胁。灾难的狂潮已逼近巴黎，巴黎城内充满了战争火药味。

戴高乐一到巴黎，雷诺总理就把他请到家里。已经六神无主的雷诺问戴高乐：“现在德军已是兵临城下，大难临头，政府应该怎么办？”

戴高乐丝毫不惊慌，他镇定地回答，“立即迁往非洲与盟国一起坚持战斗！”

6月10日，痛苦的一天开始了。

正如人们预感到的那样，墨索里尼向英法宣战，意大利军队从南部侵入法国，无异从背后插刀。德军象潮水般地涌到巴黎城下。内阁已经决定当晚撤出巴黎。雷诺早已无法驾驭局势，这时正迅速失去控制内阁的能力。

清晨，当戴高乐将军正在为雷诺起草广播声明时，魏刚将军未经通报就闯进了总理办公室。他立即说明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结论极端悲观：除了要求停战，别无长策。戴高乐当即表示反对，认为还有其它出路。魏刚以讽刺的口吻反问道：“你有什么建议吗？”

戴高乐回答说：“政府没有什么建议可提，只是下达命令。我相信命令是会下达的。”

“那么，你就等着瞧吧！”魏刚带着轻蔑的口吻说道，然后，甩身离开了办公室。

巴黎怎么办呢？戴高乐赞成保卫巴黎，必要时就进行巷战。他刚一就职，就要求雷诺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兼国防和陆军部长的资格指派一位坚定人物担任法国首都的卫戍长官。他提议由德拉特尔将军出任此职，这位将军不久前在雷代尔战役中打得很出色。

但是，戴高乐的希望很快地破灭了。当日，魏刚将军擅自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这一决定与戴高乐为首的主战派的保卫巴黎的决心背道而驰，但寡不敌众，内阁还是批准了。

失望中的戴高乐不得不嘱咐下属，把文件、箱柜和其他物品打捆包装。当地穿过总部大楼的走廊时，看见了贝当。

这位元帅主动上前与他打招呼：“哦，你已经是将军了，可是我不向你祝贺。战败的时候当个将军有什么用呢？”

戴高乐反唇相讥：“可你自己，元帅先生，不也是在1914年撤退时当上将军的吗？几天以后在马恩河战役，法军不是又反败为胜了吗？”

贝当哼了一声说：“那根本不能比！”说完这句话便不再理睬戴高乐了。

戴高乐望着这张再也熟悉不过的背影，眼前突然浮现出17年前令他永生难忘的一段往事……

1924年6月，戴高乐在法国军事学院的结业考试中，因为“穆瓦朗事件”而受到了不公正的评判，被派往美因兹的莱茵区法军司令部供职。从而失去了调往总参三局（计划局）实施他的战术和战略思想的机会。

但是，戴高乐并没有消沉下去，相反，他更加发奋自强。从离开军事学

院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之后，戴高乐利用业余时间著书立说，阐述他自己的观点。其成果就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于1924年出版了。

《敌人内部的倾轧》是一部思想严谨、分析深刻的军事著作。书中分析德国战败的原因在于军事当局对政府权力的践踏。作者对德、法两个民族进行了对比，表明法兰西显然比德意志优越。他认为德国人“生性好高骛远，狂热扩张个人权力以至不惜任何代价，而且对人类经验、常识和法制的约束根本不屑一顾。”

《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的出版，大大提高了戴高乐上尉的声誉。当年曾发现戴高乐这匹千里马的伯乐贝当元帅，毫不迟疑地下令委任戴高乐为他的幕僚。这时，贝当已是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和作为三军首脑的法军总监了，他急需调一些年轻有为的军官辅佐他。

戴高乐作为贝当的幕僚，来到总部所执行的第一项任务是就工事和要塞在法国国防中的作用问题写一篇研究报告。说实在的，戴高乐对这项任务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不赞成静止防御的理论，不同意以静止防御作为机械化战争的一个样板。但是，作为司令部的官方理论家，他现在却必须要奉命给静止防御的理论寻找根据。戴高乐如往常那样，迅速地在一个月內完成了。他的报告以《法国设防城镇的历史作用》为题发表在《法兰西军事评论》上，日期是1925年12月1日。戴高乐尽管认为提醒公众注意法国边防上的薄弱环节是他的职责所在，但是他清楚地看到，最高军事会议以为沿边界建立一条永久性防线将会为防御入侵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显然是危险的。他认为加强国防最重要的是提高军队指挥员的素质，加强装备，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的部队。

贝当元帅对戴高乐上尉的工作感到满意，从中他也看到了向军事学院清算他的“学生”蒙受的不公正评价的天赐良机。

1927年4月7日，军事学院圆形会堂黑鸦鸦地坐满了人，大多是已经头发变得花白的老教授。人们静静地等候着，等候着由法军总监贝当元帅亲自主持的一场报告会。

九点整，贝当元帅在新任校长埃兰将军的陪同下抵达会场，人们看见在贝当元帅的后面还跟着一位身挎佩剑的中年军官，人们猜想也许这就是他的警卫或是秘书吧。

教授们起身站立，竞相后退给元帅闪开一条路。这时，元帅却停下脚步，伸手示意让跟随在他身后的年轻军官先行。元帅的这一举动，顿时犹如一颗炸弹轰然爆炸，在场的人瞪大了眼睛瞧着这位先行者。

“这不就是因为‘穆瓦朗事件’，而闻名全院的夏尔·戴高乐吗？难道说，今天他是这场报告的主讲者吗？”在场的人嘴上虽然没有这么说，心里大概都是这样想的。

戴高乐全身戎装，面色冷峻，大步流星地向讲台走去。登上讲台，他慢条斯理地摘下军帽放在桌上，又将佩剑置于一侧，然后，从容不迫地摘下了他那副白手套。

贝当元帅从来不说废话，他站起来开门见山地向所有听众宣布：“诸位，戴高乐上尉将要阐明他的观点，请大家注意听。”

待贝当宣布会议开始后，戴高乐起身站起，用他那特有的冷峻眼光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泰然自若地开始了题为“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的演讲。

戴高乐不用讲稿，大量引用了一连串古往今来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

军人和作家的名言警句。许多人为之倾到，但也有许多人感到恼火。不少听讲的人暗自发问：戴高乐所精心描绘的具备各种美德的理想领袖究竟指的是谁呢？是指那个坐在前排、嘴角挂着满意微笑的贝当？还是他戴高乐本人？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菲利普·贝当或夏尔·戴高乐？

戴高乐笔挺地站着，不仅从身材，而且从口才，智力到记忆力上都超群出众。他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在座的曾经是他的老师和参加毕业成绩评判的老教授们，甚至看得使对方发窘。其实，更使这些教授们感到窘迫的是戴高乐下面的一段言辞：

“我提醒在座的诸位注意，强有力的人物往往严厉粗暴，难以相处，甚至使人讨厌。即使绝大多数私下承认这样的人物是超人一等的，从而有意无意地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但他们也往往不得人心，而且在以后的生涯中也很难受到宠幸。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宁可重用讨人喜欢之徒，而不愿意提拔具有真才实学之士。”

尽管人们对戴高乐毫不掩饰的狂妄自负甚感厌恶，但大家仍然一致认为他是一个颇能使人入迷的演员。因此，在戴高乐后来的两次演讲中，依然是座无虚席。

场面完全一样。戴高乐第二讲的题目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和纪律的含义》。第三讲的题目是《威望》。在谈到领袖人物的品质时，戴高乐再次强调：“事实上，有些人几乎从初生之时起，就具有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视之不能清楚见其形，但其影响则往往令人惊讶不已。”

戴高乐上尉在军事学院的这番讲演，极大地刺伤了某些人的自尊心。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小小的上尉，竟然在法军总监贝当的亲自主持下回校讲学，更有甚者的是，他居然选择领袖人物的品格作为讲座的主题，这简直是蓄意侮辱。

而在戴高乐上尉的眼里，此次轮番讲演，是一种罗马式的大胜利，他为能有这次机会回校去羞辱军事学院那帮人而幸灾乐祸，暗自得意。

17年后的今天，当戴高乐再次回想起这段往事时，他的心中依然对口当这位昔日的恩师充满着感激之情。可以说，当年没有贝当的赏识、庇护和提拔，也就没有戴高乐今天的职位。

想到这里，戴高乐突然感到心中一阵酸楚：“如今年迈的贝当真的是老朽了，不仅仅生理机能老朽，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已经变得僵化，面对德国的进攻，他竟是坐以待毙而无动于衷，真是可悲啊！”

更令戴高乐感到可悲的是，6月10日当晚，法国政府匆忙撤离巴黎，从巴黎迁到图尔。法军总司令部设在布里阿尔附近。

6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雷诺发给丘吉尔一封电报，他也曾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法国的悲剧愈演愈烈。

图尔市政府的所在地是一座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从巴黎迁到图尔来的法国政府，就在这里临时安了家。6月11日，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英法联席会议。

魏刚将军来迟了一步，一脸的担心和不安，匆匆穿过通道，后面是被撤换下来的甘默林将军。

“局势越来越复杂了，”魏刚将军边走边说，“赤色分子企图从背后给我们一刀，英里斯·多列士在巴黎举行了武装起义，共产党人占领了叶利色宫，这个事实远比德国人入侵更为可怕！”甘默林边走边听，他的脸上有一

片片红潮，不用说，他的内心也相当激动。

进入会议厅，魏刚将军便迫不及待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各位政府官员。接着说道：

“共产党人，赤色分子正在利用这场民族灾难，已经在巴黎举行了武装起义。应该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以便对赤色分子进行无情的扫荡。必须坚决粉碎共产主义的威胁……”

魏刚将军所述的有关共产党人在巴黎起义的消息，象一颗威力无穷的重磅炸弹，炸得法国内阁部长们大惊失色，惶惶不安。

“总司令是对的！决不能让法兰西陷入无政府状态，共产党人会破坏神圣的私有制度！”有人插嘴说道。

年迈的贝当元帅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的局面是毫无希望的，应当结束战争。”语言惨淡无力。

这时，雷诺总理默然不语，他在焦急万分地看着手表：“丘吉尔先生应该到了，英国首相会阐明整个局势，拿出应急方案来的……”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接到雷诺总理的电告后，就决定第四次飞往法国。按照雷诺指定的地点，他的“红鹤”式飞机好不容易才在图尔市郊机场降落。法国政府只派了一辆专车在机场等候，待首相一行登车后，就向预定地点驶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穿过街道上的车流，来到古建筑门口。

雷诺总理开门见山，用一句话来欢迎英国首相的光临：“尊敬的丘吉尔先生，我本人准备继续打下去。可是，非常遗憾，看样子，我不得不离开法国内阁……”

“为什么情绪这么低？应当记住科列曼松！”丘吉尔首相胸有成竹，想鼓起法国总理的斗志，“二十五年前，情况跟这次一样。科列曼松说过，‘我决心和巴黎共存亡，跟进犯它的敌人拼到底！’结果，巴黎始终安然无恙地立在他的身后……应当尽一切力量保卫巴黎！……”

贝当元帅尖锐地顶了一句：“那时候，我可知道，科列曼松有60个师的后备力量！……有60个师的英国军队，为法兰西战斗。现在，他们在哪？”

聪明的丘吉尔感到这是对敦刻尔克的恶意攻击，他假装没有听懂贝当元帅的弦外之音，把话引到一边：“我们大英帝国最终会履行作为一个盟国的崇高职责。不要一提起战争，就感到有变化莫测的痛苦，应当下决心达到最终目的，去夺取胜利！”

丘吉尔特有的男低音，浑厚，深沉，在整个会议大厅回旋、激荡，发出共鸣。他善于雄辩，动人心弦。处变不惊，应付自如。“应当给法国人鼓劲，给他们灌输一种思想：要继续战斗，不胜利毋宁死！”丘吉尔首相这次冒险来法国的目的，就是阻止法国跟德国议和。

“诸位部长先生，对下面建议有何看法，”丘吉尔首相用锐利的目光，逐个扫扫周围就座的法国内阁部长，“如果能建立一个‘英法联邦’我们将成一个国家的臣民。大不列颠帝国将成为法兰西民族强大的靠山。如此一来，你们和我，就成为一国治下的平等公民。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你们政府也可以迁移到一个新地方，坚持战斗。比如，到非洲去，在那里，法国政府将继续领导整个法兰西的抗德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法国总理雷诺先生对这个现实的畅想，并不抱乐观态度，“在大英帝国的王冠和希特勒德国的皮靴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区别，法国还不是一样！”基于这种考虑，他顺势来了一句：“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需

要仔细研究，从长计议。”

早有二心的魏刚将军则毫不客气地放了一炮：“首相阁下，您是否能给我们派些英国歼击机来？据我所知，它们一直闲闲地呆在英国，没有承担任何军事任务。”

“这件事嘛，尊敬的总司令阁下，您看到了没有？我们的共同利益，在于艰苦的奋斗，在我们两国之间，不应该出现一丝一毫的本位主义的影子。但是，即使这样做是残酷的，我仍然要以我们共同利益的名义，断然拒绝您！我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丘吉尔认真选用字眼，以便具有更大的说服力，“这就是说，现在不是决定性的时刻，这里也不是决定性的地点，如果希特勒有朝一日，冒险入侵英国，真正的灾难才算降临！到那个时候，我们英国用什么手段去反击或对付德国的威胁呢？”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有顷，贝当元帅在一旁冷冷地开了腔：“无论如何，我们法国应当求和，我们没有力量抵抗。”

“请原谅，尊敬的元帅阁下，法兰西共和国的职责并没有授权于我有朝一日，来奉命解放法国！”英国将军斯皮尔斯忍不住插了一句。他是陪同英国首相丘吉尔专程来法国参加英法联席会议的。

“法国政府一旦投降，就意味着对法国实行封锁，而且要对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军事重镇和港口，实施轰炸……”斯皮尔斯将军接着说道。

“不能这么直来直去。”丘吉尔首相脑子一转，“我想，事情总不至于发展到这一步，我们两国将一齐战斗下去。我们英国政府相信，我们的盟国会履行自己保卫国土的神圣职责。”

英国首相丘吉尔对进一步磋商不感兴趣了。他心里明白他的鼓动并没有奏效。

此时，法国内阁成员之一，戴高乐将军正好推门而入。这位将军看到英国首相丘吉尔之后，马上走上前去问好。英国首相当即给斯皮尔斯将军使了一个眼色：“按原计划执行。”斯皮尔斯将军连忙彬彬有礼地跟戴高乐将军寒暄起来，俩人相互握手致意。

“尊敬的将军阁下，您的意见如何？”

“我仍然坚持我原来的计划，”戴高乐将军用词简练，句句有力，好象在挥舞马刀，“我们应该战斗！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就会取得必然胜利！”

“很好，我很能理解你们处境的窘迫，请你们相信，英国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会放弃斗争。”丘吉尔感动地向戴高乐将军伸过手去。

会议大厅中一时出现了少有的和谐和热情。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法兰西内阁成员们一一握手告别。两个小时以后，他已经回到伦敦。这次法国之行，使他感到遗憾，疲倦。看来贝当、魏刚之流投降的决心已经定了，戴高乐将军虽然和他一样坚定不移，但他缺少作战条件。

想到这儿，丘吉尔用速记形式在日记本上记了一段重要的话：

“从图尔安全返回伦敦。我仍然继续高唱自己谱写的歌曲，今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打击，哪怕是盟国退出我们的联合阵线，我们仍将战斗到底，在所不惜！”

6月13日一早，内阁继续进行辩论。

但这时戴高乐的意见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贝当、魏刚和战时内阁及最

高军事会议的秘书保罗·博杜安这些失败主义者的意见占了上风。虽然戴高乐将军的意见被否决，但他仍然坚持要雷诺签署一项命令，让总司令作好向非洲转移的准备。

临近中午时分，雷诺给魏刚将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政府希望尽量在中央高原和布列塔尼地区坚持抵抗。雷诺接着写道：“万一失败的话，我们就利用海上自由在法兰西两帝国范围内安身并组织抵抗。”可是，这封信到第二天才发出。

13日那天，巴黎在步步进逼的德军面前已撤退一空，城内80%的居民已流离他乡。

侵略者已到了法国首都巴黎城外，没有一声枪响迎接他们，等待他们的是一座没有抵抗也没有人烟的空城。6月14日上午，巨大的“卍”字旗帜升起在巴黎主要广场并高高飘扬在埃菲尔铁塔顶端。德军士兵在马路上昂首阔步，好不得意神气的样子。伟大的、具有光荣历史的法兰西首都，就这样被希特勒的第十八军团占领了。

就在巴黎沦陷的前夕，6月13日，丘吉尔又对法国进行了最后一次访问。其结果仍然使他感到遗憾、失望。这是英法两国之间最后一次磋商。

巴黎沦陷的那天，即6月14日，法国领导人开始了又一次长途跋涉，目的是波尔多。这一次比前一次更加令人沮丧，道路也更加拥挤不堪。雷诺剩下的那点权力正迅速地冰消瓦解。贝当这个庞然大物给斗志涣散的内阁罩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魏刚唯一的愿望就是停战，而博杜安的失败主义影响则几乎无孔不入。

戴高乐到波尔多后，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想迫使雷诺答应采取一些有利于在海外继续战斗的行政措施。他直接了当地对总理说：

“我曾经尽绵薄协助你，但那都是为了战斗。我决不同意求和。

你要是呆在这里，就会遭到失败而葬送你的一切。我们必须尽快迁往阿尔及尔。你到底决定去还是不去？”

“去！”雷诺感到已经事到临头了，只有这样办。

“那么我得马上亲自到伦敦走一趟，设法请英国人协助解决运输问题。我明天就走，将来到什么地方和你会合呢？”戴高乐接着问道。

雷诺的回答是：“到阿尔及尔找我。”

戴高乐将军匆匆告别了雷诺，当反动身到布列塔尼。

6月15日清晨，戴高乐登上了驱逐舰“米兰号”，当晚抵达伦敦。

丘吉尔和他的战时内阁成员，对法国政府的危机一直忧心忡忡。为了阻止法国单独媾和，英国的一些内阁成员和雷诺问题的特使法国国防部次长戴高乐将军几经协商，草拟了英法《联盟宣言》。除了总的方面谈到联盟的好处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雷诺提出一些活生生的振奋人心的新事实，使他能够把大多数阁员迁到北非去继续抗战。经英国战时内阁批准后，就将宣言草稿由戴高乐将军用电话通知雷诺总理。

戴高乐的这个电话是在唐宁街十号接待室打的。在电话中，戴高乐向雷诺总理传达了联盟宣言草案。这时，站在一旁的丘吉尔满面红光，非常兴奋，他禁不住从戴高乐手中拿过电话喊道：“喂！雷诺！戴高乐是对的！我们的建议可能产生巨大的效果。你要坚持住。”

谁知这样一项空前慷慨的建议到头来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在雷诺内阁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争论十分激烈。总理宣读完英国关于建立联盟的建议后，

遭到投降派的坚决反对。雷诺对于《联盟宣言》所寄托的希望顷刻之间便烟消云散了。他明白他已失去了阁僚们的信任，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卸下这个不堪承受的重担。

6月16日晚，戴高乐将军携带《联盟宣言》副本回法进一步征询意见。谁知当他在波尔多机场着陆时，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他的助手告诉他、雷诺已经辞职，勒布伦总统已召请贝当元帅组组政府。这只能意味着投降，戴高乐感到大局已定，无可挽回，是只顾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还是甘愿成为政府的叛逆、军队的抗命者，舍弃身家性命、高堂老母而出走英国，救亡图存？经过思考，戴高乐毅然决定第二天早晨离开法国。他恨贝当、恨魏刚，同时也恨雷诺的软弱。

还是在伦敦的时候，戴高乐为了预防局势的突变，采取了一个超出国防与陆军部次长职权范围的行动措施，电令预定驶向波尔多的法国轮船“巴士德号”改变航向，驶往英国港口。这条船上装有从美国运来的1000门75毫米大炮、数千挺机枪和大量炸药。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对的，这批军火没有落到德国人手里，而重新装备了从敦刻尔克撤回的英国远征军。

戴高乐在飞离法国的前夜，去看望了那位失败了的总理。雷诺由于绝望和失眠，显得萎靡不振。这位富有才智的总理大臣，当初相当坚决，但此时已毫无斗志。最近一连串事变的巨大压力，加上那些怯懦成性的同僚对他的背弃，使他的意志丧失殆尽。现在再也不能对他寄予任何希望了。

即使这样，戴高乐依然向雷诺表示了自己坚决战斗下去的决心。他坚定地说：“天塌下夹，有地顶着，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战斗下去！”

此时的雷诺只能给予支持的，就是从秘密款项下支了十万法郎给戴高乐。

第二天，6月17日上午9时，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和德库塞尔中尉的陪同下，飞往英国，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40年6月17日，一个无名的准将队即将投降纳粹德国的已经土崩瓦解的法国逃到了伦敦。

初来伦敦，戴高乐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单，一切都被剥光了。就象面对着一片茫茫的大海，后退已经是不可能了。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跳到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去搏击，去奋牛，最终达到光明的彼岸。

戴高乐已经破釜沉舟了。但是，如何战斗呢？在什么范围进行呢？要走到什么目的地呢？戴高乐此时是两手空空。他在身旁连一个军队或组织的影子也没有。在法国，他没有人拥护，也没有声誉，在国外同样没有名望和地位。但正由于缺乏这些，他才找到了自己行动的方针，唯有毫不动摇地担负起光复祖国的使命，才能获得权威；唯有成为国家和民族不屈服的战士，才能获得法国人民的承认和热情拥护，并获得外国人的尊敬与重视。他暗暗鼓励自己：“我虽力量有限，孤立无援，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爬上顶峰，不能后退！”

经过反复考虑，戴高乐确定了自己首要的工作是升起国旗。宣布奋斗目标，其次是取得武器，然后建立起一支队伍。对他来说最为幸运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态度同他一样坚决。丘吉尔此时也是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进行战斗的。陆军已是残兵败将，飞机不多，主要盟国已经屈膝投降，他正准备迎接德国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来保卫他的岛国。但是，他的资本

比戴高乐要雄厚得多，英国的领土完整无损，人民的斗志依然旺盛，丘吉尔可以支配全部国家机器和力量，而戴高乐则一无所有。

不管怎么说，丘吉尔立即看到了戴高乐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几天之前，丘吉尔在图尔几乎是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过，戴高乐是个应运而生的人。

6月17日下午，戴高乐站在首相面前要求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当时戴高乐正象是在英国的海岸边遇了难，一切都已荡然无存，没有丘吉尔的帮助他又还能做什么呢？丘吉尔慨然允诺。两人商定等贝当向德国人求和之后进行广播。当晚传来消息说，贝当已经要求停火。

第二天，6月18日下午6时，戴高乐来到布什大厦的B2播音室，坐在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的首次广播。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事实上，从那时起，戴高乐就成了法国的战斗旗手，成了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

年过半百的戴高乐，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政府。

这一政府断定我国军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交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完全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天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迫使我国军队撤退的是德同人的坦克、飞机和战术，而远远不是我们人数不足。正是德国的坦克、飞机和战术提供了突袭的因素，才使我国的领袖们落到现在这种不幸的境地。

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决不！”

讲到这儿，戴高乐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

“我是根据对于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因为，你们要记住，法国不是孤单的。它没有被孤立。在它的后面是一个广大的帝国，并且它还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大英帝国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斗争。和英国一样，法国还能够毫无保留地利用美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斗争的结局。这是一场世界大战。错误已犯过的，曾经有过迟延和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事实仍旧是，我们来日粉碎敌人所需要的每一件东西依然在世界上存在着。今天我们被机械化实力的无情力量击败了，但是我们还能瞻望未来，更加强化的机械化实力将给我们带来胜利，世界的命运还有待决定。”

最后，戴高乐用一种少有的激昂声说：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讲到这里，戴高乐已感到自己热血沸腾，同时内心深处也有一丝凄凄的酸楚，他感到，他和波尔多政府和军队的关系行将结束了。在他年近半百的时候，又开始了冒险生涯，就像一个人被命运抛出来，失掉了一切依靠一样。但他还是渴望波尔多政府在最后的时刻会选择战争的道路。即使有极小的可能，也必须加以鼓励。

戴高乐激昂的演说，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英国，也越过海洋传遍了法国

领土上的各个角落。虽然他的讲话充满着激情，但听的人并不那么信服。他们怀疑一个不知名的新提拔的年轻准将能领导法国人民进行抗战，更怀疑他在国外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反法西斯武装。

但是，对于戴高乐来说，他总算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现在他要作出最后一次尝试，看看海峡彼岸的那些人心中是否尚存抵抗的星星之火。然而，波尔多对戴高乐的回答是一个命他马上回去的电文。这之后，戴高乐给魏刚总司令发了一封信，请他来领导抵抗运动，然而，此信也是石沉大海。直到6月30日，戴高乐接到由法国大使馆转交来的一项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交战争委员会审判。这个委员会起初判戴高乐四年徒刑，后来由于魏刚的坚持，把戴高乐缺席判决了“死刑”。

对于波尔多方面的这种态度，戴高乐只是嗤之以鼻。他把目光随即转向了海外的殖民当局。6月19日，他打电报给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如果他拒绝投降，他戴高乐愿意在诺盖的麾下效劳。当晚，戴高乐又在广播里呼吁：“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继续抗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放下武器、撤离军事阵地，或同意把属于法国的任何一片领土交给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但是，戴高乐所做的这些努力，仍然毫无成效。一些殖民地的总督们，认为戴高乐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准将，”他在官场中“唯一足以挂齿的经历只是在已经下野的雷诺内阁中担任过国防和陆军次长而已。”

1940年的6月，真是一个熬人的6月。在这段时间里，戴高乐焦急如焚，吃睡不宁，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在这段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只有少数人与戴高乐的观点相同，认为政府一旦投降就丧失了一切权利，而大多数人对贝当政府的合法性并没有认真地提出过疑问，诺盖将军倒是想打下去，但就连他也认为没有理由非得响应戴高乐的呼吁不可。这些高级的旧官僚基于陈腐的等级观念和法统思想，确实感到自己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

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6月21日，决定法兰西命运的时刻到了。

1940年6月21日中午，天空格外晴朗。深蓝的天空上飘飞着几丝淡淡的白云，巴黎市郊贡比涅森林显得特别静穆。

希特勒和法国的停战谈判将要在这里举行。提起贡比涅可谓举世闻名。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在这里用他那沾满血渍的手向法国及其盟国签下了投降停战书，在一片寂静之中，法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向德国人宣读了34个条款，使德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他们失败的惨重。二十二年后的今天，历史颠倒过来，希特勒将在这儿报仇雪耻。

也许因为这个地方本身会增加希特勒报仇雪耻的甜美滋味，希特勒便把谈判地点选在了这里。不仅如此，希特勒还命令工兵，用风镐把建在这里的一处博物馆的墙壁推到，把博物馆保存的一节卧车推到屋外的轨道上。因为这节卧车就是当年法军福煦元帅的指挥车厢，德国使节就是在这节车厢里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希特勒将要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确切位置上，报仇雪恨。

下午3时15分，一辆黑色的曼赛德斯牌汽车由远而近驶来，跟在后面的是一辆普通的轿车。在离空地大约200码的阿尔萨斯——洛林的雕像前嘎然

而止。

车门打开，一位身穿绿色制服的军官走下车来，几缕头发梳理得很光滑，紧紧地贴在脑门丘，一撮的小胡子，不用说，这就是德意志帝国最高统帅希特勒。同时走下车来的军官穿着各种各样的制服，他们有空军元帅戈林，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还有雷德尔，里宾特洛甫和赫斯。

希特勒抬头望望天空，蔚蓝的晴空万里无涯，似乎也使他的心里都变得开朗无愁。看得出来，希特勒今天的心情特别舒畅。随后，希特勒向纪念碑望去。这座雕像此时用德国军旗覆盖着，这是为了不让希特勒看到那把大剑。那是 1918 年获得胜利的盟国的一把大剑，插在一只有气无力的鹰身上，这鹰代表霍亨佐仑王朝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似乎也不想看到它，只投了一瞥，便继续大踏步地走去。

走过这块小小的林间空地以后，空地中央升起了希特勒的最高统帅旗。突然，希特勒的注意力给离地约三英尺高的一大块花岗石吸引住了。希特勒及其他的随从，慢步走上前去，读着石头上刻着的纪念碑文：

“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被它所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所击败。”

这块纪念碑是二十二年前，签定凡尔赛和约之后落成的。希特勒读着，戈林也读着。他们站在 6 月的阳光下，在一片沉静中读完了它，周围的人都在注意希特勒面部的表情。德国元首希特勒轻蔑而愤怒地笑了。他怀着报复和胜利有的仇恨，有意站在纪念碑前，目空一切，不可一世！

然后，希特勒高高地昂起头，充满复仇的感情，趾高气扬地朝那节举世闻名的车厢走去。踏进车厢，他得意地坐在 1918 年福煦元帅坐过的那把椅子上，足足有五分多钟。

五分钟以后，法国代表团来了。这个代表团以色当的第二军团司令查理·亨茨格将军为首，成员有一个海军将领，一个空军将领和一个文职官员利昂·诺尔。利昂·诺尔曾任驻波兰大使，他现在正亲身经历着德军造成的第二次崩溃。他们看起来都精神颓丧，但还保持着一种悲惨的尊严。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会把他们带到法国人引为骄傲的这个圣地来受这种屈辱。当他们看到停放在空地中间的那节车厢时，一个个睁大了惊恐的眼睛。他们的这种震惊，无疑正是希特勒所期望的。以查理·亨茨格为首的四名法国代表被引入车厢，坐在对面指定的座位上。

在一片寂静之中，德军军官凯特尔向法国代表宣读了他们拟定的停战条款——总共 36 页。

在德国人提出的条件中，最恶毒的一条就是，强迫法国人把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上的反纳粹的德国流亡人士，全部交给希特勒帝国；凡是与别国联合对付德国作战的法国人，被捕后立即枪决；所有战俘都将被拘留到签订和约为止。

停战条约中最难处理的是法国海军问题。停战协定规定：法国舰队必须复员，解除武装，并把舰只停泊在本国港口废弃不用。德国“无意使用在德国监督下的港口所停泊的法国舰队来为自己作战。”

最后，希特勒给法国政府一块未占领区，它在法国的南部和东南部，由贝当政府治理，首都设在维希。这是一种狡猾的手段。这不仅可以从地理上和行政上分裂法国，还可以使法国流亡政府难以成立，并且可以打消在波尔多的政治家们想把政府迁往北非的任何计划。

对于这些苛刻的投降条件，法国代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在那节卧车车厢中，法国接受了德国的投降条件。这时已是夕阳西沉的傍晚。

法国，这个曾经拥有 300 万大军、号称拥有欧洲头等陆军的大国，这个在上次战争中曾有四年之久坚持不败的法兰西就这样日落西山了。

第二天，即 6 月 22 日下午，法国代表和凯特尔签订了停战文件。

法国的崩溃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民都惊心怵目地看着这个伟大明星的殒落。大多数法国人在听到广播后凄然泪下，无可奈何。不少爱国志士虽然不甘心战败，可又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人们又听到来自海峡彼岸的召唤。就在贝当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当天，戴高乐在伦敦又一次发表声明，严正指出维希政府由于投降敌国已失去正统性，并正式宣布成立“自由法国运动”，发誓“要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

法国沦陷了，代表“自由法国运动”的洛林十字旗却在海峡彼岸高地竖立起来。

6 月 28 日，英国正式承认临时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当时不少欧洲国家的合法政府流亡到伦敦，但象戴高乐那样，在国内存在着表面上“合法”的、并获得美国、苏联等多数国家承认的维希政府，而在伦敦又另起炉灶别树一帜的，却绝无仅有。当时戴高乐面对的是接二连三的挫败，但仍然坚韧不拔。他说：“我力量有限，孤立无援。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爬上高峰，永不后退！”

没有武装就没有法国，建立一支战斗队比什么都重要。戴高乐四处奔波，加紧力自己建立一支战斗队而努力，英国当局把白城体育馆借给戴高乐，作为他招兵买马的集合地。然而，在 6 月 18 日的召唤广播后的一个星期时间里，才只有几百人集合到自由法国的旗帜之下。所幸的是，这时，大约有十万吨法国船舶到英国港口避难，船上至少有一万名水手。此外还有几千名在比利时负伤的士兵正在英国医院里逐渐康复。但这些士兵和水手中的大多数人一心想回家，因为在他们看来，战争已经结束了。贝当政府的命令就是这样说的，绝大多数人都乐于从命。

但是，在困难面前，戴高乐并没有低头，6 月 29 日，他去利物浦附近的特伦特姆公园活动，那里驻扎着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他经该师指挥官同意，招募了外籍军团第十三旅两个营的大部分，200 名阿尔卑斯山步兵，一个坦克连的三分之二，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几天之后，戴高乐又在哈罗公园取得很多收获，两艘潜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拥护戴高乐。驻在圣阿塔恩的几十名飞行员后来成了自由法国空军的核心。

就这样，到 6 月底，戴高乐的募兵活动虽非一帆风顺，倒也初具势头。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第一个具有高级军衔的人士到达伦敦，宣布支持戴高乐。他就是海军中将米塞利埃。他的到来对戴高乐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样，零星到达伦敦的志愿人员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他们有些人是从法国绕道西班牙逃出来的，有些人是从北非经过直布罗陀投奔来的。集中在白城的两千名敦刻尔克伤员中，有二百名决定投靠自由法国；一个从地中海东部地区陆军中分拨出来驻守塞浦路斯的殖民地营，也聚集到自由法国的旗帜之下；6 月底，有一个渔船队把下列塔尼沿岸塞纳岛上所有身强力壮的男人都运到了科尼什海岸。虽然这些人加到一起人数也不算太多，但他们的重要性却不是数字所能计量的。这些青年志愿者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戴高乐反法西斯战士们的

信心。与此同时，他们与海外的联系也加强了，每天都收到成千上万封信件，大大提高了戴高乐在海外的声音。

因此7月初，戴高乐周围充满了轻松乐观的气氛。但是，这种气氛维持时间不长，即被英国海军袭击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冲淡法国沦陷以后，丘吉尔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法国舰队的命运。法德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法国舰队应在德国或意大利的监督下退役并解除武装。诚然，在同一条款中，德方宣称，他们无意在战争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舰只。但是，从希特勒的以往作为来看，这一诺言既不可信，也毫无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毅然决定必须摧毁或夺取法国舰队，或者使之失去战斗力。当时这支强大的作战力量正散泊在英国、地中海、非洲和马提尼克等地的港湾内。7月3日清晨，英国以占压倒优势的兵力突然袭击停泊在朴茨茅斯和普利茅斯的法国舰艇，俘获战列舰两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8艘，潜艇若干，以及大约200艘小型船只。唯有大型潜艇“苏尔古夫号”进行了抵抗，双方各死一人，三名英军受伤。

当天，在米尔斯克比尔海军基地附近的奥兰，法国海军上将让苏尔拒绝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从“皇家方舟号”上起飞的飞机炸毁了战列舰“布列塔尼号”。“敦刻尔克号”搁浅了，战列舰“普罗旺斯号”冲上了沙滩。“斯特拉斯堡号”被击伤，但从阿尔及尔开来的几艘巡洋舰逃到了土伦。

7月4日，丘吉尔向下院报告了米尔斯克比尔行动的经过，议员全体起立，朝野党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然而，戴高乐从报纸和广播中获悉这一消息时，好像突然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他觉得这并不完全是由于正当的保障完全的动机，而且还由于“多年海上竞争的积怨、法西斯战役开始后日益加深的不满以及因维希政权缔结停战协定而爆发出来的愤恨。”但他也承认由于法国已经投降而德国将来可能毁约，因此英国人有理由担心出现最坏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不列颠就会受到致命的威胁。所以戴高乐对英国人的行径和他们的吹嘘一概忍气吞声。他认定法国本身的命运应当高于法国舰队的命运，因此战斗必须坚持下去。

不管怎么说，这个事件对于自由法国刚刚萌芽的希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有数百名法国水兵志愿在英国海军中服役，但自由法国的应募人数急剧下降。

7月1日迁往维希的法国政府在7月5日作出了反应，宣布与大不列颠断交。6天以后，贝当元帅被选为国家元首。这无疑反映了法国民众已经毫无斗志。没有几个人相信戴高乐所代表的事业有可能成功。愿意接受他领导的则更是寥寥无几。

虽然戴高乐招兵买马的工作困难重重，但他的号召还是感动了一些有识之士。卡特鲁上将从西贡前来听候戴高乐的吩咐，并且巧妙地拒绝了英国内阁希望他能取代一位若明若暗，不合适的准将的建议。同时勒让蒂约姆将军、德拉夫纳上校、达尚利尔海军少校、布路赛少校、德奥特克洛克上尉都先后前来报到。戴高乐在圣西尔的老同学贝图阿尔，从挪威率领外籍军团的一个旅在伦敦登陆。他重返摩洛哥时，留下了外籍军团的半个旅，由马赫林·凡纳莱指挥，另由河尼希上尉和德瓦弗兰上尉从旁协助。至于“非军事人员”前来参加戴高乐运动的倒是络绎不绝。

戴高乐在接待前来投奔他的人时，总是带着犀利的目光，用他那清晰、

犀利、粗犷的声音说，“如果希特勒要来伦敦，他也许早已来了；我认为俄国将完于美国投入战争，不过，苏美两国都会介入战争。希特勒想的是乌克兰，他征服不了俄国，而这将是他失败的开始。法西斯的侵略会激起全世界愈来愈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我们暂时虽说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一定胜利。法兰西这个国家一定在我们手里重新获得解放而进一步发扬光大。”戴高乐通过手势特别是通过语言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前来报到的爱国志士。也许他们来时还抱着各种疑虑，但当他们听完这段慷慨激昂的言论时，当时谁不甘心当个戴高乐主义古呢？

忙忙碌碌之中，1940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悄悄来到了。戴高乐采取了果敢而又不乏想象力的行动，决定举行自由法国战斗队阅兵式。

7月14日上午，拥有7000余人的自由法国战斗队齐集白厅。戴高乐威严地站立在台阶上，他的身后是一幅巨大的福煦元帅画像。戴高乐用他那特有的阴沉犀利的目光注视着这个队伍。在微风的吹拂下，洛林十字旗高高飘扬。

10点钟，戴高乐宣布阅兵开始，在伦敦公众赞许的目光下，一列列方队英姿勃发地走过主席台前，戴高乐默默地注视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可以感到在他冷峻的外表下，他的内心却燃烧着一团火，他在心灵深处意识到光复祖国的重任就要落在他们的肩上，任重而道远。

随后，戴高乐率领这支队伍在福煦元帅的像前敬献了三色花圈。

这是戴高乐以及他的部队第一次在伦敦公开亮相，他向人们宣告“自由法国运动”成立，从此将与维希政府分庭抗礼。同时，为了完成自由法国的抗德大业，他希望得到世人更多的支持。

7月21日，首批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对鲁尔区的轰炸，这标志着自由法国重新投入战斗了。8月24日，这支队伍荣幸地接受了英王乔治六世的检阅。

战斗的法国在苦难中挣扎，在战斗中成长。热情的言论从法国大量涌来。戴高乐将军坐在泰晤士河堤岸上的圣史蒂芬大厦办公室里，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他的桌上摆放着许许多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其中有一件使他极为感动。那是一张7月14日在星形广场拍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那一天德国人到了那里以后，有一群男女在无名将上碑周围沉浸在悲哀里。7月19日，他们把这张照片寄来，并且写了这样几句话：“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我们在等待你！”另外一张是路过的人献满了鲜花的坟墓。这就是戴高乐母亲的坟墓。她在7月16日向上帝奉献了她的苦难，祈求挽救法国和庇护她的儿子的使命以后，就在班明死去了。

看到这里，戴高乐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他慢慢离开自己的办公桌，踱步来到窗前，一眼望见的是碧水粼粼的泰晤士河，他不由得想起了他的祖国，想起了巴黎美丽的塞纳河，想起了故乡的亲人和朋友，他沉浸在无限的深深的眷恋之中……

1940年8月，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总部迁到了卡尔顿花园四号一所较为宽敞的楼房。在初步建立了一支自由法国战斗队之后，戴高乐感到尽快确定自由法国和英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更显得极端重要。

早在6月28日，英国政府便发表了一项公告，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虽然当上了领袖，但他的地位还有待于去

巩固。于是，戴高乐于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和英国首相以及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谈判。以他在6月26日交给丘吉尔先生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一份备忘录为起点，终于达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协议。

这一协议通常被称为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它是戴高乐努力建立的那个大厦的基石。

在协议中，戴高乐坚持英国必须保证重新恢复法国本土和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他想用这种办法从法律上使英国人打消他们可能怀有的任何攫取法属领土以扩大下列颠帝国的冒险想法。最后，英国人承认“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与伟大”。

在草拟确定戴高乐将军本身的权限和如何使用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条款时，双方字斟句酌，进行了艰苦的辩论。出于人力物力相差悬殊的考虑，戴高乐不得不承认指挥任何联合行动的最高权力只能属于英国。但他却为自己保留了拥有对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只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一般指示”。在这种方式下，纯民族的性质就建立起来了。

在协议中，自由法国军队的开支暂时由英国政府负担。由于初期戴高乐没有财源，所以坚持载明这只是借支。所有开支将单独立帐，以后予以偿还，从而保持了法国的荣誉。由此看来，戴高乐在对外关系，在涉及法国利益的问题上，一开始就表现了一个“高大的强硬者的形象”。

经过反复磋商，戴高乐和丘吉尔在首相别墅共同签署了这一协议。

丘吉尔——戴高乐协议标志着这两位领导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峰。维希政府在法国舰队于米尔斯克比尔被摧毁以后已经和英国断交。丘吉尔实际上已承认了戴高乐的初具雏形的政权。

这一协议对于自由法国也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不但使戴高乐摆脱了当前的物质困难，同时也使英国政治同自由法国的关系从此有了正式的基础，往后便可以不再犹豫不决地为自由法国解决困难了。最重要的是，它使全世界知道，英法的团结无论如何又有了新的开端。其结果不久就在法兰西帝国的某些领土和法国海外侨民中间产生了影响。同时，其他国家看到英国开始承认自由法国了，也朝同一方向采取了某些步骤。这首先发生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之间，它们的力量无疑是很小的，但却保持了它们在国际上的代表地位和影响。

戴高乐在努力使自由法国获得国际重视的同时，也设法使政治和行政机构的雏形活动起来。这时，戴高乐得到了一些杰出人物的支持。卡森教授作为戴高乐的助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许多协议和公文，在处理对内和对外关系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安东尼负责管理初期内政部门的行政事宜，在那个草创时代，他做了许多工作，令戴高乐感激不尽。拉比和爱斯加拉负责和外交部各部门以及欧洲各流亡政府联系。普利文和丹尼斯负责管理微薄的财源。舒曼担任了无线电广播的自由法国代言人。宾金则同盟国妥善地解决了法国商船和海员的使用问题。此外，在处理军事问题方面，戴高乐还有一批得力的参谋。就是这样一批被敌人诬蔑为叛徒、贪婪之徒和冒险家的人，使自由法国的政治和行政机构运转起来。他们在自由法国崇高事业的鼓舞下，不辞赴汤蹈火，一直跟随着戴高乐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斗。

到了8月的时候，自由法国有了一些资源，也有了一个初步的组织，而且获得了一定的声誉。这时，戴高乐把注意力转向了非洲。不久以前，他还枉费心机地企图把法国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引向这条路，现在当他发现继续坚

持作战的责任完全落在自己肩上时，戴高乐便毅然走上在非洲继续战斗的这条路。

在非洲辽阔的土地上，戴高乐为了他的事业开始了历尽坎坷的创业生涯……

第三章 柳暗花明

流亡的叛逆者
把洛林十字旗打到非洲去！
光杆司令
克服内外危机，坚持独立自主
圣诞之夜
复杂的中东
伟大的“自由法国”

1940年8月2日，对于戴高乐来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戴高乐将军被贝当政府图卢兹第17区军事法庭缺席审判，判决死刑。

坐在卡尔顿花园的办公楼里，戴高乐在听到这一判决时，只是冷冰冰地说道：“贝当元帅是卖国贼，我要枪毙他。魏刚将军是卖国贼，我要枪毙他。凡是叛徒都要枪毙！”同时，戴高乐也在为自己2个月前毅然出走伦敦的举动而感到庆幸。说起来，6月17日戴高乐飞往英国那也是惊险的一幕。

1940年6月，是法国内阁就战与降问题斗争的最为激烈的时候。贝当元帅下令严密监视主战派人物戴高乐将军。精明强干的戴高乐将军曾是贝当元帅手下的一名团长。贝当深知他才智过人，随时都会作出意想不到的举动，为此，贝当元帅下了一道特别令，组织了强有力的班子，严密控制这个与众不同的将军。

当戴高乐看到主战派领袖雷诺总理被逼下台，投降派领袖贝当上台后，他清楚地意识到，贝当上台意味着投降，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于是他毅然决定出走英国，去另辟坚持斗争的道路，抗战到底。然而，他的周围早已埋伏着贝当的密探，戴高乐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之下。如何才能甩掉他们，出走成功呢？

戴高乐不愧是才智过人，计高胆大，他很快想出了一个高妙的手段，以迷惑密探们的嗅觉。

第二天，即6月17日上午9时，戴高乐经过头天晚上紧张的安排后，借口为陪同丘吉尔来法国的斯皮尔斯将军送行而同去机场。主宾们相互握别，眼看专机已滑到了起跑线上。戴高乐将军自如地和那位英国将军说着话，交换着必不可少的外交辞令，周围站满法国保安局大批警员和暗探。出人意料，飞机舱门突然打开了，从里边伸出一双强有力的手，一把握住戴高乐将军。一眨眼工夫，戴高乐飞身跨上飞机，只听砰的一声，机舱的门关上了。

真是拔地而起，腾空而去。目睹这番情景的法国官员目瞪口呆，他们只好望空兴叹。就这样，戴高乐将军勇敢果断地逃脱了贝当投降派的魔掌。

当天，戴高乐将军就飞到了伦敦。这以后，贝当的追随者不断地劝说流亡英国的将军返回法国，但遭到戴高乐将军的严辞拒绝，诱归不成，时至今日，维希政府只能以叛国罪，缺席审判，判决戴高乐死刑。

然而，事与愿违，对于反人民、亲德的法国维希政府来说，这一判决也已是鞭长莫及，他们这些卖国贼也只能隔海望洋兴叹了。

这一天，戴高乐非但没有去赴刑，相反，他已决定把已经竖立起来的抗德大旗打到非洲，打到维希政府统辖的领地。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戴高乐以他大无畏的英雄气魄和胆略，开始了艰难的开拓非洲的抗战事业。

戴高乐在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后，就把注意力转向了非洲。法兰西帝国在非洲有众多的殖民地，而巨非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将来反攻时，这里可以作为解放欧洲大陆的跳板。

但是，到非洲应当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坐在卡尔顿花园的办公室里，戴高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在北非，诺盖将军抵制媾和达三天之久，但在6月25日却接受了停战。在那里，人们抱着一种“胆怯的轻松情绪”，认为停战条件使北非处于占领之外。法国当局在这里显然以一种军事的和具体的形式存在着，人们仍在追随贝当政府。显然，这里是戴高乐所不能考虑的。但在西非和赤道非洲，戴高乐看到了希望。

在喀麦隆，掀起了最强烈的反投降浪潮。在这个国家，不论是法国人还是本地人，都对投降非常愤慨。他们毫不怀疑，要是希特勒得到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所遭受的德国统治又会卷土重来。尽管布律诺总督不愿表态，但在公共工程局长莫莱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宣布支持自由法国。

乍得的情形比喀麦隆还要好。总督费利克斯·埃布埃坚决赞同抵抗运动。这位有良心有智慧的、热烈维护法国的黑人，这位人道主义的哲学家，全力以赴地反对法国的屈服，对纳粹种族歧视深恶痛绝。埃布埃表示他随时准备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

法属非洲其他地区的反应不是模棱两可，就是令人泄气。法属刚果总督布瓦松起初反对投降，但当他从布拉柴维尔调往达喀尔，升任更为重要的法属西非各领地的高级专员时，态度大变，倒向维希政府一边。在乌班吉（现称中非共和国），人们是赞成抗战的，但是需经布拉柴维尔方面的同意，看起来不大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加蓬的态度令人捉摸不透，但沉默中很可能怀有敌意。

在全面分析了法属非洲各国的局势之后，戴高乐决定先从形势有利的乍得、喀麦隆和刚果等地入手，派得力干部前往非洲开辟工作，把西非和赤道地区首先号召起来，使他们归附自由法国。

8月2日，戴高乐派勒让蒂约姆将军，带了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前赴“非洲三角”的索马里半岛开辟工作。而后，派普利文、帕朗少校、勒克莱尔和戴高乐的内阁总管埃蒂埃·德布瓦兰贝尔前赴赤道非洲。第一站是乍得的拉密堡。在那里，他们会见了埃布埃总督，设法使乍得归附自由法国，然后到杜阿拉去帮助莫克莱尔和他的行动委员会发动计划中的“政变”，使喀麦隆倒向戴高乐。

很快地，洛林十字旗在乍得与喀麦隆高高升起，这更坚定了戴高乐开拓非洲的信心和决心。他的下一步计划便是把刚果、乌班吉和加蓬等三个殖民地拉过来。而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赤道非洲的首府、权威的象征——布拉柴维尔夺下来。而这一艰巨的任务由谁来承担呢？这时，戴高乐想到了一位杰出而敏捷的军官德拉米纳上校。

早在6月末，这位上校就以法国中东军区参谋长的资格劝说他的领导米特尔蒙塞将军坚持战斗，但没有成功。后来他自己便把不接受停战的部队组织起来拉到巴勒斯坦。米特尔蒙塞追到了那里，追问了这支部队，但却有一个部分人已逃到了英国。德拉米纳上校因此被捕，但很快地又逃脱出来。他跑到吉布提，当了勒让蒂约姆将军的助手，曾努力使法属索马里坚持战斗，

但没有得到结果，后来退休到埃及去了。

就是这样一位坚定的抗战行，在开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重任。8月28日，德拉米纳上校按照预定计划进入布拉柴维尔政府大厦，迫使领地长官胡松辞职。胡松虽然提出了抗议，但却由于无力抵挡只好退了职。警备队、公务人员、殖民者和本地人由于事前在军医少将西塞、兵站总监索克斯、炮兵上校塞勒斯、空军中校卡勒蒂耶的影响下，思想有了准备，所以都很欢迎这件事。随后，德拉米纳上校立即以戴高乐的名义把法属赤道非洲高级专员的民政和军事权力接收过来。乌班吉的总督在圣马尔特早就在寻找机会，一旦听到布拉柴维尔被接管后，马上就打电报表示归附自由法国。但军队的司令官和一部分队伍却把兵营关起来，威胁要放火烧城。德拉米纳上校立即乘飞机到乌班吉，使这一批误入歧途的人改弦易辙。

到8月底，戴高乐派出的这五位年轻人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流一滴血。乍得、喀麦隆，刚果和乌班吉都站到戴高乐方面来了，这是法国反法西斯战士们获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就在此前后，戴高乐又获悉卡特鲁将军即将从印度支那前来伦敦，这更使他喜出望外。不巧的是，戴高乐正准备去非洲，便给卡特鲁将军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上的日期是1940年8月29日，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将军：您想象不出当我获悉您将在最近到达的消息时，我是多么的高兴。要把法国从深渊中拯救出来，有许多工作要做，像您这样的人才，这样的领导，对于复兴法兰西定能起很大的作用。您也知道，我向来对您非常敬重，并且怀着真诚和崇敬的友谊。您在印度支那所采取的态度，更坚定了这些思想情绪。现在正是需要您发挥作用的时候！”在信中，戴高乐还提到了远征达喀尔的计划。

当卡特鲁将军到达伦敦时，戴高乐已带领他的远征军开赴达喀尔了。卡特鲁将军追到非洲，终于在拉密堡见到了戴高乐。戴高乐设宴欢迎卡特鲁将军的到来，在晚宴上，戴高乐望着佩戴五星上将军衔的卡特鲁将军，举杯祝酒，说，“我对您这位伟大的领导人素来怀有崇敬的友情”，卡特鲁将军的答词也十分感人，他说：“我真诚地愿意接受您本人的领导”。出席宴会的埃布埃总督和其他人都认识到，在卡特鲁的心目中，戴高乐的重要性已经超越出了他的军阶。

这一天，戴高乐满面红光，显得非常兴奋。殊不知，他是在极力掩饰他内心的痛楚，因为在刚刚结束的达喀尔远征行动中，他失败了。

达喀尔，一直是戴高乐想要征服的地方，但又是他非常难啃的一块骨头。

在戴高乐看来，如果能对达喀尔进行一次成功的远征，就能使塞内加尔和法属西非其他地区聚集到他的旗帜之下。尽管戴高乐从现实出发，痛苦地意识到，要避免法国人同法国人之间的冲突是很难办到的，但他决心避免大规模的战斗。9月初，他便制订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他计划派一小股自由法国部队在法属几内亚的科纳克里登陆，从后方逐渐逼近达喀尔，并在沿途扩充力量，争取各方支持。然而，要使这一计划获得成功，心须提供海上支援，否则，这支远征部队就会被维希的海军消灭掉。于是，戴高乐把他的计划透露给了丘吉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8月6日，戴高乐应邀来到丘吉尔的官邸，唐宁街10号。一进门，他便看到内阁会议室的桌子上摆着几张非洲地图。丘吉尔兴致勃勃，十分健谈。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反驳戴高乐在科纳克里登陆的计划。他认为，那样

将把一支英国舰队在非洲海岸滞留好几个月。他提出了一个可以更快实现而更富有想象力的方案，他以他特有的风度向戴高乐侃侃而谈。

丘吉尔眉飞色舞地描绘了一幅达喀尔黎明时分的景象：人们从忧愁和疑虑中醒来，看到海面上已布满了战舰。上百艘舰艇徐徐驶近，一边前进一边播送着表示友谊的声音。有些船上飘扬着法国的三色旗，有的挂的是英国、荷兰、波兰、比利时的国旗。从这支盟军的舰队里驶出一只不带武器的小船，上面挂着谈判的白旗，载着戴高乐将军的私人代表开进港内。他们将被带去会见总督，给他施加了点友好然而却是坚定的压力：是合作，还是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这时，自由法国和英国的飞机将飞临城市上空，撒下劝告的传单。总督只能装装样子放上几炮，但不会再打下去。到了晚上，他就要和戴高乐共进晚餐，为最后的胜利干杯啦。

丘吉尔的热情起了特别效果，戴高乐认为这个计划本身也很有道理。于是，戴高乐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为此，丘吉尔代表英国方面同意派出两艘旧式战列舰“巴勒姆号”和“坚毅号”，四艘巡洋舰，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几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船，此外还有三艘运输舰，载着两营海军陆战队，前去支援达喀尔远征部队。

1910年8月31日，在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的指挥下，戴高乐的远征部队从利物浦出发了。戴高乐将军乘坐悬挂法国国旗的“韦斯特兰号”，斯皮尔斯将军站在他的旁边。望着茫茫大海，戴高乐将军心潮起伏，他的脑海里不时地闪现出丘吉尔为他描绘的那幅美好的图景。

不料，倒霉的事情接踵而来。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航程，这支英法联合舰队于9月17日到达弗里敦。在此之前几天，他们得到了一个令人担心的消息：一支强大的维希舰队，由“乔治·莱格号”、“光荣号”和“蒙特卡尔姆号”等三艘新式巨型巡洋舰，以及“无畏号”、“幻想号”和“马林号”等三艘轻型巡洋舰组成，自图伦起航，安然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正沿着西非海岸南下。英国和自由法国的舰队到达弗里敦时，这支维希舰队已经到过达喀尔，得到“普利茅斯号”巡洋舰的增援，而后向南驶去。

在敌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戴高乐决心继续执行达喀尔计划，他所担心的是赤道非洲沿岸各领地会破维希的这支舰队吓倒。于是，舰队于21日起航，继续向达喀尔航行，两天后在拂晓时分终于抵达目的地。

此时又碰上了一桩倒霉的事情。要想取得丘吉尔所设想的那种戏剧性效果，就得有极好的能见度，这样对方就可能看见英法舰队而被吓倒。不巧，天公不作美，一场当地罕见的浓雾使人们什么也看不见。戴高乐派出的使节遭到炮击，两人重伤。于是，英国战舰和海岸炮台交火，对打了一阵之后，决定让戴高乐在达喀尔附近的小港律菲斯克登陆。但由于大雾弥漫，一片混乱，又遇到岸上的抵抗，他们便放弃了这一计划。戴高乐和坎宁安都伤心地认为，这次行动应该就此作罢。

达喀尔行动计划失败了，戴高乐感到就象发生了一场地震，住房倒坍，瓦块劈里啪啦地砸在头上。丘吉尔也因此而大丢其脸。战列舰“坚毅号”受伤，好几个月不能使用。两艘驱逐舰也受到重创。维希方面，两艘潜艇破击沉，两艘驱逐舰被击中烧毁。“黎塞留号”受到严重损伤，由于达喀尔缺乏修理设备而不能参战。伦敦报界忍气冲冲地把这次惨败归咎于戴高乐。维希方面则对戴高乐遭到的挫折幸灾乐祸，并从摩洛哥出动飞机轰炸直布罗陀但是，并非一切都完了。丘吉尔在伦敦对下院说，戴高乐的表现使他比以往往

何时候都更加信赖这位将军。戴高乐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对他也仍然忠贞不渝。德拉米纳和勒克莱尔给他发来热情洋溢的电报，重申他们的忠诚。

10月8日，当戴高乐来到杜阿拉时，勒克莱尔在此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表现了对自由法国的热忱。

所有这些，反倒使戴高乐感到负疚。他感到，从今以后，他就是不屈不挠的法国的象征，他必须使自己无愧于这一新的形象。他写道，这对于他来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

肩负着一副十分沉重的担子，戴高乐在茫茫的非洲荒原上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幅员辽阔的非洲领地，戴高乐不辞辛苦，来往奔波。尽管他能调动的力量十分有限，但仍计划在乍得和利比亚边境荒凉偏僻的沙漠里建立一个撒哈拉沙漠作战基地，准备有一天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就让一支法国纵队去攻取费赞，并从那里打到地中海去。他同时还打算派一支自由法国远征军到中东去和英国人配合作战。这些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法属北非。

10月12日，戴高乐离开喀麦隆前往其他地方视察。当他在雅温得稍事逗留后，乘飞机前往乍得。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人旦夕祸福。戴高乐的乍得之行差一点以灾难告终。当他乘坐波特兹540式飞机去视察拉密堡时，中途机器出了故障。然而就象一个奇迹似的，这架飞机设法迫降在一个沼泽地里，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坏。

在乍得，戴高乐看到了一种极端紧张而兴奋的气氛。这里由于地势偏僻，与外界隔绝、气候恶劣，缺乏资源，使得这里的部队给养十分缺乏，但他们还是打起洛林十字旗向戴高乐表示欢迎。

洛林十字旗已经到处飘扬了，这使戴高乐感到无比欣慰。就在这时，戴高乐得知10月24日贝当和希特勒在蒙都瓦会晤，表明维希准备积极与纳粹勾结。这使戴高乐感到无比愤恨。在戴高乐看来，当前仅仅谴责维希政府，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是不够的。他本人心须成为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保护人，自由法国必须在已解放的领土上行使一个主权政府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40年10月27日是戴高乐繁忙而又重要的一天。

戴高乐在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当时也是进行抵抗的法国首都——布拉柴维尔，发表了庄严的宣言。他在宣言中讲到：

“法国现在正遭遇着它历史上最可怖的危机。它的领土，它的帝国，它的独立，甚至于它的精神都受到了毁灭的威胁。

一些不三不四的当局，对无可奈何的恐慌点了头，已经接受了敌人的法律，唯命是听。但是，无数的事实证明人民和帝国并不接受这种可怖的奴役。千百万法国人民，或千百万法国臣民，已经下了决心，要把战争一直打到解放为止。还有千千万万人民整装待发，只是还没有找到名副其实的领导者们。

但是一个真正的法国政府已不存在了。事实上在维希虚有其位而徒拥虚名的那个机构是不合宪法的，是仰侵略者的鼻息的。从奴役的情况来看，这个机构只能当作被法国的敌人围来反对国家的荣誉和利益的一种工具，事实上也仅仅如此。因此，必须有一个新的政权负起指挥法国作战的重任。时势把这个神圣的职责交给了我；我一定不辜负它。

我要以法国的名义，而且只是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职权，一旦法国人民能自由地选派代表时，我要郑重地向他们提出有关我的行动的报告。

为了协助我进行工作，我从即日起，组织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代表着这个正在为自下而上而斗争的国家和帝国，由正在法国领土上行使职权的人员，或象征民族最高智慧和道德观念的人们组成。

我号召所有法国领土内团结在我周围的男女老幼参加战争，那就是说参加战斗，或准备牺牲。我们的同盟国宣布了他们决心要为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作出贡献。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跟它们密切联系之下，保卫那一份尚在我们手中的民族遗产，免受敌人或他的帮凶们的侵略，是要在任何地方随时攻击敌人；动员我们军事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的一切力量，维持公共治安，并主持正义。

我们有着很好地服务法国的觉悟，抱着必胜的信心，一定要完成这一个伟大的、保卫法国的任务。”

戴高乐将军还在 10 月 27 日这一天，颁布了两项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第二项法令，任命卡特鲁将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埃布埃总督、索托总督、军医西塞将军、卡森教授，达尔让利厄神父和勒克莱尔少校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由戴高乐本人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戴高乐为了让全体法国人认识到布拉柴维尔宣言和同时发表的两项法令的重要意义，戴高乐在离开布拉柴维尔之前，于 11 月 16 日又郑重地发表了一个“组织宣言”，宣布他掌权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整个法国，同时根据 1884 年的法律谴责维希炮制的所谓“法兰西国家”是违反宪法的。

就这样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在非洲，戴高乐建立了一个辽阔的作战基地和一个精干的行政机构，这是些实实在在的成就，而达喀尔惨败的耻辱此时已渐渐为人们所忘记了。而且，一个以戴高乐为当然领袖的自由法国人的国家业已建立起来了。

11 月 17 日，戴高乐离开了广阔无垠的非洲，登上了飞往伦敦的飞机。透过舷窗，向下望去，戴高乐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沙漠像黄色的大海。那一道道一条条的沙浪，就像是阵阵海浪，那行进在沙漠路上的一队队骆驼，就像飘摇在海涛上的小舟，那被一丛丛沙柳围集着的绿洲，就像是海面上星罗棋布的岛屿。他的心中突然涌起一股热流，千头万绪涌上心头。从单枪匹马号召抗德到创建自由法国运动，戴高乐穿过了多少激流，闯过了多少暗礁啊。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从今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寄人篱下的流浪汉了。想到这里，戴高乐怎么能不为之欣喜，怎么能不为之激动呢？

初冬降临的时候，戴高乐回到了伦敦。

一踏上伦敦的土地，戴高乐心中无不感到骄傲。他亲眼看到了他的盟友在遭到德国法西斯空袭后，依然镇定自若，奋起抗击，伦敦岿然还在。在这座伟大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丘吉尔的名言：“让我们投身于国家吧，我们要参加战斗。参加工作，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但是，戴高乐也很快地发现，伦敦人在清除断瓦残垣的时候，另外一些恐怖依然笼罩在他们的心头。希特勒在首次空袭伦敦遭到失败后，并不死心，为了实现他的“海狮计划”，他已下令改用长期的、主要是夜袭伦敦及其他主要城市的战略以拖垮英国。死神，依然游荡在英伦三岛的上空。

在这种困境之中，英国人已经无暇顾及他人了，戴高乐很快地发现，伦敦政界正在集中精力在自己的事情上，自由法国的一些具体问题对他们来说就很不合时宜了。对于自由法国来说，在这个战事沉寂而物资又十分匮乏的时期，指望伦敦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已不可能了。

然而自由法国还面临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戴高乐一回到伦敦，就在考虑和英国一同进军中东的问题，想乘胜扩大战果。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一方面要对他们保持一种坚决的独立态度，同时又要向他们取得不可缺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自由法国与他的盟友之间也必不可少地发生一些摩擦。

正当戴高乐回到伦敦开始着手下一步工作时，他很快地发现英国政府方面犯了一个惊人的错误。他们被“情报处”耽误了。那时英国由于被围正弄得头昏脑胀，于是情报和保安机关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加起来。“情报处”也把他的触角伸向自由法国方面来了。他们在这有面用了一些怀着善意的人，同时也用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总之，英国政府在某些令人讨厌的特务的唆使下，突然对自由法国进行中伤，几乎把它断送掉。

就在这时，自由法国内部也出现了危机。由于自由法国是仓促间一个人一个人地聚集起来的，其中也不乏冒险家、阴谋家或官迷。戴高乐本来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尽忠职守，实际上野心勃勃之辈和多疑猜忌之徒的勾心斗角以及搬弄是非、竞相诋毁和造谣中伤的事也是层出不穷。

早在戴高乐在非洲期间，他在伦敦的追随者相互怨艾嫉恨，勾心斗角，闹得不可开交。与戴高乐闹分裂的人物主要有三派：一派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唱反调的！一派是对他不满意的；还有一派是由于有等级观念。换句话说，有些人认为戴高乐有可能成为军事独裁者；有些人是冒险分子，他们捞取一官半职的野心未能得遂；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戴高乐级别太低，没有资格领导这一自称代表整个民族的运动，他们宁愿追随米塞利埃海军中将那样级别较高的人物。《自由法国评论》编辑安德烈·拉巴尔特是一个与戴高乐政见不同的人物，属于第二派那些心怀不满的冒险分子，在戴高乐去非洲期间，他离开了卡尔登花园，后来倒向了吉诺。穆兹利埃将军也在此期间与其他部门闹翻了。

米塞利埃也是一个具有“难以相处”性格的人。他到伦敦时年已六旬，他的胡须墨黑，两眼炯炯有神，整天轻松自在，显出一副大海盗的气派。戴高乐曾听说，此人在法国海军里的名声“很臭”，为此，他曾亲自拜访驻伦敦的法国海军代表团团长奥当达海军上将，问他是否知道米塞利埃一生中干过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海军上将断然予以否定。戴高乐这才感到放心，决定任命米塞利埃为自由法国海军司令。然而，这位海军中将在法军中的级别比戴高乐将军要高，但到伦敦后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成了戴高乐的下属，他对这一点一直心怀不满。于是，米塞利埃在任命之后便超出戴高乐授予他的权限去发号施令，或者就破坏戴高乐命令的执行。1940年秋，戴高乐前往非洲的时候，不愿意把自由法国运动的指挥权交给米塞利埃。而作为投靠自由法国运动的级别最高的军人，他当然希望戴高乐在离开伦敦期间派他为代表，但戴高乐并不十分信任他，所以没有在离开伦敦期间让他全面负责。于是，他心怀不满。

10月9日，戴高乐曾电令米塞利埃把自由法国的舰只尽量派往法属赤道非洲的黑角，戴高乐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海军基地。米塞利埃却在12日的复电中列举了一系列技术上的理由，说明无法执行戴高乐的命令。戴高乐对此怒火中烧，他在10月20日又发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我不满意你目前的态度。在我离开以后的第一个月中，你的工作尚称良好，现在则另是一样。我命令你今后只处理军事问题。请你不要突然任命人员，以免引起混乱和不满。……”

就这样，在戴高乐离开伦敦期间，卡尔登花园中所发生的一些严重的个人冲突和公务上的勾心斗角，已扰乱了士气，使许多自由法国志愿战士感到愤慨。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外部和内部危机，戴高乐将军自始至终地寸步不让，拒绝妥协，傲然无视自己地位的软弱。他一方面着手安排人事，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着手考虑进军中东的问题。

转瞬之间，1941年元旦悄悄降临了。

从非洲回来几周以后，戴高乐将军同夫人和孩子一起迎来了1941年元旦。此时他们已经搬进座落在希罗普郡的一幢别墅了。

新年的夜晚，海上起了风暴。排山倒海的海啸铺天盖地而来，威逼整个伦敦，这种凶恶的飓风，在空荡荡的毫无防护的街道上，横冲直闯；在黑糊糊的弹坑里盘旋，卷起大片大片的积雪。洁白的鹅毛大雪，覆盖了烧焦熏黑的残垣断壁，一眨眼工夫，英国古老首都伦敦便披上了白绒绒的外衣。这般景色，是戴高乐逃亡到伦敦后初次观赏到的。

戴高乐与家人在市郊的别墅内渡过了这个难忘的新年之夜。

一家人围坐在壁炉前倾听着室外暴风雪的呼啸和一股股雪粒扑打窗户的唰唰声，倍感屋内是这样的安详而温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戴高乐不停地在外奔波，没有象今晚这样尽情地享受家庭的温暖，享受孩子们给他带来的天伦之乐。望着坐在身旁的妻子和膝下的孩子，戴高乐的思绪已经飞得很远很远……

他想起了与妻子伊冯娜的初次会面。那是1921年10月的事情。当时波兰前线战事刚刚结束，戴高乐上尉从波兰回巴黎度假。他绝没有料到，这次度假对他个人生活来说竟具有决定的意义。虽说他本人还一无所知，做媒的人却已为他穿针引线了。当时，丹坎夫人是巴黎风月场上的老手，也是上流社会中穿针引线的“红娘”。

一天，丹坎夫人恰好碰见戴高乐上尉在她娘家吃午饭。她忽然灵机一动，心想这个在少年时自己常开他玩笑的青年军官，如今一表人才，讨人喜欢，何不把他介绍给当地有名的饼干制造商旺德鲁家的女儿呢？但她感到为难的是，旺德鲁家的女儿伊冯娜曾经拒绝了一位将军儿子的求婚，因为这位青年是个军官，而她不愿嫁给军人。她说她宁愿在家乡养儿育女，而不愿常常随军仓促搬迁。但是，从心底来说，丹坎夫人觉得他们实在是天造的一双，地配的一对。于是，她抱着试一试的侥幸心理，精心安排了一次“巧遇”，地点定在巴黎“清秋沙龙”。

两个星期之后，就像是巧合一样，两家人在“清秋沙龙”碰上了。丹坎夫人给他们作了介绍。过了不一会儿，夏尔和伊冯娜这对青年男女便离开家人，单独交谈。他们边聊边漫步来到一幅画像跟前，那幅像画的是童年时代的诗人和剧作家莫里斯·罗斯丹。罗斯丹是戴高乐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于是，他抓住机会炫耀了一番，显示他熟谙罗斯丹的诗作，有惊人的记忆力。戴高乐大段大段地背诵这位诗人的诗句，伊冯娜听得着了迷。伊冯娜回家后，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向母亲倾吐了她对这位青年军官的好感。他说，“夏尔是一位惹人喜爱的好青年，他知识渊博，文明礼貌；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个子太矮了。”

几天之后，女方旺德鲁一家邀请戴高乐一家赴茶会。戴高乐上尉把他的军帽、手套和手杖都放在两膝上面。当他想往这一堆东西上再搁一杯茶的时候

候，竟笨手笨脚地把茶水洒到伊冯娜姑娘的衣服上。早已坠入情网的伊冯娜看到戴高乐上尉的举动，偷偷地笑了，顺势给那个窘迫的大兵解了围。一周后，这一对情侣在凡尔赛宫举行的盛大晚会上再度相逢。戴高乐上尉早已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走到伊冯娜跟前，俩人翩翩步入舞池。第六场华尔兹舞完毕，戴高乐鼓起勇气向伊冯娜求婚，她同意了。

过了几个月，戴高乐再次从波兰回国度假。在加来圣母院教堂里的夏尔马涅和圣·路易的圣像之间，夏尔·戴高乐和伊冯娜·旺德鲁举行了婚礼，时间是1921年4月7日。

转瞬之间，20年过去了。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年代，伊冯娜与丈夫戴高乐始终相亲相爱，一往情深。伊冯娜与丈夫走南闯北，荣辱与共。在戴高乐最孤独，最困苦的时候，是她给了丈夫最真挚的情爱，最真挚的支持。人们都说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又是一位称职的军官夫人。然而，戴高乐却感到负疚，因为他感到自己给予妻子的爱真是太少太少了。想到这里，戴高乐不由得用他那坚实的臂膀把妻子紧紧地揽在怀里。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女儿安娜正在对着他痴痴发笑，他难过地把脸转向一旁。

说到女儿安娜，戴高乐感到欠她的情真是太多了。他的思绪不由得又飞回到了1928年那个风雪交加的冬天……

1928年至1929年之交，凛冽的寒风横扫着德国占领区，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二十五度。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大面积的流感。仅是驻莱茵区的法军就有143人丧生。

说来也真是倒霉。刚刚提拔为少校的戴高乐正担任驻守在特雷夫的轻步兵第十九营营长。他所指挥的第十九营死于流感的人最多。虽然，戴高乐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然不能抵御病毒的侵袭。他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可爱的青年士兵死去，心急如焚。

为此，戴高乐把自己的心思全扑在了战士们身上。

一天，营里一名无亲无故的轻步兵死去了。戴高乐听到这个消息后沉痛地说：“我就是他的亲人，我要为他送葬。”当天，营里为这位士兵举行了简朴的告别仪式。遗体入殓前，戴高乐佩戴黑纱在这位士兵的遗体前默哀。随后，他又跟随灵柩前往墓地。下葬时，他亲自为这位士兵执锹填土。最后，他肃立墓前，难过他说：“孩子，安息吧！”

就流感而丧生的情况，法国驻军调查委员会派人到戴高乐所指挥的第十九营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尽管戴高乐于执行纪律非常严厉，但对士兵的关心却十分突出，调查委员会成员皮科上校在报告中说：“轻步兵第19营确有不少人死亡，但这不是因为对十分照顾不周所致。该营的管理极为出色。”

为此，戴高乐获得了“荣誉轻步兵”的桂冠，战士们亲昵地称他为“圣母雕像”。就这样，他把一颗滚烫的爱兵之心留给了战士们，却把一个终生难以弥补的不幸留给了他的女儿。

就在这年的冬天，戴高乐的妻子伊冯娜怀着身孕随丈夫迁居到这里。当时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戴高乐夫妇怀着难以言表的喜悦盼望着孩子的诞生。但由于严重的流感在兵营中流行，戴高乐一心扑在了战士们身上，难以顾暇就要临产的妻子。而不幸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

有一天，离预产期还有几周，戴高乐夫人独自上街不幸在冰雪路上被汽车撞倒，虽未受伤，却深受惊吓，使怀着的婴儿受到无形的伤害，之后，伊

冯娜生了个不健全的女孩，是个白痴，取名安娜。这给戴高乐全家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日后，他们尽一切努力设法恢复孩子的理智，但毫无效果。

眼瞅着女儿安娜已经长到 12 岁了，但她的呆傻也越发突出，许多人曾建议戴高乐夫妇把这个残废姑娘送到收养所去，但他们拒绝了。戴高乐解释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戴高乐千方百计地保护安娜，不让好奇的人和新闻记者来看她。他们一家迁到伦敦后，他不允许摄影记者到他的乡间寓所拍照他的孩子，以避免安娜出现在照片上，从而引起人们的议论和其他孩子的取笑。

在这个除夕的夜晚，戴高乐为了补偿给女儿的父爱，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使女儿快活起来，他一面跳舞，一面拍着大腿，唱着流行歌曲，失去了平时的严峻刻板，只要安娜高兴，他舍得一切。

不知不觉中，新年的钟声敲响了。1941 年的新年悄悄地来临了。它能带给自由法国什么新的希望呢？是否能迎来军事和政治斗争中最晴朗的一天呢？戴高乐拭目以待。

新年一过，戴高乐便迫不及待地把他的战略目标投向了复杂的东方。

在戴高乐看来，苏伊士运河是中东门户，又是地中海门户，因此是控制非洲的关键。所以，戴高乐的头两个目标是争取法属索马里的卫戍部队和亚历山大港的海军部队，在这里维希政府分别驻有一万人和四万五千人的卫戍部队，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就可成为戴高乐极强的兵力来源，抱着这个目标，戴高乐开始了他的中东之行。

戴高乐首先在喀土穆着陆，那里是苏丹和厄立特里亚的作战基地。不久，蒙克拉尔上校指挥的自由法国新建旅和一个印度师协同作战，在克仑击溃了意大利军队。但这支自由法国部队随后不久就改编为自由法国第一师，派往埃及了。

中东的地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苏伊士运河。这个地方一失，小亚细亚和埃及就对轴心国家打开了大门。相反地，如果能保持住这儿，总会有一天能从东方进至突尼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这就意味着一切都要求他们必须坚持作战，而运河则是战略要冲。戴高乐知道，从的黎彼里到巴格达，中间包括开罗、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等地，再从亚历山大港到内罗毕，中间包括吉达、喀土穆和吉布提等地，其中的政治、种族和宗教上的情绪与野心，由于战争的刺激而尖锐化了。法国在这方面的地位已经削弱，而且“为各方面所垂涎”。戴高乐认为，当一切都在沸腾的时候，如果法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被动，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保注其中的任何一块土地。因此，戴高乐感到自己在这儿的任务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那就是行动起来，以代替那些不采取行动的人。

在这一段时期，戴高乐在非洲的部队，捷报频传，连续取得成果。在他的指挥官中战绩最力辉煌的那位勒克莱尔上校正成为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勒克莱尔骁勇善战，而且是一位天生的将才，但由于装备极差而无法充分施展他的才能。1941 年 1 月，勒克莱尔派出一支部队佯攻木祖克，他的真正目标却是远离拉密堡的库弗腊绿洲，两地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公路。勒克莱尔很明智地征集好了大约 100 辆卡车，运了几百名士兵，带了仅有的一门 75 毫米加农炮，几门口径较小的 37 毫米炮以及几挺不好使的机枪。3 月 1 日，勒克莱尔迫使库弗腊的意大利守军投降。意大利人只是在投降以后才发现，打败他们的那支部队人数少得可怜。

在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作战基地，由普拉特将军指挥的部队，不久前占领了意大利在基朗高地的防线。蒙克拉尔上校的那一旅和阿斯蒂埃·德·维拉待队长的空军在这一战役中建立了奇迹。至于吉布提的维希军队，勒让蒂约姆将军虽然和他们接了头，但他们还没有下决心反正过来。领地长官诺勒塔则用尽一切办法来镇压倾向于归附的人，甚至连死刑也用上了。这反而更坚定了戴高乐解放这一地区的决心。3月29日，戴高乐乘机前往厄立特里亚视察，那里的部队正进行着紧张的战斗。他到达的第二天，普拉特的部队就一举攻克多角堡。4月7日，由蒙克拉尔上校指挥的旅，首先攻入城区，并在碉堡里抓住了敌军上将，使蒙克拉尔上校得到了接受敌军红海舰队司令投降的光荣。法国分遣队在战斗中总共俘虏了4000人，到马萨瓦又接受了1000多人的投降。

4月1日，戴高乐将军回到开罗，这是战争的心脏跳动的地方。4月4日，戴高乐高兴地读到丘吉尔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就自由法国在非洲最近取得的胜利中所作出的贡献表示祝贺。一周之后，戴高乐写信给英国中东地区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正式提出把勒让蒂约姆将军指挥的自由法国第一师调往昔兰尼加——埃及战场，协助他作战。但戴高乐明确指出，他认为必须保持该师建制的完整性，并仍由其师长指挥。他还提醒韦维尔说，他认为劝说吉布提的守军倒戈十分重要，因此要求韦维尔务必对吉布提严加封锁，并提供一切方便，协助自由法国与吉布提进行接触、空投传单、搞好其他形式的宣传等项工作。

不久，戴高乐从开罗回到布拉柴维尔，在这里，他给丘吉尔发去了一封电报，讲了他对形势的看法，并重新提到吉布提的极端重要性。就在这时，戴高乐听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气愤的消息。

5月6日，希特勒在巴黎的代表与维希法国代表经过三天的会谈，达成了如下的协议，维希政府将为人侵中东地区的德军提供武器并给予登陆权。作为交换条件，德国人答应放宽对占领线两侧贸易的限制，为维希法国重新装备6艘驱逐舰和7艘鱼雷艇，把付给德军的占领费从每天四亿法郎减少到三亿法郎，并释放83000名战俘。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9日，戴高乐接到英方代表斯皮尔斯将军从开罗发来的致电，电文说目前似乎不大需要自由法国的军队继续在这一地区作战。又称，尽管韦维尔将军个人始终乐于同戴高乐见面，但他认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不久的将来，戴高乐都没有来开罗的必要。

英国政府的决定无疑是火上浇油，戴高乐憋着一肚子气，第二天回电说，鉴于英国政府所作的单方面决定，他根本无意去开罗。遗憾的是勒让蒂约姆的部队迟迟不能集结，因为德国人一旦从叙利亚登陆，自由法国将因此而无法在那里采取任何行动。戴高乐认为，不管怎么说，中东目前事态的发展，将使在非洲的特别是在乍得的自由法国部队在战略上越来越重要。因此，他决定集中手头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保卫这些领地。

5月13日，戴高乐电召卡特鲁将军返回布拉柴维尔，并要求卡特鲁把这一决定通知开罗的英国人。同时，他任命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为他在近东的政治代表，勒让蒂约姆将军为总司令。一周以后的5月18日，他在获悉维希外长达尔朗的贝希特斯加登之行后，发表广播演说，对“敌寇与通敌派之间的无耻交易”表示愤怒与声讨。

其实英国人日子也很不好过。从多德卡尼斯基地出动的德国空军不断袭

击苏伊士运河，而且完全有能力把部队空降到叙利亚。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埃及、苏伊士运河区以及阿巴丹的炼油厂将直接受到威胁。在伦敦的丘吉尔对这一切洞若观火。这时，戴高乐要求让自由法国部队在叙利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丘吉尔对这一要求十分同情，但他始终认为派自由法国部队单独作战是不明智的。

丘吉尔权衡了上述种种因素后，于5月9日致电韦维尔将军，说鉴于达尔朗同德国人做成了交易，鉴于英国人缺乏可供调遣的部队，我们别无办法，只有为卡特鲁将军提供必要的运输工具，“让他和他的自由法国部队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尽力而为，皇家空军则对付德国的空降。”

戴高乐快要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但他以惯有的洞察力看到，如果不考虑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想就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前途达成持久而有效的协议是不可能的。为此，戴高乐给自由法国在伦敦的代表团发了一封电报，正式表示愿意承认上述两国的独立和主权，责成代表团将这一决定通知英国政府，并作为交换条件，要求英国政府公开声明它尊重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权利。紧接着，他在两天以后为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一事给卡特鲁将军发出了详尽的指示。“只要有办法，自由法国的统治权就必须伸展到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去！”戴高乐坚持自己的主张，毫不动摇。

自由法国部队士气高昂。戴高乐乘势给厄立特里亚和利比亚的有功部队颁发了第一批“解放十字勋章”，进一步激发部队的斗志。6月6日，丘吉尔致电戴高乐，对他保证给予叙利亚和黎巴嫩以独立的决定表示“欢迎”。

1941年6月8日，自由法国和英国一起打着盟国的旗帜越过边界，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进发。韦维尔和卡特鲁联合下令，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能开火，当时主要依靠的是心理战。设在巴勒斯坦的电台数周以来一直用法语广播，呼吁叙利亚境内的法国同胞不要把他們当作敌人，而要当作朋友来迎接。他们也没有忽视对阿拉伯人的宣传工作。卡特鲁将军根据戴高乐的指示草拟了一个告当地人民书。

尽管事前采取了这些措施，他们还是遭到了维希守军的猛烈抵抗。戴高乐在开罗听到这一同室操戈的不幸消息时，无不为此感到焦虑。戴高乐实在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因为有很多迹象表明维希、甚至轴心国家，将对自由法属非洲发动一次进攻。于是，戴高乐一方面坚持保留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委任统治权，以戳穿英闷人企图在整个中东建立英国的“领导权”的把戏，一方面继续指挥远征军向大马士革推进。

黄沙遮天，烈日炎炎，戴高乐将军风尘仆仆地往来于大马上革和联合部队阵地之间，要不然就是到斯皮尔斯夫人和弗罗硕医生管理下的英法联合野战医院去看望伤员。他也逐渐地听到他的士兵、最优秀的军人如何在战场上牺牲，勒让蒂约姆将军如何受了重伤；热南上校、德特洛亚海军少校如何牺牲了；德·博亚索底、德·维洛特雷队长如何挂了彩，伤势很重；6月9日到10日在利塔尼，12日在开斯瓦，15日和16日在库奈特拉与艾兹拉，如何发生激战，自由法国和英国盟友的士兵伤亡枕藉。但是，戴高乐愈感到悲恸，就愈加坚决不屈。

6月18日，戴高乐的追随者云集在开罗聚会，纪念戴高乐发出抗德号召一周年。戴高乐对在埃及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发表了激昂的演说，他严正谴责维希军队在叙利亚的抵抗带有希特勒的凶残的印记，接着，他高声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不着说，最好的做法是加强自由法国人从他的手

里夺回祖国并尽全力和那些誓必粉碎他的计划的人并肩作战的决心。就在这个时刻，我们的步兵、水兵和空军正在大马士革、乍得、利比亚、阿比西尼亚的大门以及各个海洋、各处天空以辉煌的战果证明这样一种决心。”

在戴高乐的号召下，自由法国军队奋勇进军。6月21日，在开斯瓦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以后，自由法国军队开进了大马士革。戴高乐本人也于23日到达叙利亚的首都。就在这天晚上，德国人轰炸了该城，以显示他们与维希当局的团结。

在戴高乐听来，这隆隆的炮声恰似欢迎自由法国部队进驻大马士革的礼炮。

戴高乐在坚持抗德和维护独立主权的道路上，可谓是历尽坎坷痴心不改。他作为资产阶级抗德派的代表人物，对内同维希政府势不两立；对外必须对付英、美贬低法国地位、侵犯法国海外殖民利益的种种行为。他在寄人篱下的情况下，必须顽强地为维护法国的利益和地位而斗争，同时还得处处设法保住自己的地位。形势的发展为戴高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也使他面临重重暗礁。

自由法国部队进驻叙利亚取得成功之后，戴高乐清醒地看到中东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在近东不仅维希法国和德国是他的对手，英国人也有自己的打算，这些打算与戴高乐心目中的法国利益自然是水火不相容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大国，而法国只是一个吃了败仗的国家。戴高乐一向对英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因此当丘吉尔建议由英国出面保证自由法国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许诺时，戴高乐未予理睬。在戴高乐看来，法国的许诺无需外国保证。戴高乐担心英国人正在制造一种印象，似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应该归功于英国而不是法国，似乎英国人已经取得了充当自由法国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国家之间仲裁人的资格。因此，戴高乐在6月24日正式委派卡特鲁将军为他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全权首席代表，指示他谈判缔结有关地中海东部地区国家获得独立和主权并与法国结盟的条约，而且指示他在近东军事行动中与合作国合作时，要确保该地区的防务以击退敌人的进攻。同时，卡特鲁将“行使地中海东部地区法国高级专员的一切权力并承担其全部责任。”戴高乐接着说，“这样，法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委任统治将能够按期结束而法国的工作却仍能继续。”

1941年7月10日，维希法国在叙利亚的驻军司令邓茨将军准备投降。他下令把军舰和飞机开到土耳其，到那里以后就被扣留了。接着他要求停火。于是，英国与维希法国商定三天以后在阿克商谈投降条件。7月14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获悉，维希法国与英方签订的协定，实际上是把叙利亚和黎巴嫩无条件地让给英国人，法国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国家的权利只字不提。戴高乐顿时火冒三丈，眼看着军事危机变成了一场政治危机，而且是戴高乐与其盟友之间多灾多难的关系中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戴高乐如坐针毡。“不行，一定要阻止这个协定的实施！”戴高乐心中拿定主意，便动身前往开罗。

7月21日，在开罗戴高乐与英国中东事务大臣利特尔顿开始了极为严肃的会谈。

看得出来，利特尔顿是一个和蔼深思的人，胸襟开朗，他也是刚刚由英政府派到开罗总管中东事务的，显然他不愿在他接事初期就发生令人难堪的争吵。所以，在谈话刚开始时，他表现得比较局促。

看到利特尔顿有些拘谨的样子，戴高乐也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设法不让自己发火，很冷静他说道：“我们共同进行的战斗，使我们在战略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果。维希在东地中海地区屈从德国人这一危险给予中东战场的沉重负担，现在已经解除了。但我必须说明，你们和邓茨签订的协定无法接受。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权不能从法国转移给英国，它属于自由法国，也只有她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自由法国必须为此向全法国作交代。同时我也必须把跟我们作战的法国军队尽量争取过来。他们迅速地被成批遣返，而且被集中起来，与外界隔绝，使我们无法对他们做工作。总之，自由法国不能同意自己和法国增援部队的泉源无法接近的情况。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我们共同作战的结果，却让你们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建立起权力。”

“我们没有这种意图，”利特尔顿用抚慰的语气解释说，“英国除开赢得战争以外，并不打算在叙利亚或黎巴嫩追逐什么目标。不过那边的内部局势必须安定下来。因此，我们认为东地中海国家必须独立，这一点英国人已向它们提出保证。同时，在战争期间，军事指挥部对于公共秩序有绝对权力。所以当地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应属军事指挥部。至于威尔逊和德·维尔迪奥克所达成的关于法国军队撤退与登船的技术条款，也同我们希望事情进行得有秩序的愿望相符。最后，我们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不信任我们。我们的事业终究是共同的。”

“不错，”戴高乐接着说，“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但我们的地位不同，我们的行动也就不能一致了。在东地中海地区，托管国是法国而不是英国。你们提到这些国家的独立问题，但唯有我们才有资格，给予它们独立，而且我们也正在给予它们独立。对于这方面的理由和条款，只有我们可以裁决和负责。你们当然可以从旁赞助，但不能从中干涉。至于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公共秩序问题，那是我们的事，而不是你们的事。”

“那还不是一样，”利特尔顿反驳说，“根据英国和自由法国 1940 年 8 月 7 日的协议，你们应该承认英国最高统帅部的权力。”

戴高乐当即指出：“实际上我承认的是最高统帅部对自由法国军队的指挥权，但只是在击溃共同敌人的军事方面。我从没有意思让这项特权扩大到法国辖区的主权、政策或行政事务中来。有一天当我们在法国本上登陆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会提出最高统帅部的权力来要求统治法国呢？”

说到这儿，戴高乐轻蔑地一笑，接着他又摆出一副冰冷的面孔，用强硬的语气说：“此外，我还要向你重复一次，我迫切要求和维希的部队接洽一下。这一点实际上对你们也有好处。把这一批很会打仗而将来我们在非洲或其他地方还可能遇上的军队，象这样不加考虑地把他们遣返，实在太荒谬了。最后，战争物资和特种部队的指挥权也应当属于自由法国。”

利特尔顿听罢，耸了耸肩膀，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这一切都说得很好，但停战协定已经签署，必须遵守。”

戴高乐依然压住怒火说：“那个协定并不能约束自由法国，我没有批准。”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呢？”利特尔顿接着问道。

“是这样：关于英国最高统帅部似乎打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行使的权力，为了避免含糊起见，我特此奉告，自由法国军队从 7 月 24 日起，即三天以后，就不再从属这个统帅部了。同时，我已经命令卡特鲁，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任何反对，立即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全境的政权接收过来。我也下令给自由法国的军队，尽量和其他法国部队接触，并控制他们的战争物资。最后，

我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的整编工作已经开始了，今后还要积极进行。”

说完，戴高乐起身，把预先准备好的一个照会递给利特尔顿，上面写明了这些条件。临别时，戴高乐义正辞严地说，“利特尔顿先生，你知道我本人和我的追随者对我们的同盟事业做了一些什么。因此你就可以估量出，如果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同盟被破坏，那是多么令人感到遗憾！但是，我们本身以及我们国内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人，都不能承认这一同盟将用来危害法国。如果不幸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宁愿断绝我们和英国的关系。诚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尽可能跟共同敌人作战。我打算在三天内到贝鲁特去，在这三天之中，我随时准备进行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谈判。”说完，戴高乐主动伸手，与利特尔顿握手告别。

告别时，戴高乐发现利特尔顿表面上故作镇静，实际上已经惶惶不安了。

每当法英关系有破裂的危险时，戴高乐总是致电丘吉尔，这次也不例外。他在电报中说，阿克停战协定不符合法国的军事、政治利益。丘吉尔没有直接予以答复，但跟往常一样，戴高乐这种寸步不让的态度产生了效果。

当天晚上，利特尔顿再次与戴高乐会晤。他完全否认英国企图立地中海东部地区取代法国，并宣布他愿意用书面形式向戴高乐保证英国决然下在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谋求任何私利。但这仍然不能使戴高乐心满意足。他指出停战协定仍在执行。利特尔顿再一次领略了戴高乐那不可一世的傲岸神气和他那矢志不移的决心，他甘拜下风。

7月24日，英国政府与自由法国双方终于达成了一项对停战协定的“解释性”协议。这项补充协议意味着对维希部队的归宿问题将全盘予以重新考虑。

当天晚上，戴高乐启程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7月27日，当这位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庄严地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很快地便被一种很明显的热情感动了。法国和黎巴嫩的军队在街道两边站满了，群众则挤在空地上，不断地鼓掌欢迎。通过热情洋溢的人群包围着的炮台，戴高乐来到小行宫，在这里同黎巴嫩政府的首脑艾尔弗雷德·纳卡希作了彬彬有礼而充满乐观气氛的交谈。然后他来到大行宫，法国的领导人物都聚集在那里，其中大部分人对于维希所建立的制度都曾支持过或信任过。但当戴高乐和他们接触以后，很快地戴高乐又一次看出一种既成事实，如果有正义作基础的话，将怎样影响人们的态度，甚至影响他们的信念，无论是公务人员，还是社会要人、教会人士都向戴高乐保证他们的忠诚，并保证在新政权下竭诚地为国家服务。几乎所有留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法国人，都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热忱地和自由法国联合，为解放祖国而斗争，并履行法国在当地的权利与义务。

更使戴高于欣喜的是，自由法国进入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使几千名维希官兵倒向自由法国，从而使戴高乐再建两个旅和一支装甲部队。

从1940年6月创业到1941年7月，整整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戴高乐扛着抗战大旗，足迹踏遍了茫茫的非洲荒原，又踏进了错综复杂的中东地区。凭着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他穿过了一道道急流，闯过了一座座暗礁，他的队伍在不断地扩大，他的自由法国的地位在逐步提高。仅仅一年的时间，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而这其中的甘苦，只有戴高乐自己最明白。

夏末秋初，戴高乐在迷人的海滨城市贝鲁特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从地中海吹来的阵阵海风，温暖而柔和，给身体极度疲惫的戴高乐带来了无限的惬意。但是，很快地这段安宁的生活又被德国法西斯的战火打破了。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大举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的爆发，使戴高乐感到震惊，但他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因为在反法西斯的阵营里，他们又多了一个新的伙伴。

在这新形势之下，戴高乐抓住有利时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魄和胆略、继续他的艰难的抗战事业。

第四章 英雄碑碣

战火中诞生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让·穆兰之死

戴高乐不再孤独

镶嵌在法国晦暗了的光荣之上的希望宝石

戴高乐：“母亲，看看您的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们！”

1941年9月1日，戴高乐回到英国首都伦敦。

在卡尔顿花园，“自由法国”总部办公室里，戴高乐坐在红木办公桌后，神色冷淡而严肃，他的脑海中正在思考着一个重大决经过一年多血与火的考验，自由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不仅建立了一支精悍的海陆空武装部队，而且对外关系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自由法国运动仍然还算不上是“政府”。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做出决定。

经过思考之后，戴高乐微微闪光的眼球里，流露出兴奋的色彩。

9月24日，戴高乐发布命令。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

这个委员会包括：普利文，负责财政、经济和殖民地；卡山，负责司法和教育；德让，负责外交；勒让蒂约姆，负责作战部；瓦兰，负责空军；刚从法国来的迫特姆，负责在法国本土的行动、劳工和情报。卡特鲁与达让吕也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不管部委员。戴高乐本人为该委员会主席。

这个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就不时地遭到维希政权和德意法西斯的恶意攻击。它有时被说成是一堆贪婪的政客，有时被说成是一群法西斯冒险家，有时又被说成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共产党狂人。”但是，所有这些诽谤，都被戴高乐他们奋不顾身的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和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所经受的血与火的考验而不攻自破了。

人民清楚地看到，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是戴高乐将军发出了战斗的号召，举起了抗战的大旗；是戴高乐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在和法西斯匪徒们浴血奋战。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维希政府的投降政策，才使150万法国战俘在法西斯的铁蹄下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苦难：正是由于贝当等人的不抵抗政策，才使德国人吞并了阿尔萨斯、洛林及法国北部地区的广大领土；正是由于赖伐尔等人的卖国求荣的政策，才使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法国横征暴敛，使法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正是由于维希头目奉行投降卖国哲学，才使德国法西斯驱使愈来愈多的法国人为他们服苦役。特别当人们看到希特勒的飞机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着陆，日本侵占了河内和印度支那的时候，看到维希军队残酷镇压抗战人民的时候，维希头目所说的“为了保卫法兰西帝国不惜与任何人作战”的说法就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这时，贝当元帅也处于万分苦恼之中。1941年8月，他在广播中悲伤地说：“我感到吹起了一阵歪风。人们感到心神不安，疑虑占据了他们的心灵。政府的威信成了问题。命令不能贯彻。一种真正的焦虑冲击看法国人民。”

在戴高乐的召唤和抗战组织的影响下，法国本上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在秘密地发展起来。但限于当时德国占领的残酷斗争条件，抵抗运动处于极为分散的状态，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参加抗战运动。有的在积极编写、印刷和散发传单；有的在秘密监视敌人，为抗战组织提供情报；

有的在冒着生命的危险，掩护或护送地下工作人员；有的在运输及分散空投或偷运过来的军用物资；有的在袭扰敌人，或破坏敌人要害部门的通讯联系。总之，在法国本土上生活萎靡消沉的外表下边，秘密的抗敌活动正热烈蓬勃地展开。

1941年8月发生了一系列枪杀德国官兵的事件。第一批被杀的有：一个刚从地下车站上来的少校军官、南特城卫戍司令，驻防波尔多的一个德国军官和巴黎塞宾莱大街上的两名德国兵。其他地区的暗杀也跟着开始了。

为了报复，法西斯强盗枪毙了几百名人质，将好几千名爱国者关进监狱，随后又把他们送往德国服苦役。敌人还以极重的罚金和劳役来惩罚、蹂躏有德国人遭到暗杀的城镇居民。

当戴高乐听到这些用冒着巨大危险的代价取得的单独抗敌的战绩的时候，心情是骄傲而又沉重的。同时对那些在德国复仇怒火下的法国人的牺牲，戴高乐的内心深感悲痛。但这并不是绝望。戴高乐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当注意保存力量，尽量避免得不偿失的牺牲，以备将来有效地配合全国的大反攻或大起义。为此，戴高乐在1941年10月23日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说：

“德国人被法国人杀掉是完全自然和完全正确的。如果德国人不愿死在我们手里，他们就应该呆在自己家里……既然他们没有能够征服全世界，他们就一定不是俘虏就是死尸。……但是战争必须有策略。战争只能由负责作战的人来领导。……目前我命令在沦陷区的人不要公开地杀害德国人。唯一的理由就是：敌人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大批屠杀我们目前被解除武装的战士，作为报复。另一方面，只要一到我们能够进攻的时候，我就会发出你们期待已久的命令。”

戴高乐原来并未设想在国内组织抗德斗争。1940年6月18日当地站在麦克风前发出号召时，他也只是要求沦陷中的法国人不要一无所知，向他们解释失败的原因，剖析停战的危害。这最初的号召仍是一个军事领袖的号召，它最直接的目的是壮大新生的“自由法国力量”。但当他获悉法国本土内的抵抗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后，他便竭力设法加以控制和利用。

戴高乐一方面要限制得不偿失的牺牲，同时也必须利用这种由德国人的镇压而激起的法国人民的愤怒情绪，以鼓起民族的斗志和团结。10月25日，德国法西斯匪徒在南特和波尔多各杀害50名人质的第二天，戴高乐在广播中说：“敌人以为枪毙我爱国志士便可以吓倒法国。我们将让他们知道，法国是吓不倒的。我现在吁请全法国的男子和妇女，在10月31日星期五这天，从4时到4时5分，在他们当时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动，静默5分钟。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同时也是法国精诚团结的证明。”事实证明，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工厂里，这次示威是非常动人的。这一行动表明，战斗的法兰西人民是听从召唤的，是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的。

戴高乐的号召点燃了“怒火”，他开始发动一场法国人在法国本土上的战斗。他也深知，赤手空拳去公开点燃法国的怒火将要冒多大的风险，但他在这一风险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因为他看到了抗战精神依然存在：“民族没有屈服于灾难”。

在戴高乐的号召下，在法国大陆，各种各样的战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勃发而出。

在所谓自由地区，弗莱乃上尉领导的“战斗队”，艾曼纽耳·达斯迫埃·德

拉维热里领导的“解放队”和由让-皮尔·勒维主持的“义勇军”都展开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宣传活动，他们组织群众，号召以下同的方式同敌人展开斗争，并招募别动队。

在沦陷区，爱国者的抵抗运动则更为艰难，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敌人严密的监视。任何嫌疑犯都被关进监狱，然后押出国境。因此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是极为分散的，行动是秘密的。像杜尼上校创立的“军政组织”，黎包舍领导的“自由人”，莱贡特——布纳组织的“抵抗者”，加瓦耶建立的“自由北方”以及在艾诺、在法兰德斯和矿区由乌克指挥的“北之音”，都表示要为祖国的解放、民族的复兴而奉献力量。

这些组织政治观点不同，但他们的共同愿望是一致的，这就是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他们之间存在的派系之争，实际上是同法国被占领的状况分不开的。起初，抗战运动是由一些爱国人士以小组的形式组成的。不久，这种小组大量出现，但是很分散。为了避免盖世太保以及与之配合的纳粹机构和维希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他们往往互不联系。甚至在同一小组同一地段活动的人也互不了解。特别是起初，当这些秘密小组纷纷出现时，名目繁杂。后来，许多小组消失了，或同其他小组合并了。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是“解放”、“战斗”、“狙击兵”和“民族阵线”。

“战斗”是由两个组织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合并后组成的。一个是由亨利·弗雷内领导的，另一个是由乔治·皮杜尔等基督教民主党人领导。

“狙击兵”同“战斗”一样，成立于里昂，这个城市实际上成了法国南部抗战运动的首都。它的最初领袖是莱维和克洛迪斯——珀蒂。

“解放”则是由仪表非凡、喜欢冒险的人物艾曼纽耳·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创建的。他是一个新闻记者，也当过海军军官。

“民族阵线”是由共产党发起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按行业建立了若干互有联系的“民族阵线”，有律师民族阵线，店主民族阵线，农民民族阵线，妇女民族阵线等。每个阵线都有自己的报纸，它的成员的政治色彩多种多样，有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有社会党人，有激进党人，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民族阵线”是在法国南北两个地区都能以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进行活动的唯一组织。

在这形形色色的抗战组织中，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组织是最有组织的一支中坚力量，大大推动了抵抗运动的发展，早在1940年底，共产党人已组成一个能够适应地下斗争和抵抗法西斯恐怖的雏型的武装组织。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略，更激起了共产党人的抵抗。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就互相这样说了：“我们并不孤立，有了苏联人民这样一个同盟者，我们可以芒得解放，获得胜利的！”从此，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更加活跃，更有步骤了。破坏、暗杀，武装活动大大增多了。在斯大林1941年7月3日的演说发表之后，“红军万岁！苏维埃俄国万岁！”的标语贴满了圣德田城。7月14日，巴黎城中，各大马路以及拉丁区，出现了很多的游行队伍。

法国义勇军和游击队是由法国共产党和许多干部如洛当基上校、普列南、洛朗·加桑诺哇等人征集起来、组织起来的一支活跃的抗战组织。他们的武装斗争特别发生了放力，为反侵略民族大起义做了最好的准备。请听几位共产党人的临终遗言：

加伯列·贝里于1941年12月15日被德国人在瓦雷廉小岗上枪杀。在他死前几点钟，他写了这样几句话：

“我最后一次检查了我的良心，这次检查是很切实的。倘使要我重新再生活一次，我还是要走同样的路。今夜我时刻想起我的亲爱的朋友保罗·瓦扬——古久里的那句名言：共产主义是世界的青春，它为值得歌颂的明天作准备。我回头就要为值得歌颂的明天作准备了。”

几个月之后，希特勒匪徒枪手了瑟马，他是铁路员工的领导者，他死前写下的几句话说明了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他的勇气和卓见达到了多么高的程度：

“斗争中的同志们，我快死了，我心中最后还是想着你们，想着我们伟大的党的所有的党员，想着所有的法国的爱国者，想着红军的英勇战士们和他们的领导者伟大的斯大林。我怀着法国必获解放的信心死去……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我牺牲的日期近了。但我知道将要枪毙我的纳粹分子已经战败了，法国会把这个伟大的斗争继续下去。苏联和它的同盟行万岁！法兰西万岁！”

皮尔·李高勒的遗言更表达了许许多多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决心，他在遗书上写道：

“我最大的雄心就是成为使法国土地肥沃的一滴鲜血！”

在这些英勇无畏的共产党人领导下，法国义勇军和游击队在敌占区内到处安设埋伏，到处袭击，投炸弹，使敌人疲于奔命。

面对着法国本土抗战组织的纷纷出现，戴高乐极力想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纳入他的“自由法国”的统一领导之下。就在这时，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反法西斯战士闯进了他的生活，他的名字叫让·穆兰。

让·穆兰曾任法国埃尔——罗伯尔省省长。当纳粹德国的铁蹄踏入他所在的沙特城时，他表现了卓绝的坚定和高贵品质。

就是这种坚强不屈的品格激怒了法西斯匪徒。敌人侮辱了他，把他殴打，并将他关进监狱。具有坚强意志的穆兰在敌人面前永不低头。凭着这股下可征服的威慑力量，敌人终于向他妥协，让·穆兰得以释放。从此，他一直住在法国的未被占领区，他在那里同抗战运动取得了联系。

1941年9月9日，让·穆兰偷越国境线，取道西班牙准备投奔“自由法国”。这时在里斯本的英国当局立刻看中了他的才干，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试图争取他回法国为英国服务。但他决心已定：他要到伦敦，为戴高乐效劳。

1941年11月底，让·穆兰终于从里斯本到达伦敦。一到伦敦，他便迫不及待地要求会见戴高乐将军。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12月的一天，让穆兰应邀来到卡尔顿花园。带着紧张的心理，穆兰走进戴高乐的办公室。他一眼看到戴高乐将军坐在办公桌后的沙发椅上。身材显得十分修长，脸上呈现出的是一副冷峻的面孔。

戴高乐轻轻做了一个手势，让·穆兰便坐在了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这时，穆兰好好打量了一下“自由法国”总部的办公室。屋内的东西象是临时凑合在一起的，处处给人不经久、不可靠的印象。不过，一张红木办公桌却过分讲究，旁边摆着几把刺目的、粗糙不堪的木椅。墙角塞着一个书柜，堆满书籍。墙上挂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拿破仑肖像，皇帝头戴三角制帽，双手交叉在胸前，不可一世！

看到这里，让·穆兰心里明白了：这位威震环宇的法国伟大君王，是戴高乐将军崇拜、模仿的偶像。

戴高乐出于礼貌，首先说了几句恭维话，在这之前，戴高乐曾经了解过

让·穆兰的为人，他对穆兰所遭受的德国人的侮辱深表同情，同时对他那种坚强不屈的品质表示由衷的敬意。

接着，戴高乐问了一句：“来到这里，您打算干些什么呢？”

“我一时说不清楚……反正，我将献身于法兰西的自由、独立的伟大事业！”让·穆兰回答得干脆，声调中充满着庄严和自信。

“我非常感谢您对自由法国的忠诚！”戴高乐将军隔着桌子，伸过手来。

戴高乐将军与穆兰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戴高乐很快地发现眼前这位年轻人，具有天生的辩才和决断能力，从交谈中可以感觉出他心中洋溢着深厚的热爱法国的感情。戴高乐已经意识到了这位年轻人的潜在重要性，他下定决心把一件考虑了很久的重要任务交给这位年轻人去完成。

于是，戴高乐在沉默了片刻之后，语气低沉地对穆兰说道：“有一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在听了你关于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情况的介绍后，我更加感到必须尽快地把这些组织联络起来，纳入自由法国的统一领导之下，而完成这一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我看就是你。我决定派你立即回法国去，在法国未被占领区的抗战运动内作为我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唯一代表。您有什么意见吗？”

听罢此言，让·穆兰感到一股暖流从他内心喷出，顿时浑身都是力量，他想不到他崇拜的领袖对他如此信任，他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我准备完成您授权的一切事务。将军阁下，对我来说，您就是我们伟大法兰西的化身！”让·穆兰响当地回答。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戴高乐起身站起，表示谈话业已结束：“我们会给您提供一切方便的，再见！”

让·穆兰带着戴高乐的重托，接受了一个月紧张的突击跳伞训练，于1942年1月1日被空投到法国。他的密码代号先是“雷克斯”，后是“马克斯”。

回到法国，让·穆兰开始了他的秘密活动。他的使命是组织秘密军事小组，设立三投武器接收站，分发经费，用无线电同伦敦保持联系。抗战运动组织很需要经费，而他手中就掌握着经费，就等于他握有一张王牌。他在随后几个月的耐心的组织工作中，以及在同那些不如他那样相信戴高乐是唯一可能的领袖的人们进行谈判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穆兰的推动以及基层人员的支援之下，南方地区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民族委员会的代表担任主席。3月间，他们发表了以戴高乐为抗战领袖的共同宣言。

穆兰历尽艰险，终于实现了南方和北方抵抗运动的统一。1943年5月，由法共发起，成立了以穆兰为主席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戴高于被确认为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从此，实现了法国内外抗德运动的合流，并把国内抵抗运动纳入了“自由法国”运动的轨道。接着，“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进一步统一了国内外抗德运动，壮大了法国抗德力量的声势。

1943年2月，当穆兰再次来伦敦与戴高乐会面时，戴高乐在他的官邸举行的仪式上，亲自将一枚“解放十字勋章”戴在了这位抗战运动领导人的胸前，他觉得这次仪式比其他任何同类仪式都更加动人。

但是，正当穆兰发挥更大作用时，他不幸被人出卖，遭到逮捕，丧失人性的德国法西斯匪徒对他施加惨无人道的酷刑。他为法国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

穆兰牺牲的消息传到伦敦，戴高乐感到一股深重难言的悲痛从心底涌起。对于一个久经艰难的领袖来说，此时悲痛在他的身上，激起的已经不是眼泪，而是长久的沉默。……

穆兰之死的确让戴高乐感到痛心，他的死使戴高乐失去了志同道合的战友。但是，戴高乐并不孤独，因为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众多的有志于法国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

在伦敦，戴高乐经常受到在伦敦的法国人团体的帮助。“法国学院”从一开始就在校长索拉教授的主持下向戴高乐靠拢，这个学院为法国同胞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教育园和一个活跃的学术团体。“法国联盟”在戴曼和莎蒙小姐领导下继续工作。“法国研究大厦”的图书馆截至到它被炸，负责人罗伯特·克吕牺牲以前，一直供给“自由法国”的工作听需要的文件材料。“法国志愿军之友”和在苏格兰的“法国战斗合作委员会”给戴高乐以大量的慷慨而又有价值的帮助。“自由法国中心招待站”负责接待从法国来的侨民。“法国医院”则医治和护理了自由法国战斗部队很大一部分伤员。

“大不列颠法兰西人协会”更是给戴高乐以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它组织了好几次有军民踊跃参加的集会，在会上戴高乐同侨居在英国的法国人见了面。他们向戴高乐表达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并坚定了对争取胜利的信心。

1941年11月15日，在艾伯特大厅，戴高乐向伦敦旅英法侨发表演说：

“旅行者在攀登山道的时候时常停下来，测量一下已经走了多远并确定前进的方向。同样的，我认为今大应旅英法侨的邀请在此集会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借此看看我们团结起卒保卫自己的具体表现，并重新集结力量为我们祖国的事业，在艰苦的战争道路上继续前进。这件事情并不怎样困难，因为尽管我们是处在战乱之中，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们是什么人和我们为了什么而斗争。我们相信，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对于法国来说，是一条光明的大道。”

戴高乐在开场白之后，郑重地宣布了自由法国政策的三大宗“第一项，”戴高乐说，“作战——就是说，在战斗中尽可能发挥最大的力量。……但是，只是在响应法兰西的号召和为它服务时，我们才作这样的努力。”接着，戴高乐谴责了战前的和维希的政权，他说：“我们认为，由国内人民心中发出的轰轰烈烈的清除运动，彻底扫荡了造成灾难的原因以及在投降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整个上层建筑。由于这个缘故，我们的第二项政策是，一旦情况允许，人民可以自由说出什么是他们所要求的和不喜欢的的时候，就恢复人民的发言权。”最后，在第三项下，戴高乐概述了自由法国希望给与法国新体制以怎样的基础。“这些基础”，戴高乐说：“是由自由法国人的三个格言所规定的。我们说‘光荣与祖国’，意思是祖国只能由胜利而得到新生，而只有通过对它自己的伟大的崇拜才可以继续生存。我们说，‘自由、平等、博爱’，因为我们决心忠于民主原则，我们说：‘解放’，因为在打败敌人之前，我们的努力不能停止，它必须给每个法国人带来在光荣和安全中生活和工作的条件”。

这时候，听众情绪达到高潮，整个艾伯特大厅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形成一个强大的示威，以特殊的方式表示了对这位抗战领袖的忠诚和敬意。

随后，戴高乐访问了驻在英国的自由法国战斗队。陆、海、空军部队虽然人数较少而且是分散的、一点一滴地组成的，但现在已凝成一个整体，并

且日趋巩固。戴高乐所到之处，都受到士兵们的热烈欢迎。当被士兵亲眼地称呼为“大查理”的戴高乐来到他们部队时，在阅兵式中士兵们用他们的注视、高昂的姿态来表达他们对自己的领袖始终不渝的忠诚和敬意。

戴高乐不再感到孤独……

对于大不列颠岛，戴高乐有着特殊的感情。这里不仅是自由法国的发源地，是戴高乐和本土及海外抗战组织联系的纽带，而且也是自由法国反法西斯战士的训练中心。

大批抗战骨干在这里接受训练，并由这里出发分赴前线。在坎伯雷营地，由雷纳上校指挥的轻骑兵、炮兵团、装甲队、工兵支队和信号组，每6个月负责培养一批士官和专家。

在炮兵辎重厂，在伯台上校的领导下，该厂除负责军火生产外，还负责分发由美国依“租借法案”所供应的军事物资，用以装备新成立的部队。

由特里小组领导的“法国义勇军校”，继马祖夫人之后，训练了大批能干的年轻姑娘们成为驾驶员、护士和后勤服务人员。

由鲍端司令领导的法国学生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班排连军官。有52人后来在作战中光荣牺牲。

戴高乐怀着崇敬的心情说：“没有再比和这些年轻人会面能给自由法国领袖以更多安慰的了。他们是镶嵌在法国晦暗了的光荣之上的光芒四射的希望之宝石。”

在英国这块基地上，还培训了数以千计的海军人员。他们大部分从英国港口出发，参加在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极地一带进行的海上战斗，到1942年6月，已有700名自由法国的海军将士英勇献身。当时海军感到最困难的是军官的补充问题。紧张的战争环境不允许他们按部就班地遵循专业化的原则进行训练，只能边战斗，边学习，从战争实践中总结提高。由海军中校威泽尔和加拉尔领导的“学校舰队”，积极地在“戴奥多尔·迪西埃总统号”、“行星号”和“美丽的火鸡号”舰上进行训练。在这里共毕业了四批学员。从这座实战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都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在对敌作战中英勇顽强。成了自由法国海军的中坚力量。

在盟国阵营服务的一支法国商船队，在航运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战争开始时法国所有的270万吨——或660艘客船和货船——船位中，有70万吨或170艘客船，在维希政府投降后仍然继续为抗战服务。在人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戴高乐的海军部。还补充配置了67艘商船的人力。总计有580名军官和1300名海员继续为战争坚持航运。到1942年春，已有1/4的海员在海上牺牲。

自由法国的空军，从无到有，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1941年，戴高乐首先在英国成立了“法兰西之岛”空军战斗队。司令员为西威杜。当他的飞机在法兰西上空被击落后，便由杜贝叶继任。在叙利亚战斗的第二天，在埃及成立了“阿尔萨斯”战斗队。它最初在布里格指挥下在利比亚进行战斗，以后调到大不列颠，由摩绍特相任指挥官。就在保卫伦敦的空战中摩绍特光荣牺牲了。洛林轰炸队是在东地中海地区成立的，由毕若担任指挥。他在敌人后方执行轰炸任务时牺牲了。盖尼良·摩里尼接替了他的职务。“布列塔尼”混合队在乍得成立，由圣贝鲁领导，支援盟军在撒哈拉作战。这些年轻的飞行员，英勇奋战，前赴后继，不怕流血牺牲。

在北非战场上，戴高乐的第一轻装师在和隆美尔率领的德军交战中创造

了光辉的战绩。这支部队在 1942 年 6 月初在比耳哈亥依木地区被敌人重重包围后，接着又遭到德军重炮和飞机的轮番轰炸。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法军的军火储备日益减少，食物缺乏，水源几乎断绝。在炽热的阳光下，在浩瀚的沙漠上，法军一直奋勇拼杀。

6 月 3 日，隆美尔写信要求法军投降，以免痛遭歼灭。6 月 5 日，德国军官又重申其最后通牒。对于敌人的投降要求，法军都以炮火作了回答。

6 月 8 日和 9 日，德军又连续向法军发起了猛烈攻击。企图把这支部队消灭在沙漠里。法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不仅子弹快灯光了，而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是水源完全断绝了。他们每人每天只能得到 2 公升水，在这么炎热的地带里作战显然是不够的。

在遥远的伦敦，戴高乐将军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发给前方的电报说：“盖尼将军，希望你知悉，并转告你的军队，全法国注视着你们，你们是它的骄傲！”

戴高乐将军的号召鼓舞了前线的将士。这支部队终于在 6 月 11 日奇迹般地突破重围。全军 5500 人。经过 11 天的拼杀，死伤 1109 人，但德军却遭受了三倍于法军的损失。

比耳哈亥依木法军的胜利突围，成为大家议论和报纸新闻的中心。第二天，所有在伦敦、纽约、蒙特利尔，开罗、里约热内卢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闻号角，都震天动地地响起来“法军的英勇防御！”“辉煌的战绩！”“在比耳哈亥依木德国人被打败了！”

戴高乐对此次战役总结说：“我们已经接近一直所向往的目的，那就是为我们的自由法国军队——虽然他们在数量上力量有限——取得一个伟大时期的伟大任务。比耳哈亥依木的炮火向全世界宣布了法国复兴的开端。”

6 月 18 日，对于自由法国人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1942 年这天，一万余法国军民在伦敦举行集会，庆祝 6 月 18 日发出号召两周年。这天，伦敦艾伯特大厅的四层看台都挤满了人。一个有洛林十字旗的三色帷幕悬挂在演说台后面，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

人们盼望的时刻来到了。伴随着雄壮的马赛曲和洛林进行曲，自由法国领袖戴高乐将军健步登上演说台。52 岁的戴高乐依然是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

戴高乐将军用他那深邃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厅及站立着的群众之后，以他那低沉而浑厚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说。

“香弗曾说过：‘理智的人忍耐，热情的人生活！’法国在波尔多投降和被出卖已有两年，可是法国仍旧通过武器、土地和战斗法国的精神继续作战。在这两年间，我们过着伟大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热情的人。可是我们也忍耐了，因为我们是理智的人。”

戴高乐的声音在宽敞的大厅内回响着。大家都在凝神细听，用整个身心倾听着。

“我说我们是热情的人，可是我们只有一种热情，那就是对我们的伟大祖国——法国！”戴高乐说，“在所谓停战以后，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非洲和东方的战场上，在广阔无边的海洋上，在英国、厄里特里亚和利比亚的天空上，在圣纳扎尔的夜战或是早晨的刑场上丧命，在最后一口气里也要念着法国的名字。千百万立场坚定的法国人，不论是在本国准备复仇，在战争中打击敌人，还是在海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维护着祖国的尊严和影响，他们都

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为法国服务；只有一个思想，就是对法国效忠。因为没有热情就不能成就任何大事。”

“我说我们是理智的人。的确，我们选择了最困难、最光荣的战斗的道路。为了祖国的解放，我们不惜牺牲一切。”戴高乐说，“我们从来不承认法国曾退出战争。在我们看来，1940年的战败，所谓停战，所谓我们部队和领土的中立，只是那蛮横掠夺政权的人，为破坏法兰西共和国制度、法律和自由，为侵略者的利益而破坏我们的联盟，所施加的种种阴谋活动而已。”

戴高乐的谢谢被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戴高乐做了一个向下的手势之后，接着说：

“说真的，两年前的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当我们大胆地挺身而出捍卫国家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坚信我们的抗战事业一定胜利，法西斯的侵略，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戴高乐带头鼓起掌来，然后他接着说，“今天世界的战局正像我们早先预料的那样顺利发展。当今，在丘吉尔所领导的英国，在敌机猛烈的轰炸下，像磐石一样坚定，在他们的非洲，在海洋连续取得胜利。我们看到斯大林所领导的俄国人民及其军队，一年来，在1200英里长的战线上粉碎了德国及其所谓盟国的疯狂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也同时看到罗斯福所领导的美国，正在把他们的巨大资源变为战争武器，他们正在慷慨地援助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也看到法国人民群众在抵抗中那样团结，他们在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帮助自己的部队。我们公开地向这些忠诚的爱国公民致敬！”

听众席里再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戴高乐情绪激昂地说：

“是的，一个伟大的国家，它为了自己和别国必须继续保持伟大。但是，如果它的儿女都舍弃了它，它怎样继续保持伟大呢？如果它的战士不是它的荣誉象征，勇敢的泉源，希望的中心，它将怎样再建立它的统一、恢复它的伟大光彩呢？”戴高乐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战争的时代，我们要超脱自私和偏见，我们要和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一股伟大的浪潮正涌向国际理想的高峰。

最后，戴高乐用激昂的高声说：“我们知道血和火的考验还没有过去。我们了解敌人还有多大的力量和狡猾的伎俩……我们必须团结战斗，忠诚地履行对法国的义务，不到全国解放决不罢休。那时我们工作完成了，我们的作用尽到了，我们将追随那些从它的仍史开始以来为它服务的人，以及在它永久的未来中为它服务的先驱者，用庇古的话简单地对法国说：母亲，看看您的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们！”

戴高乐的演说，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大不列颠岛上的各个角落，也越过海峡传到了法国本土，人们守候在收音机旁，激动地听着、听着……

它像一声春雷，唤醒了仍在沉睡的人们：它像一把高高的火炬，照亮了战士们继续前进的道路。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布满了荆棘，但是，他们战斗的决心不变，他们将继续勇往直前。

第五章 风雨同盟

戴高乐与斯大林化干戈为玉帛
太平洋战争的火光照亮戴高乐的心
戴高乐渴望叩开罗斯福的大门
罗斯福不再缄默

“ ‘ 战斗法国 ’ 的地位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

世界的历史年年增添新的内容。1941年战局的发展证实了戴高乐关于这次战争是一场世界大战的预言。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凌晨四点半左右，苏联的斯大林元帅和他的侄子一起乘快艇去黑海钓鱼。斯大林住在黑海岸边的别墅里。

“ 再往深湾那边去一下！ ” 快艇按斯大林的吩咐向更远处驶去。

这时，另一艘快艇拖着白色的浪花追到跟前。快艇上站着的一个军人向斯大林高声喊道：

“ 斯大林同志有紧急情况！电台广播德军已侵入苏联领土，现在战争正在全国进行。 ”

斯大林二话没说，急忙收起鱼线。鱼线上挂着两条活蹦乱跳的鱼。斯大林把鱼放进鱼篮，用嘶哑的声音说：

“ 好哇，希特勒你骗了我，真想不到现在就来进攻我们。 ”

他的惊诧是有道理的。就在2年半前，德苏之间签订了互下侵犯条约，苏联不仅严守协议，而且还给德国送去了小麦和石油等物资。

但是，就在今天，德国190个师团在49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由北、中、南三个方面闪电般地侵入苏联。

大祸临头终不察，不禁战火滚滚来。

午间12时，仍任外长莫洛托夫受苏共和政府的委托，从克里姆林宫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号召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粉碎德国法西斯的进攻，把德寇赶出苏联国土。随后，成立了国防委员会，斯大林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最高统帅。

苏联人民团结起来。怒火中烧的苏联士兵急匆匆地跨上战马，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操起了钢枪，奔赴前线。

6月23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随自由法国部队进驻大马士革的戴高乐从电讯中得知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时，他便暂时收起了反苏反共的念头。他的秘书曾不解地探询：在对德战争中支持苏联，是否违背了他自己一贯强硬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戴高乐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希特勒！ ”

第二天，戴高乐向苏联驻伦敦的代表团发了一份电报：“ 我们目前不想说苏维埃政权的种种恶行，甚至罪行。我们应当像丘吉尔那样声明：我们毫不隐讳地站在俄国人一边，他们正在与德国人作战。……蹂躏法国，占领巴黎、兰斯、波尔多和斯特拉斯堡的不是俄国人。……俄国人正在消灭和将要消灭的德国飞机、坦克和士兵，就再也不可能用来阻止我们解放法国了。 ”

戴高乐发出这封电报之后，紧接着在外交上采取了行动。卡森和德让奉戴高乐之命前往苏联驻英国领事馆会晤伊凡·麦斯基大使，向他保证自由法国一定支持苏联，并要求与莫斯科建立军事关系。

8月2日，戴高乐从贝鲁特给卡森和德让发出指示，要他们询问麦斯基，莫斯科是否准备与自由法国运动建立直接的联系，是否准备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如果可能的话，恢复法国的领土完整。

当自由法国人第一次来访时，麦斯基对他们的欢迎是诚挚的，但是有保留。麦斯基蓄有山羊胡子，目光炯炯有神，十分讨人喜欢。当自由法国人第二次来访时，麦斯基的态度则是十分热烈，毫无保留。

戴高乐欣喜地看到，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宣传机器一夜之间来了十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德国进攻之前，莫斯科电台天天都在谩骂英帝国主义和他们的“戴派雇佣军”。现在却对他们大加赞扬了。在自由法国人于6月底第一次拜访苏联大使到8月初第二次拜访期间，克里姆林宫显然明确无误地给麦斯基开了绿灯。

戴高乐的态度，终于引来了斯大林的积极响应。9月26日，苏联政府正式声明：承认戴高乐将军为整个自由法国的领袖，并声明愿意同法兰西国防务委员会建立关系。此外，莫斯科愿意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同伙的共同斗争中帮助自由法国。至于法国，苏联政府强调了它坚定不移的决心，保证在战胜共同敌人之后，充分而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

和苏联结成军事联盟一举，不仅给戴高乐带来了希望，而且带来了战胜希特勒、解放法国的信心。

不久，苏联政府正式任命鲍戈莫洛夫大使为与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打文道的代表。戴高乐很快就和鲍戈莫洛夫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自那以后，戴高乐一有机会就尽他的有限的的能力帮俄国人的忙。随即，戴高乐派珀蒂将军为他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珀蒂立即受到俄国人一系列表示友好的待遇，如由参谋部给他介绍情况，请他访问前线并让他拜会了斯大林。

如果说，1941年6月22日对斯大林来说是国难临头的一天，那么，对于戴高乐来说，则是自由法国新的转机的一天。希特勒悍然进攻苏联，使战争局面与初期大不相同。这就为自由法国的抗德大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如果说，在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的那一刻戴高乐看到了胜利的前景；那么，1941年冬美国的参战则使这一前景更加明朗。

1941年，由德、意、日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在亚、欧、非大地上燃烧。然而，硝烟还没有弥漫到美国的领土上。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以花环、吉他、火山著名的檀香山依然是一片太平景象。

12月6日，正是美军官兵“神圣的周末”。不待夜幕徐徐降落，这个夏威夷群岛的首府，樯帆林立国际商港，早已是万家灯火，繁忙了一天的珍珠港，又沉浸在迷人的夜色中。从散落在海边的一个个俱乐部里，传来阵阵轻松愉快的舞曲和男女们的欢声笑语。

就在这同一时刻，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仅距檀香山西北约9公里的珍珠港，已是杀机四伏。以6艘航空母舰为主体的日本舰队正全速逼近珍珠港；另一只潜艇特攻部队，包括20多艘潜艇，5艘袖珍潜艇，已按战斗序列包围瓦胡岛，其中多数潜艇已潜抵珍珠港外。凌晨，一支潜水镜在珍珠港进口处探出水面，窥视的结果证明，大部军舰已经碇泊，离舰上岸、群聚在檀香山的多数美国官兵，正沉浸在周末的一片欢乐之中。

短短几小时之后，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7时40分，日本海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偷袭珍珠港事件、直到8时，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才把十万火

急的电报发出：“珍珠港遭受空袭。这不是演习！”

当天中午，一道从夏威夷发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电文送到刚吃罢午饭的罗斯福手里。此时整个珍珠港已笼罩在弥漫的浓烟之下。下午2点21分，两名日本特使野村、来栖走进美国国务卿赫尔办公室，递交日本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声明，此时正是日本第一批飞机开始袭击珍珠港后的一小时。

1941年12月8日，罗斯福总统向国会作了为时6分半钟的著名演说，要求对日本宣战。

有着坚韧毅力与瘫痪作斗争的总统，撑着支架缓步穿过国会大厅，欢呼声象暴风雨般地爆发出来。

罗斯福登上讲坛，面对激动的人群，面色安祥而严峻，双目凝视前方，庄严地宣布：

“昨天，1941年12月7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和蓄谋的进攻。”

“我要求国会宣：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发动的无端的卑鄙的进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自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同日，英国对日本宣战。9日，中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宣战。10日，中国对德国宣战，接着，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向日宣战。

10日晚，罗斯福发表了《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的讲话，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投入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11日，希特勒宣布对美国宣战。同一天，东条英机、希特勒、墨索里尼又签订一个新的协定，申明德、意、日三国“在对美、英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之前，绝不放下武器”，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单独媾和，同时规定了瓜分世界的范围以及战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狂妄叫嚣。

正当法西斯分子做着瓜分世界的美梦之时，英勇的苏联红军给进攻莫斯科的德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战争局面的改变使戴高乐看到了新的希望。12月7日，当戴高乐获悉日本联合舰队袭击了珍珠港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一件最大的喜讯，这样一来，我们终将赢得胜利！

戴高乐愈来愈感到，自由法国今后所需要的是在外交上打开一条出路，在盟国中取得它应有的位置，以一个交战国和主权国的姿态出现。

戴高乐在和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交往中，感到最难打开局面的是和美国的关系。

为了叩响美国这扇难开的大门，戴高乐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

当自由法国在世界各国心目中不再是那个使人“惊奇的逃亡者”的时候，美国官方却坚持以一种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它。罗斯福政府一直和维希保持亲善关系，希望以此抵制德国的影响。戴高乐认为，这等于姑息养奸，自寻失败。

为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戴高乐曾多次采取主动。1941年5月19日，戴高乐从布拉柴维尔致电勒内·普利文。

“由于美国所采取的近乎交战的态度，由于维希和德国的勾结越来越明显，而且，最后由于我们在非洲和大洋洲的自由殖民地的特有的经济情况，

因而我们和美国建立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我患来自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您。”

戴高乐在电文中指示普利文由伦敦去华盛顿，在美国需要呆多久就呆多久，执行六项任务：与国务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建立自由法国所属非洲和大洋洲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和财政联系；购买作战物资；组织或改组那里的自由法国委员会；建立一个新闻宣传机构并与可能乐于帮助自由法国的有影响的美国非官方人士建立联系。

1941年6月初，普利文带着戴高乐的重托由伦敦前往美国。当普利文踏上美国的土地时，他却发现那里对自由法国几乎一无所知，即使听到一星半点，也多半是对自由法国不利的消息。但是，普利文并不是完全空着手到美国来的。自由法国运动事实上控制着太平洋和非洲的一些法国属地，这就是他的资本。普利文受戴高乐之命主动提出在喀麦隆、乍得、刚果以及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为美国建立空军基地提供方便。这对美国可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北非在维希的控制之下，美国人将来有可能需要在非洲建立这样的基地，以便在欧洲采取战争行动。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太平洋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威胁在当时看来也已十分明显。

事实上，美国政府也就马上为他们的空军要求使用自由法国控制着的非洲某些基地，后来又要求使用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岛两处的基地。由于当时美国还不是交战国，所以这个要求是以“泛美航空公司”的名义提出的，但其最终目的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戴高乐很想得到美国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支持和承认，但他并不准备在由他代表整个法国这一要求上作出任何让步。戴高乐坚信：他不仅代表法兰西，而且他就是法兰西。

多年以前，戴高乐在《剑刃》一书中就提及并颂扬了凯撒和拿破仑的表演才能。他自己扮演的角色是法兰西本身，这是历史使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扮演的一个伟大角色。尚未亲自领教过戴高乐的罗斯福，从来不相信也不承认戴高乐的这种自诩。与戴高乐交往颇深的丘吉尔却亲自领教过这一点。一次，丘吉尔存与戴高乐会谈时对于戴高乐的傲慢曾直言不讳地说：“你说你是法兰西？你并不是法兰西！法兰西！她在哪里？当然，我承认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追随者是法兰西民族的一个重要而又值得尊重的部分。但是，除他们以外，我们无疑可以找到另外的权威，它也有它的价值。”戴高乐打断了他的话：“如果在你的看来我不代表法兰西，你为什么，又有什么权利来同我商讨法国的世界利益呢？”丘吉尔不吭声了。

无论何时何地，戴高乐表现出的都是这种坚定的不妥协的态度。当普利文告诉戴高乐，国务院邀请他“以专家身份而不以代表身份”参加同英国领事馆的会谈时，戴高乐叫他坚持原则。

8月9日，戴高乐从阿勒颇给普利文发了一封电报，重申了他的不可动摇的立场：

“一般说来，你很清楚，我们所要求的是美国提供作战物资，而不是什么救济品。我知道，国务院目前准备提供医疗用品，而不愿提供武器。如果他们不提供武器，我们就拒绝接受医疗用品。遵循老一套方针行事的幻想在华盛顿显然还很流行。他们偏袒维希，也就是悦，偏袒一手培植了维希的希特勒。

你是代表法国的，我不同意你仅仅以专家身份参加三方会议。要出席，就得同其他与会者享有同等权利，否则干脆不出席。”

戴高乐的强硬态度同样产生了效果。8月，美国人向乍得派了一个军事联络团。9日，科德尔·赫尔公开宣布，美国与自由法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他当时说：“我们与这个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讲都是极为诚恳的。”10月1日，普利文在国务院正式会见了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11月11日，罗斯福总统在给斯特蒂纽斯的信中，把“租借法案”的利益扩大到自由法国，理由是“保卫与自由法国有关的地区对于保卫美国有重要关系。”从此，自由法国可以从美国获得一切战争物资。这使戴高乐不禁额手称庆。

然而，戴高乐在高兴之余，依然认为有必要让普利文向萨姆纳·韦尔斯和科德尔·赫尔说明在伦敦组成的自由法国政权的性质。1941年9月22日，他在给普利文的电报中说：

“戴高乐将军一向庄严声明，他只是作为法国遗产的管理人，在基本上属于临时性质的基础上履行其责任。而且他预先声明，一旦法国国民的代表有可能自由地举行会议，他将服从这些代表。9月23日，普利文被召回伦敦，戴高乐任命国际劳工局法国代表阿德里安·蒂克西埃接替普利文为驻美代表，这个职务也可以说是一个未被承认的国家的大使。同时在伦敦，自由法国和驻伦敦美国负责与外国流亡政府联系的大使德雷克塞尔·比德尔建立了正常关系。

至此，戴高乐有种种理由认为，与美国保持工作关系的基础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但是，美国承认自由法国政权性质的问题依然遥遥无期。

戴高乐将军和美国人之间，掺杂着一些私人恩怨。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若离若合，绵长而不自然。

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他的《敌对的同盟国》一书中分析了罗斯福和戴高乐于这两位活动家的性格，认为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过分以我为中心，彼此就可能达成谅解。

戴高乐与罗斯福在出身、性格和经历上迥然不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出身豪门巨富。他在格罗通中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很早就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他所接触的作家、思想家和理论家都具有“新的民众思想”，他成为“新政”的总统，实现了震撼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运动”。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精明强干，身残志坚；又是一位出色的谈判能手，善于施展他的魅力。战争使美国在军事和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优势，使罗斯福总统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

戴高乐将军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出身于一个严厉的、爱国的、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他已经懂得了责任感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直到战争爆发前，他一直从事军事艺术和作战行动的研究。他的著作，表明他对快速攻击型的现代战争有着独到的见解。很久之后，他才同政界接触。战争开始后，他被任命为副国务秘书和国防部副部长。1940年贝当政府投降后，6月18日，他在伦敦向军人和民众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与他并肩战斗。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这一事业，没有从事政治活动。随着法兰西西帝国的众多领地宣布归顺自由法国，他“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政治舞台。”他把军人采取攻势和切断敌人退路的品质带到他的政治活动中。他与盟友的关系不是处于谈判的地位，而是挑战和对抗。

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戴高乐与罗斯福的关系一直处不好。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性情高傲，难以相处。而在戴高乐看来，罗斯福则是一个倨傲的人，有着大国优越感，希望由他扮演上帝角色，主宰法国命运。二人谁也不能正确

看待对方，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由于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困难。

说到政治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看待自由法国问题上。法国的崩溃在英国引起很大冲击，同时也深深震动了罗斯福总统。一支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军队投降了，一支完整无损尚未参战的现代化的海军宣布“中立”了，法国可耻地接受了希特勒的停战条件，这使罗斯福认为，多年来政府连续更迭的法国已经完全分崩离析。一段时间，罗斯福曾希望法国海军和法兰西帝国继续同英国人并肩作战，但这也使他失望了。罗斯福认为法兰西永远不会再成为第一流国家，因而，没有必要投入军事力量和在外交上给予支持，以使它恢复旧观。目前的法国是纳粹帝国的一个附庸国，由贝当元帅统治着。贝当代表着这个古老的、有着光荣历史，但不能适应新世界节奏的国家。罗斯福的对法政策就是与贝当主持的维希政府保持亲善关系，希望以此抵制德国的影响。

罗斯福如何看待戴高乐呢？他认为戴高乐的代表性远不如贝当，贝当身边派驻有教廷大使、苏联、美国、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瑞典、巴西、瑞士大使……贝当统治着半个法国。他无可争辩地统帅着一支军队，特别是一支完整无损的海军，并且控制着大片海外领地和头等重要的战略要地。罗斯福从戴高乐的敌对分子身上获得的情报中得出结论，戴高乐只被国外流亡的极少数法国人承认，在伦敦指挥着一支很小的部队，武器、经费全靠英国。在罗斯福看来，戴高乐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心胸狭窄的人和沙文主义分子，戴高乐唯一的愿望就是夺取并保持绝对权力。与丘吉尔相反，丘吉尔把戴高乐看作是法国“命运的主宰”，而罗斯福却不愿把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而准备冒任何危险的戴高乐视为捍卫法兰西荣誉的勇士。

1941年8月9日，阴雨绵绵。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乘军舰秘密地在纽芬兰的阿金夏半岛洋面上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会晤。

浓雾中，当丘吉尔的坐舰“威尔士亲王”号出现时，罗斯福在他的坐舰“奥古斯塔”号甲板上紧撑支架，起身立正脱帽，向丘吉尔致敬，两位著名的坚决主张反法西斯的首脑相见了。会议期间，制定了抵制日本侵略的共同政策，并对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侵略发出了警告。8月12日，两国首脑共同起草大西洋宪章。

《大西洋宪章》声称，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

虽然是罗斯福与丘吉尔的会晤，但戴高乐依然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大西洋宪章》的签定，使戴高乐看到了希望。因为这个宣言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和发展，对反抗纳粹暴政的斗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于是，戴高乐抓住这有利时机，以主动的姿态，频频向罗斯福发动攻势，以消除他们之间长久的隔阂，增进美国与自由法国之间的联系。戴高乐的不懈努力，终于打动了罗斯福，美国政府改变了以往对“自由法国”保持缄默或是怀有恶意的态度。但是123形势的发展仍不容戴高乐乐观。

12月7日，与德意结盟的日本对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毁灭性的突然袭击。戴高乐心想，美国人为了采取联合行动抗击共同敌人，从此会把和它自己的敌人作战的自由法国看作盟国。但他的幻想很快就化为泡影了。

戴高乐仍然必须忍受坎坷的命运。

1941年下卡年，苏、美先后参战，使战争局面与初期大不相同。这就为自由法国的抗德大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但是，在这个时期，戴高乐在国际上依然遇到了不少困难。法国主权以及戴高乐的领导地位不断受到来自美、英，特别是美国的严重挑战。

在罗斯福和科德尔·赫尔看来，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仍然是一个非法的、具有潜在危险的组织，在牵涉美国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可以与它进行谈判，达成有限的协议，但它完全没有代表性，在关系到法目利益问题上没有必要跟它协商。12月13日，美国政府根本不同自由法国协商，也不顾他们的抗议，证用了当时停泊在美国港口的14艘法国船只，其中包括“诺曼底号”邮船。

倒霉的事一桩接着一桩。

1941年岁末，美国的参战震惊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当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美国就象是一个巨大的锅炉，一旦点着了火，就会迸发出无限的能量。”为了建立反法西斯大同盟，圣诞节前夕，丘吉尔匆匆赶往美国。他与罗斯福一起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2年，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在罗斯福的书房里，由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宋子文分别代表美、英、苏、中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份宣言还汇集了其他22个国家的签字，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这27国政府签订的联合国家盟约中，自由法国被弃之门外。

这一切对戴高乐的打击已经够大的了，但更糟的是不久又发生了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事件。

在西半球离纽芬兰不远处有两个不出名的小岛。一个叫圣皮埃尔岛，一个叫密克隆岛。从十六世纪起，这两个小岛就从属于法国。那里的居民大多属于布列塔尼和诺曼底血统。法国崩溃后，维希政府派高级专员罗贝尔海军上将牢牢地控制着岛上的居民。由于这两个岛处在海运的通路上，显而易见，五角大楼早就对这两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小岛发生了强烈的兴趣。法国应当首先关注它们的防卫。

戴高乐认为解放这些岛屿是明智的。不久前戴高乐远证达喀尔的失利，使西非登陆的打算付之东流。结果遭到不少非议，使将军一时陷入困境，戴高乐一直在考虑如果情况允许，他们将通过武力重新占领这些岛屿。在美国虎视眈眈之下，在岛上居民倾向于自由法国运动的条件下，戴高乐认为时机已到。但是，应当设法预先得到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支持。

由于圣皮埃尔岛正在海运的通路上，英国人害怕岛上的无线电台被德国的潜水艇利用，所以希望把它联合在自由法国的旗帜之下。但丘吉尔认为必须取得华盛顿的同意。

一听这话，戴高乐就火了。因为在他看来，占须这些岛屿完全是法国的内政问题。12月，戴高乐获悉罗斯福已经派美国海军上将霍恩去法兰西堡，显然是要与罗贝尔海军上将商谈法国在美洲的属地以及在美洲海域的船只实现中立的条件问题，戴高乐便决定毫不延迟地采取行动。

此时米塞利埃海军中将正好要去加拿大视察当时停泊在哈利法克斯港的“苏尔古夫号”潜水巡洋舰和一些协助盟国护航的自由法国驱逐舰。戴高乐认为应该征得加拿大的赞同，有可能的话通过他们征得美国人的赞同。但是，从英国外交部戴高乐获悉，加拿大政府经美国同意，决定在圣皮埃尔岛登陆，夺取那里的电台。法国全国委员会立即向伦敦和华盛顿提出抗议。

戴高乐感到他的自由法国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既然现在面临着外国对法国领土的干涉，那就再也不能犹豫了。他命令米塞利埃海军中将立即向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进发。

米塞利埃率领的舰队不费吹灰之力便顺利攻占这两个小岛，受到了岛上居民极为热烈的欢迎。年轻的立即报名参加自由法国的军队，年岁较大的则着手组织地方自卫队。戴高乐任命他的特使萨瓦里接替维希派的高级专员担任当地的行政长官。

人们也许会想，这样顺利完成的小规模行动不至于引起什么震动，最多只是使美国国务院吃了一惊，在外交上嚷嚷一番以示反对也就完了。但事实不然。

攻击行动于圣诞节前夕完成，正值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白宫罗斯福总统那里作客。美国各报都大肆渲染这次美英首脑的亲切会见，及时报导了动人心弦的友好场面：两个盟国的首脑光临大教堂，泪流满面，当众唱起了赞美歌《在小小的维夫林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的突击行动，在美国竟激起一场风暴。

就在当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先生停止了圣诞休假，急如星火地为此事赶回华盛顿，并发明了一项书面声明。赫尔指责：“所谓自由法国船只在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采取的行动是一个专横的、违背各方协定的行动，而且事前没有通知美国或得到美国的许可。”其中有一句话，吸引了戴高乐将军的注意力。美国国务卿赫尔怒不可遏，要求把“所谓自由法国的战士从他们刚占领的两个岛上赶走。”“所谓自由法同”一词极大地伤害了戴高乐。戴高乐致电丘吉尔，提醒他美国国务院的态度已在法国公众舆论造成了极坏的印象。丘吉尔一再缓和这场冲突，设法减轻强烈的反响。他在卡皮托利的神圣讲坛上，向美国议员们发表了演说，一方面对戴高乐及其追随者大加赞扬，一方面宣誓忠于英美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和战斗联盟。但赫尔却不顾英国人的干预，无视他们大量缓和气氛的行动，依然固执己见，并试图以英国政府为中间人对戴高乐进行恫吓。

1942年1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显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拜访了戴高乐，试图劝说戴高乐同意让这些岛屿实现中立，脱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而独立，并接受盟国的共同控制。不出所料，戴高乐一口回绝了。

“那么，美国显然打算派遣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去圣皮埃尔岛，到那时你将怎么办呢？”艾登显出关切的样子问道。

“盟国的军舰将在法国的领海之外停下来，美国海军上将将与米塞利埃共进午餐，米塞利埃一定会非常高兴。”戴高乐极其幽默地回答。

“如果巡洋舰开进法国领海呢？”艾登接着问道。

“我们的人将会按照惯例要求它停止前进。”戴高乐坚定地回答。

“如果巡洋舰还往前开呢？”

“那就太不应该了吧，”戴高乐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人就得开火了。”

在戴高乐猛地出人意料说出“开火”这两个字时，艾登顿时大惊失色。

戴高乐看到艾登脸上吃惊的神色，便笑了笑补充说：“我是理解你的惊异情绪的，但我对民主国家是有信心的。”

戴高乐以一笑结束了这次会谈。其结果是，美国人最终接受了自由法国占领这两个岛屿的既成事实。

戴高乐将军泰然自若地占领了两个小岛，但却毁了与罗斯福建立良好关系的机会。

顷刻之间，1941年即将过去。

在新年之际回首往事，是人之常情。望着窗外人迹罕至的除夕夜晚，一年中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个一个在戴高乐的脑海中浮现。整个1941年，在戴高乐和他的英国盟友之间以及和英国的美国盟友之间，甚至在他和自己的追随者之间，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他所处的地位，他那宁折不弯的性格以及他自命不凡的伟大抱负，使他不可避免地卷进了接踵而来的风波，受到了接连不断的压力，但他终于挺过来了，因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他。

就在这天晚上，《抵抗运动》报的主编尤里·别鲁阿先生拜访了戴高乐公寓。

别鲁阿先生自称是戴高乐将军的传记作家，正在致力于撰写专门著作。在与戴高乐交谈时，别鲁阿先生征求戴高乐的意见：

“将军阁下，我以为完全可以这样设想，书的封面，应该是法兰西国旗，再加上夏尔·戴高乐的亲笔签名，这更有象征意义。”

“这些具体问题，留在我们重返巴黎后再议，”戴高乐认真他说，“我只想向世人表明，我把自己的一切全献给了法兰西！正是为了它，我才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东奔西走。没有领导核心，一个民族就无法生存。他们需要指示，离不开善于巩固政权的领导人。”

尤里·别鲁阿先生急忙记下了将军的这段自述。同时他也明白了就是这个信念在支撑着戴高乐，使他泰山压顶不弯腰。

转眼间，冬去春来。春风吹拂了伦敦大地，阳光融化了泰晤士河的坚冰，解冻的土地散发出浓郁醉人的春天的气息。

在这万物生机的春天，戴高乐感到他与美国紧张的外交关系也应该有所缓解。

为了消除外界的误会，1942年4月1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演说，全面阐述了他的对外政策，同时对罗斯福的“不公正”态度，也旁敲侧击地进行了批评。他说：

“不要认为战斗法国这个奇迹，只要一经形成就不要管它了……整个问题的基础是，只有在盟国愿意和战斗法国站在一起的前提下，战斗法国才愿意和盟国站在一起。”

在直接谈到美国政府仍然和维希发生关系并和维希的代理领事进行秘密交易的时候，戴高乐严正指出：

“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依靠那些破坏法国自由和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模型或脸谱来改造法国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引用了为了怕雨淋而投入大海的可怜的傻子原则。”

戴高乐进一步强调说，“当前整个法国问题是一个革命问题，不承认这一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被它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出卖了的法国，开始要完成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如果自封的现实主义，在一次又一次的慕尼黑会议中，已经把自由引向深渊的边缘，而现在又继续压制热情，不肯改弦更张，那将是不能容忍的！”

戴高乐最后说：“地位已经确定了，自由法国无论在公众的感情上或是在法律的认可上，都成功地被认为不仅是法国的武装保卫者，而且是它的利

益的监护人，这个结果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得到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在这篇演说中，戴高乐显示了他坚决捍卫自由法国地位的坚强决心，这决心是牛也拉不动的，只要他下了决心，任何困难都会被粉碎。

经过近两年的“曲折”的了解和“严肃的对话”之后，戴高乐与华盛顿的关系有了迅速的改善。1942年5月21日，美国新任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伦敦同他会晤，恭听他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见解。接着在6月1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艾登也参加了。戴高乐打电话给他的驻华盛顿代表阿德西安·蒂克西埃说，现在看来美国国务院的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韦尔斯已开始意识到他们对待自由法国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了。29日，英国外交大臣告诉将军，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改变它对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次日，怀南特与戴高乐共进晚餐，表达了对将军的同情，并答应在美国尽力宣传将军的人格。

这时，丘吉尔正在华盛顿，他正竭力劝说罗斯福总统缓和他对这位自由法国领袖的态度，结果华盛顿于7月9日发表了一个公报，给戴高乐的运动以某种承认。公报的全文曾于发表前送交戴高乐，征求他的同意。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博尔特将军被指派为美国政府代表，与在伦敦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协商有关指挥战争的一切问题。美国方面承认戴高乐将军的贡献和全国委员会为维持法国的传统精神和制度所作出的努力。全国委员会“作为法国抗击轴心国的法国各种抗战力量的象征”，将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公报同时载明，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致认为——“它确信法兰西全国委员会也会认为——法国的政治前途只能在自由和没有强迫的条件下决定。”

戴高乐对这份公报表示满意。但是，他很快发现它的实际价值很有限。公报宣称，美国愿意同自由法国官员在他们各自管辖的领地上打交道，只要他们在那里行使着有效的职权。但它却只字未提非常重要的其他领地，特别是仍在维希控制下的法属北非。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外交上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美国又进了一步。这时，从北非战场上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自由法国军队在比耳哈亥依木力挫德军。

比耳哈亥依木战役规模虽然很小，但它表明自由法国战士是能够为共同的事业英勇奋战乃至献身的。消息传到法国本土，那里的抵抗运动大受鼓舞，这次胜利提高了整个自由法国运动的地位，相应地降低了维希政府的威望。消息传来，戴高乐独自在办公室里流下了喜悦而自豪的眼泪。

同时，戴高乐也看到了另一个令人振奋的迹象，国内抗战组织已开始希望他进行全面领导。这些组织中有几个领导人到伦敦来见他。

7月中旬，戴高乐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从此标志他现在不仅得到了海外的、而且也得到了国内的抵抗者的忠诚。

7月底，戴高乐把三大抗战组织的领导人召集到了伦敦。27日，他改组了全国委员会，已经到达英国的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受命负责内政；成功地出使过墨西哥和一些操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的雅克·苏斯戴尔被任命为情报委员。全国委员会的事务现在已是井井有条。戴高乐的影响比过去更大了。

戴高乐开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中东和北非。卡特鲁将军向他电告，法英两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不断发生争端。戴高乐决定亲自去看看，他亲临前线

也许能给他的战斗部队带来些安慰。

1942年8月初，戴高乐离开伦敦飞往北非。坐在机舱内，戴高乐心情难以平静，他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令人烦恼的忧愁。前不久发生的马达加斯加岛事件就令戴高乐感到法国的主权问题仍然受到威胁，令他焦急不安。

1942年5月5日，凌晨3时，一家通讯社打电话给戴高乐，告诉他一支英国特遣部队正在马达加斯加东北海岸线上的战略要港迫那果——苏瓦雷斯登陆。由于这次在法国须地上的登陆事前竟未与戴高乐商量过，他顿时愤慨到极点。事实上，自日本参战以来，将军就一直敦促盟国让自由法国对马达加斯加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这个岛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有被日本占领的危险。然而，在戴高乐初次提出建议时，马达加斯加还不在丘吉尔优先考虑之列。随着日军在东南亚的神速进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孟加拉湾、锡兰和印度洋的威胁，使首相改变了他的看法。问题在于自由法国是否应该参加任何登陆行动。从他们本身的情况看，他们显然缺乏登陆的手段，这就需要英国海军和空军的支持。但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对于达喀尔的惨败记忆犹新，因此在同美国商量后，他们决定自己干，不让戴高乐与闻其事。

131

令戴高乐更为恼火的是，英军登陆的当天，发自华盛顿的一份公报宣称，美国和英国同意，马达加斯加应在占领该岛对于共同事业不再必要时，立即归还法国。一想到法国的一块领地将在这一段时期中被人夺去，戴高乐将军怎么也按捺不住胸中怒火。

与对付先前所有这类危机一样，戴高乐又采取了丝毫不作让步的做法。同往常一样，他的强硬态度奏效了。6月10日，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到他府上，就马达加斯加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

“将军阁下，我向您保证，英国对马达加斯加没有任何企图，因为我是法兰西的朋友！”丘吉尔大声说道。

然而，戴高乐并不这样看问题。对他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他怀疑英美对法国托管下的领土有所图谋。

戴高乐的态度惹恼了丘吉尔，他暴躁他说：“你不是我唯一的盟友！”接着又嚷道：“我是法国的朋友！我过去一直希望，现在也希望，伟大的法国有一个伟大的军队。这对于和平、秩序和欧洲的安全都是必要的。我从来也没有任何其他政策！”

“你说得很对！”戴高乐说，“在维希的停战协定之后，你的长处是一直掌握着法国这张牌。这张牌的名字叫戴高乐。现在不要失掉它！如果失掉就太可笑了！因为现在你的政策正日渐成功，而自由法国已经成为法国抗战的灵魂和支柱。”

他们也谈到了罗斯福对戴高乐的态度，丘吉尔劝他说：“不性急嘛！看看我是怎样既有屈从又能坚持不让的吧。”

“你能那样做，但是我办不到！”戴高乐说，“因为你有一个巩固的国家、一个团结的民族、一个统一的帝国、一支庞大的军队作基础。至于我！我有什么资本呢？然而，正如你所知，我得对法国的利益和命运负责，这副担子太重，我没有条件低头，环境也不允许我低头！”

“我不会拆你的台，”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态度深表理解，临别时他说，“我一定不会离开你，你相信我好了。”戴高乐所处的地位使他不仅对马达

加斯加等法属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的命运担心，他更为北非的命运担心。

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它未来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呢？戴高乐只感到他的心被复杂的感情交织着，缠绕着……

第六章 历史重典

戴高乐：我是个富裕的穷鬼，孤独的领袖

“火炬”没有照耀戴高乐

美军与法伪将军达尔朗的幕后交易

戴高乐：如果与投敌的官员签订协议，我们的抵抗还有什么意义？

卡萨布兰卡，罗斯福导演一场“结婚闹剧”

强迫吉诺作新郎，新娘反对难成婚

“媒人”操纵下的“婚礼”

战斗法国的旗帜飘扬在阿尔及尔上空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处在转折关头。从8月下旬以来，全世界所有国家军政要员的注意力，均被吸引到苏德战场，一座军事重镇——斯大林格勒方向来了。至此，俄军誓死抵抗的悲壮历史，就在这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揭开了血淋淋的最后一幕。

斯城的保卫者们，为争夺每一个废墟奋起血战。斯大林格勒已成了俄罗斯人英雄主义和无畏的献身精神的象征。问题。假使法国一直衰败下去，本身的威信将丧失殆尽，它的独立自主也就不存在了。它将从平静的海而不停地沉沦下去，从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相反地，如果它能在恢复统一的基础上东山再起，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只要战争期间法国是个交战国，而又团结在一个政权的周围，它的前途就有保障。”

然而，团结在什么样的政权周围呢？在戴高乐看来，当然不是维希政权。在法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它是一个投降政府。在法国的灾难中，群众再也不相信那不久前由于失败而垮台的政治体系。最有代表性的人在这点上比任何人都坚定，有些人还持保留态度，也有一些人对维希那只破船还也有希望。

就在戴高乐考虑法国前途的时候，英美制定的“火炬”计划却在秘密地进行。

9月20日，经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火炬”方案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参加“火炬”作战的美英远征军共有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双方并确定，由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这一战役的总指挥，英国亚历山大将军担任副总指挥。

时间对于盟军太重要了。拖延得愈久，盟军取得的战略意义就会愈小。“火炬”战役的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愈来愈感到盟军不能等到万事齐备才开始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同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最后商定，盟军登陆北非的最后期限不能超过11月上旬。

即将开展的“火炬”战役，将戴高乐卷入到一个异常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之中……问题。假使法国一直衰败下去，本身的威信将丧失殆尽，它的独立自主也就不存在了。它将从平静的海面下停地沉沦下去，从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相反地，如果它能在恢复统一的基础上东山再起，那就什

么也不会损失，只要战争期间法国是个交战国，而又团结在一个政权的周围，它的前途就有保障。”

然而，团结在什么样的政权周围呢？在戴高乐看来，当然不是维希政权。在法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它是一个投降政府。在法国的灾难中，群众再也不相信那不久前由于失败而垮台的政治体系。最有代表性的人在这一点上比任何人都坚定，有些人还持保留态度，也有一些人对维希那只破船还抱有希望。

就在戴高乐考虑法国前途的时候，英美制定的“火炬”计划却在秘密地进行。

9月20日，经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火炬”方案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参加“火炬”作战的美英远征军共有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泪1700架飞机，其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双方并确定，由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这一战役的总指挥，英国亚历山大将军担任副总指挥。

时间对于盟军太重要了。拖延得愈久，盟军取得的战略意义就会愈小。“火炬”战役的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愈来愈感到盟军不能等到万事齐备才开始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同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最后商定，盟军登陆北非的最后期限不能超过11月上旬。

即将开展的“火炬”战役，将戴高乐卷入到一个异常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之中……1942年秋天，美国和英国在北非谋划的“火炬”战役尽管对戴高乐实行“高度保密”，但是，戴高乐已猜测到盟国的军事意图，因为某种军事行动正在计划中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了。

丘吉尔在开罗时，已任命亚历山大将军担任总司令，不久，蒙哥马利将军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坦克和飞机的集结从未中断。8月27日，戴高乐致电他在伦敦的委员会，宣布了他的结论：美军已决定在法属北非登陆，以配合英军从埃及发动的攻势。

戴高乐虽然猜测到了盟国的军事意图，然而对于盟国的计划和密谋却一无所知。戴高乐觉察到，打破他孤立状态的关键在于罗斯福。他已派他的特使达斯蒂埃到过华盛顿，但成效甚微。于是，他决定派第二个特使——已在伦敦参加他的阵线的社会党的抗战运动领导人安德烈·普利普，让他带去一封给美国总统的私人信件。

这封信开门见山，谈到一些根本问题。戴高乐说，法国承受了1911—1918年战争的主要负担，虽然它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却已元气大伤，疲惫不堪了。法国在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错误，以及缺少盟国的支持，导致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使法国重新投入战争确有必要。他本人毅然承担起这个责任。

戴高乐在信中还说，他不是一个政客，当然不赞成他和他的追随者介入政治，如果这意味着参加党派之争。但如果这意味着捍卫法国的利益，为了法兰西而向敌人作战，那么他确实已参与了政治。他驳斥了认为他对战后法国有个人野心的种种流言蜚语。有人认为他想成为独裁者，或认为法国人民竟会容忍独裁，这些想法都是无稽之谈。美国总统在法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崇

高威望。但是美国总统应该与哪一个法国打交道呢？昨天的法国？维希的法国？还是明天的法国，人们尚未看到其形状的法国？不，他申辩道：战争期间算得上法国的唯有现在的战斗的法国。戴高乐要求罗斯福“为了我们共同战斗的神圣事业的利益，全面地直接地审查美国和战斗法国之间的关系。”

这封 10 月 26 日签署的信虽然及时交到了，但罗斯福总统并没有给予答复。罗斯福总统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计划，在此以前都早已确定了。戴高乐根本就没有排上号。美国为了插足北非和扶植一个受美国控制的政权，以利战后确立美国在欧洲和世界的霸权地位，多方物色能听命于美国的人选，以取代坚决维护法兰西主权和独立的戴高乐。

1942 年 9 月 16 日，美国国务院驻北非高级专员罗伯特·墨菲密访伦敦。

这是一位北非通，长期担任美国驻北非的总领事，深得罗斯福总统信任。他这次秘密来到伦敦，是要同艾森豪威尔讨论那里的政治局势的。

“维希政府表面上是标榜‘中立’的，美国同它还维持着外交关系。因此，只要不过分激怒这个政府，北非的局势就会有微妙的发展。”墨菲一开始就对艾森豪威尔推心置腹。

“可是，北非的地方当局的情况怎么样？”艾森豪威尔最担心的还是他将来要去的、要战斗的那一片地域。

“请将军放心，我和我的伙计们搞过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当地政府对美国人并不抱什么敌意。我们还联络了一些对轴心国持敌对态度的军政高级官员。”

墨菲向艾森豪威尔推荐了一个人——亨利·吉诺。

亨利·吉诺是五星上将，他的军人生涯非同凡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对德战争中，曾失去一条腿，他是 1940 年从德国战俘营里逃出来的。尽管当时他已 63 岁，他还是用绳索逾墙逃出了柯尼斯坦因监狱的城堡。并于 1942 年的 4 月到了瑞士。冒着纳粹用十万马克的悬赏要他首级的危险，他到了法国的未被占领区，受到了贝当元帅的召见，并同他进行了“诚挚的谈话”。维希政府的总理赖伐尔试图说服他向德国人自首，被吉诺予以拒绝。最后他得知，如果希望德国人给他自由，他必须签署一项效忠于贝当元帅的声明。美国人决定和他打交道的时候，并不了解这一点。

“驻阿尔及尔的法军军团参谋长查尔斯·马斯特将军曾向我保证，如果吉诺到阿尔及尔，所有法国殖民部队都会集结在他的周围。因此，如果吉诺出面，盟军登陆时不会遇到什么抵抗。”

“可除了马斯特之外，我们并没有理由去相信那些已经拒绝戴高乐邀请他们参加自由法国的职业军人会服从他们的指挥官的命令，来投靠在法国军队中没有地位的吉诺。”艾森豪威尔并不完全信任吉诺。

送走了墨菲之后，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们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这是英美盟军第一次组织的如此规模的两栖作战行动，有许多问题需要细致研究，以确保万无一失。

10 月 16 日，墨菲在返回阿尔及尔后，给艾森豪威尔发来了两封密电。一封是关于人事问题。墨菲告知，马斯特将军已直言相告，除非让吉诺担任最高统帅，否则他不会干。墨菲还推荐了另一个人：维希部队的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达尔朗的儿子曾主动找到墨菲，向他保证，他的父亲愿意和盟军合作。艾森豪威尔很倾向于接受达尔朗，他手握重兵，而吉诺却无一兵一卒。但达尔朗的底细不详。

达尔朗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有着很不光彩的经历。他是纳粹的热心合作者，是维希反犹太法令的主谋，并持强烈的反英态度。他几乎代表着盟国正在与之斗争的欧洲反动势力。

在了解了达尔朗的底细之后，经过反复推敲，看来再也没有推比吉诺将军更合适的了。于是，艾森豪威尔决定任命吉诺为整个法属北非的总督来掌握“微妙的局势”，达尔朗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戴高乐被完全撇在一边，甚至对即将开始的盟军登陆北非的“火炬”计划也毫无所知。

139

1942年11月5日，艾森豪威尔飞抵直布罗陀。盟军已把这里选为这次“火炬”行动的临时司令部。

11月7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把在法军中“享有盛誉”的吉诺将军接到直布罗陀，想利用他的影响使北非的维希法国倒向盟国。同时，为了争取维希政府和法属关注各国领导人对“火炬”行动的支持或守中立，罗斯福在战役开始之前，分别给维希首脑贝当、西班牙头目佛朗哥、葡萄牙总统卡蒙纳将军、阿尔及利亚总督夏泰尔以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统治者发出了字斟句酌的电文，要求他们与盟军提供合作。最有意思的是，在草拟致贝当的信时，丘吉尔曾提醒罗斯福，贝当“利用自己的名望给我们的事业所带来的损害，是任何地位稍次的人物都做不到的，对地不能太仁慈了。”但是，罗斯福还是以反法西斯大局为重，给他写了一封热情的规劝的信，信中仍称他为“法兰西共和国元首”。希望贝当和盟军合作，解放北非，清算德意法西斯的罪行。

总之，为了使这一战役顺利进行，美英两国除了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外，还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争取维希法军归顺，企图“兵不血刃”地占领法属北非。

1942年11月8日，美国远征军横渡重洋，盟军在北非登陆的“火炬”战役开始了。

出乎盟军意料的是，局面与当初设想法军不会抵抗的计划相反，北非登陆并不是一帆风顺，照例流了不少鲜血。贝当统治下的维希法军，枪口不是对准德国人，而是对准盟军，与盟军展开了一场搏斗。

面对法军的抵抗，艾森豪威尔下令各路特遣队强行登陆，突破法军的防线。

针对北非登陆行动，各地的无线电台反复转播了一个预定的信号：“罗伯特到了，罗伯特到了！”此时，远在伦敦的戴高乐也听到了这一讯号。罗伯特是墨菲的教名，戴高乐毫不怀疑盟军在北非的登陆行动已经开始了。

中午时分，戴高乐被英首相丘吉尔召见，来到唐宁街10号。丘吉尔和艾登友好地迎接了他，但显得有些尴尬。丘吉尔解释说，在海上和空中，英国人占较大的比重，但在地面上，美军人数超过英军。事实上这是美国人的一场表演，指挥官是艾森豪威尔。遗憾的是，美国人坚持要把自由法国排斥在外。

“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丘吉尔说，“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决不抛弃与你签订的协议。自1940年6月以来，我们就一直答应支持你。”丘吉尔还情绪激动地补充说，“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你曾和我们站在一起，既然现在前景越来越光明了，我们决不会抛弃你！”

丘吉尔告诉戴高乐，美英商议由吉诺将军指挥北非的法国军队。戴高乐是了解这位将军的。早在1942年4月吉诺逃出德国战俘营来到瑞士之后，戴高乐不失时机地公开赞扬了这位将军，并派密使向他提出了为了法兰西的利益而合作的建议。此举使戴高乐赢得了声望。事实上，他给吉诺指出的前景是在未来解放法国的战斗中，统率一支统一的法国军队。然而，吉诺对戴高乐这个提议却不予理睬。他认为，凭着他的资望和上将的军阶，只要在北非一露面，所有的人就会向他靠拢，向他靠拢的人无疑也包括戴高乐。

对于吉诺的狂妄，戴高乐并不在意，吉诺将军总比亲德分子达尔朗强得多。于是，待丘吉尔讲到吉诺之后，戴高乐表示赞扬和良好的祝愿。

“美国人现在在非洲登陆，这件事本身是令人满意的。”戴高乐说，“你们英国和我们自由法国在非洲共同作战已经有两年了。对法国说来，我看在非洲可以重建一支陆军，或者重建一支海军为解放法国而战。吉诺将军是个伟大的军人。我祝愿他的尝试成功。遗憾的是盟国怂恿他与我不同，否则我不仅预祝他成功，还能给他帮助。迟早我们会相互谅解的，盟国的干涉越少，我们的合作就会越好。”

戴高乐同时指出，“美国人在北非要玩弄利用维希反对戴高乐的把戏。我一直这样想，到时候他们必然要还这笔帐。事实上他们正在付这笔代价，当然我们法国人也应该付出代价。但是，在我们军人的灵魂深处有道义观念，我相信这场战斗不会打很久。然而，不管时间多么短，德国人是要来的。”

当天晚上，戴高乐向法兰西全体军民，向法属北非的侨民和军政人员发表了广播演说。他说：

“法兰西的盟国，已开始把法属北非投入解放战斗里来了。他们正在那儿让大批军队登陆。这样，就使我们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成了解放法国前进基地。……

战斗法国已经使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重新参加了神圣的战争，它一直希望，一直想使其他的一切地方都这样做。其他的一切地方！特别是指法属北非来说的。我们从前在那里曾经获得那么多光荣，现在那里又有着大批的部队。

法兰西的将领、士兵、海军、空军、公务人员们、北非的法国侨胞们，起来吧！帮助我们的祖国！毫无保留地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的法兰西特别命令你们，不要考虑什么名义和形式，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拯救祖国！所有战斗法国的成员，赞扬、欢迎和欢呼一切不怕敌人和卖国贼、敢于重新站立起来的人。不要听信奸细的谣言，说什么我们的盟友，将要夺取我们的法兰西帝国。

前进吧！这是伟大的时刻。正是施展聪明和勇敢的时候。敌人到处都在动摇和屈服。北非的法国人，我们希望通过你们，把我们从地中海这边送到对岸，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中去，这就是说要依靠法国人取得胜利了！”就在戴高乐发表激昂的演说时，北非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法国士兵并不理解秘密外交所达成的协议，一致把美军登陆视为敌人入侵。于是，北非海岸的各个小岛、各个村镇、各个城市响彻了愤怒的呐喊声：“我们又被出卖了！”“打倒入侵者！”

在激烈的战斗中，法国人损失了三千多名战士，盟军损失的数字更大。法国海军丢掉了好几艘战舰，其中有现代化的冉·巴尔号战列舰。激烈的战斗，在空中、海上、地面上交织进行。双方伤亡过重，损失可观。法方丢掉

了 135 架飞机，反过来，也打落了 35 架美国飞机，重创美国马萨诸塞号战列舰。另外一艘美国巡洋舰和驱逐舰也被岸上炮兵击中，一百多艘运输艇被打沉。

北非战斗中，法、美、英伤亡惨重的消息使戴高乐闷闷不乐。

11 月 9 日午后，戴高乐在伦敦召见了美国代表斯塔克海军上将。战斗中的情况使海军上将感到痛心，他不相信竟会发生这样的战斗。他说：“艾森豪威尔也感到吃惊和不安。”“我要派一个使团到阿尔及尔去，”戴高乐感到现在必须由战斗法国出面帮助解决问题，他宣称，“我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使团到达目的地。”斯塔克答应作必要的安排。

次日，戴高乐写信给丘吉尔，信中写道：

“亲爱的首相：

我请求您协助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设法向北非的法国人那里派遣一个考察代表团。

整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所最关心的，就是将法国本土和法兰西帝国联合起来同一切盟国并肩作战。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使法属北非成为政治和军事整体的一部分，特别是成为已团结在战斗法国和抵抗运动中的法兰西帝国各个领地的整体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此，我迫切希望派遣代表到北非去向法国人，特别向吉诺将军，陈述这个观点。

143

关于吉诺将军的事情，派代表团更是十分必要，因为他可能并不充分了解真正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

我希望这个代表团由下列人员组成：

勒内·普利文先生，民族委员会外交事务和海外领地委员；

我私人的参谋长比奥特中校；

贝尔纳和沙尔维两位先生。他们是最近从法国来的，他们分别领导着‘解放’和‘战斗’这两个抵抗运动组织。”

信发出后不久，11 月 11 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那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在大列颠的法兰西人”，聚集在阿伯特大厦倾听戴高乐将军为法兰西全国人民的团结而发出的慷慨而激昂的呼吁。

尽管戴高乐写信给丘吉尔，请求他从中斡旋，以寻求罗斯福的支持，但是，丘吉尔依然左右不了罗斯福。

就在盟军强行登陆的紧张时刻，美国同维希政府之间的幕后交易也在一幕幕地发生着……

就是眼光远大的政治活动家，也未能料到维希这个位于法国南部的小市镇，这个无忧无虑、快活热闹的疗养胜地，会摇身一变，成了欧洲一个大国的临时首都。

1940 年 9 月，贝当元帅签署投降书之后，希特勒便乘机授意组织了一个新的法国政府，由老朽不堪年逾九十的贝当元帅充当领导人。维希便成为贝当政府的所在地。

一时间，这个原来只有五万居民的维希小镇一下子急剧膨胀起来。象哈里发王朝黄金时代发狂的皇城，各省区的地方长官、各部门的公务人员、新闻记者、速记打字员、各类服务人员等纷至沓来，人口一下子便猛增到 130

万人。象任何一个首都一样，各国外交代表也纷纷赶到这里来凑热闹。美利坚合众国全权大使维里雅木·莱希海军上将偕夫人由华盛顿来到了维希。

当莱希上将脱下战袍，换上外交官紧身礼服后，便加紧了他的外交活动。一般说来，维里雅木·莱希大使在军事和外交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相当可观。首先，他顺利地 and 海军上将达尔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达尔朗上将明显的反英情绪，并没有使美国大使感到烦恼。至于谈到海军上将公开的亲德感情，更不足为怪。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位海军上将掌握着法国陆海军的指挥权，这和美国征服法国在北非殖民地的计划有着直接关系。

在美国秘密筹划登陆北非的“火炬”计划时，达尔朗综观世界局势，这个投机分子感到搭盟国车的时候到了，于是通过他在阿尔及尔的小儿子，向墨菲表示愿意与盟军合作。但他的计划落空了，美国最后任命吉诺为整个法属北非的总督，掌握北非权力。但是，达尔朗并未善罢甘休，他仍然窥视着北非最高行政首脑大权的位置。

1942年11月初，达尔朗巡视北非回到维希后不几天，突然接到意外消息，他的儿子突然得了麻痹症，在阿尔及尔住进了医院。由于病情危急，地下不得不于11月5日返回北非。因此，正当盟军即将大举进攻之际，他出于意外地留在了阿尔及尔。这是一个奇怪而麻烦的巧合。

罗伯特·墨菲担心他在这里碍事劝他在盟军登陆前离开，可这位海军上将因担心儿子的病情，毅然拒绝了墨菲的建议，而注在一位法国官员费纳尔海军上将的别墅里。

近一段时间来，盟军在阿尔及尔的希望寄托在法国军事长官米官将军身上。他与墨菲的关系一向很密切，但是墨菲并没有告诉他具体的登陆日期。11月7日午夜，墨菲悄悄拜访了他，告诉他一支强大的美英联军，在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的支持下，即将开到北非，几个小时之内即可登陆。朱安将军闻讯不禁大吃一惊。他原以为自己可以控制阿尔及尔的全局，但现在情况有变了，维希政府的副元首、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正在此地，他的职权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只要达尔朗在此，一切手握兵权的法国军官，决不会再听从他的命令。

“不如把达尔朗请到这里来，咱们当面商议看看。”墨菲与朱安将军商量道。

凌晨2点，达尔朗赶到了。朱安将美英联军即将登陆的消息如实相告了。没想到一向对英国人怀有恶感的达尔朗听后暴跳如雷“我早就知道英国人是愚蠢的，但我一直认为美国人要比英国人聪明一点。现在我开始认为你们美国人所犯的 error 之多，也不亚于英国人。”他指着墨菲的鼻尖说。

尽管墨菲和朱安百般劝说，达尔朗依然执行贝当元帅下令抵抗的命令。在盟军强行登陆的形势下，11月8日上午7时40分，达尔朗带着明显的无可奈何，给他的主于贝当元帅发去了一封电报：

“上午7时30分的情况如下：搭乘英国舰只的美军已于阿尔及尔及其邻近地区实行登陆。守军在几处地点，特别是在港口及海军司令部两地击退了进攻。在其他地点，由于是突然袭击，登陆获得成功。局势在日益恶化，守军不久即无法支持。各方面报告表明，大规模登陆正在酝酿中。”

上午11时30分，达尔朗又给贝当发了一电：“阿尔及尔可能于今晚失守。”

下午5时，他在另一份电报里说道：“我军虽尽力阻挡，美军还是突入

市区，我已命当地驻军司令朱安将军就投降一事进行谈判。”

下午7时，在英国海军少将布罗斯的率领下的东线特遣部队进驻阿尔及尔市，阿尔及尔正式宣布投降。

就在盟军占领了阿尔及尔之后，吉诺将军来到这里，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号召北非法军停止抵抗，但毫无作用。在北非的维希法国一部分上层人士中，特别是军政首脑们，仍然把贝当视为偶像，而达尔朗又被视为贝当的直接代表，北非的军官都是按他的指示办事。吉诺将军的那些希望法国人调转枪口，对准德国人的言论毫无影响力。

这显然是与达尔朗尚在阿尔及尔有关。达尔朗的影响显然比他大。

逮捕达尔朗，是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想法。可他又一转念，逮捕达尔朗未必就能产生什么积极影响。这里的法国军队，虽然还是忠于他所代表的贝当政权的。如果达尔朗能给图伦和达喀尔的大量法国舰艇发出一道必要的命令，美英盟军就有希望立刻减轻地中海的潜在的海军威胁，这个人还有利用的价值。他甚至想起了离开伦敦之前丘吉尔诚恳他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痛恨他，但如他把他的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就是叫我爬行一英里路，我也会欣然照办。”

看来争取此人是上策。

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从直布罗陀飞到阿尔及尔，亲自会见了达尔朗。

协议很快就达成了，即“北非的法国军政官员与和平居民同盟军合作，盟军承认达尔朗管理法属北非的行政事务，吉诺将军指挥北非的所有法国军队。”

激战了五天五夜的枪炮声终于停息了。

法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达尔朗、吉诺、戴高乐三雄并立的局面，形势的发展更加复杂微妙……

当达尔朗协定的实情公诸于世后，这笔交易所引起的政治风波是美国政府始料不及的。在英国国内，在自由法国内部，对这项协议的指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英国人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而其对象乃是一位与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因为这笔交易，在北非登陆的胜利，甚至阿拉曼战役的胜利，都已黯然失色。英国外交部认为，首先他们有自己的道义上的立场。他们正在为国际的体面而战斗，而达尔朗却是它的反面。

戴高乐将军对此亦是怒气冲天。他说：“如果盟军在解放一个国家的同时，又与现在投敌的官员们签订协议，那么抵抗还有什么意义？”

11月16日，戴高乐拜会了丘吉尔和艾登，告诉他们，与达尔朗作交易的决定并不像他们所辩解的那样在战略上是站得住脚的。戴高乐说，“使自己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背道而驰是战略上的错误。”

说着，戴高乐把法国来的电报拿给丘吉尔看，他说，“这些电报反映出来的舆论令人震惊。你们要想一想这种冒险所带来的后果。如果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缘故，法国一旦看到它的解放就是达尔朗，那末从军事观点来看，你们可能打胜仗，但在道义方面你们是要吃败仗的。”

与此同时，戴高乐命令法兰两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公报，声明与盟国在阿尔及尔的安排断绝关系。戴高乐在会见丘吉尔和艾登之后，留下来和他们共进午餐。谈话的气氛依旧是紧张的。丘吉尔竭力安慰这位倔强的将军说：“事态很可能朝着对你有利的方向转化，吉诺在政治上已经完蛋了，达尔朗

迟早也会有同样的下场，你就是荣誉，只有你一个人能站得住。”丘吉尔力劝戴高乐忍耐一点，“美国人到时候会来找你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会见后的第二天，11月17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说：“我应该让你知道，与达尔朗所签的协定引起了强烈的愤怒。我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相信它只能是一种仅仅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才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人们会认为我们愿意和当地的吉斯林之流妥协，这种看法不仅在法国而且会在全欧洲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我们对此决不能忽视。达尔朗声名狼藉。正是他，提拔他的下属来指挥法国海军，从而使法国的海军对我们怀有恶意。正是他，派法国海军到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面与你的舰队作战，才使一些美国海员送了命。此事恍如昨日，如今为了权位，达尔朗又倒向我们这边了。和达尔朗签订一个永久性的协定，或在法属北非成立一个达尔朗政府，这是无法力千百万普通百姓所理解的，而他们的一片至减之心就是我们的力量。”

虽然丘吉尔成功地要求罗斯福注意与达尔朗打交道的暂时性，但英国广播公司唯恐触犯美国人，在随后几天中还是扣下了自由法国的声明。戴高乐痛心地对丘吉尔说，“我知道，英国领土上的电台不归我管。”

在华盛顿，戴高乐将军的特使蒂克西埃和菲利普就与达尔朗交易一事提出抗议。激怒了的罗斯福总统大声叫道：“我当然要和达尔朗打交道，因为达尔朗给我阿尔及尔！如果赖伐尔明天给我巴黎，我也要赖伐尔打交道！”不过，他补充说，他很愿意在华盛顿会见戴高乐将军，并请这两人向将军转达他的邀请。

戴高乐本指望至少俄国人会在达尔朗问题上支持他，然而他却并没有估计到斯大林惯常的冷眼旁观的态度。这位苏联的领导人确实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说过，他认为将达尔朗拉进盟国抗击希特勒的主流中来，“乃是一大成就”。

此时，戴高乐又陷于孤立的境地。他愈来愈感到，不仅他戴高乐的地位岌岌可危，而且法国本身也有沦为附庸国的危险，法国内外抗德力量浴血奋战孜孜以求的独立和主权就可能落空。

面对新的挑战，戴高乐坚持抗德和维护独立主权的原则，依靠国内外抵抗运动的全力支持，采取了打击达尔朗、争取吉诺的正确方针。

此时的达尔朗权力已经在握，他口口声声要真诚地与盟国合作，但他却继续为非作歹，不听忠告。他继续任用维希官员，甚至包括那些同纳粹密切合作而声名狼藉的人。另一方面他把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分子关入狱中，封闭了他们的《战斗报》，这就更加激起法国人民对他的仇恨。自由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以及英美报刊群起而攻之。同时，达尔朗也感到自己所获得的统伯地位也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他写道：“由各处获得的消息，都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达尔朗越来越感到，自己已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一种莫名的恐惧向他袭来。

1942年12月23日，圣诞节的前一天。早晨，达尔朗海军上将从自己的郊外别墅回到位于帕连·爱达的公馆，当将军踏上他办公室的台阶时，突然响起两声枪响，犹如阿拉伯人驱赶牲口的几声鞭响。达尔朗应声倒下。

公馆里顿时象炸了庙似的，大惊失色的工作人员拥向法国地方当局首脑办公室的门口。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响过之后，四个大汉迈着碎步，轻手轻脚

地抬出了浑身是血的海军上将。

一股鲜血，正从上将身上涌出，流在地板上，形成一条鲜红的细流。幸好，达尔朗海军上将还有知觉。他一双豹眼睁得大大的，直喘粗气，胸膛里冒着嘶嘶的哨音。

赶上来的两个美国间谍，慌忙指挥人们闪开一条通道，人们急忙把他放在“帕卡尔德”牌轿车上，飞快地朝医院驶去。一个小时以后，上将再也没有清醒过来，他走向了永恒的黑暗……

当枪响一分钟过后，一个黑发、尖脸、面色苍白的年轻人慌忙跑出大楼。几个人在后面发狂地追着，终于在台阶处抓住了他，立刻把这个年轻人的双手扭到背后。

几天之后，这位刺客被送上军事法庭，他认为为法国人民铲除一个声名狼藉的领导人是他的责任。根据吉诺将军的命令，这位青年于12月26日被枪决。他名叫博尼埃·德拉夏佩尔，年仅20岁。

达尔朗之死，除掉了戴高乐将军道路上一个主要障碍，但其直接后果是使一个业已混乱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

12月27日，戴高乐已收拾好行装，准备飞往华盛顿。在去机场的途中突然接到通知，由于暗杀所产生的后果，丘吉尔和罗斯福已决定取消他的这次旅行。

从机场回来，戴高乐立即电告吉诺将军：“达尔朗被刺是一个警告，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接着，戴高乐写道：“将军，我建议您尽快地在法国的领土上和我会谈，无论在阿尔及利亚或在乍得都可以。我们要研究一些办法，在一个临时中央政权下把国内外和法国领地的一切可以为解放法国和拯救法国而战斗的法国军队统一起来。”

在此前一天，12月26日，吉诺将军在英美的支持下以值赫的“军政长官部”的名义掌握了一切大权，吉诺将军总算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权力。

12月28日，戴高乐向吉诺致意，并再次呼吁战斗的法国人团结一致。

吉诺新居高位，根本无意听取戴高乐的意见。12月29日，吉诺被迫给戴高乐作出这样的答复：“鉴于达尔朗被刺所引起的情绪，我认为当前时机不利于我们之间举行会谈。”

戴高乐满怀信心地静候吉诺的回音，想不到竟是这样让人失望的结果。但是，戴高乐并没有放弃达尔朗之死所造成的有利形势，他大力宣传战斗法国的政策，并扩大其影响。

1943年新年伊始，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他说：

“法属北非和西非内部的混乱局势日益严重。这是由于在维希政权垮台后，法国政权在这里并没有基础。战斗法国组织起来的富有热情和久经考验的强大民族力量，虽然使法兰西帝国大部分领地投入战斗，重新回到共和国的怀抱，但这个力量在法国这块属地上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

戴高乐在叙述了国内外当前形势后，进一步阐述了他呼吁建立中央临时政权的必要。他说：

“12月25日，我得到民族委员会和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同意，向吉诺将军建议从速在法国领土上与我会晤，共商大计，以争取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我认为法国的形势以及战争的总形势，都不容许我们再有任何迟延了。”

戴高乐的声明以及这个声明在国内外产生的广泛影响及群众的强烈支

持，都击中了华盛顿政府的痛处，使罗斯福和他所支持的吉诺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月6日，吉诺向戴高乐发出第二封信，原则上表示同意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谈。这次没有再提达尔朗之死所造成的不利气氛，但又借口“早有的会”，说在1月底前不可能确定谈判的具体日期。

为此，戴高乐非常生气，他说：“早在1942年12月25日我就建议与你举行会谈，使我遗憾的是，你由于早有约会而延至今年1月底举行。我要但白地告诉你，关于实现法兰西帝国的统一以及把它的力量和全国抵抗运动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迫切性，民族委员会和我个人跟你的见解不同。”

就在戴高乐等待着与吉诺将军举行会晤期间，罗斯福与丘吉尔秘密飞往摩洛哥海滨城市——卡萨布兰卡。一场难以预料的“喜剧”在这两位导演的操纵下渐渐拉开了帷幕。……

1942年下半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反法西斯战场上捷报频传。

同年10月，英军中将蒙哥马利与纳粹德国最年轻的陆军元帅隆美尔在非洲阿拉曼地区展开了一场总较量，这就是著名的阿拉曼战役。这场空前的沙漠恶战以英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就打开了通往的黎波里的道路。一个月以后，德军第六集团军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纳粹在东线总崩溃的迹象已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是向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还是经由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登陆，进攻欧洲的“软下腹”？英美仍在举棋不定。看来，在最高一级进行磋商是必要的。

1943年1月中旬，在刚刚解放不久的摩洛哥海滨城市卡萨布兰卡，有两位神秘的人物先后光临该市。

按西班牙人的说法，卡萨布兰卡是白色的城市，它座落在美丽的大西洋沿岸，自由自在地延伸在起伏不定的山丘上。它慷慨无私地给温暖的季风和蓝色的海浪敞开着自己博大的胸怀。今年，时值一月，但春已经来临。生气盎然的夹竹桃，到处绽开了诱人的笑脸。

两位神秘的人物很快就领略了这座城市的美丽，更使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两个月以前，这座美丽的城市，还归法国人所有，如今，市区内窄狭的、安详的街道，已被美制吉普车和美国士兵填满了。

化名“P先生”的人是于12日先期到达卡萨布兰卡的。紧跟其后，14日，化名“Q海军上将”的人也乘坐专机，迅速降落在同一机场。随后，“Q海军上将”一行立即换车直奔安法郊区的达累斯沙达别墅。

这座带花园的高级别墅，是安法郊区一个显赫法国人的私人财产。别墅的建筑风格，结构布局，内部装饰，以及雅致的家具，奢华的陈设，样样都在向人们展示着庄园主的富有和追求享乐的贵族情调。客厅里一排考究的威尼斯式大窗口，直对着生气盎然、百花争艳的花园。可惜的是，能自动卷起的钢制窗帘却严严实实地遮住了窗外美丽的景色。

不用说，这两位神秘的人物在极为严格保密的条件下，将在此进行一次秘密会谈。“Q海军上将”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总统罗斯福，“P先生”则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一次有关盟军下一步作战安排的会晤。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最高统帅，斯大林本也应该参加这次会晤，可是由于苏联国土上正进行着殊死斗争，斯大林脱不了身，所以未到。

由于战事紧迫，作战讨论会于罗斯福总统到达的当日下午便正式开始。午餐过后，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双双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其他随行人员则移

动坐椅，在两巨头面前围成一圈。他们中间美国方面有：马歇尔将军、海军上将金·阿诺德将军；英国方面有：阿兰·布鲁克将军、庞德将军、空军元帅波特尔。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美英法军队已从东西两面对突尼斯的德意法西斯军队形成包围之势，胜利在望了，而当盟军击溃这股敌军之后，他们下一步干什么？

会议历时 10 天，幸好，涉及欧洲军事行动的重大分歧并没有出现。经初步商定，一旦突尼斯的军事行动结束后，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应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英国首相丘吉尔精辟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北非决不是供人休息的柔软沙发，而是下次进攻的跳板。”每一位出席联合委员会特别会议的高级将领都明白，今年在地中海区域发起的任何一次战役行动，必然会推迟他们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事已如此，俄国人只好眼已巴地继续等待开辟第二战场了……

军事行动问题很快地确定下来了，眼下，在卡萨布兰卡英美双方争吵不休的焦点，就剩下“控制”法国政局这个议题了。罗斯福对戴高乐不感兴趣，对这位将军怀有很深的偏见。可惜，同吉诺将军的会晤，使罗斯福总统感到非常失望。

那是 1 月 17 日，美国外交官罗别尔·迈尔弗陪同吉诺将军，前来专访安法郊区的达累斯沙达别墅。

美国外交官径直把吉诺将军带到美国总统面前。只见这位吉诺将军直挺挺在沙发上。他面带傲气，声势逼人。在他到达之前，罗斯福总统已从墨菲和艾森豪威尔那里得知，吉诺任性而傲慢，一心想担任盟军总司令。百闻不如一见，罗斯福总统看到他那一副傲慢的样子，顿时心里一沉：“这个外表浮华、行动粗鲁的老军人，肯定对政治一窍不通，没有任何一点灵活性。”自始至终，吉诺将军一味坚持己见，总是重复一句话，“给我们武器！给我们坦克，飞机，大炮……其他一概不要！”

“那么，您从哪儿动员军队呢？”罗斯福忍不住了。

“大量招募殖民地的雇佣军，兵源不成问题，只要给我们武器就成！”

“您打算借用摩洛哥的军队来解放法国？”

“这有什么关系！”吉诺忍不任大叫起来，“最重要的是实力。我认为和摩洛哥人打交道，总比和共产党人搞联合要好上十倍……给我们武器！几星期之后，我们手中将集中起一支庞大的军队。”

“那么，‘自由法国阵线’……”

“戴高乐对军事一窍不通！”吉诺将军突然做了一个恶毒的怪相，说：“如果我手中拥有武器，我就会轻而易举地跟他达成一项协议。其余问题，我一概不感兴趣。”

吉诺将军的粗劣言行，深深刺伤了美国总统。他除了神气活现和耀武扬威之外，一无所知。这位法国将军离开办公室后，美国总统只能耸耸肩膀，说：“地地道道的粗鲁军人！他在圣西尔到底学了些什么？要知道，我对法国军事科学院的评价一向很高带着难以忘怀的印象，罗斯福感到对这样一个不仅粗鲁、无知，而且眼光短浅的法国人，根本不能在他身上下一大笔赌注。可又非常遗憾，其他合适的人选又没有找到！”

这时，丘吉尔首相天天来游说一次，他总是建议，最好由戴高乐将军一人主持法国新政府。可是，在罗斯福看来，丘吉尔支持戴高乐的真正原因是

他们有在战后保持英法殖民帝国的共同利益。罗斯福每次都把英国首相的这种建议，轻轻地挡了回去。

但罗斯福又不能不考虑戴高乐，因为他在各殖民地和法国国内有一定影响，在政治上他比吉诺占上风。于是，争论来争论去，不外乎一种结果：让戴高乐和吉诺平分秋色。

说服吉诺将军容易，然而要把戴高乐请到卡萨布兰卡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对于这两个对立的法国领袖，罗斯福抱着一种取笑的实际上近乎戏弄的傲慢态度，给科尔德·赫尔先生写了一封信。科尔德·赫尔先生此时留守华盛顿，没有参加这次英美首脑会议。

“他们把新郎——吉诺将军带到我的面前。”总统信笺上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浓烈的讥讽味道：“新郎自然愿意及早缔结良缘，并且依照我们的条件举行婚礼，然而，我们的朋友，说什么也请不来那位火气十足的新娘——戴高乐将军。新娘发狂地反对这里的一切，根本不愿看见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并没有流露出与吉诺将军同赴婚床的任何情意。”

丘吉尔在此期间，接连两次给戴高乐发去电报说：“我可以在这里给你和吉诺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安排一次具有良好远景的会谈。”但戴高乐马上回电予以拒绝。他不愿意在一出有失身份的喜剧中充当丘吉尔的斗士，去与受罗斯福庇护的吉诺较量。并在回电中提醒丘吉尔，他曾一直找机会与吉诺会晤，但都没有成功。他坚持说，最好在法国人之间举行会谈，他不喜欢“盟国高级法庭”的气氛，而盟国却正是建议用这样的“法庭”来代替最好由法国人自己安排的会议。同时戴高乐又打电报给吉诺，他在电报中十分不客气他说：“请你记住，我仍旧随时准备与你会谈，但必须在法国领土上，在法国人当中进行，地点和时间，完全由你选择。”

到头来，这场奇怪的婚礼，还是在高压下决定举行了。经过法兰西全国委员会讨论，大家认为即使仅仅为了与罗斯福的会晤，戴高乐也应该走一趟，况且大战的形势和法国目前的处境，不容许戴高乐拒绝跟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英王陛下的首相举行会谈。

在离开伦敦前，戴高乐同美国海军上将斯塔克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者非常认真地听了这次谈话。戴高乐向他讲述了法国历史及其悲剧。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法兰西依靠某位在以前不被人知的领袖死而复生。圣女贞德、波拿巴、克雷蒙梭以及其他就是例子。圣女贞德是位农民，一个没有文化的平民的女儿，但她却拯救了王国，戴高乐将军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海军上将。斯塔克建议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与罗斯福会晤时，把这些话再说一遍给罗斯福总统听。

1943年1月22日，戴高乐一行登上了开往卡萨布兰卡的飞机，一场“结婚的闹剧”开始了……

1943年1月22日下午，戴高乐一行的专机降落在卡萨布兰卡的费达拉机场。

迎接“新娘”的是美国将军韦尔伯等人。喜好别出心裁的美国人自有一套迎接“新娘”的特殊办法。上车前，韦尔伯用一块破布蘸了些污泥涂在汽车的玻璃窗上。这种谨慎的做法，无非是要把戴高乐将军及其同伴抵达摩洛哥的消息封锁起来。

汽车一驶入安法区，戴高乐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铁丝网围绕着会议处

所，里里外外都是美国岗哨，不许任何人自由出入。在这儿，在法国的土地上，他们却被隔离，这使戴高乐感到十分反感。

为了摸清美英的意图，戴高乐来到卡萨布兰卡的当天，就与丘吉尔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戴高乐一进门就先发制人，他大声对英国首相说：“如果我早知道在法国的土地上会被美国人的刺刀团团围住，我是决不会到法兰西全国委员会讨论，大家认为即使仅仅为了与罗斯福的会晤，戴高乐也应该走一趟，况且大战的形势和法国目前的处境，不容许戴高乐拒绝跟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英王陛下的首相举行会谈。

在离开伦敦前，戴高乐同美国海军上将斯塔克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者非常认真地听了这次谈话，戴高乐向他讲述了法国历史及其悲剧，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法兰西依靠某位在以前不被人知的领袖死而复生。圣女贞德、波拿巴、克雷蒙梭以及其他就是例子。圣女贞德是位农民，一个没有文化的平民的女儿，但她却拯救了王国。戴高乐将军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海军上将。斯塔克建议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与罗斯福会晤时，把这些话再说一遍给罗斯福总统听。

1943年1月22日，戴高乐一行登上了开往卡萨布兰卡的飞机，一场“结婚的闹剧”开始了……

1943年1月22日下午，戴高乐一行的专机降落在卡萨布兰卡的费达拉机场。

迎接“新娘”的是美国将军韦尔伯等人。喜好别出心裁的美国人自有一套迎接“新娘”的特殊办法。上车前，韦尔伯用一块破布蘸了些污泥涂在汽车的玻璃窗上。这种谨慎的做法，无非是要把戴高乐将军及其同伴抵达摩洛哥的消息封锁起来。

汽车一驶入安法区，戴高乐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铁丝网围绕着会议处所，里里外外都是美国岗哨，不许任何人自由出入。在这儿，在法国的土地上，他们却被隔离，这使戴高乐感到十分反感。

为了摸清美英的意图，戴高乐来到卡萨布兰卡的当天，就与丘吉尔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戴高乐一进门就先发制人，他大声对英国首相说：“如果我早知道在法国的土地上会被美国人的刺刀团团围住，我是决不会到在此之前，墨菲受总统之命会见了戴高乐，交谈近一个小时。墨菲建议戴高乐在会见总统时，不要提合法地位的问题。“吉诺感兴趣的只是军事指挥权。”墨菲说，“只要你沉住气，过不了三个月，控制形势的是你，因为吉诺对政治毫无野心。”戴高乐只是淡淡的一笑，回答道：“政治野心会随着一个人地位的变化而迅速膨胀的！”

在达累斯沙达别墅，罗斯福亲切地接待了戴高乐。罗斯福不愧是外交上的老手，尽管他对戴高乐一个小时的表现感到十分恼火，但他一再压制自己的愤怒，带着通常那种迷人的风度，用法语向戴高乐问候，他的法语讲得不太好，但他愿意用这种语言交谈。罗斯福也很得体地邀请戴高乐将军在自己身旁就座。然后问长问短，表现了少有的客气。但当谈话进入实质性的问题时，俩人则是针锋相对。

在谈到法国主权问题时，罗斯福认为法国的主权属于法国人民，但由于德国侵占而暂时不能行使。要恢复这一主权，只有当人民能重新自由地表达

他们的意志时才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他不愿承认任何临时政府，不管它是由戴高乐还是由其他任何人领导的。

罗斯福总统还指出，他色不可能承认戴高乐的组织，因为戴高乐“不是选举出来的。”戴高乐回答说，圣女贞德拯救了法兰西，她也并不是选出来的，历史上其他例子，戴高乐也讲了许多。但罗斯福只记注了圣女贞德的名字，后来他一再加以嘲讽，以至于总统身边的人也围着罗斯福绘声绘色编造笑话：悦戴高乐接连宣称他是圣女贞德，是波拿巴，当然还是路易十四！

戴高乐将军很有分寸地回答了美国总统的询问，但在法国主权问题上始终是固执己见，寸步不让，弄得美国总统和法国将军不得不面对面、眼盯眼地交锋着。这时，象是一阵轻风拂过，帷幔轻轻动了一下，戴高乐突然发现里边还有别的人，几个手执冲锋枪的美国士兵来回晃动着。他后来得知，那些移动着的人影原来是总统助理哈里·霍普金斯、秘书们以及总统的警卫。种种痕迹表明，美国人根本不相信戴高乐将军。

事情继续朝前演变。美国总统建议，两个法国将军心须尽快会晤，立即和解，那怕表面上维持和谐都行。但其结果又是如何呢？

1月23日，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导演下，“新郎”“新娘”终于相见。

“新郎”吉诺亲自来拜见“新娘”戴高乐，想不到“新娘”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斥问：“喂，怎么回事！我四次向你建议会谈，而你怎么要我在这铁丝网里，在外国人中间来跟你会谈呢？你从国家观念上说，不感到有些难为情吗？”

吉诺显得很窘，他忙向戴高乐解释说，他也是不得不这样做。接着，吉诺便向戴高乐兜售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所推行的计划。将来的法国执政委员会会有三位主席，吉诺本人是第一位首脑，戴高乐居第二位，英国人打算从法国调来的乔治将军居第三。为了保持三首脑在军阶上的平衡，指挥权独揽下来，他兼任法国军队的总司令，包括自由法国和抵抗运动的一切武装力量。根据这个理由，他只隶属于艾森豪威尔。维希的总督们仍然保留他们原来的位置。另外，组织一个“法兰西帝国议会”，这个议会要管理法兰西帝国的行政事务，但绝不能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对于这“一厢情愿”的计划，戴高乐是不能接受的，他十分反感地说：“你所想象的是，在罗斯福庇护下由你掌握实权。说穿了，这是任凭外国摆布的执政官。但是，第一执政官拿破仑是在战争和独立中得到人民的一致称赞的。你要举行一个什么样的公民投票呢？如果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话，准能对你有利吗？况且，拿破仑是以一个为法国赢得多次伟大胜利以及占领了广大领土的将领状态出现的。我也全心全意地希望你能作到跟他一样。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你的胜利又在哪儿呢？”戴高乐一口气讲到这儿，只见他扬起眉毛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挑战似地反问道。

对戴高乐的反问，吉诺窘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说来。于是，戴高乐继续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这位理屈辞穷的将军紧追不放，他接着斥问道：“第一执政官在立法方面和行政方面都有过人之处。你的才能是这样的吗？再说，你不是不知道，在法国，公众舆论都攻击维希。然而，你的职务先是从达尔朗那里取得的，以后是从诺斯等人的手中取得的。所以你是以贝当元帅的名义取得你的那些职务的，人人都知道你给贝当元帅的信，你在信中告诉他说，你决不作任何事情来反对他的政策。在这些情况下，你相信你能取得大部分法国人民的拥护吗？没有人民的拥护，一个政府即使不成为叛乱的靶子，也

只是个徒有虚名的政府。最后，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你的权力是人为的，是处在从属地位的。试问你，在这种情势下，怎能靠你保全法国的主权呢？”

戴高乐用无情的逻辑步步进逼，吉诺将军穷于应付，只好再次声明说：“这是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我不愿卷入政治旋涡；对于我来说，我只知道重建法国军队，我完全信赖美国盟友。”他接着说：“我刚刚跟罗斯福总统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我能组织多少个师，美国就负责装备多少个师。我考虑，准备在半年内建立12个师。至于您，能在同样的时间内组织起一半吗？谁又来供应您武器呢？”

预定的这场单独会晤中，冲突越来越明显。可谓是针尖对麦芒。

戴高乐在听完吉诺的声明后，以强硬的口吻反驳道：“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你我在军队名额上的竞赛。现在，北非的军队是属于法国的。这些军队下是你的产业。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你很快就可以看到的。问题是法兰西帝国以及法国本土内的统一，这就要求建立一个适应这种形势的中央政权。作到了这一点，所有各种军队就会毫无问题地统一起来，而且能统一使用。世界局势要求战斗法国是抗击敌人、维护共和国以及复兴民族的标志。当维希这个幽灵破灭的时候，全法国的共同情感自然而然地会转向战斗法国。我们所要求建立的中央权力机构，一开始就谴责维希，并且声明停战条约根本无效，是非法的；这个中央权力机关和法兰西共和国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对于全世界来说，要成为法国独立的化身。”

然而，吉诺不但没有被说服，反而更加顽固不化。其结果，便是无休止的争吵，吵来吵去，谁也不妥协，有可能便是导致俩人断绝关系的恶果。美国人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的。

于是，就在戴高乐与吉诺结束会谈后不久，罗伯特·墨菲便来向这位倔强的将军施加压力。告诉说英美同吉诺已作出一些新的安排，今后武器和粮食都将提供给吉诺当局，因为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都已正式承认他“掌管法国的军事、经济和财政权益，而这些权益现在和将来都与现已在法属北非和西非站稳了脚跟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关。”

戴高乐以怀疑的态度和不愉快的心情听着墨菲的讲述。他对供应方面的安排表示同意，但有一点刺痛了他，就是美国和英国自命为法国权利的裁判官，竟要与吉诺单方面打交道，而吉诺则在所谓不染指政治的借口下，居然承认他们的权威。这样看来，法国的权益不会受到尊重。

第二天清早，美国外交官麦克米伦和会说法语的美国将军威廉·威尔伯继续对戴高乐施加压力。戴高乐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威尔伯，当时他们两人都在军事学院读书。随后，麦克米伦递给戴高乐一份由他和墨菲起草的戴高乐与吉诺协定文本。这个文件责成这两位将军去贯彻的仅仅是这样一个意图，即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以便在战争期间管理法属法兰西帝国。

然而，在戴高乐的眼里，有三个问题使这个文件不能让他接受。第一，它是盟国提出的；第二，它将使戴高乐不得不放弃他现有的政权；第三，它将给人们造成达成了协议的印象，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协议。随后，戴高乐就此文件征求了他的随员们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任何影响法国权力的协定，决不能是外国干预的结果，不管这种干预是多么友好或者多么高尚。但是他还是表示，准备在结束这次谈话之前，再分别向丘吉尔和罗斯福重申一下自己的立场。

同一天下午，戴高乐来到丘吉尔的住所米拉多尔别墅，开始了自大战以来，他们之间最激烈的一次交锋。丘吉尔声色俱厉地威胁说，他一回到伦敦就要公开谴责戴高乐阻挠协议的达成，还要发动英国公众舆论来反对他。戴高乐也是寸步不让。他反过来指责丘吉尔支持了一个法国不能接受的、使欧洲不安宁的、使英国感到遗憾的事业；丘吉尔的这种做法，只是为了使美国人满意，而不考虑其代价如何。

随后，戴高乐又来到离米拉多尔别墅只有几步远的达累斯沙达别墅。在戴高乐看来，这位美国总统接待他时表现得“很明智，就是说亲切又在发愁。”总统觉察到他甚至不能说服戴高乐接受公报的内容，他因此感到遗憾。罗斯福耐着性子说，“在人类事务中，应当演剧给公众看，您和吉诺将军在有我和丘吉尔参加的会议中举行会谈的消息，特别是随着这个消息同时发表法国首脑们的一项共同声明，即使只在理论上获致协议，也会产生令人注目的可贵的效果。”

“这事我可以办到，”戴高乐回答说，“会有一个公报的，尽管这个公报不可能是你们所需要的。”

然后，戴高乐把他的助手们介绍给罗斯福，总统也介绍了他的部下。一切都象事前安排好了似的，紧跟着，丘吉尔、吉诺和他们各自的随员都进来了。一进门，丘吉尔就大声吼道：“我的将军，请不要妨碍战争！”边说边在戴高乐面前晃动着他的手指。一切都象是在表演给美国人看。

罗斯福总统趁此机会，笑容可掬地询问戴高乐说，“您至少能同意与吉诺将军同时坐在我和英国首相旁边照一张相么？”

他的要求并不高，戴高乐彬彬有礼地表示同意说：“为了您的缘故，我愿意这样做。”

这时候，罗斯福总统惊喜狂叫：“快，快把我抬到花园中去。”警卫们匆忙行动起来。

达累斯沙达别墅外，有一片碧绿的草坪，这是一个不大的网球场。这里事先早已准备好了四把椅子，无数的照相机都已瞄准了这四个座位，新闻记者站了好几排，他们手里都拿着自来水笔。

四位“演员”面带微笑，走出房间，在和煦的阳光的照耀下朝座椅走去。

“请等一等，”罗斯福总统此时俨然是一位很有手腕的“导演”，他转过头来，对身边的戴高乐说：“再请你当着我们的面，在照相机前和吉诺将军握握手，行吗？”

“I shall do that for you!”戴高乐用英语回答道。

于是，记者和摄影师的镜头一齐对准了四位“演员”，只听得“咔嚓，咔嚓……”快门的声响和摄影机的转动声。

两位将军各自伸出一只手，不自然地握在了一起，身后是坐在座椅上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1月24日，历时10天的卡萨布兰卡会议顺利闭幕了。给斯大林送去了一份会议《纪要》，宣布了盟国的共同看法，它宣布：“尽量集中空前强大的兵力，随时待机重登欧洲大陆……”

同时，也向世人宣告戴高乐将军和吉诺将军已结成联盟，其标志就是摄影师拍下的握手照片。

至此，由丘吉尔和罗斯福一手导演的“结婚闹剧”降下了帷幕……

1943年1月26日，戴高乐带着复杂心情乘英国飞机回到伦敦。

离开安法之前，戴高乐草拟了一个简短的公告。这个公告他给吉诺看过。当然没有让盟国知道内容，最后的定稿是这样的：

“我们会见了，我们会谈了。我们注意到了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这个目标就是彻底打败敌人，从而赢得法国的解放和人类自由的胜利。与所有盟国并肩作战的全体法国人在战争中团结一致，将会达到这个目标。”

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赢得了“未宣告的胜利”，同时他也不得不为自己毫不妥协的立场而在盟国所设置的种种障碍和困难方面付出代价。不仅英美政府首脑对他不满，而且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法国记者和电台评论员也都津津乐道地在他的“可悲的傲劲”和“野心未能实现”方面大做文章。当停泊在纽约港的法国军舰和商船上的海员纷纷弃船而去，要求在戴高乐的旗帜下服役时，美国当局便逮捕了一些人，并以戴高乐证招志愿军破坏战事为由，用最强烈的同句向在华盛顿和伦敦的自由法国机构提出抗议。

然而，戴高乐密切注意的是政治战略。阿尔及尔是权力和活动中心，他决定到那里去，只要能按他自己的主张行事。在战术上，他把卡特鲁将军作为他的工具，由卡特鲁领导在阿尔及尔的联络委员会。2月18日，卡特鲁致电戴高乐，汇报了阿尔及尔的形势。他说，吉诺似乎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而不象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坚定。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在监狱中关满了反维希的法国人。结果当地许多法国人对吉诺失望了，他们都投奔卡特鲁，表示愿意为战斗法国效劳。

照戴高乐派看来，关键的一点是对吉诺施加压力，使他割断与维希政府的联系。卡特鲁明确表示，如果要取得谅解，必须清除维希分子。2月23日，根据卡特鲁的指示，全国委员会草拟了

面对英美的软硬兼施，戴高乐仍然坚持维护独立主权的原则。这时，吉诺致函戴高乐，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海外领地委员会”，他和戴高乐将是其成员，但并无政治权力。吉诺本人不会使他的军事指挥权隶属于这个机构，他准备使它隶属于盟军最高统帅部。

吉诺的新建议使法兰两全国委员会大为震惊。在4月15日的会议上，委员会一致支持戴高乐，要求组成一个拥有实权的执行委员会，撤换通敌的维希人员，并要求使法军总司令（即吉诺）置于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同时，现在存在的全国委员会主席戴高乐应有权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去阿尔及尔。

吉诺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他提出的新建议反而弄巧成拙，使他非常不得人心，吉诺的抵抗已开始崩溃，战斗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已在阿尔及尔出现，从此戴高乐的威信进一步提高。4月14日，当战斗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开进突尼斯的斯法克斯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此时，戴高乐派往国内的抗战运动的代表让·穆兰电告戴高乐，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业已组成，从而联合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信念的组织，并一致要求在阿尔及尔迅速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中央临时政府。”

5月17日，吉诺终于被形势所迫邀请戴高乐立即前往阿尔及尔，以便与他共同组成一个法国中央权力机构。至此，戴高乐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尽管前面还有一段斗争的历程。

离开英国以前，戴高乐写信给英王乔治六世，深深感谢他本人、他的政府、他的人民，感激他们在1940年最艰难的日子里对自由法国及其领袖的欢

迎和接待，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对自由法国的支持。戴高乐正打算去拜访丘吉尔先生，突然获悉他刚刚离开伦敦，于是，他拜访了艾登。

“您知道吗？”艾登和蔼地问道，“您给我们带来的困难比我们欧洲的一切盟国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还要大得多？”

面对英美的软硬兼施，戴高乐仍然坚持维护独立主权的原则。这时，吉诺致函戴高乐，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海外领地委员会”，他和戴高乐将是其成员，但并无政治权力。吉诺本人不会使他的军事指挥权隶属于这个机构，他准备使它隶属于盟军最高统帅部。

吉诺的新建议使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大为震惊。在4月15日的会议上，委员会一致支持戴高乐，要求组成一个拥有实权的执行委员会，撤换通敌的维希人员，并要求使法军总司令（即吉诺）置于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同时，现在存在的全国委员会主席戴高乐应有权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去阿尔及尔。

吉诺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他提出的新建议反而弄巧成拙，使他非常不得人心，吉诺的抵抗已开始崩溃，战斗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已在阿尔及尔出现，从此戴高乐的威信进一步提高。4月14日，当战斗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开进突尼斯的斯法克斯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此时，戴高乐派往国内的抗战运动的代表让·穆兰电告戴高乐，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业已组成，从而联合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信念的组织，并一致要求在阿尔及尔迅速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中央临时政府。”

5月17日，吉诺终于被形势所迫邀请戴高乐立即前往阿尔及尔，以便与他共同组成一个法国中央权力机构。至此，戴高乐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尽管前面还有一段斗争的历程。

离开英国以前，戴高乐写信给英王乔治六世，深深感谢他本人、他的政府、他的人民，感激他们在1940年最艰难的日子里对自由法国及其领袖的欢迎和接待，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对自由法国的支持。戴高乐正打算去拜访丘吉尔先生，突然获悉他刚刚离开伦敦，于是，他拜访了艾登。

“您知道吗？”艾登和蔼地问道，“您给我们带来的困难比我们欧洲的一切盟国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还要大得多？”

“我毫不怀疑这句话，”戴高乐笑着回答说，“因为法兰西是一个大国。”艾登伴随着戴高乐一直走到大街上，目送着这个高大身躯的领袖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

第七章 劈荆斩棘

阿尔及尔，戴高乐与吉诺平分秋色
重振武装配合盟军反攻
阿尔及尔的新主人
三巨头筹谋诺曼底登陆，戴高乐无足轻重
戴高乐：拜托了，艾克！

1943年5月30日中午，一架战斗法国飞机在阿尔及尔布法利克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后，徐徐降落在机场的跑道上。

舱门打开，身材高大，一身戎装的战斗法国领袖戴高乐将军健步走下舷梯。

吉诺将军快步迎上前去，紧跟其后的是卡特鲁将军以及美国、英国使团的代表。

这时，乐队奏起了高昂的“马赛曲”，国民志愿军的仪仗队威严地站立在一侧，向战斗法国将军行注目礼。停在不远处的迎宾轿车都是清一色的法国产品。这番情景和安法相比，戴高乐感到十分欣慰。这说明战斗法国已经在北非取得了胜利。

公众不知道戴高乐来到这里。阿尔及尔、伦敦和纽约的新闻检查机关都封锁此消息。飞机有意不在白宫机场降落而特在偏远的布法里克机场降落。从机场出发，车队一路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戴高乐一行没有进城就直奔“避暑大厦”。

当天中午，吉诺将军为戴高乐举行盛大的午宴。戴高乐和吉诺相对而坐，他的右边是乔治将军，左边是让·莫内。吉诺将军的两边分别是卡特鲁和马西格里，陪同人员共计40余人。

下午4点钟，戴高乐一行来到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敬献“洛林十字架”。这时，成千上万的群众神秘般地出现在广场，随即响起浪涛般的欢呼声。虽然对于这次活动，任何报纸都没有刊登消息，但是那些时刻保持警觉的“戴高乐派”还是被惊动了，他们自发地聚集在这里，“戴高乐万岁！戴高乐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戴高乐被眼前的情景感动了，他在挥手致意的时候，眼睛里似乎有冰凌花在颤动，他带头唱起了《马赛曲》，顿时，在场的群众也满怀激情地唱起来，雄壮的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随后，戴高乐及其随员在热情洋溢的欢呼声中前往格里森别墅。紧接着，各方的信件便被送到了这里。第一封信是前空军总参谋长维勒曼将军寄来的，他从1940年惨败以后，就满怀悲痛和希望隐居家园。这位将军以最高尚的辞句，要求戴高乐在战斗法国的空军里给他相应的军级，派他担任指挥一个中队的职务。从群众的欢呼声中，从维勒曼将军的信中，戴高乐看清了事情的实质。在这儿，跟别处一样，民族感情做了抉择。因此，他对即将面临的斗争更是充满了信心。

尽管戴高乐有许多支持者，但是，他马上感到阿尔及尔对于他仍然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吉诺将军是当权的最高统治者，英国人美国人承认他，当地几乎所有的法国官员也都承认他。

激烈的斗争从第二天早晨便开始了。在国立弗罗芒坦中学，戴高乐与吉

诺就将要成立的政府组阁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戴高乐说：“为了我们能够形成统一的组织并同心协力地工作，我们必须有一些主要问题上求得一致。在我国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时，这个政权应负起全国的一切责任。军队的领袖即使由部长或主席来担任，也必须由政府任命，并且必须服从政府。如果为了作战，必须将某军的将领在战略上归附外国将军指挥，这也应由法国最高当局的命令来决定。从我这一方面说，如果不首先规定这个新机构在全部范围内，特别是在它本身范围内的一切权力和职能，我不赞成把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由别的机构来代替。其次，为了更清楚地表示法国还在作战，完全不承认维希，我们必须解除诺盖将军、布瓦松和佩卢东总督的职务。”

吉诺一听便恼怒了。他不同意军队的领导权属于政府。关于“地方总督”问题，吉诺很激动地声称，决不愿意牺牲他们。

第一次会晤就出现了这样的僵局，会议在戴高乐砰地一声摔门而去而结束。

6月1日，戴高乐出于他在选择时机和自我宣传方面所惯有的敏感，在格里森别墅召见了法国和盟国的记者，提供了几条他们所渴望的重要新闻。戴高乐说，他到北非来，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国权力机构，以领导民族力量进行作战。这个机构的建立是为了维护法国的主权，但要将某些代表维希方面的人士排除在外。

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当天晚上便通过新闻媒介传来了。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忧心忡忡。他一度是维希政府的一个部长，后来支持吉诺将军。现在，戴高乐坚持要把他和其他维希政府高级官员一同解职，使他坐立不安。为了争取主动，当天晚上他便给戴高乐和吉诺各写了一封信。他给戴高乐的信中写道，他愿意放弃他总督的职位，以促成为取得胜利和恢复法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体法国的联合，并希望戴高乐转告军事当局，给他在军队中服务的机会。

戴高乐收到此信后，立即接受了佩卢东的辞呈，并在复信中写道，请相信“在祖国遭受危险的考验的时候，法国人一定都会和我一样重视你这种大公无私的行为的价值。”随后，戴高乐把佩卢东总督的来信和他回信的副本送交给吉诺将军，同时也把这一切情况告诉新闻记者。第二天，这个消息便在世界各地报纸上刊登出来。

佩卢东的辞职立刻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影响。众人看来，他公开引咎辞职，表示了对戴高乐的顺从，从而否定了吉诺的阿尔及尔体系，使这个体系的人员及其盟国顾问内部的混乱达到了极点。

吉诺获悉戴高乐的行动后，立即在凌晨3时左右写了两封信：一封是怒气冲冲的正式信件，对戴高乐处理佩卢东辞呈的作法表示惊讶；一封是毫不客气的非正式信件，指责戴高乐有纳粹倾向。这时，风云更加险恶，对立两派的斗争大有剑拔弩张的气氛。

在这危急时刻，当天深夜，戴高乐派人告诉吉诺将军说：“这种在外国人面前制造暴乱的气氛，以我看来，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我们或者决裂，或者达成协议，明天必须采取新的步骤。”

6月3日10点钟，七人委员会开会审理了佩卢东的辞呈，一致同意卡特鲁取代他的总督职位。至于其他人，诺盖将军将被解除在摩洛哥的职位；布瓦松一俟找到别人继任他的工作，就从达喀尔撤回；贝尔热雷将军将退休。

“佩卢东事件”平息了，固执的吉诺将军再一次作出让步。戴高乐赢得了他在阿尔及尔的权力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障碍一经扫除，建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协议便迅速达成了。戴高乐和吉诺共同担任主席。委员中戴高乐方面有卡特鲁。马西格利和菲利普；吉诺方面有乔治和莫内。委员会宣布它为法国的中央政权，负责领导法国的抗战和其他一切事宜，并行使法国主权。

戴高乐如愿以偿，他热情地拥抱了吉诺，用的是法国式的拥抱。尽管戴高乐认为委员会的双重领导是荒谬的，但他有信心可以使委员会从属于他的意志。戴高乐激动地写道：“我是被一层浓雾包围了的领航人，但我相信，如果我掌住舵，总会见到晴天的。”

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正如戴高乐预料的那样，他前进的航线上出现的又是一块块坚硬的暗礁。

阻隔戴高乐前进的第一块礁石来自盟国方面。在北非建立法国的中央政权，享有一个政府的权力，行使法国的最高主权，取消“总督”制度，这和罗斯福及其部长们所宣称的主张是极其矛盾的。因此，当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6月3日中午正式宣告它的诞生的声明时，却被美国新闻检查局扣住不发。

对此，戴高乐并不感到奇怪。他设法通过广播讲话公布了这条消息，因为广播设施已在很大程度上为组织得很好的戴派所控制。通过广播，戴高乐肯定地向法国本土的人民说：他们的政府在迁回巴黎以前，在阿尔及尔执行职权。

此外，盟国不仅仅对新闻报道不高兴，而且当戴高乐给伦敦发去电报，催促将要参加委员会的几个人速来阿尔及尔时，英国人却以各种理由为借口，推迟他们的飞机启程时间达十日之久，以表示对戴高乐专横的不满。

丘吉尔终于出面了。早在5月30日戴高乐在布法里克机场着陆时，就听说丘吉尔也秘密来到这里，随后艾登先生也赶来了。此后他们住在遥远的别墅，暗中却叫乔治将军汇报解放委员会所讨论的情况。6月6日，也就是法兰西解放委员会宣告成立的第三天，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吉诺等人来到他的别墅，参加所谓的“乡村”宴会。

戴高乐直言不讳问道：“首相阁下，近几天您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使我感到诧异，我想您可以是专为我们而来的吧？”

丘吉尔晃动着他那肥大的脑袋，连连摇头说：“将军阁下，您不要有什么顾忌，我是丝毫不打算干涉你们的内政。”转而，他的眼珠一转，又突然补充道：“在军事倥偬的情况下，英王陛下政府应该了解北非这个主要交通要冲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如果在这儿突然发生了一种非常震动的事件，比方说，你把吉诺一下子吞并了，我们也好采取一些措施。”

戴高于当即否认他有这样的意图，他说：“我是希望促使吉诺将军自觉地站到公众利益方面来。”在戴高乐眼里，吉诺即使作为一个军人也有他的局限性，但可以欢迎他担任在目前情况下所能提供给一名法国军人的最高职务。然而，决不能让吉诺保留他的主席和国家文件签署人之一的职位所给予他的对政治决定的否决权。戴高于心里也非常清楚，吉诺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变得孤立和众叛亲离，撤职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坐在丘吉尔另一边的吉诺将军始终以敌视的目光注视着戴高乐，眼前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甚至毫不畏惧盟国强大的势力，

真是狂妄到了极点，吉诺将军心里责骂着。同时他也作好了与戴高乐最后一搏的准备。

在往后的局势发展中，究竟谁主沉浮？人们还需拭目以待。

1943年6月5日，法兰西全国解放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是研究确定各位委员的分工问题。乔治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卡特鲁仍保留原职。马西格利和菲利普分别担任外交委员和内务委员。德姆维尔主管财政，普利文负责殖民事务，莫内负责军备和供应给养等。至于新的殖民地总督人选，两星期内来自喀麦隆的比埃尔·库尔纳里将取代维希分子布瓦松，得到戴高乐赞同的马斯特将军被确定为突尼斯总督。

然而，当重要的决议需要通过时，政府中依然出现了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6月8日，当委员会再次开会研究有关军队统帅的重大问题时，便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有三个建议摆在委员们的面前：一个是由乔治提出的，建议把法国的一切军事力量统一归

吉诺管辖，由他担任国防部长兼总司令，同时还保留主席的职位。但在军事范围内的事务不属于法国政府；第二个是卡特鲁提出的，主张由戴高乐担任国防部长，吉诺为军队的总司令；第三个是戴高乐提出的，他认为总司令应被派去担任与盟军司令们联络的任务，并应尽快亲临前线指挥，因此应解除总司令的政府职务。

经过激烈的争执，七人委员会最终否决了乔治将军关于给予吉诺充分军权的建议，根据这项建议，吉诺仍将是主席之一，但在军事问题上受委员会的约束。如果按照戴高乐提出的建议去做的话，吉诺应尽快亲临前线指挥，因此应解除他的政府职务。同时军事事务应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吉诺和戴高乐应在其中任职，但该委员会最终应对政府负责。但是，吉诺在乔治将军的支持下，对卡特鲁和戴高乐的建议断然拒绝考虑。大多数委员也不能做到使吉诺服从或辞职，他们对这一棘手问题显得无能为力。会议陷入僵局。

在戴高乐看来，原本可以在几分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却使人们陷入喋喋不休的争论之中。6月10日，戴高乐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声明：“在委员会目前工作的情况下，我不愿长此以往地参加委员会工作”。随后，他在格里森别墅闭门不出，内心非常沉痛，他对来看望他的部长、官员、将军们透露，他将到布拉柴维尔去。

戴高乐的这一举动，引来的的是一个难以言喻的混乱局面。吉诺发现，在戴高乐缺席的情况下，他简直无法利用委员会。这时，被阻于伦敦的新委员相继来到了阿尔及尔，戴高乐认为时机成熟，他应该出山尽快结束这混乱的局面。

这时，美国人又粉墨登场了。6月19日，艾森豪威尔在罗斯福的授意下，邀请吉诺和戴高乐商谈“有关法国武装力量的指挥和组织问题”。这次会谈只有三个发言人，墨菲和麦克米伦等其它官员都处于旁观和议论的地位。

175

戴高乐从来就是一个不会错过机会登台表演的人。开会那天，他故意姗姗来迟，不紧不慢地走进为他敞开的双扇大门，在安乐椅上就座，再加上他那把椅子，要比其余在座的人整整高出两个头。

艾森豪威尔宣布会议开始，戴高乐抢先发言，他以为最关键的就是不要失掉主动权。他对艾森豪威尔说：

“我是以法国政府主席的资格来这里开会的。因为在作战中，按惯例国

家元首或政府主席应该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如果在有关你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上向我有所要求，请放心，我一定使你满意，可是我们先说明，这必须与我所负责的国家利益相一致。”

戴高乐不卑不亢的一席话，一下子把初次与他打交道的艾森豪威尔吸引住了。的确是刚直不阿，能言善辩，艾森豪威尔从内心深处不由得对这位法国抗战领袖产生了敬佩之情。但他仍然要秉承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他对戴高乐说：

“你们知道，我准备不久就向意大利进行一次重要的战役，它直接关系到欧洲和法国的解放。为了进行这场战斗，我需要你给我保证后方的安全。法国在北非现有的军事统帅和组织必须不作任何变更。特别是吉诺将军，必须保持现有的权力和职位，并仍由他保留处理军队、交通、港口和飞机场的全权。应该由他一个人来同我商讨北非的一切军事问题。虽然我不管你们内部组织的问题，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以美英两国政府的名义向你声明，如果我刚才提出的条件未经履行，美英方面将停止对法国军队供应军火。”

“好你个美国人，又来恫吓我了，”戴高乐心里骂着，嘴上毫不示弱地说：“我知道你的措施。你向我要求的保证，我无权给你。因为，法国统帅组织，是法国政府权限以内的事情，决不属于你们！但是，我听了你的发言，我想向你提几个问题。”

“一切作战的国家，比如美国，都是把作战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将军，而有关建军的事项则由部长负责，难道你硬要法国不这样做么？”戴高乐的一双眼睛紧盯着艾森豪威尔，有点咄咄逼人的样艾森豪威尔只是重复说，他的请求是指维持吉诺的整个权力而言。

戴高乐紧跟着问道：“你刚才提到，你对美英政府承担着自己的义务。难道你不知道我对法国也负有自己的责任吗？因此，我不能允许任何外国来干涉法国执行自己的权力。”艾森豪威尔对此只有沉默。

戴高乐又说：“你是个军人，你认为一个领袖依靠某个外国的恩赐，就能维持他的权威吗？”戴高乐信心百倍，振振有辞，还不时地扫视一下其他人员的表情。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有顷艾森豪威尔回答道：“我的将军，我十分理解，你对祖国命运深切关怀，考虑得很远，请你了解，我现在在军事方面有燃眉之急。”

“我也有，”戴高乐说，“因为我的政府应该迅速地把法国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包括战斗法国的兵力、北非的兵力和现在法国本土所组成的兵力，而现在的制度却使它们分散。政府还必须用你们供给的武器来装备这些分散的军队，你们的供给是为了我们同盟的利益，也是为了取得我的政府给予你的各种合作。在这一点上，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戴高乐对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你还记得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供给许多盟国武器方面，法国也起着像今天美国这样的作用。我们法国人，当时完全装备了比利时和塞尔维亚，供应俄国和罗马尼亚许多军人，最后，我们又以大量物资供应了你们的军队。是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你们美国人放的大炮是我们的大炮，坐的战车是我们的战车，乘的飞机是我们的飞机。反过来，我们对比利时、塞尔维亚、俄国和罗马尼亚，甚至对美国难道也曾要求任命某某统帅和建立一定的政治制度吗？”

戴高乐的话音一落，全场又是鸦雀无声。其间，每个人的内心活动都是很复杂的。

一直没有开口的吉诺将军终于按捺不住了，他率先打破沉默的气氛，他说：“我也有我的责任，特别是对于军队。这支军队的力量很小。它只能在盟国范围内维持下去。关于它的统帅和组织，正像它参加战役一样，完全应包括在盟国的范围内。”吉诺自恃有美英的支持，仍然顽固不化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戴高乐最看不起吉诺那一副奴颜卑膝的嘴脸。听到这儿，他“霍”地一下站起来，推开椅子，离开会场。直弄得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天，在自己的住所，戴高乐要求盟军总部，将它的各项要求写成书面文件，正式提交法国解放委员会。这个书面文件总的说来就是坚持由吉诺担任法军总司令，而就应受“压倒一切的政治控制”。末尾，对法国主权再次作出保证。

然而，戴高乐并不为此所动，因为这些保证与上述的实际要求相矛盾。戴高乐要盟国提出书面要求，正是为了让委员会便于否认他们。

6月21日，由14人组成的法国解放委员会否决了盟国提出的书面要求，委员们要求吉诺决定要么承认法国政府的权威，要么离开政府，不担任总司令职务。当吉诺反对与一个14人的解放委员会讨论秘密军事问题时，戴高乐乘机力促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这个军事委员会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包括总司令、参谋长和政府的代表，以便对法兰西的军队组织、招募和联合，以及把他们调配到各个战场和地区的问题作出决定。在执行问题上，分设两个最高军事司令部：吉诺仍负责北非司令部，戴高乐负责法兰西帝国其余地区和法国抗战运动。吉诺被迫接受了这一决定。

经过一番较量，戴高乐终于击败了他的一个竞争者。其实，论实力，吉诺根本就不是戴高乐的对手，只因他的背后有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扶持，才使他在台上维持了八周之久。

至此，戴高乐挫败了美英的阴谋，站稳脚跟，控制了局面，成了名符其实的法目领袖和最高军事统帅，然而，他同美国的严重较量还在后头，届时，鹿死谁手还需拭目以待……

1943年6月26日，戴高乐来到突尼斯。就在同年中旬，盟军取得了突尼斯战役的全面胜利，法国抗战部队也参加了这一战役。经过18天的战斗，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25万德意军队由于没有运输船只可供撤退，便于5月13日宣告投降。至此，盟军在北非已全部肃清德意军队，墨索里尼所要建立的“非洲大帝国”的梦想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戴高乐感到欣慰的是，通过这次战役，他所领导的抗战武装力量有了新的发展，并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戴高乐本人的威信也较前大大提高了。

6月27日星期天，在举行阅兵典礼和在主教堂做过礼拜之后，戴高乐在群众的欢腾中来到冈比大的广场上。在这里向夹杂着许多突尼斯人的无数法国侨民发表讲话：

“我们对法兰西、对自己的母亲法兰西只有一件事，除了为它服务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把它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应该打击敌人，应该惩办叛徒，应该为它保留自己的朋友，应该摘掉它嘴上的箍套，斩断它身上的锁链，使人们能够听到它的声音，并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奔向光明的前程。我们对它没有任何要求，除了在解放的那一天，我们要求它张

开那双仁慈的臂膀抱着我们欢乐地痛哭一场，而将来我们有一天与世长辞的时候，它把我们轻轻地埋葬在可爱的祖国的神圣的土地上。”

戴高乐怀着的一颗对祖国母亲真挚的爱，所抒发的一番肺腑之言，深深地感染了在场聆听他讲话的每一位群众，回报他的是排山倒海般的掌声。

这时，戴高乐已打定主意，把他的法国战斗部队继续投入下一场即将开始的意大利之战，并为进一步解放自己的祖国——法兰西积蓄力量，做出重要的贡献。

突尼斯战役的枪声刚刚平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又火光四起。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盟军一旦突尼斯的军事行动结束，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应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作战行动代号为“哈斯基”。

7月9日清晨，英美军舰分别从东西两方在马耳他岛的南面汇合，组成了一支特大混合舰队，全速朝西西里岛冲去。仅仅为了输送闪击该岛第一梯队，就从整个参加这次行动的3200艘船只中，拨出了2000艘专用船只。由4000架歼击机和轰炸机组成了一支打击力量，作为空中支援。对西西里岛集中了如此庞大的兵力，足以使它们拥有绝对把握，彻底摧毁阻挡他们前进的一切障碍，把敌人砸成粉末！因为敌方驻守西西里岛的兵力远远不能与此匹敌。

在盟军强大的战斗机掩护下，美军第七集团军的部队，在利产塔、杰拉、斯科格里蒂登陆，第二天上午遇到德军的反击。驻守在卡尔塔吉诺内地区的德军“戈林师”，对美军第一步兵师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次日，德军第十五装甲师一部队岛屿的西部赶来增援。但由于英军已逼近西西里岛东岸中部的卡塔尼亚城，“戈林师”又被调往该地作战，美军才算顶住了对方的反击，并将三个滩头阵地联成一片。英法联军在锡拉库本登陆后，进展较顺利，在最初的三天内，便占领了岛屿的东南部分，并于7月16日向卡塔尼亚和杰尔比尼的飞机场挺进。

英美法联军的登陆区绵延二百余公里。与登陆部队承受的全部过失和损失相比，整个登陆行动还是成功的。敌军几乎没有抵抗就放弃了阵地，他们朝岛的纵深地带潜逃，而盟军则开始向岛内纵深地带追击。

最后，经过38天的紧张战斗，盟军共歼德意军队167000人，其中德军37000人，缴获敌机1000多架，取得了意大利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大胜利。

就在戴高乐的部分战斗部队配合盟军取得攻占西西里岛战役的胜利时，7月14日，在法兰西帝国和战斗法国的首都阿尔及尔，举行了国家复兴和恢复全国统一的示威游行。

传统的阅兵典礼呈现了复兴的气象。当戴高乐向走过的队伍回礼时，仿佛看到人群中间有一股渴望投入战斗的炽烈火焰迎面扑来。戴高乐感到在军队和人民的上空飘荡着坚定的信心。就是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毁灭了昨日的灾难，带来了充满希望的今天。随后，戴高乐激动地站到话筒前，对广场上聚集的一望无际的群众发表讲话：

“经受了三年无法形容的痛苦，法国人民又站起来了。它又高举着祖国的旗帜，团结一致、热血沸腾地站起来了。这一次它是以团结一致的姿态出现的。今天在帝国首都，以一种光荣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明天在我们的所有城市和乡村一旦从敌人及其帮凶的手中解放出来时，也会出现同样的团结。”

这时，广场上响起惊雷般的掌声。戴高乐作了一个向下的手势后，接着

说道：

“世界上有些人曾认为可以把我国军队的行动看成与我国人民大众的感情和意志毫无联系的事情。他们可以认为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陆军、海军、空军完全不同，他们不考虑上战场是为了什么而去冒生命的危险。总之，这些理论家、冒牌的现实论者替法国人，也只是替法国人想出一种理论，国家作战的力量可以在国家政治和民族精神之外独立存在。我们可以向这些现实论者指出，他们不懂事实。一切法国公民，无论在什么地方，从4年来或8个月来对敌作战，都是响应法国的召唤，为了达到法国的目的和为了符合法国的要求而作战的。凡是建立在其他基础上的一切制度，只能导致冒险或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但是，法国现在是以它的生命、它的伟大和它的独立来作赌注的，在这个紧要关头，既不允许软弱无力，也不允许冒任何危险。”

戴高乐的这番话是针对当时盟军的战略行动而言的。盟军在攻占西西里岛取得意大利战役第一阶段胜利后，对下一步的战略行动仍然悬而未决。丘吉尔极力主张乘胜前进，攻占罗马，在意大利尽可能向北挺进，并进而向巴尔干进军；而美方则认为应及早横渡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戴高乐本人也不赞成丘吉尔的主张，从军事观点来看，从地中海向中欧进军，戴高乐认为这大冒险了。他认为应该从法国领土上来考虑。在法国，换句话说，在有利于速战的土地上，既接近海空军基地，又有抵抗运动在敌后活动，给予盟军以有力的帮助。然而，对于戴高乐的意见，盟国置之不理，他们只要求法国军队参战，而不参加计划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讨论。对于这种企图利用法国军事力量而又想排除法国的荒诞阴谋，戴高乐非常愤慨，他在演讲中便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们的阴谋。

戴高乐激动地指出：“法国不是解放之神将要轻轻唤醒的睡意惺松的公主。法国是一个备受折磨的女囚，她在牢狱中受尽鞭笞，深深体验到自己的灾难的原因和虐待她的那些暴君的无耻。法国早就选定了一条复兴的道路！”接着，戴高乐又指出了抵抗运动一旦胜利后在国内外必须达到的目标。

在结束讲话时，戴高乐挥手高声喊着，“法国人，啊！法国人！祖国在痛苦和光荣中，生龙活虎般地经历了1500年。目前的考验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我们历史上的最悲惨的一幕却快要结束了。昂起头来！大家象兄弟般地紧密团结在一起，通过斗争，通过胜利，奔向新的前途。”

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了，这种群情激奋的盛况使戴高乐对法国未来的前途更加坚定了信心，这就是在配合盟军反攻，解放法国的同时，必须保注法国的独立和主权，任何企图把法国变成附庸国的阴谋都将彻底破产。

在讲演台上，墨菲先生显得有些感动地向戴高乐走来表示祝贺说：“这样多的人啊！”戴高乐平稳地说：“这只是你在阿尔及尔所看到的10%的戴高乐分子。”

离开突尼斯，1943年8月8日，戴高乐又来到了卡萨布兰卡。

一进入这个城市，戴高乐便感受到这里的气氛与6个月以前他秘密来到这个城市的景象大不相同。当时的卡萨布兰卡到处充斥着美国兵和美国岗哨，如今城墙上飘扬着国旗与彩色缤纷的旗帜。更使戴高乐值得欣慰的是，今天他是作为法国权力的象征和中心重新出现在这个城市。

举行雄伟的阅兵典礼之后，戴高乐向掩盖了利奥广场上的人潮发表了演说，他带着从容自若的语调讲道：“由于法国和帝国的统一，法国必将取得

胜利。”下午，戴高乐视察了梅克内斯。8月9日，戴高乐来到非斯。他走遍了整个阿拉伯人的城市，在喇叭声中，在旗帜林立中，在这个几千年来一向沉寂的都市里。掀起了空前未有的示威游行。

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归附法国。这时，盟国的态度也有所转变，8月26日，民族解放委员会得到美、英、苏联的正式承认。的确，三大国所用的辞句有很大的区别。华盛顿方面作了最大的保留：“委员会被承认，对承认它的权威的海外领地，拥有管理权。”伦敦也采取同样的辞句，但是它补充说：“在英国看来，委员会是个有权指导法国作战力量的机构。”莫斯科显得作常宽宏大量。苏俄认为委员会代表“法兰西共和国的民族利益。”它是“在与希特勒主义进行斗争中的一切法国爱国者的唯一的领导机构和代表。”

9月3日，趁战争四周年纪念日，戴高乐在广播中宣布了这些情况，他指出：“有26个国家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我们争取胜利和和平的团结一致提供了鲜明的证据。”

然而，在正在进行的意大利战役期间，美英在刚刚正式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后没有几天，却肆无忌惮地对它采取排斥措施。

随着7月25日墨索里尼的垮台，美、英、法三国军队以势如破竹之势横扫意大利，意大利即将投降。8月29日，麦克米伦和墨菲交给马西格利一份备忘录，要求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承认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法国正如同代表所有盟国一样，有权和巴多格里奥元帅签订一项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包括盟国的利益，其中特别包括法国的利益，”并指出：“联合工国和合众国政府将尽可能使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派遣一位代表参加签字仪式，如果它愿意的话。”

9月1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用照会提出答复，同意艾森豪威尔代表法国正如代表所有盟国一样，签订停战协定，同时要求马上把草案全文通知给他们，同时还声明，无论在哪里签字，民族解放委员会随时准备派遣一位法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参加签字仪式。

因此，对于华盛顿和伦敦来说，这就是表明它们愿不愿意承认法国在结束敌对行为的一系列规定中是它们的平等的使用者的机会。然而，9月8日，麦克米伦和墨菲来向马西格利说，意大利的投降已成事实，半点钟以后，艾森豪威尔公布“他同意意大利政府停战的要求，停战条件是由英、美、苏三国政府批准的。”并把这一声明的全文交给了马西格利。

马西格利当即指出上项声明没有提到法国，这就违反了英美在8月29日书面向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的保证。麦克米伦回答说，艾森豪威尔的声明主要是一种手段，仓促采用是为了触动意大利的军队和人民，因为在半岛上，盟军正在进行一次新的艰苦的战役。马西格利回答说：“是否手段，我不知道，但你们说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何时签订的？究竟有哪些条件？”麦克米伦和墨菲只是说，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主席吉诺将军曾得到大本营的通知，他并没有给我们提出任何意见。当天夜晚，马西格利又会见麦克米伦，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时英国国务大臣才承认伦敦和华盛顿政府从8月20日起就与意大利政府开始谈判。但仍然说，这一切事情都通知了吉诺。

9月9日，戴高乐召集民族解放委员会会议。外交委员马西格利的报告自然引起了大家对英美当局的作法的激愤和不满，毫无疑问，大家对他们的企图也表示愤慨。同时质问吉诺将军为什么没有把盟国通知他的重要消息向

政府，特别是向他的主席报告？如果我们早知道这些情况，我们就更能保障法国应得的利益。吉诺证实他没有得到有关停战的任何消息。于是，马西格利在晚上把吉诺的否认通知麦克米伦和墨菲，但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只是支吾其词地推脱说，艾森豪威尔总部没有人懂法文和吉诺参谋部没有人会英文，可能是造成误会的原因。第二天，麦克米伦又跑来道歉说：“经过调查，我们才证明只是今天早晨艾森豪威尔将军才把停战条件通知吉诺将军。”

一点疑问也没有！在整个意大利战役期间，盟国只要求法国军队参战，而不参加计划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讨论，一致打算尽力把法国从有关意大利的决定中推开。

戴高乐清楚地估计到了，将来盟国在决定欧洲命运时，还会排挤法国。但是，他们必须知道，法国决不允许把它推出去。

9月12日，在访问奥兰时，戴高乐在演讲中严正指出：“祖国将加倍努力来加速敌人的失败，使法国根据自己的地位参与作战的安排和世界的重建。”“法国为了一切人的利益，在目前开始进行解决战争问题的过程中应有自己的地位。”

不管怎样，从麦克米伦和墨菲的行动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盟国往往利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双头领导的畸形现象来掩盖他们的阴谋。这使戴高乐下决心加紧摆脱政府双头领导的局面。

10月中旬，解放委员会根据戴高乐的请求颁布了一项法令。按照这项法令，政府只有一个主席。委员会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式任命戴高乐为该委员会的唯一主席，吉诺退出委员会，出任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被派往意大利半岛执行法国远征军总司令职务。11月6日，当取得吉诺的同意并在场的情况下，委员会“要求戴高乐将军对委员会进行他认为必要的改组。”

11月9日，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同时宣告新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成立。

1943年5月30日，戴高乐在到达阿尔及尔这个普遍充满敌意的地方时，他实际上是单人独马。然而，仅仅5个月的时间，他却成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唯一的主席，成了阿尔及尔和法国人的主人，这或许是他最惊人的一次胜利。

冬天近了。一切都显示着这是战争结束前最后一个冬天。

1943年，随着战局的进展，盟国的胜利已成为必然，罗斯福希望召开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斯大林拒绝参加。因为苏联对太平洋战争持中立态度，他不愿意与有蒋介石参加的讨论对日作战的国际会议。对此，罗斯福与丘吉尔决定把一个会议分比两个来举行，即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尔后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

开罗会议整个会议讨论的是远东战略问题。最主要的成果是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它公开宣布：三大盟国进行几次战争是为了制止并惩罚日本的侵略。其目的在于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在太平洋地区夺取或占领之一切岛屿，日本从中国人手中窃取的领土，诸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一结束，11月28日，罗斯福就带着一个70多人的班子飞往德黑兰。丘吉尔按照自己的路线从开罗前往德黑兰，下榻于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斯大林则早已等候在苏联大使馆内。

东方古城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它坐落在不很高的厄尔布尔上山南麓几

乎不长林木的高地上。在城郊厄尔布尔士山的山坡上，坐落着一幢幢昔日国王的豪华宫殿、外国大使馆和公使馆的避暑建筑以及当地贵族的别墅。

在这里，在德黑兰、在苏联使馆大楼内，反法西斯联盟三大国领导人，即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和大不列颠首相丘吉尔在这里相聚了，几天之内这里成了“全球的中心”。

11月28日，星期天，下午4时，德黑兰会议第一次全会开幕。在富有帝国风格的大厅内，在覆盖着奶油色呢绒的圆桌旁，三巨头举行了首次会晤，共商反法西斯大计。

正式开会之前，举行一个赠送仪式，身着英国空军最高长官礼服的丘吉尔将从伦敦带来的一柄名为“斯大林格勒”之剑，双手托着赠交斯大林。身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接过宝剑，吻了一下精美的剑柄，然后抽出一截，又迅速插入，转身交给伏罗希洛夫，仪式到此结束。

德黑兰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军事问题，以及斯大林要求迅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当丘吉尔表示无法保证时，斯大林愤然而起，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走吧！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好干了，我们在前线还有好多事干呢！”罗斯福居中调解，经过反复协商，终于确定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并正式商定：1944年5月由美、英驻军在法国北部沿岸塞纳湾的诺曼底地区登陆进行“霸王”作战。与此同时，在法国南部进行牵制性登陆。其后不久，美国陆军上将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霸王”作战的最高司令。同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他规定了简明扼要的任务，“你将进入欧洲大陆，并与其他盟国共同实施指向德国心脏和消灭其武装力量的作战。”

在反法西斯联盟的历史上，盟国与法西斯列强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首次在德黑兰达成一致，有关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最后决议也获得通过。

12月2日，斯大林和丘吉尔陪同罗斯福来到机场，2名身材高大的中士把总统让进“维利斯牌”轿车，4名警卫人员神气活现地拔出自动枪跳上在前面快速开动的一辆卡车的踏板。罗斯福赶忙举起右手，用二只手指构成英文“V”字——意即“胜利”。不一会儿，总统的座机就朝开罗方向飞去。

丘吉尔也于同一天飞抵开罗。

苏联代表团于中午飞离德黑兰，然后从巴库乘坐政府专列抵达莫斯科。

德黑兰会议确定了同盟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这样战后法国的地位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的梦想是要把法国变成其附庸。因此，在1943年9月到1944年6月这一关键时期中，盟国在作出重大决议时，戴高乐以及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被排斥在外。戴高乐颇为辛酸地注意到了，无论经由北作乘船去开罗的丘吉尔，或由开罗飞往德黑兰的罗斯福，都不屑与他接触。甚至没有人征询他对欧洲的前途的意见和欧洲解成的计划，就是在法国登陆的事宜也不让戴高乐与闻。这样的排斥所产生的痛楚深深地刺伤了戴高乐的心。

戴高乐在失去了进入列强圈子的门路后，只好靠与次要人物联系聊以自慰。这样的人物有：南斯拉夫“采特尼克”组织首领米海洛维奇、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博士以及波兰的索森科夫斯基将军。

1944年2月，当盟国的援助转向铁托的游击队，而米海洛维奇逐步失势的时候，戴高乐授予米海洛维奇一枚战斗十字勋章以示支持。法国与波兰之间有着感情上的联系，戴高乐在二十年代曾在波兰服过役，然而，当斯大林企图在华沙设立一个傀儡政府时，戴高乐积极地呼吁盟国起来反对苏联事实

上企图吞并波兰的作法，但是，盟国却对此置之不理，无动于衷，这使戴高乐尤为懊丧。

不过有一件小事是戴高乐能办到的，他确实也办到了。1939年9月，波兰政府存放了大批黄金在法兰西银行。1940年6月，这批黄金又转到了当时的法属苏丹（现为马里）的巴马科。当波兰的流亡总理米科拉伊齐克要求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归还这批黄金时，戴高乐答应了这一要求。苏联代表鲍戈莫洛夫听到了此事的风声后，就给法国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拒绝这个要求。然而，这样做却毫无结果。于是，鲍戈莫洛夫拜会戴高乐，并说：“苏联政府对于把波兰的黄金转交给流亡到伦敦的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因为它不是将来的波兰政府。”

戴高乐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对俄国人表示傲慢态度的机会，他回答说，流亡在伦敦的政府，由于得到了包括苏联在内的盟国的承认，仍然是合法政府。最后，他表示不明白苏联人有什么权利能够干预一件纯属法国和波兰两国的问题。鲍戈莫洛夫先生告退时毫不掩饰他的不快。

在这段时期中，戴高乐与索森科夫斯基将军、安德尔斯将军、波兰共和国总统拉茨基埃维兹以及前外交部长罗梅尔等波兰领导人保持了亲密友善的关系。1944年3月，戴高乐在意大利卡西诺山前曾与率领波军的安德尔斯见过面。

在这些异常艰难的日子里，对戴高乐来说，事关荣誉的问题是，他的军队在解放他的国家的事业中应该发挥作用，盟国的计划应该请他参与意见，他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权威应该得到毫无保留的承认，以及他本人应尽早地在法国领土上出现。

早在1943年9月，解放委员会就向华盛顿和伦敦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确定在法国作战时，法国行政机构与盟军协同配合的条件。备忘录中特别说明，在作战地区，地方当局将满足盟国在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方面的需要。在后方，法国政府将满足艾森豪威尔以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所提出的要求。为了保证取得联络，规定每支大部队都配备一名法国“行政联络”军官随军工作；同时派遣一位拥有必要的职权和随行人员的将军到艾森豪威尔那里去；在政府返回法国本上以前这个时期，有政府的一个成员以代表的资格前往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事实上，1943年9月在德·布瓦斯朗贝的领导下成立的行政联络团进行了征集和训练，以后被派到了伦敦。

1944年3月，戴高乐任命了柯尼希将军和科歇将军分别为北方战场和地中海战场盟军总司令的助手，同时还任命了安德烈·勒特罗克埃为解放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

所有这些措施表达了戴高乐渴望他的军队在解放他的国家的事业中发挥作用的愿望。实际上，盟军参谋部也对这些措施表示满意，但是，要使这些措施收到实际效果，还必须有华盛顿政府和伦敦政府的同意。可是，这两个政府对戴高乐提出的备忘录始终不肯答复。

实际上，罗斯福总统一月复一月地把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件束之高阁了。

这时候，一个新怪物出现了，它使戴高乐经受了更为严重的折磨和屈辱。就在戴高乐急切地等待着盟国对其备忘录予以答复的时候，美国出现了一个“盟国军政府”。

罗斯福直到最后也不承认戴高乐政府，哪怕临时承认也不行。他打算对

法国采取类似意大利南部的那种“盟国军政府”方案，实行军管。所谓“盟国军政府”就是对战败国实行全面军管而设立的政府。在法国设立的“盟国军政府”，它是由技术人员、商人、理论家、宣传家以及一些新近归化美国的法国人迅速建立起来的机构，用以取代戴高乐的政府，以掌握法国的政权。

1944年4月，罗斯福总统颁布命令，指令艾森豪威尔以盟军总司令的身份亲自掌握法国一切权力，总司令可以自己选择与他合作的法国当局。当艾森豪威尔恳求不要让他背上政治包袱时，罗斯福只是在文字上稍微修改了一下他的指示，但没有改变这一指令的实质。

在戴高乐看来，罗斯福的企图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梦境一样不现实。罗斯福早在北非就精心策划过类似他现在梦想在法国推行的政策，当时的条件要比现在对他的图谋有利得多，但他在那次尝试中完全落空了。戴高乐的政府在科西嘉岛，在阿尔及利亚，在摩洛哥，在突尼斯、黑非洲都顺利地行使着主权，达尔朗——克拉克协定早已成为一纸空文。

很显然，罗斯福在非洲政策失败后，还没有放弃他的幻想。但是，从目前法国的形势来看，戴高乐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罗斯福企图在法国本土玩弄同样的花招，那么他将面临这样一个事实：盟国在法国除了戴高乐委任的部长和公职人员以外，他将找不到任何其他的人；除了戴高乐统率的部队以外，他找不到任何其他部队。戴高乐也决不相信艾森豪威尔能同不是他指定的人在那里顺利地进行工作。

况且，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没有接受他的政治领导人的观点。艾森豪威尔在启程就任新职以前，走访了戴高乐，以他待有的大方态度说：

“过去我对你抱着成见，今天，我承认这是错误的。为了将要开始的战争，我不仅需要你的武装部队的支援，还需要你的公务人员的协助和法国人民精神上的支持。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就是力求得您的帮助而来的。”

“你真是好样的！因为你知道该说‘我错了’。”戴高乐兴奋地拥抱了艾森豪威尔。

接着，戴高乐与艾森豪威尔讨论了他的政权与盟军指挥之间在法国建立的合作性质不明确，以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艾森豪威尔毫不掩饰他对这些问题有些担心。他补充说：“但是除了原则以外，还必须看事实。我可以向你担保，关于我的事情，无论人们强迫我采取什么表面上的态度，实际上，在法国除了你的政权以外，我不承认任何其他法国政权。”

于是，戴高乐向艾森豪威尔说明，关于解放巴黎的方式，我们会有机会表现我们的这种协调的。戴高乐说：“应当由法国部队占领首都。为了这个战役，应该象我们法国人要求过的那样，必须有一个法国师及时地运到英国。”艾森豪威尔答应了这一点。

他们谈了很晚，很晚，戴高乐再次为这位盟军总司令的豁达而感动。

就在戴高乐围绕“盟国军政府”问题同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时候，英国人也不断地对其施加压力。丘吉尔先生自告奋勇，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与戴高乐将军的拒绝之间充当了中介人。但是因为美国的势力大和声望高，所以丘吉尔的努力主要是对戴高乐施加压力，叫他去满足罗斯福的要求。

1944年1月上旬，新近接替麦克米伦的英国驻阿尔及尔大使达夫·库柏先生突然来到戴高乐的住所，对戴高乐说：“您已知道，丘吉尔从德黑兰回来以后，就病在突尼斯了。后来又把他转送到马拉喀什。他很想见见您。但他的健康情况不容许他移动地方。您同意到他那里去吗？”

在法国的领土上，照一般惯例，英国首相应当拜见法国政府的主席，但是丘吉尔毕竟是丘吉尔，况且健康状况不佳，于是戴高乐放弃了在阿尔及尔接见他的权利。

1月12日，戴高乐独自前往马拉喀什，并接受了与首相共进午餐的邀请。这是半年来的第一次会谈，他们谈了很长时间。

席间，丘吉尔试着软化戴高乐，他用使别人都听得清楚的声音咕哝着说：“我的法语讲得不错吧，是不是？既然将军的英语说得那么流畅，那么你一定完全听懂我的法语的。”戴高乐报之以一阵大笑。

然后，丘吉尔生动而热情地给戴高乐描述顺从总统观点的好处。总之，他竭力要使戴高乐承认罗斯福在法国事务上的最高权力。他问道：为什么自由法国当局逮捕了佩卢东、布瓦松和佛兰亭？为什么他要把吉诺将军和乔治将军赶出委员会？他提醒戴高乐，佩卢东是罗斯福总统挑选的阿尔及尔总督，罗斯福也曾保证要维持布瓦松的地位。至于吉诺和乔治，前者是罗斯福选中的，后者则是丘吉尔拉过来的。

从丘吉尔的话里，似乎应该确认，对于由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为法国所作的选择，必须在法国照办。而他们对戴高乐将军的主要不满的地方，就是他不接受这一点。

戴高乐用最好的态度回答了丘吉尔，他说：“好好打仗吧！不要操心其他的事情！”

第一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丘吉尔依然没有说服戴高乐。相反，戴高乐感到罗斯福与丘吉尔如此对法国内政的关心，正是法兰西复兴的一个明证。因此，戴高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他说：“我要沿着我的道路——独立的道路前进，我相信，不仅对于我所负责的国家和民族，而且对于我所珍视的联盟，这都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4月14日和17日，达夫·库柏带着丘吉尔的口信再次登门拜访戴高乐，丘吉尔又一次自告奋勇，充当戴高乐与罗斯福之间的调解人。他说，如果戴高乐能够与总统直接会谈，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并说他乐于为戴高乐应邀去华盛顿作好安排。

戴高乐告诉达夫·库柏，他对这样不算邀请的邀请并不感兴趣，这样的邀请以前就有过。如果美国总统希望会见法国政府的主席，他只稍请他去就行了。但是，在罗斯福公开扬言任何法国当局都要对他负责的这个时候，他戴高乐为什么要通过丘吉尔去乞求罗斯福给他一个请帖呢？他这方面无求于总统。民族解放委员会对于形式上的承认已不再感兴趣。重要的是取得法兰西民族的承认，而这一点现在完全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了。过去盟国本来是有能力帮助民族解放委员会获得地位的，但他们没有那样做。现在承认与否已无关大局了。

戴高乐最后警告大使说，如果盟军司令部试图篡夺他的政府的权力，在法国将出现混乱的局面。

就象在战争中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一样，报复说到就到。一件事是英国政府限制戴高乐用密码和法国驻伦敦的办事机构联系；另一件事情是，一位名叫达福的英国人控告戴高乐犯有刑事罪。为此，戴高乐与英国的危机达到了顶点。

达福是英国情报机关的间谍，曾试图打入法国在伦敦的情报部门。由于冒名顶替，戴高乐在英国的指挥官对他进行了军法审判，并将他关押在伦敦

郊外坎伯利的法军拘留营。然而，达福逃出了拘留营，并向英国法庭控告戴高乐和其他法国领导人，说他在坎伯利遭到了虐待。英国政府“无权撤销”这一起诉，并扬言除非原告本人撤诉，法院一经备案，必须开庭审判。如果戴高乐回到英国，很可能会被捕，甚至在被判有罪之后，不得不去坐班房。

面对英国人的这两件报复行为，戴高乐十分愤慨，他奋起还击。关于限制使用密码联络一事，戴高乐以禁止法国在伦敦的大使维埃诺和他们的军事代表柯尼希将军与盟国打任何交道的方式来报复。对于控告他犯有刑事罪一事，戴高乐以攻为守，也提出了一项控告。1943年初，一位名叫斯蒂芬·梅尼埃的自由法国人从阿克拉回到英国。梅尼埃受雇于戴高乐主义者，在阿克拉英国广播公司发射台负责向法国本土广播。因为他是外国人，因而受到英国安全部门的拘留和盘问。拘留期间，梅尼埃突然死去。戴高乐宣布，梅尼埃的儿子准备向法国领土上所有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向丘吉尔和整个英国政府起诉。既然英国人能抓戴高乐，法国人也能逮捕丘吉尔。

此时已是5月份，离盟军总参谋部决定要登陆的6月份越来越迫近了，整个西方世界即将投入历史上最为冒险的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军情火急，英国人越发地希望澄清目前已陷入僵局的政治局势。

为了缓和同法国解放委员会的关系，丘吉尔政府决定付给达福1000英镑，作为他撤回起诉的代价。5月23日，达夫·库柏带着丘吉尔的请帖，请戴高乐前去伦敦解决承认法国政府以及在法国进行行政合作的问题，僵局才算打破。

自从英国政府限制戴高乐与伦敦传递密码电报以后，戴高乐就很遗憾地拒绝接见英国大使。这次，戴高乐给他敞开了大门，只因他声明有了“新方针”。达夫·库柏同时向戴高乐声明，英国政府希望在盟军登陆时，戴高乐能在英国。

“我很感激这种关注”，戴高乐答复达夫·库柏说，“事实上，当盟军发动登陆战时，我确实很愿意在出发基地，我想从那里到法国解放了的第一个地区去。所以我愿意接受到伦敦去的邀请。”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声明，”戴高乐话锋一转，接着说道，“关于在那里签订一项带有政治意义的协定，我完全采取保留态度。解放委员会不管盟国任何意见，我们都断然要用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关于我们与盟军司令部合作的条件，很早以前我们就在一个备忘录中讲得很清楚，但是盟国对这份备忘录迟迟没有答复。现在英国政府可能准备在这个备忘录上签字，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是这样，那么我也看不出同英国政府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又有什么用处，不过，我还是打算去伦敦，但条件是必须立即解除对密码通讯的限制。”

达夫·库柏此次的邀请总算有了结果，这使他很高兴。

5月26日，法国解放委员会通过了戴高乐对英国大使提出的主张。它声明戴高乐去伦敦是参加发动反攻战役并在适当时间内慰问战地的法国民众，而决不是为了协商什么事情。第二天，戴高乐又接见了达夫·库柏大使，并向他重申了上次的立场。关于密码电报，英方同意使用，并为此向戴高乐作出了“书面保证”。

6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通过一项法令，正式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正式声明盟军必须尊重法国主权，决不同意其他任何政府存在，坚决抵制美国政府企图在登陆后宣布在法国建

立占领区军政府和强制发行货币的决定。

至此，种种事态表明，戴高乐将军在“盟国军政府”问题的较量中再次成为获胜者。今后，虽然可能还会遇到危机，但结局已不容置疑：戴高乐关于法国独立的观点将占上风。

1944年6月4日，戴高乐应丘吉尔的邀请，乘英国首相的私人飞机离开阿尔及尔，来到伦敦。

在此之前，丘吉尔叫人改装了一列火车用作他的司令部。火车把他本人、他的随员以及三位大臣——史末资陆军元帅，欧内斯特·贝文以及伊斯梅将军送到紧挨着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朴茨茅斯附近的司令部的一条支线上。从那里，丘吉尔可以观察到为进攻被占领了的法国所作的准备工作情况。

当戴高乐一行的飞机在伦敦着陆时，艾登便陪同戴高乐将军驱车来到了丘吉尔的火车司令部。两位领导人就在车厢里举行了会谈。丘吉尔首先对戴高乐的到达表示热烈欢迎。站在一旁的史末资元帅对于戴高乐的来访则表现得相当尴尬。因为几个月以前，他曾在一个团体中说：法国已经不是一个强国，它应该与英帝国并在一起，同时盎格鲁萨克逊的报纸也曾经对此事大肆宣传。

午餐后，丘吉尔首先向戴高乐介绍了关于即将从英国海岸出发所展开的规模巨大的战斗，他满意地指出最初阶段主要由英国的力量来承担这个任务。他说：“特别是皇家海军在运输和护航方面将起主要作用。”

戴高乐诚恳地向丘吉尔表示，对英国的成就非常敬佩。他说：“英国勇敢地经受了无数的危难，从而挽救了整个欧洲。今天它应当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在那里集结无比强大的兵力，这就是英国的勇敢政策的鲜明证据。”

在这个历史时刻，在这儿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中间，充满了一种互相尊重和友谊的气氛。接着大家就谈到正题。丘吉尔对戴高乐说：“让我们研究一下我们在法国合作的问题，随后你就到美国去，向总统提出来，他可能会接受，那时我们就可以把它付诸实行。无论如何，你要去跟他会谈，这样他才会软化，并在某种形式下承认你的政府。”

“为什么你硬要我到罗斯福跟前去作法国政权的继承人？”戴高乐当即辛辣地回答说：“为什么你认为我必须把我在法国当权的资格交罗斯福审议？法国有自己的政府，在这方面，我无所求于美国，就是对英国也无所求。”

现在，戴高乐把他新近听到的最不愉快的消息端了出来。它关系到盟国军政府。戴高乐说：“我刚刚得到消息说，尽管我们再三警告，有人为即将登陆的部队和工作人员提供所谓的法国货币，这种货币是外国铸造的，共和国政府绝对不予承认。但根据盟军司令部的命令，这种货币将在法国领土上作为法币强行流通。”

这时，坐在贝文对面的比约特将军插话说：“还有一点，这种纸币印出后还有一个拼写错误。”

戴高乐接着说，“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昨天，根据美国总统的指令并征得你的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宣布把法国置于他的管辖之下。在此情况下，你怎么能指望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呢？”

“你又怎么能指望我们英国人采取与美国人不同的立场呢？”丘吉尔反过来大声质问戴高乐说，“我们要解放欧洲，但是没有美国人就办不到。我们要把这一点说得明明白白。当我们在欧洲和海洋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总是选择海洋，当我在罗斯福和你之间进行选择时，我总要选择罗斯福。”

最后的这番话显然深深地刺痛了戴高乐的自尊心。坐在一边的外交大臣艾登摇了摇头，他似乎也不相信丘吉尔怎么讲出了这样一番话。

这时，劳工大臣贝文走过来，为了让别人都能听到，他大声地对戴高乐说：“首相对你说，无论如何他是赞成美国总统的。你要知道，那是他个人的看法，绝不是以英国内阁的名义来说的。”他这一番话总算稍稍缓和了一下车内紧张的气氛。

然后，丘吉尔把戴高乐带到了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总司令在树林深处，墙壁上挂满了地图的小屋中，对这两位领导人详尽和稳重地介绍了登陆的计划和准备情况。船只随时可以出港。飞机待命起飞。几天来，军队都已经上了船。8个师团和渡海、登陆的许多机械设备，都已经全面地准备妥当。由海军、空军和伞兵部队进行掩护的工作也无可挑剔。

戴高乐听着艾森豪威尔的介绍，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气势磅礴的登陆场景，他无不佩服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了建立自己的“计划”所施展的才能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艾森豪威尔带着踌躇不安的面色，继续说道：“目前天气十分恶劣，假如在7日或17日之前不进行登陆的话，月光和潮水将使登陆推迟一月。无论如何，最迟明天必须发布进攻或延迟的命令。”

“依将军您看，在这样的时刻应如何决断？”艾森豪威尔转过身来，一双眼睛紧盯着戴高乐。

“我只向您说一句，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决不推迟。我认为天气的危险比推迟几个星期的危险要小些，因为推迟就要使执行任务的人精神长期紧张，也有泄露军事机密的危险。”

当戴高乐准备告辞时，艾森豪威尔显得有些局促，他递给戴高乐一份打印文件，并说：“这就是我准备向西欧人民发表的声明，特别是对于法兰西人民。”戴高乐浏览了一遍，当即表示这个文件不能令人满意。

艾森豪威尔已经领略过戴高乐的脾气秉性，当即向戴高乐保证说，“这只是一个草稿，我准备按您的意见修改。”双方约定，第二天具体商谈修改意义。

丘吉尔陪同戴高乐一起回到列车中，戴高乐对丘吉尔毫不隐讳地谈了自己内心的忧虑。因为在光明的战斗前景上，又一次出现了一种笼罩在戴高乐政府上的阴影。

的确，华盛顿为艾森豪威尔撰写的声明，戴高乐是不能接受的。按照这个声明的原文，艾森豪威尔对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人民所讲的话严格地限于军事问题，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他转过来对法国人民讲话时，调子改变了，他要求法国人民执行他的命令。他的讲话中根本没提到戴高乐或者民族解放委员会，更不稍说临时政府这一新名称。法国人民将被告知：“如果没有相反的指示，在行政机关中，人人应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等法国全境解放后，由“法国人自己来选举他们的代表和政府”。

戴高乐对这一声明甚为反感。他说：艾森豪威尔“在表面上自命为担负我们国家的责任，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有权指挥军队的盟国将军，他没有任何资格来干涉我们的内政，何况他也是无法进步一干涉的。在这个声明中，它对法国的政权只字不提，这个政权几年来是鼓舞和领导我国人民作战的力量，这个政权也把大部分法国军队的荣誉委托给艾森豪威尔指挥。无论如何，我在6月5日上午，交给盟军总部一份我们能够接受的文本。正如我所估计

的那样，他们答复我说，这个声明文件来得太晚了，因为声明文件都已经印制妥当，随时准备要投掷到法国的本土上。”

6月5日，戴高乐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伦敦。当天晚上，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两栖作战第一步偷袭行动秘密开始了……

第八章 为了母亲的微笑

“解放法国应当是自己解放自己的战役”
华盛顿，戴高乐成为罗斯福的座上宾
赖湊“联合政府”
荣归故里
潮水退去，戴高乐面对的是满目疮痍的国家
振兴法兰西！
胜利者的祈祷：愿世界和平永驻

1944年6月5日午夜，深沉浓重的夜色笼罩着大地。在朴茨茅斯港湾停泊场上，聚集着成群的船只，并且做好了充分准备，可以随时随地起锚，驶向大海，可是出发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大量的登陆艇顺着波涛上下波动着，暮色茫茫，着实难以分清它们的轮廓。

此时，在英国20个机场上，数千架飞机也在暮色苍茫中，静静地等候着……刀出鞘，箭上弦的时刻即将到来。午夜过后11分，“霸王计划”的第一步偷袭行动——“泰坦”行动开始了。

“泰坦”行动的第一组人员在瑟堡半岛3000英尺上空从一架“斯特灵”轰炸机上跳了下来。头一名跳伞者是特种空军部队的诺埃尔·普尔中尉，另外三名伞兵跟着他跳了下去。普尔碰了一下机尾，便坠入云雾之中。降落伞自动打了开来，普尔昏沉沉地降落在圣洛正西五英里、去库汤斯路旁的一片草滩上。醒来之后，他发现备用品中的鸽子笼，便给伦敦写了一封信，简要地报告了着陆地点的情况，然后装入鸽子脚上的小筒内，便把鸽子放了。普尔中尉是登陆日那天盟军空投到法国的第一位前哨兵，也是第一个从法国把情报送回英国的人。

普尔小组离机数分钟后，“泰坦”行动第二组四名伞兵在哈里“雏鸡”·福尔斯的带领下，在同一地区降落。为了使他们看上去象是一支空降部队的先导，随后又派了数架“斯特灵”飞机，空投了200个只有真人一半大小的假伞兵。德国人后来把这些假伞兵称作“洋娃娃”。随后，飞机空投下的数千支伪造的步枪和机枪开始爆炸。问时，普尔和福尔斯带着伞兵们装起了扩音箱。开始播放事先录制好的枪炮、迫击炮、士兵的咒骂、指挥官的命令等混杂声音。

在每一块驻有德军机动部队的地区，盟军都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似乎都突然出现了盟军伞兵部队，小至一个连，大至一个旅。这些行动旨在制造混乱，让德军及伞兵部队陷入对诺曼底村野的搜寻之中，而真正的盟军空降部队则在横跨奥恩运河的蒙特布尔和卡朗丹之间完成了着陆，建起了空降场。几小时之内，那些“洋娃娃”和噪音发生器将会把巴黎的德军高级指挥部搞得晕头转向。“泰坦”行动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参加，使用的飞机和技术装备也屈指可数，但却为登陆行动起到了巨大的配合作用。

午夜过后，6月6日凌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两栖作战经过长期的准备和谋划终于开始了。盟军2395架运输机和847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起飞，载着3个伞兵师向南疾飞，到法国诺曼底海岸后边的重要地区空降伞兵。东方渐渐透出黎明的曙光，英国皇家空军的1163架飞机，对勒阿弗尔和瑟堡之间事先选定的敌军海岸的10个堡垒，投弹5853吨。天亮以后，

美国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开始出击，1083架飞机在部队登陆前半小时，对德军海岸防御工事投弹1763吨。然后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

当天已大亮之时，一幅海湾的触目惊心的全景便呈现在士兵面前。盟军海军成百艘的船只朝法国北部海港进发，数不清的烟筒、桅杆和防空气球使英吉利海峡显得更加拥挤不堪。接着重型战舰也投入了战斗。只见“罗德号”巨舰，很快超过了单纵舰队。它的主舷炮，一次又一次地喷射着排炮。喷火式飞机成中队编队飞行，不时掠过军舰的桅杆，朝法国北部沿岸猛扑过去。顿时，整个法国沿岸尘上飞扬，硝烟弥漫。炸弹的爆炸声和炮弹的啸音，汇成一曲战争交响乐。盟国部队进攻的时刻，复仇的日子来到了。

上午6时31分，美军开始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登陆。在这之后，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也陆续在事先选定的海滩登陆。清晨传来的消息说明，进攻舰队几乎在未遭敌军阻击的情况下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全部海空运输部队已经登陆，正在巩固阵地。

守卫法国海岸线和荷兰的是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此时隆美尔正在家里睡大觉，登陆作战打响的前夜，他乘飞机赶回自己的庄园赫林根，庆祝他妻子的生日。在伯希特斯加登德军最高指挥部里，希特勒和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也都在鼾睡中。

盟军胜利登陆的喜讯到处传扬，也传到了伦敦卡尔登花园戴高乐的办公室，戴高乐十分激动，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天啊！

6月6日清晨，就在登陆战役打响的同时，按照盟国事先的安排，流亡在外的欧洲领导人——挪威国王、荷兰女王、卢森堡女大公，比利时首相，相继在无线电广播上对他们的人民发表讲话。紧接着，艾森豪威尔宣读了他的声明。随后，应该是由戴高乐将军向法国人民讲话，但他却拒绝这一安排。

不是戴高乐不愿意向法国人民讲话，此时此刻，他是多么的想对他的祖国人民大声呼唤：“这是解放法国的战役，也是法国自己解放自己的战役。”但是，如果他接受盟国的安排，特别是紧跟艾森豪威尔总司令之后讲话，这就意味着戴高乐承认前者所说的一切，而艾森豪威尔所发表的声明却是戴高乐不能赞同的。戴高乐本人希望允许他在当日晚上利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发表讲话。

如同往常一样，他如愿以偿。当天下午6时，戴高乐独自一人进行播讲。这是一个等待已久的激动时刻。

戴高乐怀着无比的热情，用他那为人熟悉的声音说道：“最后的战斗开始了。……当然这是法国的战争，也只是法国的战争。……凡是法兰西的儿女，不论他们在哪里，也不论他们是谁，他们唯一而神圣的义务是尽一切力量打击敌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国政府及由它任命的法国领导人的命令。……在我们的血和泪所凝成的乌云后面，现在正在重新出现象征着我们伟大的太阳！”

戴高乐的讲话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法国本土，法国各地抵抗运动的成员们分别聚集在一起，激动地聆听戴高乐的号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盼望已久的时刻。

在戴高乐的号召下，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下的各种爱国力量紧急动员起来了，复仇的烈火从一个省烧向另一个省，从一个城市烧向另一个城市……

法国游击队怀着满腔仇恨袭击德军的桥梁和临时军火库，切断电话线，拆毁铁路线，为了配合盟军的进攻，在法国各地执行着进行游击破坏活动的使命。布列塔尼半岛上的游击队更是成为盟军最高司令部密切关注的焦点。

此处的游击队员有一项不仅对“霸王”战役而且对“坚韧”行动意义十分重大的使命。为了配合诺曼底登陆，游击队的任务是切断布列塔尼同法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尤其要设法阻挠驻守该半岛的 145000 德军向诺曼底增援。同时，为了配合“坚韧”行动。游击队还加强了活动，给德军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布列塔尼地区也可能出现大规模登陆作战。因此，布列塔尼游击队的秘密活动，比起法国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广泛和频繁。

自从登陆日以来，盟军向布列塔尼半岛空投了大批特种作战小分队，负责武装、训练和领导该地区的游击队。空降非常顺利，而巨数小时之内基地就在杜沃特森林建立起来，特种作战部队和当地游击队便开始出击骚扰德军。当他们听到电台广播的行动指示——“拿破仑的旗子难道总是在佩罗斯——基勒克的上空飘扬吗？”——之后，便发起全面出击，和盟军大部队开入半岛的时间基本吻合。

6月18日拂晓，德军以一个旅的兵力向游击队据点发起了进攻。穷凶极恶的德军用曳光弹引着了干柴，点起了森林大火，300多名游击队员不是英勇战死就是失踪了。据说德军捉到了35名俘虏，让一名德国牧师给他们集体做了忏悔后全部枪杀了，数十座农庄被烧毁。但是德军的暴行并没有吓倒法国爱国者，他们喊出：“血债必须用血偿还！”很快地，布列塔尼半岛又组织起8000名武装的和22000名没有武装的“马基”游击队。

尽管游击队出兵不利，损失惨重，但却相当成功地延迟了布列塔尼地区的德军部队向诺曼底的增援。隆美尔的战略是同步兵色围盟军的桥头堡，同时重新调配装甲部队，以期进行强大的反攻。可惜的是，隆美尔没有足够的步兵来完成对盟军的包围。由于游击队的活动和盟军的轰炸，驻守布列塔尼的各步兵师无法按时到达前线。德军的伞兵部队也在这一地区遭到了同样的阻击，大大延误了战机。号称“帝国”的第二党卫军的装甲师，是世界上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战斗部队，但它在从佩里高到诺曼底的路上，同样遭到了游击队传奇般的骚扰和袭击。

布列塔尼半岛的法国游击队，他们积极响应戴高乐的战斗号召，为了自己祖国的解放，不惜付出重大牺牲，他们以自己英勇斗争大大推迟了“帝国”装甲师到达前线的时间。该师在登陆日之后第17天才到达诺曼底。据法国官方公布的战报，“帝国”装甲师从佩里高到诺曼底途中，共死伤4000人。此外，几十辆克虏伯工厂的骄傲——“风暴”式坦克和宽履带坦克被击毁、烧掉，充分证实了诗人拜伦说过的，那些“衣不遮体的爱国者们”是发动游击战争的威力。

为了更好地把法国本土内的爱国力量统一组织起来，1944年初，戴高乐正式建立了内地军，把地下抵抗运动的一切武装和非武装的军事组织，都统一在“法国内地军”之中。内地军没有一个全国总参谋部，只有一个地区的司令部，有省一级的司令部。内地军是由志愿人员组成的，为了加强对这支军队的统一指挥和领导，1944年4月，柯尼希将军被任命为总司令，管辖驻在英国的全部法军，以及能够配合盟军登陆部队作战的法国内地军。尽管地下力量的行动必须从外部由一个非常集中的司令部来指挥，但是，游击队由于本身的性质，活动却是分散的，他们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展开活动，

机动灵活地配合盟军利法国主力部队的军事行动。

由于地下游击战的特点，很难估计游击队在这样大规模作战中取得的成绩。因此，要估计抵抗运动在解放法国的战役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最好还是听听他们的敌人和盟友是怎样说的。

德国占领兵团情报机关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话：

6月7日在奥里亚克：“形势危机，我军不断遭到袭击。”

6月9日在上比利牛斯：“我方部队不断受到袭击。这些匪帮使我军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6月10日在多尔多涅：“第11装甲师每天都不得不与散布在多尔多涅各地的恐怖分子互相扭打，部队进展甚慢，有时一干只能前进几公里。克莱蒙——费朗——利摩日地区完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全区铁路交通完全停顿。部队移动十分困难。”

……

就是盟军也对法国内地军的锐气感到震惊。他们像受到内地军打击的德军一样，原先对他们的估计也过低了，盟军指挥部6月底宣布，战果超出他们期望之外。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得不承认，法国内地军的贡献等于15个正规师。他们实际上等于是一支在关键时刻到来时已经着陆的伞兵。

戴高乐在伦敦的几天中，不断地接到战争的喜讯。特别是当地得知贝叶城成为法国被占领区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城市时，他更是彻夜难眠，激动万分。

6月14日，戴高乐怀着激动的心情，在朴茨茅斯港湾登上“战斗”号驱逐舰。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舰艇剖开深蓝色的海面，激起雪白的浪花，驶向一望无垠的大海。

站在甲板上，戴高乐挺直身子，双手紧紧握往扶手。风声呼呼，愈吹愈烈，浪花泛起的泡沫不时地拍打在甲板上。这个时候，戴高乐将军却没有心思留意这些，他那付专注的面孔一直盯着前渐渐地，海平面上出现了贝叶高楼林立的轮廓。这时，戴高乐只感到激动的心情像海浪一样汹涌激荡，他真想大声地呼唤：“我的苦难深重的祖国啊，您的儿子回来了！”话没有喊出来，但它却像烈火一样在他的心中燃烧，像雷电一样，在他的周身震荡。

“战斗”号驱逐舰终于靠岸了。一上岸，戴高乐便受到法国人民和武装人员的热烈欢迎。当戴高乐进入贝叶城时，他从一条街步行到另一条街。居民们看到戴高乐将军都甚为惊讶，随后是热烈欢呼，或泪流如注。他们走出家门，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跟着他走。人越来越多，渐渐地汇成了一股长长的人流。孩子们把他包围起来，妇女和老人则向他诉说四年来的痛苦生活和法西斯匪徒在这里犯下的滔天罪行。望着纯朴的法国人民，戴高乐顿时心头感到从苦难的深渊中涌起民族的喜悦、自豪和希望，他时时到刻都沉醉在这种爱国激情之中。

在一个钟头前还悬挂贝当肖像的县府大楼前的广场上，戴高乐向聚集在这里的居民发表讲演。当地县长莫里斯·舒曼在戴高乐发表讲演前，激动地向群众宣布道：“荣誉和祖国！我们的戴高乐将军回来了！”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戴高乐对他的人民说：“敌人毕竟是敌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击败他们。法国一定会胜利的。事实上，这就是一场民族革命。”

广场上的群众沸腾起来了。四年来，在德国法西斯铁蹄下饱受苦难的人民，今天第一次听到一个法国领导人在他们的面前讲话。

戴高乐号召人民积极支援盟军作战，积极支援法国内地军和正规军作

战，狠狠打击敌人，为解放自己的祖国作出贡献。戴高乐说：“我们法国人要永远记住6月6日这一天，这是伟大解放战争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我们在法国本土上开始了反攻；从这一天起，我们要获得胜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要获得解放！”

戴高乐为了让人民牢记“6月6日”这个神圣的日子，最后背诵了著名诗人拜伦的《唐璜》中的诗句：

“那是夏季的一天——六月六日，
我对于日期喜欢说得确切，
不仅哪一代哪一年，也要说明哪一月；
它们像是一种驿站，命运女神
在那里调换马匹，使历史改变调子，
然后越过帝国和国家疾驰而去，
留下的除了编年史外没有别的，
要么还有死后才能进去的天堂。
日子是六月六日，时间大约
六点半分——战斗或许更近七点……”

戴高乐的话音刚落，广场上又一次掀起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当地居民不仅记住了6月6日这难忘的日子，也记住了6月14日，戴高乐进入贝叶这激动人心的一天。

1944年6月15日清晨，戴高乐乘“战斗”号回到朴茨茅斯，其后又回到伦敦。他高兴地看到英国报纸用大字标题报道他重返法国的消息。

当日下午，艾登来到卡尔登花园拜访戴高乐，这是戴高乐结束伦敦之行的最后一天。在艾登看来，罗斯福只等戴高乐去华盛顿就会改变他的看法。戴高乐也非常清楚，法英合作至今未能建立在更好的基础上，华盛顿政府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在对外关系中，美国是所有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个环节打开了，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于是，在结束了伦敦之行后，戴高乐决定接受罗斯福的邀请，到美国访问。

在此期间，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挪威、波兰和捷克的流亡政府均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此外，戴高乐又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了意大利和梵蒂冈。所有这些，都有效地提高了他的地位。因此，在戴高乐决定对美国出访的时候，他依然坚持他是代表法国去向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对战争作出的贡献并向法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表示个人敬意的，任何会谈都只是两国政府首脑之间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6月24日，戴高乐将军在致—209—驻华盛顿代表的电报中明确地表示了他的立场：“我既下需要什么，也不打算特别要求什么，尤其是关于让美国正式承认临时政府的问题，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不准备提出这一问题。”

1944年7月6日下午，戴高乐乘罗斯福总统派来的专机抵达华盛顿。在机场，他被当作一位高级军事领导人，受到鸣礼炮17响的欢迎，没有得到给予国家元首鸣礼炮21响的礼遇。从戴高乐走下舷梯的那一刻起，他便从欢迎的阵容中感受到了，尽管是正式邀请，但罗斯福总统对他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迎宾车队穿过市区，直抵白宫。罗斯福总统笑容可掬，带着他那为人所熟知的魅力站在白宫门前迎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站在他旁边。罗斯福再次用法语欢迎他的客人：“我见到你是多么高兴啊！”

用茶以后，罗斯福和戴高乐进行了第一次长时间谈话。首次会谈之后，戴高乐被送至布莱尔大厦，这是美国政府惯常用作接待贵宾的一座古老而奇特的寓所。一年前，罗斯福总统的中意人吉诺将军曾在此受到同样的礼遇。身败名裂的吉诺如今已经销声匿迹了，而这位勉强为总统承认的低级将领这次成了座上客，并置身于美国官场的巨大权力中心。罗斯福总统恐怕也没有想到局势发展变化得会是如此之快。

7月7日，也就是戴高乐访问华盛顿的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在白宫设午宴款待戴高乐将军，并发表了非常友好而动听的讲话。在讲话中，他老练地回避任何政治纠纷问题，他说：

“我认为，法国有些东西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就是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全世界都珍贵的文明精神……岁月流逝，我们已看到法兰西的黎明来到了，我们已看到这一文明将获得全部解放，不仅是过去的文明，而且比战争以前更加吸引人，更伟大的文明都将获得全部解放。”

罗斯福在真诚地向法国致意后，又特别亲切地对戴高乐将军说道：“一年以前，也就是去年的一月，我第一次会见了戴高乐将军。我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有第二次会晤，我希望还有第三次，乃至更多次的会晤……在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或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之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毫无例外，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今天早上曾谈到涉及全世界的许多事务。我们对世界前途的看法完全一致，并且同意解除德国武装，使其近五年发生的事情在今后50年内不再重演。”

午宴是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坐陪的还有国务卿赫尔、前驻维希政府大使威廉·李海海军上将以及美国其他高级官员和代表。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非常自信的神态，对战后世界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随后，戴高乐来到阿林顿公园向无名英雄墓致敬。然后，又到医院看望垂危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并瞻仰了乔治·华盛顿纪念碑。

在以后的几天中，戴高乐在布莱尔大厦不断地接受人们的“觐见”。来访的人中有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也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将军、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

可是，戴高乐访问的真正目的是同罗斯福总统进行推心置腹的会谈。然而，会谈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戴高乐在美访问期间，共和罗斯福举行了两次单独会谈，他们俩人是在罗斯福书房里的写字台旁会见的。戴高乐发现总统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纪念品、勋章、祈福消灾的偶像等古怪的玩意儿。

会谈始终围绕着法美关系和未来世界的组织问题。罗斯福滔滔不绝地、大而化之地描绘了他为摆脱了纳粹德国恐怖的世界所制定的蓝图，整个蓝图表现出的是他自己想从胜利中争取权力的愿望。罗斯福说，美国的孤立主义是过去的一个最大的错误，他设想在将来建立一个由四大国组成的理事会，前三个是美国、苏联和英国，第四个不是法国，而是中国。而且，他还打算通过国际法来建立一个由这四大国组成的常设干涉机构来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但是在西方，真正有分量的只有一个大国，那就是美国。因为正如罗斯福所阐明的那样，蒋介石的中国需要美国援助，而英国人则因他们的帝国前途未卜，将会听命于美国的意志。在这种宏伟的前景下，古老欧洲的问题，不管是东欧还是西欧，在罗斯福看来都是次要的。

根据这一推断，总统心目中的战后世界中，法国是无足轻重的。对此，戴高乐竭力想使罗斯福理解，在他掌舵之下的一个复兴的法国具有远远不可忽视的分量。他说：“西方国家应该得到复兴。如果它复兴起来，世界其他地区都将以它为榜样。如果它衰弱下去，蛮横的暴力就要席卷一切。尽管西欧存在分歧，但是它对于西方还是重要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西欧古老民族的勇气、力量和深远影响，法国的情况尤其如此。法国是欧洲的大国，只有法兰西，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你们的盟友。”

说到这儿，戴高乐稍稍停顿了一下，呷了一口茶后接着说道：“我知道你们准备在物质方面帮助法国，这对它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应该在政治上使它恢复活力和自信，从而恢复他的作用。如果有关世界的重大决定没有法国参加，如果法国丧失了它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一句话，如果战争的结局给它造成一种战败者的心理，那它怎么能起作用呢？”

罗斯福对戴高乐所阐述的论点表示理解。不管怎么说，他对法国的感情，或者至少是对他过去想象中的法国的感情是强烈的。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感情，使他对法国昨天的惨败感到失望和愤慨。罗斯福颇为痛心地追述了他对法国在战前年代那种政治上无能的状态的感触。他说：“我这个美国总统，甚至有时还记不住法国政府的短命总理的名字。在这儿，现在你看到我的国家是多么的殷勤接待了你。但是这出悲剧演完后，你是否还是政府的首脑呢？”很显然，罗斯福依然在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将不会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任何政党。关于法国解放后，谁来执政这一点，他认为，只有法国人民自己选择适合他们的政府形式，并由他们自己选举国家领导人。对于戴高乐和他的临时政府，罗斯福依然抱着敌视和不信任的态度。

虽然要驳倒总统的某些观点并不难，但是，戴高乐抑制住自己，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处于权力顶峰的罗斯福总统他现在所考虑的只是怎样使戴高乐理解他自己想从胜利中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而法兰西在他所描绘的奇妙的巨幅画面中，只是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谈话就如法国人所说，是“聋子的对话”，再争辩下去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因此，戴高乐只淡淡地说，“总统的见解终于使我相信，在国际事务中，理论和感情同强权的现实比较起来是无足轻重的，最重要的是人们所掌握的和坚持的事实；法国要恢复它在世界的地位，只有靠自己”。

这时，罗斯福也笑了起来，他说，“我们将尽力而为，但是，若说为法国服务，的确谁也不能代替法国人民。”

尽管在分歧的问题上，两人总是各讲各的，谁也不愿听取对方的意见，但最终他们还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的。当戴高乐起身告辞时，罗斯福总统坐在他的推车中，送戴高乐走了一会儿。在走廊中，有一扇门敞开着。

“您看看我的游泳池，我就在那里游泳”，罗斯福仿佛在向他的残疾挑战，用手比划着对戴高乐滔滔不绝。罗斯福克服困难的惊人毅力和顽强精神再一次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戴高乐不禁向这位有着坚韧毅力与瘫痪作斗争的“快乐勇士”致以崇高的敬意。离开华盛顿以前，戴高乐把比塞大兵工厂工人所制的机械珍品一只小潜水艇送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则回送给戴高乐一张他自己的照片，上面写着亲切的字句：“给我的朋友戴高乐将军！”

戴高乐没有在美国逗留过长的时间，因为离美国大选只有几个月了，他不愿引起自战争开始以来就不赞成美国对法政策的新闻界对国务院和罗斯福

的敌视。但是，在短短的访问结束时，戴高乐在驻华盛顿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吸引了大批法国记者和美国记者。

当戴高乐进入会场时，人们起立向地欢呼，在场的记者们惊奇地发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和蔼可亲、高尚和持重的人。

记者招待会一开始，戴高乐首先用英语说道，“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接着，他用法语宣读他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戴高乐谈了他这次访美的目的是与罗斯福总统讨论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他说：

“我将带着在美国首都逗留期间留下的美好印象离开这里。我这次有机会同许多内阁成员……国务卿、议员、将军们会晤。我认为，我们达到了罗斯福总统和我本人为此行确定的目标，原则上我们就这场战争中和战争结束后美国和法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客观、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还议论了将来建立世界组织的问题。我们应当迫使德国和日本完全投降，然后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国与国的团结不再是一句空话。”

戴高乐的讲话不时地被记者们的掌声所打断。随后，戴高乐接着说：

“罗斯福先生高瞻远瞩，理解问题，他的理想主义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我则尽力向他说明了法国在逐渐摆脱暂时的灾难以后，首先和盟军按照自己的地位共同专加作战，一步步走出它暂时的苦难。它打算先与盟国一起参战，进而分享世界和平生活。”

在戴高乐结束了他的演讲之后，记者们纷纷向戴高乐递条子，提出各种问题。当时有位记者问道：“有人说法国将不是从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四大强国之一。法国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吗？”戴高乐坚定地回答：“空谈改变不了事实。很明显，如果不把法国摆在大国地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世界组织。”戴高乐在会上谈笑风生，不卑不亢，给美国新闻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公众舆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美国著名评论家杰弗里·帕森发表文章说：“国务院继续拖延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使美国盟友感到为难和恼火。英国和苏联政府已明确通知我们，它们希望考虑立即承认。”美国公众舆论普遍认为，戴高乐将军的华盛顿之行，如果说没有改变罗斯福总统对他的看法的话，至少在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一重大问题上引起了美国新闻界和公众舆论的关注。美国公众舆论随后掀起了一场支持戴高乐的运动，由于坚定不移，据理力争，白宫被迫再次做出让步。

7月10日，戴高乐结束了华盛顿之行，随后访问了加拿大。7月13日，他乘飞机回到了阿尔及尔，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在法国行政管理权上他终于取得了胜利的消息。关于法国行政管理权问题，阿尔及尔、华盛顿和伦敦终于达成一致协议。协议承认只有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才有管理法国的权力；只有它才享有与盟国取得联络以及向盟军提供心需的劳务的资格；只有它发行的货币可以兑换解放法国的盟军所持的美元和英镑。至此，“盟国军政府”方案彻底破产。法国保住了独立和主权。

这天晚上，戴高乐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现在，让法国的大战展开吧！让我们的内地军协助下的盟军与我们的军队一道从诺曼底冲向巴黎和罗纳河谷吧！”

戴高乐回到阿尔及尔的两个星期中，盟军正从诺曼底发起攻势，向巴黎挺进。

四年多来，巴黎一直是人们所厌恶的纳粹占领军的统治中心，现在它又

突然成了吸引人心的磁铁。因为随着盟军的不断挺进，德军已是节节败退，苟延残喘，巴黎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于是，巴黎城这个曾被囚禁、被麻醉的巨人终于从酣睡中清醒了，同时，也唤醒了一些政治阴谋家的野心。维希政府的实权人物皮埃尔·赖伐尔便把一双贪婪的眼睛投向了巴黎。

赖伐尔是一个诡计多端的野心家。1940年他投降了希特勒。曾先后任维希政府的外交部长和总理，甘心事敌，干尽了坏事。然而，当德军已成惊弓之鸟，盟军即将解放巴黎的时候，他又不惜清除辛德分子，组建新的政府，讨好盟国，以取代戴高乐的临时政府。具体说来，他的计划是在巴黎重新召集1940年的“国民议会”，并建立一个所谓“联合政府”，然后把它当成合法的政府，来欢迎盟军进入首都。这样就可以使戴高乐在他的政府还未得到法律上的正式承认之前，就面临着在法国首都已有一个掌握实权的政府这一既成事实。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以惯有的手法和不顾一切的勇气进行着这一计划。为此，他打算清洗他政府里的辛德的极端分子戴阿、达尔南、博纳尔和布里农。同时，为了使这个计划具有复兴共和国的外貌，他极力寻找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参加政权：在国会里有代表性，在反对贝当的政策方面很著名，同时在国外又有相当声望。最终他选中了曾任政府总理和国民议会议长的著名政治家赫里欧先生。然而，此人正囚禁于德国集中营，赖伐尔在取得德国占领者的同意后，就到囚禁赫里欧的马尔维尔劝说赫里欧，同他一起到巴黎来召集1940年的国民议会。

然而，筹划中的“联合政府”能否得到盟国的承认呢？这时，赖伐尔通过美国派来的和下院议长联系的昂菲埃尔证实了华盛顿方面有排斥戴高乐的计划。而此时，德国人对他的计划也很赞成，并暗中予以支持。实际上，希特勒的外交部长和谋士里宾特洛甫、阿伯兹和其他人，都认为法国一旦解放，最好在巴黎出现一个包括维希分子的政府。于是，赖伐尔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他的计

赖伐尔的这一阴谋，很快地遭到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抗战运动人士的坚决反对，并对其阴谋予以揭露。他们声明，1940年的国民议会没有资格代表法国说话。此时，抗战运动所组织的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巴黎眼看要解放了。7月14日，巴黎市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人们到处插上了三色国旗，高唱《马赛曲》，不断高呼：“戴高乐万岁！”这一天，被囚禁在桑德监狱的政治犯，在监房互相通气，冒着被野蛮镇压的危险在所有窗户上挂起国旗，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维希卖国政府！”“打倒赖伐尔！”的口号，爱国歌声同时响彻全区。8月10日铁路工人举行罢工，15日警察罢工，18日邮政电讯人员罢工。

巴黎沸腾了，人心向着戴高乐，人们盼望巴黎解放。就在这时，法国北部战事却出乎人们意料地发生急剧转变。

虽然艾森豪威尔非常清楚地知道，解放巴黎将振奋法国部队的精神，也会激励整个盟军部队，但是，他却在盟军迫近巴黎之际迟迟不作解放巴黎的部署，相反却把他的首要进攻目标放在了别处。这使戴高乐以及法国作战部队大为震惊。

8月18日，戴高乐急匆匆地从阿尔及尔起飞，直抵艾森豪威尔的盟军总部。8月20日，艾森豪威尔与戴高乐就盟军改变作战部署问题进行了交谈。

艾森豪威尔在接受了戴高乐对盟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胜利进军的赞扬以

后，向戴高乐介绍了当前的战局。他指着墙上挂着的作战部署图讲道：“巴顿的第3军正带领布莱德雷军团向前追击，并准备分为两个纵队越过塞纳河。一个向巴黎北部进抵芒特，另一个从巴黎南方到达默伦。在巴顿的后面，指挥美国第1军的霍奇将军，把部队再度集结起来，这支军队在俄恩地区刚刚肃清了德军。在布莱德雷左翼，蒙哥马利的军队击退了德国人的抵抗，逐步向卢昂推进。他的右翼是空的，我打算加以利用来促使巴顿直捣洛林省，依照军备供应的可能向最大纵深推进。在德军重新集结之前，战争就会很快地结束。”

从艾森豪威尔的介绍来看，一点进攻巴黎的迹象都没有，这使戴高乐感到惊异和担心。戴高乐不解地问道：“从战略观点上看，我不了解为什么要从默伦、芒特、卢昂以及其它各处越过塞纳河，为什么单单不从巴黎越过塞纳河？况且巴黎是交通中心，而交通今后对于你们是不可缺少的，尽快予以恢复是有利的。如果是别的地方，而不是法国的首都，关于我的意见，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战事是归你指挥的，但是，巴黎的命运跟法国政府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不得不进行干预并请你指挥军队直下巴黎。首先要派勒克莱尔率领的法国第2装甲师担负这个任务。”

在戴高乐“为什么不进攻巴黎？”的质问下，艾森豪威尔脸涨得通红，显得很窘，心中似有难言之隐。他只是解释说：“攻打巴黎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和居民生命的重大损失，请您能够理解这一点。”

戴高乐同意这点，但他继续争辩说：“既然抗战运动已经起事，再不进攻就没有道理了。”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抗战运动动手太早了。”

“既然你的军队此刻已经到了塞纳河，怎么能说动手太早呢？”戴高乐反问道。

最终艾森豪威尔理屈辞穷，他只得向戴高乐保证，虽然他还不能提出确切的日期，但不久就会下达向巴黎进军的命令，并且答应这项任务将留给勒克莱尔率领的那个师去执行。

戴高乐记下了这个诺言，临别时警告艾森豪威尔说：“我认为巴黎的解放对全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此，假使盟军的命令下得太迟，我准备亲自把法国第2装甲师投向巴黎。”

艾森豪威尔的踌躇不定，使戴高乐得出了这样的推断。推迟进攻是罗斯福下的命令，因为他指望赖伐尔让赫里欧重新召集议会的计划会成功，而罗斯福对任何恢复法国议会权力的建议都很听得进去。毫无疑问，美国人又在玩弄政治手腕了。

想到这儿，戴高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意愿，他深知自己虽然已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袖，但是要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领袖，必须首先成为巴黎的解放者。由此看来，法国的首都必须由法国人自己来解放的时刻到了，一刻也不能停顿。

于是，在盟国部队向法国东部推进的时候，戴高乐的行政官员、警察紧随其后，接管地方政权。8月19日，共产党抵抗部队在巴黎号召起义，第二天，戴高乐分子便夺取了警察总部。不久，共产党和戴高乐的地下抵抗组织向警察局、邮电局和政府大楼进攻，激烈枪声到处都是。在随后的几天里，城市的地下组织不断发起攻击，城外的法国部队步步逼进。此时，守卫巴黎的德军指挥冯·肖尔蒂茨已是内外交困。

肖尔蒂茨将军统率着一支人数不多的德国守军，就在德军困兽犹斗的时候，希特勒给他下了一道命令，如果德军撤出巴黎，“必须摧毁一切，不能让任何建筑留下，无论是教堂还是艺术馆都要炸毁。”就连供水管道也要切断，用希特勒的话说，就是“一个毁掉的城市就会受到流行病的侵扰。”几天来，肖尔蒂茨将军惶惶不可终日，他知道他要是执行希特勒毁掉城市的指示，他就会成为一个毁灭世界上最辉煌城市的罪人，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就在这个时候，艾森豪威尔逐渐改变了他的主意。肖尔蒂茨害怕担当破坏巴黎的可耻罪名，而艾森豪威尔面临巴黎被毁也不能无动于衷。8月22日傍晚，首都发生激烈巷战的消息，终于促使艾森豪威尔决定行动。

8月23日清晨，布莱德雷将军返回设在拉瓦勒的指挥部，把这个好消息转告了正在等待的法国第2装甲师指挥勒克莱尔。第2装甲师已被选为开路部队。当天下午，勒克莱尔兴奋地赶回装甲师部队，大声地喊道：“立即向巴黎进军！”

勒克莱尔将军统率的坦克师于午夜启程了。涂着法国三色旗的但屯全速向巴黎挺进。在郊外经过激烈的战斗后，8月24日上午，第一支坦克先头部队开进巴黎市区，其实，整个市区业已被起义军民占领了，沉寂了4年之久的巴黎大钟从南到北又敲响了。街道两边，汇集了数不清的居民，人们用美酒和鲜花，迎接自己的但屯手们。一些美丽多情的少女，更是勇敢地跳上坦克，坐在炮塔上随队前进。

法兰西人民等了四年，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也就在这一天，戴高乐将军来到塞纳省省长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受到了抗战官员们的热烈欢迎。他一进入大厅，乔治·皮杜尔就高声喊道：“我的将军！你瞧，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都团结在你的周围。我们请您在这里聚集的民众面前庄严宣告共和国的成立。”

戴高乐回答说：“共和国一直存在着。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都与它形成一体。维希政府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效的和非法的。我本人就是共和国政府的主席。为什么我还要宣布共和国成立呢？”

说完，戴高乐走到窗前，向挤满广场的群众挥手致敬，向他们欢呼：“法兰西共和国万岁！”

随之，广场上此起彼伏地回荡着“法兰西共和国万岁！”的口戴高乐继续向巴黎市区凯旋前进。

8月25日，戴高乐乘车来到奥尔良门，进入黑压压地挤满了欢呼人群的奥尔良大街。他并没有象人群所预料的那样把车开到市政厅，而是驱车驶向蒙帕纳斯，那是勒克莱尔的指挥部。

在那里，勒克莱尔兴奋地告诉戴高乐，冯·肖尔蒂茨刚刚签署了投降书，现正在给他的驻军卜达放下武器的命令。戴高乐感到庆幸的是，肖尔蒂茨最终在良心与天职之间作出了自己的承诺，要保存巴黎。由此，巴黎这个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终于完整无损地回到了法兰西人民的手中。

巴黎解放的喜讯，迅速传遍法兰西、传遍全世界。巴黎城沉浸在狂欢之中。四年来沉浸在忧郁、压抑氛围中的巴黎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仍是辉煌灿烂的不夜城。

当晚，戴高乐将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兴高采烈的群众面前。在巴黎市政府大厦，向抵抗运动的军政官员和各界发表了讲话。他说：

“你们为什么要我们在自己家里，在起来解放并且亲手解放了自己巴黎

的时候，把激动着我们每个男女公民的激情掩藏起来呢？决不，我们不能把这种深刻而神圣的激情掩藏起来。这是在我们不幸的一生从未有过的时刻。

巴黎！被敌人蹂躏过的巴黎！横遭破坏的巴黎！受尽千辛万苦的巴黎！巴黎，到底是解放了！巴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巴黎是它自己的人民在法兰西军队的协助下，在全法国、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久的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下解放的。

当然，盘据巴黎的敌人在我们手下投降了，法兰西回到巴黎来了，它又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法兰西虽然遍体鳞伤地回到巴黎，但它却是十分果断坚决的。法兰西回到巴黎，无数的教训使它清醒过来，它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比任何时候都要看得更明确。

我首先谈一下它的义务，目前，我们把所有的义务总括为战争的义务。敌人虽然动摇了，但它并没有被降伏。它还留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不能满足于借助我们敬爱和令人钦佩的盟军就能把敌人赶出去，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去。我们必须以战胜者的姿态直捣他们的国境。所以，法兰西先头部队是以炮击进入巴黎。所以，在意大利的法国大军在南方登陆后，即迅速向罗纳河流域挺进。所以，我们那些英勇可爱的内地军要装备起新式武器来。这是为了雪耻，为了报仇，为了正义。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一直战斗到全面而彻底的胜利为止。在场的同胞们，还有法兰西听从我们的人都要知道，这个战争的义务要求全国统一。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不容许破坏它的统一。国家很知道，为了胜利，为了复兴，为了使它壮大强盛，必须有它的全国儿女跟它站在一起。国家知道它的儿子，它所有的儿女。几个可恶的投敌的卖国贼除外，他们知道或将会知道国家法律的尊严)。不错，法兰西的所有儿女，应当像兄弟般共同携手，走向法兰西的目标。法兰西万岁！”

在一派欢呼声中，戴高乐只感到自己卷进了欢乐的洪流之翌日下午，8月26日，戴高乐举行了正式的入城式。沿途到处是欢迎的人群，房屋上下不知有多少飘扬的旗帜！更使戴高乐感动的是，在目前地下电车和公共汽车尚未恢复行驶、也还没有汽车的巴黎市区和城郊，有无数的人是徒步进城的。

下午3时，戴高乐来到凯旋门。临时政府的官员和将军们，以及内地军的许多军官和战士都站在英雄纪念碑前。戴高乐神情庄重地向乍得团的士兵致以崇高的敬礼，他们在凯旋门前排成战斗队形。当戴高乐在广场上从官兵们面前经过的时候，他们都站在车上向这位抗战领袖行注目礼。

穿过阅兵的队伍，戴高乐健步登上纪念碑前的平台，重新点燃起碑前的火炬。无数双眼睛都在注视着熊熊燃烧的火炬，好象是一个梦正在变成事实。的确，自1940年6月14日德国侵略者占领这里以后，一切灯火变熄灭了。

随后，戴高乐离开了凯旋门和平台，参加阅兵典礼的人们立即给他让开了一条路，香榭丽舍大街便呈现在戴高乐的眼前。戴高乐下车步行，他将徒步行走完从凯旋门到中心岛圣母院大教堂的这段路程。

就是这段有限的路程，展现在戴高乐眼前的是人山人海的场景，到处是欢呼的人群。大约有200万人。屋顶上是黑鸦鸦的一片人，窗口里密密拥挤着人，人群中间夹杂着许多旗帜，梯子和柱子上边甚至也爬满了人。凡是戴高乐能看到的，都是阳光灿烂、国旗飘扬下的人群的巨浪。

这不仅仅是一个武器闪烁、军乐嘹亮的阅兵节日，今天更是一个曾经沦为亡国奴、受尽压迫和摧残的民族，在欢欣鼓舞的景象和自由的气氛中重见

天日的节日。由于每个参加者都选择了戴高乐作为自己灾难中的救星的膜拜活动。

戴高乐在群众无与伦比的欢腾中，在暴风雨般高呼他的名字的时候，激动而又镇静地走着，尽力使他的视线看到这个欢腾浪潮中的每一个浪头，看到人海中每一个人的眼睛。戴高乐不时地举起长臂向含泪欢呼的巴黎人民致意，他缓慢而镇静地朝着中世纪法国的哥特式大教堂走去。在他眼里，这个教堂是法国历史的象征。

在圣母院大教堂门前，无数的法国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要一睹抗战领袖的风采。面黄饥瘦的儿童们手舞足蹈地向他大声欢呼！经受了无数苦难的妇女们笑逐颜开，向他高呼万岁！饱经岁月沧桑的老人流着眼泪向他致敬！在戴高乐眼里，他们是多么的相似啊。“你们，都是患难与其的人们！”戴高乐心想，“至于我，在这种激动欢腾之中，深深感到应该完成一个远远超过自己能力的任务，充当决定国家命运的舵手。”

戴高乐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走进庄严的圣母院大教堂。在那里，举行了庄严的祈祷仪式。神圣的弥撒曲结束后，立刻响起了风琴的优美合奏，伴随着悠扬的琴声，戴高乐走出教堂。

在出口处，戴高乐遇到的又是狂喜的人群。警察尽力在维持秩序。只见戴高乐将军缓缓沿阶而下，突然，教堂附近响起了几声枪响。顿时，人群惊慌失措，许多人卧倒在地，另一些人则拥挤着戴高乐。

此时，戴高乐将军却苦无其事，依旧是那么镇静而威严。他深知，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对他怀有敌意、仇视的派别、集团还是大有人在。他不禁想到他四年所走过的创业道路，这时他突然感到，他一生的命运就是孤独，就是抗争。但是，人民的支持将是最有力的杠杆，眼前这些群众的信赖和给予他的无限热情，不就是使他自己坚定起来，继续奋斗的力量吗？

想到这儿，戴高乐走出护卫着他的人群，从吝不迫地向前走8月29日晚上，戴高乐在巴黎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说：“巴黎的德寇在法国人民面前投降已经四天了。巴黎解欣已经四天了。一种无比的喜悦和骄傲使全国沸腾起来。甚至全世界的人们，当听到巴黎从苦难深渊中摆脱出来而又将重放光芒的时候，也都为之欢欣鼓舞。”

“法兰西向一切使巴黎走向胜利的人们表示感激。”戴高乐说：“首先，我们应感谢巴黎人民，他们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绝对也没有承认失败和屈服：感谢那些致力于击退敌人而在这里长期积极进行抵抗侵略者的男女英雄们；感谢那些就地作战打击敌人并使敌人投降的法国军人；感谢那些身经百战、来自非洲或临时在内地军领导下组织起来的、战无不克、攻无不胜的英勇战士；感谢那些在战场上或绞刑架上牺牲的男女同胞们。同样，法兰西也感谢那些优秀的盟军和盟军将领，他们英勇胜利的反攻解放了巴黎，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全国的解放，并与我们共同粉碎德军。”

“可怕的狂潮已经退去了，全国人民兴高采烈地呼吸着胜利和自由的空气。在各个角落里呈现出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我们的国家感到今后不仅有希望，而且完全有把握成为一个战胜国。我们的远景像美丽的春天一样，我们可以重新出现在世界的行列中，也就是像它过去那样，站在最大强国的行列里。”

戴高乐进一步指出：“不过，我们国家也知道它距自己要达到和所能达到的终点还有多大的距离，它必须注意到如何彻底使它毫无保留地打垮敌

人，并使法国在最后胜利中具有最大的功绩。它注意到自己领土上和它的人民遭受灾难的程度。它也考虑到现在的极端困难的粮食供应、运输、武器装备和它目前阻碍战斗力以及解放地区生产力的装备。”

戴高乐最后强调说“我们的事业也就是人类的事业，它必然会取得胜利，使我们有理由欢欣鼓舞和骄傲，但这决不等于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恰恰相反，我们知道，在我们与目标之间，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和一段非常困难的路程。这种工作，法兰西人民决心要完成它。这些困难，他们愿意忍受。因为这是在经历无数考验之后，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自由和伟大所应付出的代价。”

戴高乐在总结已经完成了的事业的同时，又开始筹划自己的未来。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巩固自己的政权。

就在戴高乐举行入城式的那天夜里，德国人空袭了巴黎，击中了酒市，炸毁房屋500所，造成了一千人的伤亡。整个星期天，8月27日，第二装甲师一直在巴黎城郊进行激战。8月28日，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最后一批德国人正在被驱逐出首都。第一集团军拿下了土伦和马赛，正向里昂挺进。霍奇将军的部队已经到达了格勒诺布尔。东南方面的军事代表布尔热——莫努里带口信来说，游击队完全控制了阿尔卑斯山地区、安省、德龙省、阿尔代什省、康塔尔省和多姆山省。

戴高乐认为，现在正是趁热打铁的时候，必须使抗战运动认识到，除了他的权力外，不能有其他的中央权力存在。8月28日上午，他决定摊牌了。首先，他把巴黎游击队的二十个主要领导人召集在他的办公室里。戴高乐向他们表示祝贺后，便宣布要把内地军编入正规部队，成为他所统率的法国陆军的一部分。

戴高乐深知，在法国本上以法共为首的进步力量作为抵抗运动的主力，其武装力量和政治影响有了极大的加强。戴高乐对此早已心存疑惧，他曾毫不隐讳地表示：法共“必须受我的控制！”“决不能让他们占上风，越过我或夺取领导权。”他充分意识到控制巴黎这个政治中心是掌握全国政权的关键。他也了解到了，有些人正在策划把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变成一个永久性的权力机构，实际上也就是变成一个与戴高乐的临时政府平行的政府。而且，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已经起草了他们自己的旨在指导政府的立法草案。所有这一切都是戴高乐所不能容忍的。

摊牌的时候到了。戴高乐对应召而来的抵抗运动委员会委员表示了他们所期待的祝贺之后，指出了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命运。他说，既然巴黎已经解放，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已成历史了，因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它应该解散并合并到将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议会中去，从而扩大该机构。一切行政管理权必须由政府行使。内地军将并入国家军队，因此今后对陆军部负责。行动委员会应当撤销。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必要时由正规军协助。任何民军均不需要，应立即解散。柯尼希将军已奉命担任巴黎军事长官，监督非正规军的合并到军队的工作。

并非所有的委员都是怀有对抗之心，在一些人激烈反对的同时，也有一些委员表示愿意听从戴高乐的指示。对于反对者戴高乐置之不理，他表示他今天召集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人来不是辩论来的，他打断了反对者的发言，宣布接见到此结束。

戴高乐明白：为了把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手，仅仅依靠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政府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抵抗运动同法国本土传统的政治力量结合起

来。于是，他于9月9日改组了由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政府，自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并广泛吸收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士参加，其中本土代表人物约占三分之一，从阿尔及尔来的部长占三分之二，同时吸收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两名法共部长，随时宣布取消抵抗运动建立的一些临时机构。法共参政，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正因为如此，戴高乐的权威很快为全国各地所承认。他所到之处，人们都把他作为领袖欢呼。

继戴高乐在政治上保住了自己的统治权力之后，在外交上也获得了胜利。坚持抗战、全民起义，终于使法国得以再度跻身于盟国之林。10月23日，美、英、苏分别承认法国临时政府。戴高乐想起以前所受的屈辱，得知这一消息时竟毫无热情。

几天之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他有何感想时，他平静地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法国政府为别人愿意称呼它的名字而感到高兴。”

至此，戴高乐创建的自由法国运动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戴高乐也完成了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军人变为声誉卓著的政治家的进程，正式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执政。

1944年秋天，最后一批德国军队被赶出了伟大的法兰西。但是，潮水退下去以后，法国创伤的痕迹完全暴露出来了。

戴高乐作为一个法兰西大国的执政者，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

法国正在挨饿，遭受战乱的国家已是千疮百孔；人们残酷无情，目无法纪。它所遭受的破坏是巨大的，尤其是交通运输方面。这不仅阻碍了经济的恢复，而且使得中央几乎号令不行，助长了混乱的产生，也助长了地方自治的要求。战前的12000台机车，只剩下2800台。3000座桥梁被炸毁了。从巴黎开往里昂、马赛、图卢兹、波尔多、南特、里尔，南锡等地的火车也无法通行。全国300万辆汽车有十分之九被毁掉了，由于汽油奇缺，即使乘坐那些剩下来的汽车去旅行，也是不保险的。商店空空如也，工厂寂然——227一无声。在经济上，国家已濒于绝境。在心理上，人们茫然不知所措，但却欣喜若狂，渴望新生。

从9月中旬起，戴高乐走遍了全国大部分地方，利用各种场合将近1000万法国人见了面。他亲眼看到了祖国遭受的战乱创伤，残垣断壁触目惊心；他亲眼看到人们的口粮像度荒年一样，衣衫褴褛，凉锅冷灶，没有灯火。他也曾在橱窗空空的商店、停工的工厂、死气沉沉的车站前面走过；他也曾听到群众发的牢骚，以及造谣惑众分子的兴风作浪。……

所有这些，使戴高乐清楚地看到，在治理这样一个刚刚爬出痛苦深渊的国家过程中，他将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可谓是百废待兴。

9月12日，戴高乐在沙约宫召开了一次有8000人应邀出席的大会。在会上，戴高乐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施政方针。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解放决不容许我们有任何享受；相反，它意味着我们要继续克己奉公，并且要求我们付出艰巨的劳动，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还要服从严格的纪律。为此政府必须作出必要的规定。”

接着，戴高乐宣布了临时中央政府所规定的目标。他说：“设法使法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水平的上升而提高；通过征用或保管的方式把某些公共服务机构和企业的活动直接交给国家管理；没收投敌分子所拥有的罪恶财产；在生产和运输还不能满足消费需要的时候，规定物价和监督交换。”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国家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候，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国家巨大资源的经营和管理要有利于全体国民；永远消灭投机赢利联盟。总之，要使法兰西的每个儿女都能安全而又有尊严的生活、劳动和教养子女。”

在结束讲话时，戴高乐向参加抵抗运动的男女战士发出呼吁：“你们是佩带着洛林十字勋章的人，你们在争取法国的荣誉和自由的战斗中是全国的先驱，你们今后的任务是把全国人民引向富强和伟大的道路。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法国才能获得伟大的胜利。希望大家在重建法兰西的战斗中，勇立新功，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土，面对贫困不堪的人民，戴高乐愈发感到在经济上医治战争的创伤是当前使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方面。

困难越大，就越需要治理。在摆脱了巨大的骚乱以后，戴高乐认为首要问题是使全国重新投入生产，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使工人能够生活。7月16日临时政府在阿尔及尔就决定：“解放以后，刻不容缓的问题是大幅度增加工资。”8月28日，巴黎解放的第三天，负责解放地区的部长勒·特劳盖召开了一次各部秘书长会议，建议把工资提高40%。9月13日，内阁会议通过了这个平均数。10月17日，另外颁布了一道命令，把家庭补助提高50%。这次增加的工资和家庭补助看来很多，但是若以1938年10月的指数为100来看，却还是很低的，因为工资的平均水平只达到225，而官方规定的物价已经从100增长到300，某些物品的实际价格甚至涨到1,000。

但是，假如货币贬值，国家破产，增加工资和报酬又有什么用处呢？从这个观点来看，戴高乐政府真是如临深渊。况且，国家在目前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还必须支付作战费用，需要陆续修复铁路、港口、运河、发电厂，桥梁工程等等，否则就谈不到任何恢复。

法国就是这样这样一个疮痍满目而又潜伏着危机的国家。戴高乐不禁哀叹道：“光明大道已经打开，但法兰西却成了一个破烂摊子！”“我，遥望将来，感到国家前途光芒万丈；可是环视周围，又看到国事如麻，千头万绪，大有麦克佩斯（莎士比亚的《麦克佩斯》剧中的主人公）站在女巫大镬前面的感触。”

尽管目前困难重重，但是戴高乐必须要迎着困难上。他感到为了恢复生产和粉碎颠覆活动，必须进行社会改革。

戴高乐主张主要动力资源由国家掌握起来，巨大工程实行国有化，国家需要亲自领导银行，要成立法兰西航空公司。提高工人工资，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1945年要把各种社会保险制度完全恢复起来，并加以扩大。一切靠工资生活的人，都必须享受社会保险。

戴高乐制定这些社会政策的动机是很明确的。正如法国问题专家布赖恩·克罗泽所说：“戴高乐为穷人谋福利并非装腔作势，也不是一种怀有政治意图的姿态。”在戴高乐看来，这些政策和改革都从属于复兴伟大法兰西的运动。在能源和信贷方面，实行国有化，是为了巩固国家，使之能够控制经济。减轻工人及其家庭的疾苦，保证农民的土地租佃权，是为了缓和他们的不满，使他们投身到重建家园的工作中来。

在国家目前财政困难的条件下，为了供给国库资金，同时制止通货膨胀，戴高乐政府很快作出必须发行大量公债的决定。这就是“解放公债”。11月6日，开始发行利息三厘的长期公债和无息公债，11月20日结束。11月19

日，在发行公债结束前 30 小时，戴高乐向全国发表了广播声明，指出已购公债的数字是一项成就，随后他又补充说：“我所要求的是一次胜利！”

结算结果，解放公债共发行了 1650 亿法郎，相当于今天的 12000 亿法郎。公债有 1270 亿是“现款”，其余是国库债券。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是在最后一天中认购的。如果考虑到当时全国所陷入的巨大经济困难已经使几乎每个法国人都一筹莫展，再注意到自从上次大战以来任何一次募集都未获得同样的或类似的成绩，那么，完全可以认为，这是法国人民信赖祖国的巨大胜利。

很快地，流通的货币量就从 5800 亿法郎下降到 4440 亿法郎。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引起的巨大危险一扫而光。同时，国库收入的公债资金对稳定经济、恢复生产起到有利的作用。

戴高乐所推行的改革，虽然触犯了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但确实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戴高乐欣慰地看到，法兰西又苏醒了。并且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前途。

如今，经济上医治战争的创伤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外交上力争法国战后大国地位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正在作战的法国回到自己的家园了，现在的问题是她还应该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就是戴高乐重建法兰西的另一个目标：

法兰西的解放，成为世界各国瞩目的焦点。多少世纪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在世界上居于首位，不久前它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中遭到沉沦。但是，以戴高乐为领袖的不屈的抗战儿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使它从失败的屈辱中走出来。然而，它将以怎样的姿态重新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它又将赢得什么样的地位呢？这是戴高乐执政以来，萦绕在他脑际中的问题。

诚然，1944 年 10 月底，在戴高乐凯旋巴黎之后两个月，美、英、苏正式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权，使法兰西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但是，在国际上法国遭受排挤的日子并没有结束。

1944 年 11 月中旬，戴高乐以一个被承认的大国元首的身份向丘吉尔和艾登正式发出了邀请。11 月 10 日，二人来到巴黎。与此同时，戴高乐也向罗斯福总统和科德尔·赫尔国务卿发了邀请，但被他们婉拒。戴高乐从中看出，他与罗斯福的私人关系并没有多大变化。

而在同一时间，罗斯福邀请了俄国、英国和中国参加加利福尼亚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会上讨论了成立联合国的初步方案。法国既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更没有列入领导这个组织的“安全理事会”。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说：“这样很好！因为美、英、俄、中四国为世界其他国家流出了自己的鲜血。至于法国，在这次战争中只是以一个小国的身份参战的。”伦敦的欧洲委员会已经成立一年多，英、美、苏三国政府的代表在这个委员会里也是在没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了有关欧洲、特别是有关德国的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盟国进行协商时仍在继续坚持排斥法国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让法国以主权国和参战国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是，根本无意把它作为战胜国来对待。

戴高乐对此十分敏感。他自认为是法兰西的化身，发誓要让法国重新跻于大国行列，首先是争取战后参加盟国的对德管制并成为未来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然而，如何才能获得这样一席之地呢？

就在这时，俄国人突然抛出了一张完全出人意料的纸牌，他们邀请戴高乐前往莫斯科拜访斯大林。象在战争中那些黑暗的岁月里那样，戴高乐又一

次看到了一线希望，可以在莫斯科寻求他在伦敦、华盛顿不能得到的东西。

在戴高乐看来，苏联与英、美不同，苏联愿意看到法国重返国际舞台，以期在欧洲起某种平衡作用；同时，在防止德国东山再起方面，法、苏也有共同点。因此，戴高乐希望到东方去寻求西方所不愿给他的支持，联合苏联以加强其同美、英抗衡的地位，从而为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创造条件。

于是，戴高乐接受了这一邀请。启程前，他认为把法国对解决未来的问题的主张公诸于世是有益的。11月22日，戴高乐利用咨询议会讲坛向世人宣布了他的主张。他提请公众注意，法国将成为第一流的外交大国，有权在联合国理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真正的听众应该是主要盟国的三巨头，戴高乐就是让他们明白，除非法国参加，否则任何关于德国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既不会有效，也不会得到尊重。

1944年11月24日，戴高乐在皮杜尔、朱安和帕莱夫斯基将军陪同下，由苏联大使鲍戈莫洛夫作向导乘帆船前往苏联。途径开罗、德黑兰、巴库和斯大林格勒，12月2日，抵达莫斯科。

莫斯科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全体俄罗斯人一样，莫斯科显得庄严无比，象一座巨人一样在德国法西斯猖狂进攻的狂风恶浪中坚如磐石，巍然屹立。戴高乐在改乘汽车入城之前，在机场上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士兵们个个挺拔威武。站在那里，象一群群士兵纪念碑；待枪行进，步伐坚定有力。所有这些，使戴高乐更加坚定，苏联红军必胜，德国法西斯必败的信心。

当晚，戴高乐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穿过警卫林立的长廊，戴高乐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

“您好，将军阁下，能在苏联国土上见到您，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斯大林凝视着戴高乐的眼睛一面向他伸过手去。

在与斯大林握手的瞬间，戴高乐感到这位神秘的苏联领导人外表看来是这样的普通：他中等身材，腰杆笔直，上穿翻领制服，下着裤脚塞进软底靴的裤子，确是一位纵横沙场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

沿着长桌的两侧摆着椅子。所有的人各就各位，法国人坐在桌子的一侧，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译员波日罗夫坐在桌子的另一侧。

一阵寒暄之后，会谈很快地进入到实质性的问题。一开始就谈到德国问题。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怀疑德国在盟国的打击下将在短期内崩溃。双方立即在原则上同意必须使德国不能再危害世界。

斯大林说，“为了共问防止来自德国的任何新的侵略，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个法俄条约吧。”

提到法俄条约，戴高乐禁不住含沙射影地刺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下，他提到了1935年赖伐尔参加谈判的法俄同盟条约。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显然被戴高乐打中了要害，他们一致说：1935年所签订的条约是他们同赖伐尔签订的，由于赖伐尔的原因，这项条约的精神和条款从未实现。”

“我不是皮埃尔·赖伐尔”，戴高乐解释说，“我刚才提到1935年条约是为了证明在德国的威胁面前，法国和俄国采取共同行动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我们可能怎样履行新的条约，我认为过去的惨痛经验足以使两国领袖接受教训。”

双方同意由皮杜尔和莫洛托夫草拟条约的全文。在以后的几天里，两国部长进行了多次会晤。他们互相交换了条约草案。戴高乐在莫斯科逗留了八

天，经过多次谈判，终于签订了法苏互相同盟条约，有效期为 20 年。

12 月 10 日凌晨 4 时，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双汀外交部长在双方代表团的簇拥下分别在法文本和俄文本上签了字。它记载了两国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决不单独媾和的决心，而且还记载了在今后采取共同措施对付德国新威胁的决心。

斯大林和戴高乐分别站在双方外交部长的身后，戴高乐向斯大林说：“您看，条约就这样批准了。关于这一点，我想您的顾虑已经消除了。”于是，两国领导人互相握了手。斯大林元帅说：“我们应该表示庆贺！”当即摆好餐桌，共进夜宵。

临别之时，斯大林热情洋溢对戴高乐说：“您尽管相信我！假使您，假使法国需要我们的话，即使仅剩最后一口汤，我们也要分着喝。”

当日上午，戴高乐一行离开了莫斯科。戴高乐经由德黑兰、突尼斯回到巴黎。法苏条约使人们欢欣鼓舞，戴高乐尽情地沉浸在这派欢乐的气氛中。不过在欢乐的同时，他又听到令人不快的消息：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即将会商“无条件投降”后的德国的命运问题。在“三巨头”当中依然是罗斯福在排斥戴高乐参加。

在戴高乐还在莫斯科期间，罗斯福便于 12 月 6 日写信给丘吉尔说：“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任何企图使戴高乐参加我们三个会晤的尝试，都只能使情况复杂化和令人不愉快。”

1945 年 2 月 3 日，三巨头在雅尔塔华丽的皇宫和别墅里聚首，戴高乐没有参加。那天下午，罗斯福问斯大林，在戴高乐最近访问期间他和戴高乐相处得怎样，令人惊异的是，斯大林答道，他发现戴高乐其人“并不复杂”。但是，当讨论到盟军占领德国的问题时，斯大林却坚决反对让法国在德国获得一个占领区并在拟议中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取得一个席位的建议。并很快得到罗斯福的支持。

戴高乐原以为，签订了法苏条约，斯大林便会支持法国的要求，他的这种希望，在条约签订后几个星期之内就这样破灭了。

戴高乐在巴黎听到这一消息时，憋着一肚子火。2 月 5 日雅尔塔会议正式开幕的那一天，戴高乐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了这样一个警告：“关于缔造未来的和平问题，我们已经通知我们的盟国，法国对于自己没有同其他国家以同等权利参加讨论和表示同意的事情，当然不受任何约束……我明确指出，法国认为：从莱茵河的这一端到那一段都要驻扎法国军队、莱茵河左岸地区和鲁尔矿区应脱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国家必须独立……法国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我们确信能够实现这些条件中的某些项目，因为在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地方的周围，有一亿人口紧密地团结在法国的旗帜下。”

经过戴高乐的据理力争，以及英、美出于对付苏联的考虑，会议最终作出决定，法国还是得以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并成为管制德国的第四个成员国，并被邀请参加伦敦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对德和约的基础。

法国从大战中一败涂地到战后成为战胜国参加对德占领，跻身于大国之林，这是戴高乐一生中的梦想。如今，这个梦想终于成为现实。综观国际形势，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捷报频传，苏军和盟军正从东西两面夹击，向德国心脏迅猛推进，德国法西斯处在灭亡的前夕。胜利已成定局，戴高乐感到无比振奋，翘首等待着那最后的胜利时刻。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的老巢被一举攻破，柏林守军宣布投降。

在柏林战火平息以后，苏军暂时全面接管了这座城市。经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通过外文途径与美英军方联系，盟国商定，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5月8日将于柏林正式举行。

戴高乐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亲自委派塔西尼将军代表法国参加即将在柏林举行的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

1945年5月8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傍晚，德国无条件投降书的签字仪式在德国军事工程学校举行。法军总司令德·塔西尼将军代表法国，同苏联、英国、美国的将帅们一同走进大厅。

进入大厅，塔西尼一眼就看到三色旗和各盟国的国旗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图画。他顿时感到周身的热血在沸腾，多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个饱受灾难、悲痛和分裂的法兰西复活了，她不仅收复了自己的领土，而且恢复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并被邀请同各大国一起解决世界的命运。这时，他不由得想到了远在巴黎的戴高乐，这位不屈不挠的反法西斯抗战英雄。而此时，戴高乐也在等待着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坐定之后，塔西尼将军静静地等待仪式的开始。按照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指示，值班军官请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进入大厅。希特勒的将帅们走进大厅。走在前面的是凯特尔元帅。他走进来时，还尽力保持着威严和傲气。他把元帅杖举到自己胸前，并立即放下，以示敬意。他想在自己承受耻辱时做得体面点，尽量抑制自己的表情，但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露出颤抖和羞辱。跟在他后面的是弗里德堡海军上将和施通普夫空军上将。他们坐在专门为他们准备的桌子旁边。

这时，朱可夫元帅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书现在开始签字。

凯特尔为了证明他有权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签字投降，交出了邓尼茨元帅签署的全权证书，然后他打开一个文件包，拿出钢笔，准备在他面前的投降书上签字。

这时，朱可夫冷冷地看了一下凯待尔，厉声喝道：“到这里来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凯特尔顺从地站起来，走到坐在苏联和盟军统帅部代表的主席台前。他激动异常，脸上出现了紫红的斑点，他颤颤微微地把手中的元帅杖在腋下一夹，戴上单片眼镜，用颤抖的手签署了全部九份投降书。

他们签字时，大厅内一片静寂。然后，朱可夫元帅和特德空军上将也签了字，表示接受投降。在投降书上签字的还有见证人美国代表、战略主军司令斯帕茨将军，法军总司令德·塔西尼将朱可夫元帅说，让德国代表们离开大厅。凯特尔率领德军将帅们恢溜溜地离开了大厅。

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欢呼雀跃，互相祝贺胜利。苏、美、英、法等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蒙受重大牺牲后，终于迎来了胜利。

德国无条件投降书共分六条，第一条规定：

“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投降书从1945年5月9日0时开始生效。欧洲战争至此结束。

当天晚上，法国全国一片欢腾，热烈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们潮

水般地拥向街头，拥向广场，为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家家屋顶上、窗户外悬挂起了法国国旗。

巴黎凯旋门广场上更是挤满了欢庆的人群。当天晚上，戴高乐在欢腾的广场发表演说：

“战争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这是联合国家的胜利，也是法国的胜利！”

随后，广场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礼炮，五彩缤纷的礼花腾空而起，把巴黎的夜晚装扮得更加美丽。

两个多月之后，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作为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至此，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到此结束。

戴高乐与每一位爱好和平的人民一样，都在为这得来不易的胜利而欢呼雀跃。同时，他在心中也默默地祈祷：

“和平已在世界上恢复，我祈求上帝永远保佑它。愿和平永驻……”

韶华易逝，岁月难留。

历史的日历终于翻到了1958年。转瞬之间，戴高乐在拉布瓦瑟里隐居已经度过了十二年的光阴。

十二年的光阴对于戴高乐来说是如此的漫长。在这漫漫长日里，他独自在拉布瓦瑟里的阁楼里精心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戴高乐虽然早年写过几部作品，但如今他写起长篇巨著来仍很费力，他既不像丘吉尔那样口授，也不像专业作家们使用打字机。他拿自来水笔用黑墨水一笔一画地往下写。修改后，再由他的女儿伊丽莎自做打字工作，她能非常熟练地辨认她父亲那难以看懂的字迹。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1954年10日，戴高乐精心撰写的《战争回忆录》第一卷《召唤》出版，引起了国内外重视，立即成为畅销书，戴高乐以其自身的独特经历、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精湛的文学语言，使这部回忆录不仅成为研究世界现代史的重要的第一手史料，而且作为文学作品获得了高度评价。紧接着，第二卷《团结》于1956年5月出版。

写作的成功给戴高乐带来了极大的慰藉。但是，政治上的不得志仍使他越来越苦闷，忧郁之情有增无减。他默默地呻叹道：“难道说命运已经注定了吗？死亡永远得胜了吗？不是的！在我这无力的地面底下，已经在隐隐约约地积聚着一种力量。我虽然在黑暗里静眠不动，却已顶感到光明和生命复始的美妙前景！”

这一天，终于等到了。1958年6月1日，鉴于阿尔及尔军事暴乱而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国民议会以329票对224票通过授权戴高乐组阁。6月2日，议会授予戴高乐6个月的政治全权、修改宪法的权力以及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特别权力，戴高乐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再度当政。

盼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戴高乐终于如愿以偿，可以逐步实现他在科隆贝隐居岁月中反复构思的振兴法兰西的宏伟蓝图了。这时，他已年过67岁了。

再度执政的戴高乐，首先把制订新宪法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新宪法的基本思想是革除从第三共和国延续到第四共和国旧体制的弊病，重建国家权威。其主要特点是削弱议会权力，降低总理和内阁的作用，大大扩充总统的职权。按照戴高乐的说法，新体制既是议会制又是“总统制”，实际上这是一种“没有议会权力的议会制度”，从而使法国从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变成了半总统制国家。

事隔3个月，1958年9月4日，在国民选举中，戴高乐制订的新宪法不仅获得通过，而且，他被选举为法国新总统。1959年1月8日，戈蒂向新总统戴高乐移交权力，标志着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终结和第五共和国的兴起。

戴高乐终于登上了总统宝座，他也不曾料到，在他68岁的时候，命运之神把他推上了政坛的顶点。几十年的梦想，几十年的奋斗，终于赢来了这辉煌的时刻。这时，他仿佛已忘记了自己已是68岁的老人，他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已经越过了年龄的障碍，可以无限期地活下去了。”

这一活，他就活到1970年。

1970年11月4日，圣查理节那天，戴高乐在他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的陪同下，在科隆贝双教堂区附近散步。

戴高乐再次来到科隆贝村隐居已经一年有余了。

1968年春天，从北美到西欧此伏彼起的学生运动蔓延到了法国。5月3日，巴黎大学学生首先发难，占领学校。政府出动警察驱赶闹事学生，导致学生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从5月7日到10日，冲突进一步升级，巴黎三万人示威，外省城市也发生骚动。5月13日，学生串联工会，各工会组织决定实行总罢工。值此导致戴高乐上台的阿尔及尔暴乱十周年之际，六、七十万人上街游行，提出了鲜明的政治口号：“十年太长了！”“戴高乐辞职！”矛头直指象征现行制度的戴高乐。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五月风暴遂发展成为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时至6月，骚乱平息。戴高乐好不容易度过了五月危机，重新控制了局势。然而，五月风暴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并未随之消失。

戴高乐上台后的十年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十年，垄断资本的实力大大加强的十年，但他的经济社会改革并没有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多少实惠，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日益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利益，从而逐渐失去他们的支持，戴高乐政权的社会基础正在逐步削弱。五月风暴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法国人民对戴高乐政权的不满和厌倦的一次总爆发。

到了1969年春，随着年月的推移，戴高乐身体越来越不支了，人们对他已经不再抱有多大的希望。不希望他1972年任期满后继续执政。为了再度获得人民的信任票，以重振大大低落了威望，戴高乐第五次求助于公民投票。他宣布，他是否继续任职要取决于全民对他改革计划表决的结果。如果失败了，他就退休。4月27日，投票结果，赞成票占47.58%，反对票占52.41%。

1969年4月28日凌晨，一个紧张、严肃而衰老的声音对法国人民说道：“你们的回答决定了法国的命运，既然你们中的多数人不再信任我，目前我作为国家元首的工作显然就不能再完成了，我将立即停止执行我的任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1969年1月28日上午11时。”

这个孤独的慈父般的声音，在1940年使一个被征服的民族从失败中振作起来，继续去同残忍而无所不在的敌人作战；这个声音，在1958年以后的年代使一个国家获得超出它的地域和财力的尊严和荣耀；这个声音，在几十月以前还像是战无不胜的、而如今它却失去了咄咄逼人的说服力。就这样，夏尔·戴高乐被53%的选民抛弃了。

1969年4月28日上午，戴高乐收拾起日常生活用品，连同早就准备好的文件档案，悄然离开了金碧辉煌的爱丽舍宫，毫无恋栈之意……

一个老人的身影就这样又重新出现在科隆贝村拉布瓦瑟里。

老人在年轻军官的陪伴下，一边聊天，一边散着步，说着说着，他们来到了一座墓碑前。这是戴高乐最疼爱的女儿安娜的墓地。20年前，女儿安娜不幸死于肺炎，葬于科隆贝材教堂的墓地。戴高乐对女儿的死不胜悲痛，安葬安娜的那天，他握着夫人伊冯娜的手说，“走吧，现在她跟别人一样了”。安娜死后，每逢此节，戴高乐总忘不了到女儿的墓前默哀。他觉得女儿独自一个人在这里太孤单了。

经过一座座墓碑时，他指着那些碑文说：“在科隆贝，人都活得长寿。看，享年85岁、83岁、还有90岁的。”接着又说：“我也快80岁了，真是一关呀！”来到女儿的墓地，戴高乐重复地说道：“这里是我愿意的将来葬身之地。”

谁能料到，10天之后，戴高乐真的就安葬在这里，实现了他死后永远陪伴爱女的夙愿。

1970年11月9日下午7时差几分。戴高乐象往常一样，在晚饭前的片刻玩纸牌消遣，突然因血管破裂引起体内大出血而不省人事。7时25分，戴高乐猝然去世，仅差两个星期，他就整整80岁了。

噩耗传出，法国举国悲痛。戴高乐在多年前立下遗嘱：葬礼必须极其简单，只在科隆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墓碑上只立一简单墓碑；不要举行国葬，不要议会致悼词；不要任何称号、晋升、荣誉和表彰等。

尽管如此，11月12日戴高乐下葬的那天，四万多人自法国各地赶往科隆贝送葬；同日，巴黎50多万人冒雨伫立在凯旋门、在26年前他们的救星站过的地方，肃立致敬。

人民永远怀念这位在法国反法西斯历史上大放异彩的将军。

